

世纪文库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讲义 / 王欣夫撰.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5325-3908-3

I. 文... II. 王... III. 文献学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01716号

责任编辑 谷 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4

字 数 271 000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908-3/K · 650

定 价 35.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文献学讲义

前 言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字欣夫，号补安，后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市)，后其祖父移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遂为吴县人。先生诞生于清朝末年，未受科举洗礼，亦未接受新学薰陶，年轻时随吴江著名文学家金松岑学习国学，后又到金的老师吴县曹元弼处学习经学。曹为前清翰林院编修，是专精三礼的经学大师，先生从其受业，故对三礼亦有专门研究。学业有成，应苏州女师聘请，在该校任教。后又应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任国文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66年因患肺炎去世。

先生生长在一个书香家庭，先世以经商致富，但他曾祖父，已边经商，边学文，亦商亦儒，并撰有《资敬堂家训》二卷。他父亲王祖询则开始走上从政的道路，家中已有藏书数千卷，著名的有宋本《陶渊明集》、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余仁仲本《周礼郑注》等宋元刻本三十余种。《四部丛刊》所收明弘治本《陈伯玉集》，亦为王氏“二十八宿研斋”中故物。受家庭环境和师友薰陶，先生年轻时就养成了对古籍文献的浓厚兴趣，授课之余，以搜集资料、校勘古籍为乐。对文献资料，先生不仅勤于搜集，使其不致散佚，并且致力于刊刻传布，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如在1935—1941年间，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环境十分

恶劣，但先生还是克服各种困难，与友人一起辑印了自《乙亥丛编》至《辛巳丛编》的七辑丛编，收书七十余种，保存了一批流传稀少的文献资料。同时还辑印了黄丕烈的《尧圃藏书题识续录》、《再续录》、《尧圃杂著》和顾千里的《思适斋书跋》、《补遗》、《思适斋集补遗》、《再补遗》等，连同先生前此所写的《黄尧圃先生年谱补》，为这两个清代最著名的大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的研究资料。

作为一位藏书家，先生在收藏图书方面付出了毕生精力，同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去世前的五、六年间，他抱病为自己手头留存的部分善本图书撰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藏书目录——《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显示了他的藏书特色。《书录》著录图书约一千种，然各书均有“提要”，对书的传授源流、版本异同、内容得失以及作者、批校者、抄写者、收藏者等的生平行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索，为读者提供了有关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书录》还收录稿本一百余种，大都为清代学者著作。其中如王舟瑶据宋刻残本、刘燕庭集宋百衲本、元中统本、明王延喆翻宋本等十六种版本校勘而成的《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一百三十卷，约二百万字，因卷帙浩繁，未有刻本，仅有此手稿流传。又如孙文楷、高鸿裁所撰《山东金石志稿》，著录商代至元代金石作品三千二百余种，每种均有考证，为阮元撰《山左金石志》时所未见。其他如惠栋、翁方纲、卢文弨、冯桂芬、许克勤、沈钦韩、郑文焯、胡玉缙、曹元忠等学者的手稿，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录》中收有被先生称为“学礼斋中镇库之宝”的《积书崑摹古帖》一种，全稿六十册，为康熙时著名书法家王澐的手书稿本。此帖为王氏积数十年心血积聚而成，所临摹法帖碑板自周秦迄唐宋达八百三十四种，自撰题跋二百八十种。书则四体具备，跋则考据与鉴赏并重。此帖一半藏清宫南书房，另一半归无锡华氏所有，华氏兄弟析产时，相持不下，遂各析其半。1927年先生经友人介绍，得其前半；后又遇华氏之另一半，因索值昂贵，而手

头拮据，师母乃以典当首饰所得以充购书之款。由此可见先生在搜罗珍贵资料中的艰辛历程。

《书录》中著录数量最多的是抄本，共四百余种，约占全书之半。其中很多抄本系据作者手稿抄录，有些底本流传极为稀少，且有不少据抄底本已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仅靠抄本流传，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嘉业堂抄稿本《四库全书提要稿》为翁氏所撰《提要》底稿，与目前通行的经纪昀修改润饰的《提要》内容颇有出入，保存了翁撰《提要》的原貌。明谢肇淛小草斋精抄本《沈下贤文集》则是现存沈集时代最早的抄本。孙传凤手抄陈昌齐所撰《淮南子正误》一书，亦为近代专门研究《淮南子》的学者如刘文典、吴承仕、杨树达等所未见。至若旧抄本《明史列传稿》二百六十七卷、袁廷桢贞节堂抄本《三朝北盟会编》（存）一百七十二卷、旧精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七十六卷，皆为皇皇巨制，凝聚了前代学者的巨大心血。

先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当推经过名家手校或录有学者校语的批校本，《书录》中收录了二百种左右。这些校本，有的根据极为罕见的版本，有的汇聚了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其中如黄丕烈手校的《五代史补》、《五代春秋》、《五国故事》，顾千里手校的《困学纪闻》、《戴东原集》、《文选理学区舆》、《文选李注补证》，惠栋手校的《诗外传》、《毛诗草木虫鱼疏广要》，焦循手校的《汉书》，钱大昕手校的《汉书正误》，段玉裁、江标手校的《尔雅注疏》，冯桂芬、江标、莫友芝手校的《说文解字段注》，卢文弨手校的《尚书后案》，曹元忠手校的《三国志》，沈钦韩手校的《中吴纪闻》等等，名家名校，十分难得。由于名家手稿极为难得，可遇而不可求，先生还千方百计从师友处借来各种学者校本，加以过录，从而扩大了资料的收集范围。如惠士奇、惠栋、戴震、段玉裁、卢文弨、顾千里、阎若璩、江声、陈奂、沈大成、朱竹垞、纪昀、俞樾、黄侃、马叙伦等清代及近代名家不下数十百家，均有校本传录。此类校本，搜集极为不易，先生成年累月，孜孜以求，才能取得如此丰

硕成果。其工作之艰辛，亦不难想见。

欣夫先生是一位藏书家，不管客观环境如何困难，他总是设法克服，全力以赴，从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更值得称赞的是，他还是一位实践家，亲身参加了对文献资料的辑录、整理、校勘、刊刻等工作。据粗略统计，经他亲手辑录的著作，从早年的《莞圃藏书题识续录》、《思适斋集补遗》直至晚年的《松崖读书记》，以及经他整理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证》等有五十余种、数百万字之多。经他亲手校勘、抄录的书稿有四十余种。同时又是一位在目录、版本、校勘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专家，他对《书录》中著录的近千种书稿，不仅客观地加以记录，还对书稿的内容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价值所在，帮助读者对书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先生生平治学严谨，基本遵循清代经学家的治学道路，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努力做到言必有据，不尚空言。在《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之商榷》一文中，根据宋本《管子》杨忱的序文纠正了郭文称此本为“杨忱本”的错误，并根据书中刻工姓名考定了《管子补注》的作者刘绩为明代弘治时期的江夏人，而并非郭文所称的“辽人”。此一论述，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同。

先生著述，除已印行的《黄莞圃先生年谱补》、《补三国兵志》、《藏书纪事诗补正》、《文献学讲义》等外，尚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管子校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学礼斋随笔》、《学礼斋文存》、《学礼斋杂著》等十余种，其中以《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最能代表其在文献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文献学讲义》是先生在讲授“文献学”课程时所用的讲稿。全书从目录、版本、校勘三个方面，综合地对文献学的流变概况作了论述。本书浓缩了先生毕生收集、整理古籍文献的心得与体会，尤其是书中注意到新出土的各种资料，注意到日本等海外所存的中国文献在文献学研究中的作用，注意到现代学者如鲁迅、郭沫若、马叙伦、杨树

前言

达、闻一多、陈垣等在校雠学方面的成果，在当时同类的著作中独具慧眼。书中收集的材料亦较丰富，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有关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不少基本知识，作为进一步研究必要的参考。

徐 鹏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一、世纪文库

-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 澂著
《〈马氏文通〉读本》 吕叔湘 王海棻编
《中国制度史》 吕思勉著
《汉语诗律学》 王 力著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顾颉刚撰
《中国文字学》 唐 兰撰
《中国哲学十九讲》 牟宗三撰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撰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撰
《诗论》 朱光潜撰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撰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撰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陈 垣撰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著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著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李景汉著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李安宅著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 李安宅著
《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英]锡德尼·维伯 比阿特里斯·维伯著 秋水译
《哲学研究》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陈嘉映译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恶的象征》 [法]保罗·里克尔著 公车译
《国民经济学原理》 [奥]卡尔·门格尔著 刘絮敖译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德]赫尔曼·哈肯著 凌复华译
《我的艺术生活》 [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瞿白音译
《时代的精神状况》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 王德峰译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乔治·H·米德著 赵月瑟译
《蒂迈欧篇》 [古希腊]柏拉图著 谢文郁译注
《伦理学原理》 [英]乔治·摩尔著 长河译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 阎克文等译
《道德哲学原理》 [英]亚当·弗格森著 孙飞宇 田 耕译
《论暴力》 [法]乔治·索雷尔著 乐启良译
《论教育学》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赵 鹏译
《教育片论》 [英]约翰·洛克著 熊春文译
《形而上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李 真译
《论三位一体》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周伟驰译
《论李维》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 冯克利译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利安·班达著 余碧平译
《论法国》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著 鲁 仁译
《确定性的寻求》* [美]约翰·杜威著 傅统先译
《利息理论》* [美]厄文·菲歇尔著 陈彪如译

《主权论》· [法]让·博丹著 孙飞宇 田 耕译
《论人》· [英]托马斯·霍布斯著 孙向晨译

二、世纪前沿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吴叡人译
《权力与繁荣》 [美]曼瑟·奥尔森著 苏长和 嵇 飞译
《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 [西]马克斯·H·博伊索特著
张群群 陈 北译 张群群校
《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
庞学铨 李张林译
《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 邓红风译
《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 应 奇 葛水林译
《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 [加拿大]詹姆斯·塔利著 黄俊龙译
《反资本主义宣言》 [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著 罗 汉 孙 宁 黄 悦译
《驯服全球化》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 童新耕译
《为承认而斗争》 [德]阿克塞尔·霍奈特著 胡继华译
《奢侈的概念》 [英]克里斯托弗·贝里著 江 红译
《国体与经体》 [英]约瑟夫·克罗普西著 邓文正译
《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 [法]皮埃尔·罗桑瓦龙著 吕一民译
《寻找政治学》· [英]齐格蒙·鲍曼著 洪 涛等译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
邓安庆 朱更生译
《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 [澳]苏珊·马克斯著 方志燕译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 陶东风译
《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 庞学铨 李张林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英]艾里克·沃尔夫著 赵丙祥译

三、袖珍经典

《原始分类》 [法]爱弥尔·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著 汲喆译 渠 东校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 渠 东译 梅 非校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德]马克斯·韦伯著 胡景北译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陈 涛 周辉荣译 刘北成校
《奢侈与资本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王燕平 侯小河译 刘北成校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苗力田译
《实用人类学》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邓晓芒译
《图腾制度》 [法]列维·斯特劳斯著 渠 东译 梅 非校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王明璐译
《图腾与禁忌》 [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赵立玮译
《社会形态学》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王 迪译
《信任》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 瞿铁鹏 李 强译
《权力》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 瞿铁鹏译
《对欧洲民族的讲话》 [法]朱利安·班达著 余碧平译
《永久和平论》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何兆武译
《相对论的意义》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 郝建纲 刘道军译 李新洲审校
《对称》 [德]赫尔曼·外尔著 冯承天 陆继宗译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法]马塞尔·莫斯著 汲喆译 陈瑞桦校
《道德科学的逻辑》· [英]约翰·密尔著 陈光金译

《现代君主论》*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陈越译
《论诗剧》* [英]约翰·德莱顿著 赵荣普译
《马克斯·韦伯论大学》* [美]爱德华·席尔斯著 张美川译

四、大学经典

五、开放人文

(一) 插图本人文作品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著
《历史研究》(插图本)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 刘北成 郭小凌译
《希腊罗马神话》 [德]奥托·泽曼著 周惠译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美]查尔斯·盖雷著 北塔译
《法国史图说》 [法]E·巴亚尔等著 黄艳红等译
《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
《欧洲漫画史(1848—1900)》* [德]爱德华·富克斯著 章国峰译
《世界史纲(上、下)》* [英]赫·韦尔斯著 梁思成等译

(二) 人物

《我的大脑敞开了——数学怪才爱多士》 [美]布鲁斯·谢克特著 王元 李文林译
《古多尔的精神之旅》 [英]简·古多尔 菲利普·伯曼著 祁阿红译
《美丽心灵——纳什传》 [美]西尔维娅·娜萨著 王尔山译 王则柯校
《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科学罗曼史》 [美]丹尼斯·奥弗比著 冯承天 涂泓译
《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 [英]约翰·格里宾 玛丽·格里宾著 江向东译
《福柯的生死爱欲》 [美]詹姆斯·米勒著 高毅译
《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 [美]达娃·索贝尔著 谢延光译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富歇传》*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侯焕阁译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玛丽·斯图亚特传》*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侯焕阁译

(三) 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 科学人文

《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 [美]迈克尔·波伦著 王毅译
《生命的未来》 [美]爱德华·威尔逊著 陈家宽 李博 杨风辉等译校
《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 [英]约翰·巴罗著 李新洲等译
《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 [美]哈尔·赫尔曼著 赵乐静译
《第五元素——宇宙失踪质量之谜》 [美]劳伦斯·克劳斯著 杨建军等译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比]伊·普里戈金 [法]伊·斯唐热著 曾庆宏 沈小峰译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英]西蒙·辛格著 薛密译
《机遇与混沌》 [法]大卫·吕埃勒著 刘式达等译
《天遇——混沌与稳定性的起源》 [罗]弗洛林·迪亚库 [美]菲利普·霍尔姆斯著 王兰宇译 陈启元 井竹君校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美]威廉·J·米切尔著 吴启迪 乔非 俞晓译
《未来是定数吗?》* [比]伊利亚·普里戈金著 曾国屏译
《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 [美]亨利·N·波拉克著 李萍萍译
《林肯的DNA》* [美]菲利普·R·赖利著 钟扬等译

[注]书名后加*表示即将出版

目录

前言 / 徐鹏/1

第一章 绪言 / 1

- 第一节 文献学的涵义 / 1
- 文献二字的来源和解释 / 1
- 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 / 2
- 广义的文献学 / 2
- 文献学的三个内容 / 3
- 文献学的三位一体 / 4

第二章 目录 / 5

-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和演变 / 5
- 目录二字的意义 / 5
- 目录名称的确立 / 6
- 目与录的区别 / 7
- 目叙录不同体例的说明 / 8
- 目录不具篇目的流弊 / 9
- 第二节 目录学的重要 / 9
- 目录学为研究古书的指导 / 9
- 目录学界义的讨论 / 10
- 利用目录学的方法 / 11
- 以目录著录有无断书的真伪 / 11
- 用目录考古书的分合 / 12
- 以目录著录部次定古书的性质 / 12
- 因目录访求阙佚 / 12
- 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 12
- 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的真伪 / 13

第三节 目录的分类——七略与四部 / 13

目录必须先明类例 / 13

《七略》和四部 / 14

《七略》的类例创于刘向而成于刘歆 / 15

《汉志》为《七略》的节本 / 15

《汉志》据《辑略》作小序 / 16

《汉志》的分类基于校书的分工和篇卷的多寡 / 16

《汉志》六艺与传记的区别 / 17

荀勖以前四部的内容 / 17

四部的创始当属荀勖 / 18

《中经新簿》的分类 / 19

李充对四部的修正 / 20

第四节 目录的体例 / 20

《别录》《汉志》附注作者简史 / 20

考作者的行事 / 21

考作者的时代 / 22

考作者的学术 / 23

目录编订的体例 / 24

目录体例的评价 / 26

第五节 史家目录 / 27

《汉书·艺文志》为史家目录的创始 / 28

《汉志》据《七略》加以整理 / 28

《汉志》注意辨别伪书 / 29

研究《汉志》的重要材料 / 29

《隋书·经籍志》根据《五代史志》 / 31

《隋志》及其与阮孝绪《七录》的关系 / 31

《旧唐书·经籍志》的缺点 / 32

《新唐书·艺文志》的内容 / 32

《宋史·艺文志》的缺点 / 32

目录

- 《明史·艺文志》的内容 / 33
- 《清史稿·艺文志》的纠谬 / 33
- 《通志·艺文略》和《国史经籍志》的批评 / 34
- 第六节 补史目录 / 34**
- 后人补作史志的概述 / 34
- 姚振宗补《汉志》的成绩 / 35
- 补《后汉书》艺文志各家评述 / 36
- 补《三国志》艺文志各家评述 / 37
- 补《晋书》艺文志各家评述 / 37
- 《隋志》的补遗 / 38
- 《南史》《北史》和《五代史》艺文志的补作 / 38
- 《辽史》《金史》《元史》艺文志的补作 / 39
- 第七节 官家目录 / 39**
- 官家目录的原始 / 39
- 东汉官家目录 / 40
- 郑默《中经簿》 / 40
- 荀勖《中经新簿》 / 40
- 两晋官家目录 / 41
- 宋齐梁陈官家目录 / 41
- 北朝书目考略 / 42
- 隋代官家目录 / 42
- 唐代《群书四录》 / 43
- 宋代《崇文总目》 / 44
- 南宋官家目录 / 44
- 明代《文渊阁书目》和《内阁书目》 / 45
- 清代《四库总目》 / 46
- 清代的《天禄琳琅书目》 / 46
- 第八节 私家目录 / 47**

- 私家目录的溯源 / 47
- 梁阮孝绪《七录》 / 48
-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 49
-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 49
- 尤袤《遂初堂书目》 / 50
- 明高儒《百川书志》 / 50
- 钱曾《读书敏求记》 / 51
- 清黄丕烈《蕘圃遗书》 / 51
-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 52
-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 52
- 杨绍和《楹书隅录》 / 52
-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 53
-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 53
- 晚近有名的藏书志 / 53
- 第九节 地方著述目录 / 54**
- 方志艺文志的重要 / 54
- 方志艺文志创自《剡录》 / 54
- 方志艺文志的两种体裁 / 55
- 方志艺文志的单行本 / 56
- 方志艺文的专著 / 56
- 总论方志艺文的体例 / 57
- 第十节 专科分类目录 / 58**
- 专科目录的溯源 / 58
- 专科目录的门类 / 58
- 朱彝尊《经义考》 / 59
- 《小学考》和《许学考》 / 59
- 章学诚《史籍考》的拟例 / 60
-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 / 60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 / 61

第三章 版本 / 62

第一节 版本的起源和发展 / 62

版本的本义 / 62

版本名词的始见 / 63

版本与造纸的关系 / 64

雕版创始的各种传说 / 64

雕版始于唐代的实证 / 65

唐代佛经的雕版 / 65

五代刻书的发展 / 66

后唐的开雕《九经》 / 66

孟蜀的开雕《九经》 / 67

蜀毋昭裔的刻书 / 68

吴越所刻佛经 / 69

道书的刻行 / 69

现存的五代刻本 / 69

五代时的铜版 / 69

第二节 版本的重要 / 70

写本的易于窜改 / 70

读书必得旧本的理由 / 71

据误本的为害 / 71

官刻本的注重校讎 / 72

视旧本为骨董的批判 / 73

读书而不知版本的批判 / 73

谈版本不能脱离校讎 / 74

第三节 版本前的文献材料——甲骨、金石、简牍 / 75

甲骨用于贞卜的说明 / 75

甲骨的发现和有关著作的印行 / 76

甲骨文中的历史内容 / 77

甲骨研究的分类 / 77

- 甲骨在文献上的价值 / 77
- 上古镂金的记载 / 78
- 周代镂金的记载 / 78
- 古器物的名类 / 79
- 历代金文的著录 / 79
- 金文的文献价值 / 80
- 新发现的鄂君启金节 / 81
- 金刻为周秦两汉的书籍 / 82
- 周秦的石刻 / 82
- 汉石经为经籍版本的创始 / 83
- 魏石经概略 / 84
- 唐石经概略 / 84
- 蜀石经概略 / 85
- 北宋石经概略 / 86
- 南宋石经概略 / 86
- 清石经概略 / 87
- 单刻本石经 / 87
- 石经的价值 / 87
- 其它石刻书籍 / 88
- 石刻道书和佛经 / 88
- 简牍的溯源 / 88
- 孔壁竹简 / 89
- 晋汲冢竹简及以后的几次发现 / 91
- 晚近的和考释 / 92
- 第四节 未有版本前的写本 / 93**
- 汉代竹和帛并用 / 93
- 篇卷名义的解释 / 94
- 汉唐人多好钞书 / 94
- 写本的形式和装潢 / 95
- 写本的用纸和界栏 / 95
- 传世的唐写本 / 95
- 敦煌古写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 95

目录

- 敦煌古写本的影印和考释 / 96
- 日本所存的唐写本 / 97
- 近代影刻的唐写本 / 97
- 第五节 两宋版本的概述 / 98**
- 北宋继承和发展了五代的刻书事业 / 98
- 北宋刻本的依据 / 98
- 北宋监本校刻的慎重 / 99
- 北宋刻佛经 / 101
- 南宋修补监本和征集书版 / 101
- 南宋的官刻本 / 102
- 眉山刻七史 / 102
- 南宋私刻本的繁盛 / 103
- 岳珂和廖莹中的精刻本 / 104
- 南宋书坊刻书的繁盛 / 105
- 临安陈氏所刻书 / 105
- 建安余氏所刻书 / 106
- 佛藏的刻本 / 107
- 各地刻本的优劣 / 107
- 毕昇活字版的发明 / 108
- 其它传世的活字本 / 109
- 宋刻本的版式 / 109
- 宋刻本的行款 / 110
- 宋刻版口的各种专名 / 110
- 宋刻本的避讳 / 111
- 宋刻本的字体 / 112
- 宋刻本的版心高广 / 113
- 第六节 辽金元版本的概述 / 113**
- 辽代书禁的严厉 / 113
- 金代平阳刻书的盛况 / 114
- 赵城藏经的发现和保存 / 115
- 元代兴文署的建立 / 115
- 官刻书和九路本《十七史》 / 116

- 学校刻书的精善 / 117
- 元代用官款刻私人著作 / 118
- 私刻书的概况 / 118
- 书坊刻本的特点 / 118
- 小说戏文的发现和价值 / 119
- 元刻本的款式 / 120
- 名人手写的精刻本 / 120
- 王桢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 120
- 禁止翻刻的告白 / 121
- 第七节 明代版本的概述 / 122**
- 南北监的修版和重刻 / 122
- 经厂本的内容 / 122
- 官署刻书和都察院刻小说 / 123
- 书帕本的评价 / 123
- 藩府刻书的发达 / 123
- 私刻本的精华 / 124
- 毛晋汲古阁的刻书事业 / 125
- 毛刻本的评价 / 126
- 书坊刻书的繁盛 / 128
- 华氏和安国的活字本 / 129
- 华氏活字本的批评 / 130
- 其它活字精本 / 131
- 名人手写的精刻本 / 132
- 木刻画的艺术成就 / 132
- 彩色套印的发明 / 133
- 精刻的产地苏州与徽州 / 134
- 明刻当与宋元刻等重 / 134
- 第八节 清代版本的概述 / 135**
- 康熙至乾隆内府刻书的盛况 / 135
- 宋字体和软字体 / 135
- 铜活字和木活字 / 136
- 复宋元、套印、篆文、清文、图绘各种刻本 / 136

目录

各种版本名称和特制纸料 / 137	
各省官书局刻本 / 137	
清初私家精刻本 / 138	
嘉庆道光两朝刻书的中心人物 / 138	
名人手写精刻本 / 140	
年羹尧与和珅所刻书 / 141	
名刻本的缺点 / 141	
丛书的发展和特色 / 142	
有名的刻工和写者 / 143	
双钩本的技术 / 143	
刻书用古体字的流弊 / 143	
清末刻书的盛况与提倡者 / 144	
第九节 已有雕版后的钞本 / 144	
科学研究应重视手钞 / 144	
旧钞本的优点 / 145	
古人多好钞书 / 145	
明代的大钞本《永乐大典》 / 146	
元明两代的名钞本 / 147	
毛氏汲古阁的影宋钞本 / 148	
清代的大钞本《四库全书》 / 148	
《四库全书》的优缺点 / 149	
清代的名钞本 / 149	
第十节 鉴别版本的方法 / 150	
鉴别当凭实践 / 150	
叶盛屠隆论鉴别宋版 / 150	
孙庆增论鉴别方法 / 151	
书贾作伪手段 / 152	
选择善本的指导 / 153	
第四章 校雠 / 155	
第一节 校雠的起源 / 155	
校雠字义的解释 / 155	

- 校讎又称校勘 / 155
- 最早的校讎家正考父 / 156
- 孔子校书的阙疑之法 / 156
- 关于阙文和穿凿的举例 / 157
- 孔子校书的方法 / 159
- 子夏校书的事例 / 159
- 第二节 校讎学的重要 / 160**
- 校讎须戒望文生义须通古今语言 / 160
- 校讎须戒爱奇和无识 / 161
- 宋版有不可尽信 / 161
- 明版多出擅改 / 162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 / 163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失去本意 / 163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文义模糊 / 164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事态轻重悬殊 / 164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谬认他人之父 / 165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不解所谓何事 / 165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致所姓两歧 / 166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谓书有佚文 / 166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使失去原名相沿不改 / 167
-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可见读者立场观点 / 167
- 古书之误有多至数百千字 / 167
- 轻改古书的谬误 / 168
- 凡书不能无误字 / 169
- 如何正视校讎 / 169
- 第三节 校讎必备的条件 / 170**
- 具备众本和明通文字、训诂、音韵 / 170
- 刘向校书的具备众本 / 170
- 清人校书的具备众本 / 171
- 近人校书的具备众本 / 171
- 今天对具备众本的有利条件 / 172
- 校讎必通文字学 / 172

目录

- 识字的重要参考书 / 174
- 校书必通训诂学 / 174
- 训诂学的主要书籍 / 176
- 校书必通音韵学 / 176
- 音韵学的主要书籍 / 178
- 校雠学的参考材料 / 178
- 校雠方法的派别 / 178
- 什么是死校法 / 179
- 什么是活校法 / 180
- 第四节 校雠所根据的材料 / 181**
- 搜求和判断 / 181
- 据众本合校例 / 181
- 据本书互校例 / 182
- 据上下文互校例 / 182
- 据同类书互校例 / 183
- 据本书古注校例 / 184
- 据它书古注校例 / 184
- 据古类书校例 / 185
- 据《道藏》本校例 / 185
- 据释氏书校例 / 186
- 据甲骨文校例 / 187
- 据金文校例 / 188
- 据古印文校例 / 188
- 据石刻校例 / 189
- 据封泥校例 / 190
- 校书当避免的弊端 / 190
- 校记和正误表 / 191
- 第五节 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学 / 192**
- 刘氏父子校雠的功绩 / 192
- 孙德谦对刘氏校雠学的研究 / 193
- 第六节 汉晋人的校雠学 / 203**
- 校雠为汉学的主要部分 / 203

- 许慎的校雠学 / 203
- 《说文》根据经古文和鼎彝文 / 204
- 《说文》确守阙文之戒 / 204
- 《说文》反对俗书 / 205
- 郑玄的校雠学 / 205
- 《诗笺》的校雠 / 206
- 《周礼注》的校雠 / 206
- 《仪礼注》的校雠 / 207
- 《礼记注》的校雠 / 208
- 校读古书的读如读若等三例 / 208
- 高诱的校雠学 / 209
- 荀勖校汲冢书 / 210
- 束皙校汲冢书 / 211
- 第七节 南北朝唐人的校雠学 / 212**
- 南北朝学派的不同 / 212
- 邢邵的校雠学 / 213
- 颜之推的校雠学 / 213
- 唐代重视校雠 / 215
- 陆德明的校雠学 / 215
- 朱墨别异和摘字为音 / 216
- 《经典释文》的四例 / 217
- 反对改音易字 / 217
- 主张兼存俗字 / 217
- 颜师古的校雠学 / 218
- 校《五经定本》 / 218
- 《汉书》的校雠 / 219
- 《匡谬正俗》的校雠 / 219
- 校《尚书序》误文 / 220
- 校《过秦论》误文 / 220
- 韩愈的校雠学 / 221
- 第八节 宋元明人的校雠学 / 222**
- 宋秘阁重视校雠 / 222

目录

- 宋代校雠学的成就 / 223
- 吴缜的校雠学 / 223
- 《新唐书纠谬》的内容 / 224
- 黄伯思的校雠学 / 224
- 《汉简辨》的校史 / 225
- 洪兴祖的校雠学 / 227
- 郑樵的校雠学 / 227
- 《校雠略》的批判 / 228
- 《校雠略》的理论 / 228
- 《校雠略》的内容 / 229
- 《校雠略》的特点 / 229
- 彭叔夏和《文苑英华辨证》 / 230
- 方崧卿和《韩集举正》 / 231
- 朱熹和《韩文考异》 / 232
- 张淳的校雠学 / 233
- 《仪礼识误》发明《注疏》《释文》所据本不同 / 234
- 岳珂的校刻《九经三传》 / 234
- 论字画的名言 / 235
- 毛居正校《六经》 / 236
- 元代官刻注重校雠 / 236
- 刘世常的校雠名言 / 237
- 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 / 238
- 明人擅改古书的荒谬 / 239
- 刘绩校《管子》和《淮南子》 / 240
- 胡应麟的校雠学 / 241
- 第九节 清代的校雠学 / 243**
- 清代校雠学的成就 / 243
- 死校为活校的基础 / 243
- 卢文弨的校雠学 / 244
- 校《蔡中郎集》篇目和内容的窜乱 / 244
- 校《蔡中郎集》杂用它书参订例 / 245
- 校雠所据旧本简目 / 246

- 《群书拾补》的编刻 / 247
- 戴震的校雠学 / 248
- 校《水经注》的发明 / 248
- 钱大昕的校雠学 / 249
- 校雠须戒擅改和泥古 / 250
- 校雠符合旧本的绝诣 / 250
- 读书当得善本 / 251
- 段玉裁的校雠学 / 251
- 校书须辨底本和立说的是非 / 251
- 《经韵楼集》论校雠名言 / 252
- 章学诚的校雠学 / 253
- 互著和别裁的理论 / 253
- 王念孙、引之父子的校雠学 / 254
- 求本字和不墨守 / 255
- 《读淮南杂志自序》的校例发明 / 256
- 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 / 256
- 阮元的校雠学 / 257
- 《仪礼石经校勘记》的校例 / 257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协作和总成 / 258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凡例 / 259
- 吴派校雠家 / 259
- 顾广圻的校雠学 / 259
- 阐发“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意义 / 260
- 古书致误由于强预和易言 / 261
- 《易林》的校例 / 261
- 与段玉裁校《礼记注》的争论 / 261
- 与严可均校《说文》的争论 / 262
- 第十节 现代的校雠学 / 262**
- 现代校雠学的提倡和条件 / 262
- 鲁迅对《嵇康集》卷次和版本的研究 / 263
- 丛书堂钞本旧校的鉴定 / 264
- 各书的参校 / 264

目录

- 丛书堂钞本残阙的发明 / 265
郭沫若的《管子集校》 / 266
利用甲文金文的新工具 / 266
正确的立场观点 / 267
马叙伦的校雠学 / 267
《庄子义证》以众本校文字 / 268
又以音训校文字 / 269
杨树达的校雠学 / 269
《汉书窥管》的破除迷信权威 / 269
《淮南子证闻》的反对贵远贱近 / 270
《整理古籍计划草案》 / 271
闻一多的校雠学 / 273
《庄子内篇校释》四例 / 273
《楚辞校补》的基础工作 / 274
校雠必须有实证 / 275
陈垣的校雠学 / 275
校《元典章》的成绩 / 275
总结校法的四例 / 276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文献学的涵义

文献二字的来源和解释

“文献”这个名词，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篇有类似的话：“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礼运》这段话，就是《八佾》的解释，不过《八佾》提出“文献”两字，且表示不足的遗憾，而《礼运》却说得到了《夏时》与《坤乾》，那末《夏时》与《坤乾》，就是孔子所得到的深感不足的“文献”。据汉代郑玄说，《夏时》，是《大戴礼》中的《夏小正》；《坤乾》，是殷《易》《归藏》，都是夏殷两代的重要史料。孔子虽然深感不足，也可由此看到一点夏殷的史实。应该说，这是“文献”两字最早的解释。

郑玄注《论语·八佾》篇：“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

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他用文章二字解释“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贤才二字解释“献”字，是根据《尔雅·释言》：“献，圣也。”圣之与贤，是同一意义。于是“文”与“献”有不同的内容。据《春秋公羊传》卷一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以推知，《八佾》和《礼运》所载孔子之言，是在修《春秋》时有感而发的。周有百二十国宝书，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这就是“献”，周代的“文献”都备，不能不感叹到夏殷“文献”的不足了。清刘宝楠说：“文谓典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贤也。”也是据此立说。

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

孔子所谓“文献”，是对“礼”而言的。“礼”是什么呢？它的涵义很广，大别之，有吉、凶、宾、军、嘉五等，细分之，是“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凡是一切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无所不包。这些范围极广，积累极富的东西，要靠文章来纪录。而写这些文章的，当然要靠学问渊博，熟悉掌故的贤才。这辈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的。所以文之与献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为“文献”。

刘师培的《文献解》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仪之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他把献字解为一个人的动作，比郑玄更为明白。刘宝楠说的“秉礼之贤士大夫”，就是指能够执行这些典章制度的人，在这里本不需作对文来讲。

广义的文献学

把文献题作书名，现在传世的要算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早

了。马端临字贵与，原籍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县)。生于宋末，入元不仕。历二十余年写成这部非常浩博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说明书名的意义：“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其内容分二十四门：一、《田赋考》。二、《钱币考》。三、《户口考》。四、《职役考》。五、《征榷考》。六、《市采考》。七、《土贡考》。八、《国用考》。九、《选举考》。十、《学校考》。十一、《职官考》。十二、《郊社考》。十三、《宗庙考》。十四、《王礼考》。十五、《乐考》。十六、《兵考》。十七、《刑考》。十八、《经籍考》。十九、《帝系考》。二十、《封建考》。二十一、《象纬考》。二十二、《物异考》。二十三、《舆地考》。二十四、《四裔考》。他是用郑玄的解释，把诸臣、诸儒作为是“献”，但是所录的是奏疏、议论，已和“文”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所分的二十四门，真是无所不包，可说是广义的“文献学”，而《经籍考》七十六卷，几占全书四分之一，也可知经籍与文献的关系。后人著书，也有狭义的只取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明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是记一地的“文献”，清钱林的《文献征存录》是记当代的“文献”。其范围本可由著书者自己来定。

文献学的三个内容

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举一反三，譬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可以开启多样形式的锁。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对它怎样开启，进一步怎样发掘、整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实践的效果，本课定为三个内容：

- 一、目录；
- 二、版本；

三、校讎。

文献学的三位一体

这三个内容本来是三位一体的，不应该分什么先后。《汉书·艺文志》：“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谬讹，叙而奏之。”据此，刘向的方式是：先校讎，次目录。而校讎又必须先有本子(其时无版本)。这是做研究工作的程序。至于从学习的程序来说，应该先知道有什么书，就要翻查目录。得到了书，要知道有什么刻本和什么刻本比较可靠，就要检查版本。有了可靠的版本，然后再做研究工作，于是需要懂得怎样来校讎。现在虽不必拘泥先后程序，但为了讲述的方便，总要有一个次序，姑且作此安排。本来目录中也可包括版本、校讎，分章叙述，是为了更加清楚些，并不是说三个内容可以各自独立。

第二章

目 录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和演变

目录二字的意义

要知晓目录是什么，须先解释这两个字的本义。《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所谓视、听、言、动四项，就是为仁的“目”。在一个大名之下分列它的小名的便叫做“目”。什么是“录”？《说文》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后来便加上一个金字偏旁。《周礼·职币》：“皆辨其物而奠其录。”杜子春曰：“定其录籍也。”《公羊·隐十年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因为古人文字，著在木版上的名为方，著在竹简上的名为册。不论是方是册，都要用刀，故统谓之录，即是从《说文》刻木之义的引申。

目录的体制起源于《书》、《诗》的序。《隋书·经籍志》载《簿录篇》小叙：“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

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今《尚书》百篇、《诗》三百十一篇、《逸周书》七十篇，都有序。古时序本别为一篇，列在全书的最后。后人才把它分开冠于各篇之首。序皆分释各篇的旨意。是古之书叙，以条其篇目为主，也便是目录最早的体制。汉时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叙》，班固《汉书·叙传》，都仿这个体制。至许慎《说文解字》在《自叙》之后详列十四篇之目，更可见书叙以条其篇目的体制。

目录名称的确立

把“目录”两字联起来作为一个名词，是起于汉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时候。《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刘向《别录》：“《列子目录》。”又任彦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注引刘歆《七略》：“《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班固《汉书·叙传》的《艺文志叙》也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都是刘氏父子始称“目录”的证明。在刘氏父子之前作校讎著录工作的，如《汉志·兵书略》序：“孝武时，军政杨仆摭拾遗逸，纪奏《兵录》。”他只称录，因为原书没有传下来，不能知道有没有目录。自刘氏父子之后，目录的名词，遂大家沿用了。如后汉郑玄作《三礼目录》，便用《别录》的体例。又作《孔子弟子目录》，以人名编目，和书的目录虽然不同，然它的命名也是沿用刘向的旧名。清《四库提要·目录类》小序：“郑玄有《三礼目录》，此名所昉也。”他说目录的创始者是郑玄，没有考出在他之前的刘氏父子，这是错误的。

刘向目录的体例，不同于现在的一般目录书，下面要详细说明。

《隋书·经籍志》自《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以下共有十六部，可见目录的名称自晋以后都通用，但并不作为部类之名；把目录作为部类之名，即如现在一般的目录书，开始于《旧唐书》的《经籍志》，遂至今相沿不改。

目与录的区别

“目”，本是指一书中的篇目；“录”，则是合篇目和叙的总称。《汉志》：“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里很明显，篇目是目，旨意是述一书大意的叙，把二者合而录之称录，然后奏上。“录”既是兼包目和叙，那末，只举一“录”字也可以概括“目”在内。故刘向奏上的书本具篇目和旨意，而载在本书的只称为“录”，編集别行的也只称为“别录”。然则《别录》为什么又称《列子目录》呢？因为刘向的校雠著录是奉成帝的诏命。当时古书大都每篇每卷单行，又各本的多寡不同，向集合了公私各本，把重复的删除，著定为若干篇，所以必须著明篇目以防散佚，又可见现在的定本和旧的各本不同，在篇目后又作叙一篇，发明旨意，随书奏上。因编校之始，本来以篇目为主，故举目言之曰目录，与《晏子》、《说苑》、《山海经》之奏或称叙录，都是举偏以概全，相互以见意，没有什么不同。后来袭用，把录之名专属于目，于是有篇目而无叙的也称目录。久而久之，连只记书名不载篇目的，也冒称目录之名了。今附《别录·列子目录》以见例：

- 《列子》八卷
- 《天瑞》第一
- 《黄帝》第二
- 《周穆王》第三
- 《仲尼》第四 一曰《极知》
- 《汤问》第五
- 《力命》第六
- 《杨朱》第七 一曰《达生》
-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篇。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

篇，臣向书六篇，参书二篇，内外书共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中书有栈(音剪)，校虽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繆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惟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目叙录不同体例的说明

目、叙、录三种不同的意义，历来纷纭交错，认识不一。王充《论衡·案书》篇：“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此把篇目当作录。《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集录如左。”也是指序后的篇目。《隋志》集部书多有录一卷，或云并录、并目录，此中必有无叙而只载篇目的。这都是认录作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引邱深之《文章录》，而《文学》篇又引作邱深之《文章叙》，一书而异名，是以叙与录为一事。《新唐书·艺文志》有殷淳《四部书目序录》，既言书目，又言序录，是把录之名专属于序。毋熨《古今书录序》：“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也和殷淳用意相同。这都是认录为叙。自录之一字有此两种不同解释，于是目录书又有叙录、录目两名。其称叙录的，刘向的次列，目在叙前。后来体例变更，叙在目前。既认录为目，所以称曰叙录，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隋志》的《三国志叙录》。所谓叙录，即叙目的意义。其称录目的，亦因目在叙后，既认录为叙，那末目录的名称觉得不妥，故倒称为录目，如隋费长房《开皇三宝录》

总目叙：“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有《历代所出众经录目》一篇。所谓录目，也即叙目的意义。目录名称的变化这样复杂，但仔细分析，仍是同条共贯，研究目录的应该注意。

目录不具篇目的流弊

《汉书·艺文志》：“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七略》原书二十卷，《汉书·艺文志》只列一卷，是班固仅保存了书名，而目与录都删去，后人对逸书的篇目遂不可考，这是很可惜的。两晋南北朝的书目，只记书名，已不合目录的本义。宋以后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每书下都有说，即录中的叙，然没有一书能具篇目。各书篇目只载本书中，书亡则篇目也与之同亡。只存书名，而说可以考亡佚，这是不符事实的。

分别部类以及只记书名的目录，由来已久，至今沿用，当然不必再恢复刘向目录的原状；只为讲述目录的起源和演变，仍有加以说明的需要。

第二节 目录学的重要

目录学为研究古书的指导

古代学者多从熟读深思中心领神会，便据自己的经验著书立说，很少把这经验公诸于世。后来的学者仍须自己去摸索，在精力上确是很大的浪费。而目录学的研究，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总结前人成果，指示学术门径，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为目录学并指出它重要性的，却始于清代王鸣盛。他的《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

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同时学者金榜也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他虽没有提目录学，但意义是和王鸣盛一致的。清代的学术繁盛，与重视目录学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和《辘轩语·语学第二》论读书宜有门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又云：“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舆地。经治何经，史治何史，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前者是指示初学选读的标准，后者是教导初学认识学术的门径，都要以目录学为基础。语虽浅近，实在是深知读书之甘苦的。

目录学界义的讨论

近人汪国垣《目录学研究》，综集古今言目录学的界义有四：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汇集群籍之名为一编，而标题其书之作者篇卷。或以书之性质为次，或以书之体制为次，要皆但记书名。踵事而兴，则进而商确其体例，改进其部次。”这一类称为目录家的目录。二，“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后人览其目录，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之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难考索而得。”这一类称为史家的目录。三，“目录学者，鉴别旧槧，讎校异同之学也。汉时诸经，本有今古文之

不同，然艺文志必详加著录，不厌重出者，非如此则异同得失，无所折衷。刘向必广求诸本，互资比较，乃得雠正一书，则旧本异本之重视，盖可知矣。”这一类称为藏书家的目录。四，“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也。如龙启瑞之《经籍举要》，张广雅之《书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版本，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这一类称为读书者的目录。汪氏对于这四种界义，罗列很详，但认为“藏书家之注重板本，读书家之重视提要，其义则出于后起，其用则主于一偏，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那就未免大误了。刘向校书必汇集中外各本，其时虽没有版本，而有各种不同的本子。《别录》叙一书的旨意，即提要所自出。怎能说是后起呢？其实这四种界义，都是各举一偏。目录学应该包括这四种界义，才得全面。虽然，研究者的探讨对象可能有不同，但不能把这四种界义各自孤立起来。

利用目录学的方法

目录学既是为科学研究服务，首先应该叙述学术的源流，以供后人利用它来考辨学术；也要看他利用的方法怎样，从而判别他的收效厚薄。阅读古书，就要善于利用目录学。现在略举古人利用目录学的几个方法作为例子。

以目录著录有无断书的真伪

班固《汉书·东方朔传》：“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按此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裸》、《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它事皆非也。”这是根据刘向《别录》所载，断定这些篇目是真的。因为对于东方朔的传说神话很多，当时就有《东方朔别传》等书，《别录》没有载，可以断定它是伪的。

用目录考古书的分合

《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这是根据《郑玄目录》，说明《乐记》是把原来十一篇合为一篇，并详列十一篇的原目，使后人可以知道它是怎样分合的。

以目录著录部次定古书的性质

《南史·陆澄传》：“又与俭书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俭答曰：‘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陆澄因为《孝经》没有郑玄注，且为小学书，故主张不能列为帝典。王俭反对这一意见，并根据《七略》、《汉·艺文志》的部次为证，主张应列入六艺，并不与小学类《苍颉》、《凡将》同流，以确定《孝经》的性质。

因目录访求阙佚

《隋书·牛弘传》：“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多遗阙，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毕至，观阁斯积。”牛弘因当时阙佚之书太多，故奏请依照梁之旧目，悬赏购求，时隔不远，应该容易搜集。果然，所获很富。

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隋书·牛弘传》：“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

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牛弘为了议明堂制度，要搜罗材料，在《别录》中查得有《古文明堂礼》等七种，马宫、蔡邕确见其书，至隋时已亡佚了，幸有《别录》，可考得书名。

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的真伪

《唐会要》卷七十七：“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刘知幾议曰：‘案《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则事殊隳刺者矣。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阙。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子夏易传》是后出的伪书，刘知幾、司马贞列举了《七略》、《汉书·艺文志》不载其书。荀勖《中经簿》、阮孝绪《七录》、王俭《七志》、《隋书·经籍志》确载其书而姓名卷数又不合。以六种书目互相证明，而其书的伪造才确定。

以上六条，故友余氏嘉锡所启示，实为精辟之论，学者由此类推，而目录学的用处才能深广，科学研究的必先通目录学又可概见了。

第三节 目录的分类——七略与四部

目录必须先明类例

无论编次目录，检查目录，必先明了类例，否则无从下手。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有《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他说：“学之不专

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又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也本其说而推衍之。可知作编目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七略》和四部

目录起源于《书》、《诗》的序，这与司马迁《史记》的《自序》一样，但为一书的篇目罢了。一书之中，篇目必然有先后，这先后的次序，必然要有意义，不是随意安排，杂乱无章。例如《书》有虞、夏、商、周，《诗》有《风》、《雅》、《颂》，《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作为全书的纲领，然后把篇目分列于每一纲领下，必部次分明，才可使读者称便。杨仆校兵书的部次方法，已无从考知，至刘向合天下之书，为校讎定著，作叙录载于本书之首，子歆卒父之业，始奏《七略》，序次群书为六略三十八种，始确定一种部次方法。章学诚《校讎通义叙》：“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目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后汉、三国都沿用这部次，没有改变。到了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始改变《七略》之法而定为甲乙丙丁四部，在目录史上起了一次革命。其后，七略和四部的不同部次方法，各有信从。如齐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直到隋许善心的《七林》，都是信从七略部次的，不过小有变更。如晋、宋以来许多官撰目录（详下公家藏书目录篇），都是信从四部部次的，也有些小变更。其实七略与四部不过是源同末异，跟着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变化，为群众所公认的，就可流行较久。所以，四部直到现在还是沿用。而每部的子目则随时都有修改补充。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和需要，又不再是旧的部次所能包括。但古书一天存在着，我们就需要知道古书的部次面貌，而七略与四部，是目录中的两个主干。其它各种因袭或更张的部次方法，在下面谈官家目录与私家目录再详。

《七略》的类例创于刘向而成于刘歆

《汉书·刘向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元帝初，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中废十余年。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上方进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乃集合《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序次《列女传》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又《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又《汉书·刘向传》：向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才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从他父子二人的传，可以明晰他们校书的历史和撰定《七略》的经过。“种别为《七略》”的“种别”，即是书的类例，可知《七略》的内容是注重类例的。

《汉志》为《七略》的节本

《七略》自《唐·艺文志》之后，如《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大约与《别录》同在唐末五代之际亡失了。《汉书·艺文志》：“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阮孝绪《七录序》：“固乃因《七略》之词，为《汉书·艺文志》。”是《艺文志》为班固删省《七略》之文，也就是《七略》

的节本。《七略》原书已亡，幸而有这个节本，我们还可以根据它来知道《七略》的大概。

《汉志》据《辑略》作小序

七略：一、《辑略》，二、《六艺略》，三、《诸子略》，四、《诗赋略》，五、《兵书略》，六、《术数略》，七、《方技略》。阮孝绪说：“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汉书·艺文志》的小序就是《辑略》，班固没有用它原名而分别加在每略的前面，正如《书》、《诗》的序，后人分别加在每篇前面一样。实际只有六略，所以《论衡》说：“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其中又分六艺为九种，诸子为十家，诗赋为五种，兵书为四种，术数为六种，方技为四种，故《汉志》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是刘向校书时已分六部，歆不过因此成例来序次罢了。

《汉志》的分类基于校书的分工和篇卷的多寡

六略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呢？有两个理由：

一是校书的分工。向、歆父子担任的是六艺、诸子、诗赋三部。担任其它各部的，兵书是任宏，数术是尹咸，方技是李柱国，都是专家。据《七略》著录的书只有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并不算多。专门学术的书必需专家来校理，任宏等是一部分的总校，是属于向、歆所领导的。向、歆担任了三部分，又须做总纂的工作，虽然任务比较繁重，何至于要二十余年的漫长时光呢？（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因为一书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又有许多重复的篇卷，合起来，篇卷便大大地增多了。例如《荀子》只有三十二篇，刘向所据的中书乃有三百二十二篇，增至十倍。再合各书的复本算，数量便不算少。校理是细致的工作，要删除定著，须字字细勘，然后写定书录。一人的学术有专业，精力有限制，所以必须分工。

二是篇卷的多寡。史本出于《春秋》，后来立为史部。诗赋本出于《三百篇》，后来立为集部。但是《七略》的分类，却把史附入《六艺略》的《春秋》，而诗赋则独立为一略，是什么原因呢？这便是根据两类书所存的多寡而定的。《七略》所录史家的书，自《世本》至《汉大年纪》只有九家，包括《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即今之《史记》），只有四百十一篇，数量太少，不够独立一略，所以只好作附录。根据它的学派所出，只好附入《春秋》。诗赋却不同了，它虽出自三百篇，《六艺略》的《诗》类只有六家四百十六卷，而《诗赋略》却有百六家千三百十八篇。以家数论增多了百家，以卷数论增多了两倍余，倘把它并入《诗》类，便不相称，所以只好独立一略。又如后来史书渐渐地多了，《春秋》类也不能附录了，势必另立史部，同是斟酌于卷帙多寡。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就是说诗赋的发展情况。

《汉志》六艺与传记的区别

六艺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那末《论语》、《孝经》、小学为什么附在这里呢？因为这三类都是当时学校的课本。以后世之制度作比，小学诸书是汉小学的科目。《论语》、《孝经》是汉中学的科目。而六艺则是大学的科目。《论语》、《孝经》，汉人称为传记，《刘歆传》说的“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传记在六略中并无此名，而列在六艺、诸子的中间，明明指《六经》以外的《论语》、《孝经》、小学。

《七略》的研究，是目录学中的专门课题，这里不过略述它的内容，以见分类的精密。

荀勖以前四部的内容

四部的创始，人们都知道是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其实汉魏之

间，已早有四部的名称了。《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引孔融《与诸卿书》：“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案证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在妄矣。”《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文帝《典论·自叙》：“《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备览。”他们把四部置于经、史、子以外，显然和荀勖的四部不同。据余嘉锡的考证，《七略》中《六艺》共九种，而《刘向传》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为什么只言《五经》而不言六艺呢？因为当时指立博士的《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并入《乐》则为六艺，更兼《论语》、《孝经》、小学则为九种。汉魏间人以为只举《五经》，嫌不够完备，故连称《五经》、四部，这所谓四部，是指《六艺》中的《乐》、《论语》、《孝经》、小学四种。这一推证是对的，不可把它和荀勖的四部相混。

四部的创始当属荀勖

《隋志序》：“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所谓“又因《中经》更著《新簿》”一语，姚振宗谓“郑默撰《魏中经》，荀勖因之著《新簿》，名之曰《中经新簿》，盖沿用郑默旧名也。然则四部之体发端于郑而论定于荀。”余嘉锡则谓“郑默始制《中经》，《七录》、《隋志》不言其体例有所变更，知其分类犹沿《七略》。”两家的看法不同。盖姚氏著重在因字，因者，承袭之谓，荀既是因郑，那末，荀的四部分类也由于郑，但它书都无明文，故只能说发端于郑而论定于荀了。余氏则著重在更字，更者，变易之谓，四部既是变易的新的分类，那末，以前旧的当然仍是《七略》分类了。各有理由，很难轩轻。然照姚氏的主张，四部之体既发端于郑默，怎样来解释与郑默同时人孔融、魏文的所谓四部呢？所以余氏的主张比较合理，盖因者，因《中经》所收的书名而补充之；更者，更《中经》的七略分类而为四部分类，于文理亦较通顺，故后人论创四部

的都主荀勖而未见有及郑默的。

《中经新簿》的分类

《晋书·荀勖传》：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武帝受禅，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太康十年卒。案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其书虽已亡失，幸其部目引见《隋志序》中，至今还能考见它的大概。

荀勖的甲部，便是《七略》、《汉志》的《六艺》，后世的经部。因为历代都注重经学，著述很富，旧的虽有亡失，新的又继续出现，所以这一部分历来没有大变更。

乙部则合《汉志》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为一部，为后世子部的创始。考《汉志》的诸子十家，著录书名的，只有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年人的著作。其余如纵横、杂家到武帝时为止，农家到成帝时为止，小说家到宣帝时为止。而名、墨二家，只有六国人书。可见西汉时的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了。经过汉、晋的多次变乱，存在的当然更少。《中经新簿》原著书名虽不可考，但它合并《汉志》四略为一部的原因大体可以推知。

荀勖的分类，要算分古诸子与近世诸子为二最有条理。汉以后的名、法之学，早已失传。即便其它诸家也多没有师法，已非周、秦之旧了。后世把后出子书硬附九流之中，本是不妥的。荀勖这一分列，更可表明它们学术上的面貌。《汉志》史书本附在《春秋》，荀勖始从《六艺》中分出独立一部。但分部未久，书不可能太多。诗赋在《汉志》虽有五种百六家，到晋时已亡失了大半，新的作品又不多。所以丙、丁两部，不得不稍加变通，以求四部的分量相等。如《皇览簿》乃

后世类书之祖，并非史书，而列入丙部。汲冢书中四部都有，并非诗赋，而列入丁部。余嘉锡以为荀氏也自觉不妥，故不立经、史、子、集之名，而但以甲、乙、丙、丁为目。这一解释，可以答复后人对荀氏的讥议了。

李充对四部的修正

东晋的李充对四部的次序又作了修正。《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李充字弘度，为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他把荀勖四部的乙丙两部互换了一下，从此四部的次序才确定了。《隋志》著录自宋至隋的书目，除《七志》、《七录》之外，凡称四部的都依用李充的次序，唐宋直至今天所称四部也是如此。欧阳修《新唐志序》：“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这样提法，尚属片面。

第四节 目录的体例

《别录》《汉志》附注作者简史

书的分部明确之后，次当讨论目录的体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其人，就是说知道这个人的具体情况。论其世，就是说知道这个人的历史背景。明白了这两点，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刘向父子和班固都是很注意于此的，《别录》对于作者在《史记》中没有列传的，必叙及他的历史。有列传的，或用《史记》原文而加以删节。班固沿用刘书而作《儒林传》，其不入传的，也在书名下略加注明。如《汉书·艺文志》：

《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

列传。

《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宣帝时数言事。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

有列传。

以上略举四种作例。而细别之，又有三事：一、考作者的行事。二、考作者的时代。三、考作者的学术。

考作者的行事

考作者的行事，又有附录、补传、辨误三例：

附录：《别录》于史有列传，事迹已详的，即把原文剪裁入录，是曰附录。如《管子书录》：“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其下即用《史记》原文，略有删节；而出于向自作的，不过寥寥数语。汉时《史记》不是人人可见，附录事迹，对读者当有好处。现在诸史已是习见的书了，再加附录，似乎不必要，可仿《汉志》注明“有列传”，待读者自己去检寻。又《别录》用《史记》而不言出处，古人著书自有此体，今人则不必效法。

补传：《别录》、《七略》对于史有列传而事迹不详，或不立传的，则旁采它书材料，或据亲所见闻补作之。是曰补传。宋司马光为王通、沈作喆为韦应物、明胡震亨为刘敬叔、清孙诒让为墨子、胡元仪为荀卿都作了补传，后出者也愈精。《四库提要》虽载作者籍贯、仕履，反不如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考证为详。研究目录学者虽不能对每个作者都作传，然而这体例是可以取法的。

辨误：《别录》于作者事迹有误传，则考之它书以辨正之，如《邓析子书录》便是，是曰辨误。邓析子的死，《荀子·宥坐》篇、《吕氏春秋·离谓》篇、《说苑·指武》篇都说是被子产所杀。《别录》据《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颡嗣为政，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则邓析子的被杀，在子产

死后，据事实来辨明前人误传，这已开了后来考据家的门户。

考作者的时代

考作者的时代，也有四事：一、叙作者的仕履。二、约叙著书的时代。三、叙作者的生卒。四、采书中所引作旁证。

叙作者的仕履：《别录·管子书录》叙其事齐桓公。《孙卿书录》叙其齐宣王、威王时来游学。《汉志》小学家：“《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此例自《新唐书·艺文志》以后多沿用，而《隋志》却不然。如：“《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使后人看了，仍不知薛贞时代是西晋呢，还是东晋，是武帝时呢，还是元帝时。这是缺点。

《四库提要》以科目先后为次序，其法不能说不善，但很多没有科目的人，就不免混乱难考了。这也是缺点。

约叙著书的时代：有些作者的事迹已不可考了，甚至姓名也不知道了，怎么办呢？也应该根据书的内容注明它著书的时代。如《汉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注：“《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捷子》二篇注：“齐人，武帝时说。”《道家言》二篇注：“近世，不知作者。”材料已阙，是不能伪造的；但有了时代的线索，应该注明，使后人不能见到原书，犹能略知它的时代。刘、班的先例是可取的，可惜后来目录学者多忽略这一点。

叙作者的生卒：《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七略》：“《子云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汉志·诗赋略·杜参赋》颜师古注引刘歆曰：“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余。”这都是叙及作者的生卒，但并不多见，后来也没有沿用此例的。宋人注书，始有追为前人作年谱的，如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鲁訔的《杜工部草堂诗年谱》等，都列在本书之首，按年纪事，并录生平著作，较《七略》的附注生卒更详。犹如我们讲文学史，对于每一作家要注明他生于哪年，没于哪年一样，有助于认识作者的时代背景。《七略》

又有详注著书年月的，如扬雄“《甘泉赋》，永始三年待诏臣雄上”，“《羽猎》，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长杨赋》，绥和元年上”，都见《文选》本赋注引《七略》。宋人追作年谱，也把这一例包括在内，对于辨章学术关系很大。

采书中所引作旁证：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称并时例》：“编艺文志于其所生时世，必为详考之。苟无可考，则付之阙如可也。《汉志》于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义也。其间又有虽无可考，而取一人与之同时为论定，则并时之例生焉。《汉志》道家《文子》云：‘与孔子并时。’名家《邓析》云：‘与子产并时。’《惠子》云：‘与庄子同时。’皆据世所共知，以定著书之人。夫时世不明，则作者所言，将无以窥其命意。班氏称并时者，实知人论世之资也。”既不能得作者的年代，可取书中所引用的或后人所称述的材料作旁证，孙氏之言，最为明通。并时例外，又有称先于某人，或在某人后的一例，如《汉志》道家：“韩长者六国时，先韩子。”又阴阳家：“间邱子在南公前。”又墨家：“墨子在孔子后。”又《诗赋略》：“宋玉，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此又余嘉锡所发明，可补孙氏之遗。这样的参互推定方法，也是刘向所创。

考作者的学术

考作者的学术，用来评定这部书的价值，这是目录学中极重要的一事，也是研究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必需博通古今，好学深思，比之自己著书更难得多。因为学问至博，凡人各有专长，以刘向来说，对兵书、数术、方技三门也不敢自任，何论其他。自己著书，有师法可遵循，有心得可发挥。评定他人的书，就要虚心平情，纯乎用客观态度来衡量，不容许稍有偏向。那么怎么办呢？除了对这方面确有独到，可以作出评定外，宁极端谨慎，多案而少断，《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便是这样。不然的话，如《四库提要》虽推为空前巨著，只

因主持者纪昀，不喜宋儒，大行攻击，便有许多错误论断，成为全书的疵累。又议论必须踏实，证据必须充足，不能徒作空言。宋曾巩也曾奉诏校书，他是文学家，所作书序，多为空言，只好收入他的文集，不能算作目录学。

目录编订的体例

以上所述，都是对于作者的考论，也是谈目录体例所必备的知识。至于目录编订的体例，则有下列数端：

加叙述

目录学的重要在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对于学术源流的叙述，为治目录学之首要。其事亦始于刘歆，《七略》的首篇《辑略》，便是叙述学术源流。《汉志》即根据《七略》，今之志叙一篇，六略总叙六篇，各篇叙三十三篇，综凡四十篇；除了班固接记后事之语，皆《七略》节文。大叙一篇，为全书纲领，每种后必有一叙，而每略之后，又有总论。六艺的内容，包括各经的传授，古今文及诸家传注的善否，又指出当时学者烦碎的弊病。诸子、数术、方技的内容，先言其学派的源头，次明其所长，末指出它的流弊。《隋志》也依用此例，有可补《汉志》所阙的。宋《崇文总目》虽每类有叙，多空谈而少实证，不能比《汉》、《隋》两志。至清《四库提要》，取法《汉》、《隋》，规模弘远，既有总叙，又有小叙，复有案语。其卷首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之总叙，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叙，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可谓详尽了。但全书浩繁，论辨考证不能没有错误。胡玉缙的《补正》，余嘉锡的《辨证》已多加纠正了。此乃史志及官修目录的体例。

记版本

刘向校书，已备众本。唐末，刻版始兴，至宋而盛。于是一书而

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治目录学者必须兼收并蓄，目录学之与版本遂不可分离。顾千里《石研斋书目序》：“盖由宋以降，版刻众矣，同是一书，用校异本，无弗复若径庭者。每见藏书家目录，经某书史某书云云，而某书之为何本，漫然不可别识。然则某书果为某书与否，且或有所未确，又乌从论其精确美恶耶？”他论目录记版本的重要很精确。而全祖望《丛书楼书目序》则谓：“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所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捋扯懒祭之用。”和顾氏的立说颇异。盖顾氏从读书者怎样利用版本的角度来看，而全氏则指收藏家赏鉴家的视版本为骨董而发。其实两种看法应该统一起来。这类目录始于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书名下只注什么版本。钱曾《读书敏求记》，每书略有考证而偏重在版本。后来私人目录体例，不出这两种范畴。

录叙跋

古人目录论学术源流的，只有自撰叙录，没有钞录他人叙跋的。只有释藏中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自卷六至卷十二都是钞录各经典的叙文，其后道宣，智昇都沿此例。到了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才全采前人之书，自《崇文总目》、晁、陈书目外，并从各家文集及本书钞出叙跋，又杂取杂家笔记，材料非常丰富，这一体例，对学者很有益处。清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都沿此例。张氏于文之习见和徒发空论的删汰不录；孙氏则凡宋元叙跋全录，一字不遗，两家的体例稍有不同。余嘉锡以为张氏颇有别裁，后来居上。而以孙氏的全录原文为非。其实就文献来说，保存材料，不嫌其多，有用无用，是在于人。例如搜罗宋元人已佚文集，这便是很好的渊藪。孙氏意在保存地方文献，不只为讲论学术，我们正当以此为法，不可遽以为非。

撰提要

载籍极博，岂能一一寓目，有了提要一类的书，便能一览而知各书

的大概内容，对研究工作是具有很大功用的。《别录》就是为一书提要的创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提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等，都是这一体例。又有收藏家的提要，对每书不一定述其学术源流，而兼及校雠、板本、收藏、题跋、印记等，《天禄琳琅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张钧衡《适园藏书志》、邓邦述《群碧楼藏书志》、《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等，都是这一体例。又题跋一类亦当属此。其人文集的，以学术为主，如朱彝尊《曝书亭集》、钱大昕《潜研堂集》、顾广圻《思适斋集》、曹元忠《笺经室集》等。其单行的，所涉范围较广，如毛晋《隐湖题跋》、黄丕烈《尧圃书跋合编》、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等。内容性质虽略有不同，然都是目录学的重要材料。

目录体例的评价

以上四种体例，就第一种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原是目录学的最高要求，未必是每个研究者可一定达到的。史志和官修目录，搜罗较备，人才集中，才有可能。然古往今来也只有《汉志》（承用《七略》）、《隋志》、《四库提要》三书罢了，《崇文总目》已不可相比。

《旧唐志·序》：“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今之杀青，亦所不取，但纪部帙而已。”编撰者既感到学识不够，所言不能越出前人，与其陈陈相因，不如只纪部帙，以免重复。以后宋、明、清三史艺文志皆没有叙述，遂使学术源流多不可考，甚属遗憾。就第二种说，板本应该是目录学中的一部分，后来收藏、赏鉴两家特别地发达，流为独立学科，而对书的内容注意不够，所以有全祖望的讥讽。这一类目录如《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沧苇书目》等只记宋本、元本、钞本，而作者姓名与卷数都不著，只可供收藏家的参考，确是用处不大。一般书目，书名下为作者姓名，下注宋本、元本、钞本、校本，而作者籍贯为何地，宋、元为何朝，钞、校为何人，也不详载。就提高效率来说，目录必载作者籍贯，为注意地方文献的取资；必详

宋、元刻于何朝何地，为板本学的稽考；必明钞、校的为何时何人，为校雠学的参证。否则无异于书估的帐单。就第三种说，序跋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本书的性质、条例、价值等等。古书流传，最易亡失，录存序跋，犹可考见一二。虽然文章家的泛叙交情，虚加溢美，运用者当善于审择；而如李焘的《文简集》已亡，而《经籍考》采录序跋三十二首之多，赖以略知它的内容，不能说是烦文不切。友人卢氏弼尝谓：清修《四库全书》，把各书的序跋完全删去，不过为掩盖其作提要的根据，这与盗窃何异！叶德辉遍搜学海堂、南菁书院两经解的原刻本，也为它不刻序跋。阮元、王先谦号称通儒，不知何以也有此失。昔人为节省刻资，除张金吾、陆心源两家藏书志外，都不载序跋，现在排印便利，不必有此顾虑了。就第四种说，提要之作，最有用，也最不易。学术门类之广，一人不能兼通；古今书籍之多，短期无从着手。故《四库提要》以后，屡议续修，迄未完成。阮元《四库未收书目》、胡玉缙《未收书目续编》，只各就所见，著录有限。不如各据所长，取一专门学科，从事编写。如黎经诰《许学考》、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林钧《石庐金石书志》、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等书都早已出版，近人从事这项工作的渐多，如医学、词曲、小说、琴书各方面都有撰著，将来汇合起来，数量一定大大地超过《四库全书》。

第五节 史家目录

正史二十五部，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只《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七史。《汉书》至《宋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兼收前代书目，明、清艺文志始断代为书。而辽、金、元三代遂付阙如。七史中以《汉》、《隋》二志最为重要，其它则因撰辑未能尽善，只可备检寻之用。

《汉书·艺文志》为史家目录的创始

史之有艺文志，是班固《汉书》创始的。当时有刘歆《七略》可作根据，是一有利条件，所以班固自言就刘歆《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是《艺文志》全本于《七略》。其六略目次也没有变更，只把《辑略》内容分缀在各叙之中，实际也原文具在，没有亡失。

《汉志》据《七略》加以整理

《隋志》：“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据此，班固曾典校秘书，为什么不自己编写而要袭用《七略》呢？唐刘知幾曾对他有严厉的批评，《史通·书志》篇：“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自遂多。”班固的袭用前人材料，不止《艺文》一志，这正是作史的方法，不同于文学家的创作。司马迁作《史记》，搜罗金匱石室之藏，博采经传诸子，何尝全出自撰？《汉书》凡武帝以前列传，和《史记》都同，也因材料相同；史贵证实，不必改作。况《七略》集刘氏父子二十余年之功力，班固即使重作，也难逾越。只要撰序说明，便非有意干没。又《七略》如非班固采用，决不能流传至今，为后学津梁。这正是班固之功，刘知幾妄加讥评是不适当的。

然则《艺文志》除了把《辑略》并入序文以外，亦非全部搬用《七略》原文。他说“删其要”，必有一部分材料被删去；而于篇末总数之下，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有人有省，更是明白的说明。今考《书》家：“入刘向《稽疑》一篇。”《礼》家：“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乐》家：“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小学家：“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杂家：“入兵法。”赋家：“入扬雄八篇。”兵权谋家：“出《司马法》，

人《礼》也。”兵技巧家：“人《蹴鞠》也。”这些言人者，大都是刘向、扬雄的作品。《七略》根据《别录》，刘向当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扬雄与刘歆同时，也当然不会列入。而《汉书·艺文志》则不该不载，所以加入。出者，如《司马法》原列兵权谋家，班固认为应移入《礼》家，故出于此而入于彼。又如《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兵权谋家：“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种。”兵技巧家：“省《墨子》重。”《七略》书名有两载的，班固认为不须重复，可省。那末《七略》难道不加检点而致重复吗？不，因为一人的学术有兼通，必两列才能见其全。班固既要省去，不载就是，何必要详细注明？也因为抹去不载，后人便不知兵家之中有伊尹诸人之学了。

《汉志》注意辨别伪书

《艺文志》又有于书名下注明依托的，如道家《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又《力牧》：“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农家《神农》：“六国时诸子疾时急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小说家《师旷》：“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共十六条，则又有辨伪之功。举出入、依托两例，可知班固虽袭用《七略》，而仍每条加以研究，得出精辟的结论。刘知幾说他“因人成事”，说明他没有仔细研究。

研究《汉志》的重要材料

《汉书·艺文志》是这样重要，以至清代学者几乎没有不把它作为学习研究的基本科目。研究的心得，散见于各种著述中的很多。其作为专题研究的，自宋王应麟始，有下列各家：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 宋王应麟撰。

《汉书艺文志补注》一卷 清王先谦撰。在《汉书补注》中。

《汉书艺文志条理》六卷 清姚振宗撰。

《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 清刘光蕡撰。

《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 清孙德谦撰。

《汉书艺文志注解》七卷 近人姚明辉撰。

《汉书艺文志讲疏》 近人顾实撰。

以上各书，若论搜集材料之富，当以姚振宗为最。自叙：“班氏文注，根据《七略》，此所录一字不遗。他如颜氏集注、王氏《考证》，则不能不有所取裁。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书源流；无可征引者，或自为之说。有所心得者，则附著于篇。”其著书体例之谨严详尽，可见一斑了。

分析体例之精，以孙德谦为最。他就《艺文志》分举了四十六条例子：一、所据书不用条注例。二、删要例。三、一书下挈大旨例。四、辨章得失见后论例。五、每类后用总论例。六、一类中分子目例。七、分类不尽列子目例。八、分别标题例。九、称出入例。十、称并时例。十一、称省例。十二、称等例。十三、称各例。十四、称所加例。十五、称所续例。十六、书有别名称一曰例。十七、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例。十八、尊师承例。十九、重家学例。二十、书有传例。二十一、书为后人编定者可并载例。二十二、书名与篇数可从后人所定著录例。二十三、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二十四、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二十五、书中篇章须注明例。二十六、书有图者须注出例。二十七、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二十八、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二十九、别裁例。三十、互著例。三十一、引古人称说以见重例。三十二、引或说以存疑例。三十三、其书后出言依托例。三十四、不知作者例。三十五、不知何世例。三十六、传言例。三十七、记书中起讫例。三十八、前后叙次不拘例。三十九、一人事略先后不复注例。四十、书缺标注例。四十一、人名易混者加注例。四十二、书名上署职官例。四十三、自著书不列入例。四十四、书名省称例。四十五、篇卷并列例。四十六、用总结例。《艺文志》在《汉书》中只是一篇罢了，而分析出这许多条

例，宜乎张尔田称为二千余年无此作了。

《隋书·经籍志》根据《五代史志》

《隋书》改艺文志为经籍志，为史家书目列入正史的第二部。《隋书》领修者为唐魏征、长孙无忌等，其纪传与志又各有分修，而《经籍志》则实魏征所撰。《四库提要·隋书》：“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旧跋，称旧本每卷分题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征撰。”是其明证。但始修者实为李延寿、敬播二人。李延寿《上南北史表》：“《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旧唐书·李延寿传》：“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故姚振宗说：“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斩棘之实。”这样的大著作，本不是一手可成的。

《隋志》及其与阮孝绪《七录》的关系

《隋志》分类用四部，其子目更为详尽。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叙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共四十八篇。叙述学术源流，可补《汉志》之阙，几与《汉志》同样受到后之研究目录学者的重视。

《隋志》的根据，前人说是以梁普通中阮孝绪的《七录》为主，今《七录》书已亡失，只存一叙在《广弘明集》中，犹可考见大概，详后私家书目章。《隋志》中注曰“梁有”的，就是指《七录》。可见李延寿等也做过整理工作，核对当时书的存亡，而不是直钞的。也有李延寿根据它书或所见补入，并非《七录》所有而仍注“梁有”的。如注有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的谥号，当然不是阮氏原文。又如朱异、萧子显、陶弘景诸人皆阮氏同时人，或卒在他后，而志载其书仍曰梁有，这显然不是《七录》所有了。盖《五代史志》托始于梁，故皆以梁为断。余嘉锡说当是根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是有相当理由

的。《隋志》也有它的缺点。《提要》：“《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指出了《隋志》失收和重出的书目很多。凡此都是不可避免的。

清章宗源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只存史部，其它都失传了。姚振宗也著《考证》五十二卷，以一生精力为之，与他的《汉书艺文志条理》同为有名的巨著。研究目录学的不可不读。

《旧唐书·经籍志》的缺点

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有《经籍志》二卷，所据为唐毋暉的《古今书录》，又名《四部都录》。其书据《旧唐志》：“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志，近官撰《隋书·经籍志》亦然”，原是一部好书，可惜刘昫等无知，竟谓“相沿叙述，无出前修”，“卷帙繁多，今并略之”，竟把小序完全删去。又《古今书录》自开元以后，本付阙如，刘昫修唐一代全书，自应补足，而竟因陋就简，任它空阙，遂致唐代大文学家，如人人皆知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的集子全都没有。这才是真正抄袭，而且是不善抄袭，贻笑后世。

《新唐书·艺文志》的内容

宋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中有《艺文志》四卷，系根据唐《开元四库书目》。其书《崇文总目》著录四十卷，是宋初尚存，故得据以纂入。其志较《旧志》加入唐人自著的书多至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虽不能说已无遗漏，但较《旧志》则大大地不同，始成其为唐代的艺文志了。又书名下间有述作者的小传，这也是承《汉志》书名下附识事略的先例，其它史志都没有。

《宋史·艺文志》的缺点

元脱脱等撰《宋史》，有《艺文志》八卷。宋时国史凡四修，每修

皆有艺文志，皆有小序。又宋代求书最勤，详载于《宋会要》、《通考》、《玉海》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又极注意于收藏、校讎，详见程俱的《麟台故事》、陈騏的《南宋馆阁录》等书。论理，《宋史·艺文志》的条件较好，应该质量也提高了；可是纂修者不能尽职，只把旧目直钞，并不搜访新的材料。北宋时书，因据四次所修国史书目，故舛误尚少；而南宋只据淳熙五年陈騏等的《中兴馆阁书目》和嘉定十三年张攀等的《中兴馆阁续书目》，遂使淳熙以后新出的书，一概不见著录。所以《四库提要》讥为“诸史志中之最丛脞者”，有待于后人的整理研究了。

《明史·艺文志》的内容

清张廷玉等修《明史》，中有《艺文志》四卷，系根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黄氏本是有名的大藏书家，其目大都据所藏所见之书，不如焦竑的《国史经籍志》这样“丛钞旧目，无所考核”（《四库提要》），这是实事求是的一面；但个人所藏所见，究有限制，书囊无底，探讨难穷，这是不够完整的一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人著作为黄书不载的不在少数，还可作补遗工作。黄氏之目在明人书后附录宋、辽、金、元人书目，其意在补《宋志》之阙，是效前代史志之例，兼括前代书目。张廷玉等用其书而不取附录，遂成为断代的艺文志，而辽、金、元竟致空阙。又以《明志》与黄目比对，发现被删削的书名和卷数极多，官书之不可信，竟至如此。所以《千顷堂书目》至今别行，仍有相当价值。

《清史稿·艺文志》的纠谬

赵尔巽等修《清史稿》，中有《艺文志》四卷。承《明史》例，也是断代的。分纂者先后有吴士鉴、章钰、朱师辙，都是目录学专家，其成绩应该大有可观，乃竟疏失惊人，可知纂辑书目大非易事。范希曾评《清史稿·艺文志》，历举体例之误外，又举其小小疏失，有书名

误者，有卷数误者，有撰人误者，著录之书有以明初人书而误作清人书者，有以外国人书而误作国人书者，有一书而重复著录者，有一书二名遂误为二书而分别著录者，有诸书已散见各类又复列书之总名者，更有重复著录者。至于门类出入有界划不清者，有部居舛误者，有次序错乱欠考者，每条各举例证，都切中其弊。朱师辙有《改纂清史艺文志说帖》，载所著《清史述闻》中；而众议纷纭，未见实行。所以，《清史·艺文志》实有改作的必要，惟总结清代三百年的文化学术遗产，确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通志·艺文略》和《国史经籍志》的批评

其它如别史类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根据各书目钞入，不甚可靠。政书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虽是编次各书而为用极广，为目录学的重要参考书，前面已论列了。又有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为万历间陈于陞议修国史时由竑专领其事而编成的，只不过钞录旧目，不加考核，不论存亡，粗枝大叶，全不可靠，和《通志·艺文略》为同一类型。

第六节 补史目录

后人补作史志的概述

自《汉书》有《艺文志》，而后汉、三国、晋、南北朝诸史都付阙如，倘是没有《隋书·经籍志》兼收前代，则自汉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至北周大定元年（公元五八一年），这五百五十六年的文献材料将无目可考。范晔撰《后汉书》，以志属谢瞻为之，自范被诬而死，瞻不敢出，悉蜡以覆车，其中可能有艺文志。今所列八志，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把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补入的，并非专为补范书而作，所以不能算是补史，况其中也没有艺文志。专为补史而作的，据

现存之书，以宋钱文子的《补汉兵志》为最早了，然也不闻有为艺文补志的。至清初修《明史》，黄虞稷承修《艺文》，本欲照前史通例，兼载前代，补了《宋志》咸淳以后的阙略，又纂辽、金、元三代。后来被王鸿绪、张廷玉等所删去而改为断代体，卢文弨又把它单行刊入《群书拾补》，但误为上元倪灿撰。这可说是补史艺文之始，但黄虞稷编撰之初，本仿《五代史志》之合为《隋志》，并非有意专为一史作补。其有意专为一史作补的，首推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其后仿其体例而作补的纷纷而起，极一时之盛。今依时代先后，略述于下。

《汉志》根据《七略》，班固又加补充，应该是详尽无遗了。今考之诸书所载，则遗漏很多，且有关系典制，不容不载的，也往往失收。例如：萧何的律令、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礼仪、韩信的兵法，都明见于《史记》、《汉书》本传的，为什么不载呢？这不免引起后人的怀疑。欲解此疑点，我们必须明了刘向父子校书编目时的实际情况。

《七略》所收录的只是中秘书，即从温室徙往天禄阁的，刘氏父子只是就其所见加以论次，而如兰台石室与故府所录藏的，民间传习和博士章句的各本，他都没有收入。班固的补充，也只就自己所见到的。作史的态度应该这样，不能像郑樵《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那样钞撮它书，不加考订，虚列其目，以多为贵。这可说明《汉志》有遗漏并不可怪，而后人正当为做补遗的工作。

姚振宗补《汉志》的成绩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是一部极精密的好书。书共五卷，他共补得三十三种，二百七十四家，三百六部。附录讖纬一种，十一家，十一部。综三十四种，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附见六十四家，九十部。（诸书多不著卷数，故不计。）超过了《汉志》的一半以上。

姚书所据的材料，除了《史记》、《汉书》和后来的史书外，大致有四：一是《风俗通义》、《广韵》、《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

证》这一类旁证材料，二是汲冢竹书中新发现的材料，三是讖纬藏于石室的秘密材料，四是诗赋没有奏御的私家撰述材料。一与四，是中秘所没有的。二与三，则刘、班所不可能见到的。今一一详征博引，朗若列眉，可为著述的法则。

补《后汉书》艺文志各家评述

为《后汉书》作艺文志的，据严可均《全后汉文编》：“按《蔡邕传》，邕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案文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朝会意》、《车服意》、《五行意》，仅有八意。其余二意无考，盖《地理》、《艺文》也。”是蔡邕曾作《艺文志》，其稿大约毁于董卓、李傕、郭汜之乱。不曰志而曰意，为避桓帝讳。（汉赵戒字志伯，《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作意伯，同此。）阮孝绪《七录叙》有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若干卷（此下当有脱文），八十七家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后汉书》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通志·校讎略》言有《艺文志》。”据此则袁山松亦作《艺文志》，但为其所作《后汉书》中的一种，仍不是补史性质。

清代始有专为范书补志的。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因司马彪八志无艺文，是为补之，较单称补《后汉书》的其名为正；惜为未成之稿，且有重复及误收。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也是未成之稿，仅至子部小说家，其间又多不备。姚振宗《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其书综四部，为类四十有二，附以佛道，凡四十四类。其断代、门类颇有区别，与所著其它书同例。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成书最后，与姚振宗同时而未见姚书。例仿王俭《七志》。《考》者，仿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为辑逸之用。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也是未成之书，卷九别集类有上而无下。卷十创为师承一门，也有上而无下。我友蒋氏国榜谓其书有四善：一曰通今，二曰信古，三曰正名，四曰纪实。虽未完成，也可备

参考。

补《三国志》艺文志各家评述

晋陈寿作《三国志》，书以志名而迄无一篇。裴松之作注，堪称浩博，也没有注意。推究它的原因，当是魏《中经》和晋《新簿》都已完成，可取证于彼，用不到重出。《魏志·王肃传》“自魏初征士燉煌周生烈”裴松之注：“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他不举出书名，也缘于此。但魏《中经》与晋《新簿》，后来都失传了，读史者遂无从取证。

清人补《三国》艺文志的有侯康与姚振宗，各成书四卷；侯书至小说家而止。二家体例不同：侯书依习凿齿《汉晋春秋》、朱熹《通鉴纲目》，先蜀，次魏，次吴；姚书则仍依陈志先魏后蜀。既为补陈志而作，自不应变换它的次序，姚氏为是。侯书以人类书，即是以一人所著罗列一处，在史志来说尚未见过，地志则往往这样。姚书则以书类人，与《汉志》、《隋志》一律，四部分类才明确，这是姚书胜于侯书之处。

补《晋书》艺文志各家评述

《晋书》艺文志，在光绪时补者五家，都各不相谋，材料详略也各不同。故友丁氏国钧书最先出，共四卷，附录一卷，其例一依《隋志》，别立存疑、黜伪二目，尤见详慎。其注及刊误则署其子辰之名。文廷式书六卷，无叙跋，恐非手定，其所收材料较富。秦荣光书四卷，脱稿后续有补充，歿后，其子为编定付印。后附石刻，为这一书的创例。吴士鉴书名《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成书在丁氏之后。黄逢元书四卷，也为未定之稿，至歿后才印行。大抵此类书的编纂，须穷年累月，铢积寸累，本没有止境，所以文、秦、黄三书都非手定。丁、吴二家，本为《晋书》全书校注，用力最勤，艺文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搜辑校订，也比较严密详尽。丁注未成，其残稿今在

上海图书馆，别刊《晋书校证》五卷，为黄以周、缪荃孙所推许。吴著《晋书斟注》，巍然巨帙，与我友刘氏承幹合作刊行；但只是长编性质，其精核反不如丁氏。五家之书，当推丁氏为甲。

《隋志》的补遗

《隋志》收录，可称详备，但详于南而略于北，如后魏、齐、周诸人的著作，明见于各传和《北史》、《唐志》的，仍遗漏不少。刘芳、徐遵明、熊安生、乐逊的经学，宋显、刘曷、杨休之、辛彦之的史志，张渊、信都芳、刘焯、何妥之的历算；文辞一门如后魏的高闾、李彪、袁翻、常景、祖莹、杨谦之，北齐的樊逊、李广、卢信祖，北周的柳弘、薛慎，隋之王贞、杜台卿、辛德源，都没有著录。故友张氏鹏一博考群书，得经说九十二部，史录六十部，子类五十五部，专集七十二家，杂文三十篇，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

《南史》《北史》和《五代史》艺文志的补作

南北朝史，近人多有补作：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一卷，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先是，清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淮南书局得到他的一部分原稿付刻，阙《礼仪》、《乐律》、《刑法》、《职官》、《食货》、《氏族》、《释老》、《艺文》八志。开明书店编《二十五史补编》，从徐氏乃昌访得未刊原稿，而恰佚去了《艺文志》三卷。据徐氏序，是把他儿子徐崇的补作印入，并有徐崇的老师李肇偁序。我疑这三卷本是汪士铎的原稿。后晤其师陈乃乾，则云彼馆徐时所编辑而徐崇纂名的，可决知此书并非徐崇所作了。

五代时战乱虽很剧烈，而蜀广政十四年刻石经，长兴三年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蜀母昭裔又以私财百万刻《九经》及《文选》、《初学记》、《白孔六帖》行世。刻书之业，起于唐末而盛于斯时，无论刻石刊木，公私板本，都是开两宋之先，而史志却没有艺文。顾櫰

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可以补这缺憾。

《辽史》《金史》《元史》艺文志的补作

倪灿《宋史艺文志补》，本为黄虞稷所著，卢文弨付刻时未列黄名，今商务印书馆重印已补入。王仁俊有《西夏艺文志》一卷。厉鹗、杨复吉各有《补辽史经籍志》。缪荃孙、王仁俊、黄任恒各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龚显曾、孙德谦各补《金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其统补辽、金、元三史的有倪灿、卢文弨、金门诏。

在这类补作中，当以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四卷为最佳。以前人做补志的，尚有旧目可凭借，而《元志》则独不然，故搜罗材料最难。其书虽标《元史》，而仍附辽、金，沿用史志旧例，并非纯乎断代。创稿于乾隆癸酉，成于庚子。（据黄钟跋云撰《元史氏族表》的年份，《艺文志》约略相当。）经过三十年的钻研，宜其精密无匹了。

第七节 官家目录

官家目录的原始

古代的书籍，用竹简编制成册，它的篇目一定有先后次序，就应该有目录。《隋志》：“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用这个“盖”字，是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可征的材料，不过按理来推，想当然罢了。

我们不须远求，就汉代说，只知刘向父子为目录的创始人，其实在他们之前，可能已有目录，但是没有传下来。《汉志·兵书略叙》：“汉兴，张良、韩信叙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摺摭遗逸，奏记《兵录》，犹未能备。”这说明在高祖、武帝的时候，已有校理兵书的事。说定著三十五篇，又说奏记《兵录》，这明明有目录的。后来刘向作

叙录，也说定著若干篇，也是奏上，便是用张良、韩信、杨仆的旧制。由于刘氏有目录，也可推知张良他们也有目录，不能说全没有理由。

若按具体可信的材料而论，还是要推《七略》为官家目录的第一部。

东汉官家目录

到了东汉，光武帝笃好文雅，明、章二帝，也注重经术。当时如兰台、东观、仁寿阁都是藏书充积，并派校书郎班固、傅毅去作典掌。

《七录叙》：“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后人因而认为那时撰有兰台书部和东观仁寿阁新书两部官家书目，其实是误会的。兰台书部，只是泛指部次之事，犹如图书的分类法。东观仁寿阁新书，是指《东观汉记》。只有班固的《艺文志》是那时惟一的官家目录，其它如蔡邕、袁山松的书，即使存在，也是私家撰著。

郑默《中经簿》

魏氏代汉，于董卓西迁的破坏之后，大力收罗，所得不少，藏在秘书中外三阁，命秘书郎郑默删省旧文，除其浮伪，著《中经簿》。中书令虞松称他的书是：“而今而后，朱紫别矣。”可见郑默是下过一番功夫而取得这些成绩的。

荀勖《中经新簿》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在古冢中发现了大批竹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地下发现。其后交给领秘书监的荀勖。荀勖在这时据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变《七略》之体为甲、乙、丙、丁四部，前面已讲过，不再重复。荀勖对体制的变更，是进步的，但他的整理工作都并没有做好。《隋志》：“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比之《七略》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大大地不如了。但是汲冢所出的《穆天子传》，却有荀勖的序一

篇，其体略如《别录》，和《隋志》所言不合，是什么原因呢？或许荀勖校书的起因是为了汲冢竹书，所以对竹书特别撰有叙录。

两晋官家目录

五胡之乱，书籍又遭一次大破坏。东晋初，李充为《晋元帝书目》，四部仅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少得可怜，可见当时损失的严重。这部书目的重要意义，是把荀勖四部的乙、丙互换，奠定了后来经、史、子、集四部的次序。又《七录叙》：“《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隋志》：“《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并没有撰人姓名。二者名虽稍异而实即一书，《旧唐志》、《新唐志》著为丘深之撰。丘深之即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附见《宋书·顾琛传》。唐人避高祖讳改渊为深。

宋齐梁陈官家目录

刘宋一代目录最多。元嘉八年有谢灵运的《四部书目录》，见《旧唐志》后序；营阳王景平中有殷淳的《大四部目》，见《宋书·殷淳传》及《七录叙》；苍梧王元徽元年有王俭的《四部书目录》，见《隋志》及《旧唐志》。王俭的《元徽书目》，仍用四部的序次，因为是官家目录，不得不遵守旧制，他是不能满意的，所以又别撰《七志》，则用《七略》的体制。《七志》虽是私家目录，因为曾经表上，所以也同于官书了。

王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官至秘书丞。《南齐书》有传。所撰《七志》，据《宋书》称三十卷，《南齐书》称四十卷，《新唐志》称《今书七志》七十卷，贺踪补注。则七十卷本当是贺踪作注时的分卷扩大。据阮孝绪《七录叙》：“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

《七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隋志》同，并附子目。末云“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他对分类的理论，必有发挥，可惜已失传了。

南齐有王亮、谢朓等的《四部书目》。梁有任昉、殷钧的《四部目录》（又名《秘阁书目》），刘孝标、丘宾卿的《文德殿书目》，梁钧的《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的《梁东宫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的术数之书，另立一部，使祖暅撰之，故梁有五部之目。

梁时又有一杰出的目录，则阮孝绪的《七录》便是。因为是私家目录，故在下面再讲。

陈代的官家目录，《隋志》著录的有《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四卷，《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共三种，都没有编撰人姓名，其书也旋即失传。《隋志》：“隋氏平陈，所得之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陈朝的统治者不过偷安江左，不如梁朝那样注重经术，所以南北朝时代要算陈朝最不足观了。

北朝书目考略

自晋元帝渡江以后，中原沦陷，连年战争，无暇顾及文化。直到托跋魏兴，孝文帝笃好儒术，而秘书丞卢昶撰有《甲乙新录》。《魏书·儒林·孙惠蔚传》谓卢昶上书请在秘书省校考书籍，并提到卢昶的《甲乙新录》。《隋志》等书都没有著录，或许这部书并未传布。其书名曰《甲乙》，是为六艺、诸子，还是甲乙概括了丙丁，现在无从考信了。《隋志》只有《魏阙书目录》一卷，内容也不知怎样。

北齐、北周两代，虽都曾命官校书，究竟有没有编成目录，各书都没有著录。

隋代官家目录

隋朝统一了南北，文帝从牛宏的建议，派人到民间去搜书，秘册异

本，发现了不少。平陈之后，把所得的书籍撰为《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其后又有《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四卷，当是重修的。又有《香厨四部目录》四卷；大约香厨是藏书的地方。当时求书的定制是凡献书一卷，便赏绢一匹，故所得很多。后来也多依此法以访书。

《隋书·许善心传》：“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也。（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有淆乱。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七林》为《七略》流派的最后一种，《隋志》漏失不载，序中也没有提及。它篇首有总叙，部录下明作者之意，体例和《七略》仿佛，可能胜于《七志》、《七录》，因为《隋志》说：“《七志》不叙作者之意。”又说：“《七录》浅薄不经。”可以比较而知，可惜失传了。《唐志》又有王劭的《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文帝时屡次编修目录，可知当时得书之多了。

炀帝也性好读书，西京所藏，多至三十七万卷，命柳顾言等除去重复的，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成《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唐初平王世充，尽收没所有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溯河运至京师，经过砥柱，船覆，书亦漂没，只存目录。这是古书又一次大损失。后来修《五代史志》，就根据这目录为《隋书·经籍志》。前人多以为《隋志》根据《七录》，并不正确，说已见前。

唐代《群书四录》

唐玄宗开元三年，令马怀素、褚无量整比内库旧书。怀素请续王俭《七志》，从之。不久，怀素死了，书未成。又诏令秘书官草定四部，因参加编修的意见不统一，也未成。七年，命元行冲代怀素，历时五年，遂成《群书四录》二百卷。在官家目录中，除了后来的《四库提要》，要算此书卷帙最富了。可惜至宋代已不见著录，至今更只字无存。

《崇文总目》有《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这部书在宋初尚存，欧

阳修等修《唐书·艺文志》，即以它作依据。至《玉海》卷五十二引韦述《集贤注记》：“天宝三载闰二月，更造四库书籍（《唐会要》作书目）。”查《崇文总目》已不收此书，恐欧阳修也没见过。

宋代《崇文总目》

五代大乱，无暇文事，故没有目录传世。至宋太祖乾德时，有《史馆新定书目》。真宗时，诏编馆阁图籍目录，又有《太清楼四部书目》，均见《玉海》。仁宗景祐初，以三馆及秘阁所藏，诏王尧臣等仿《开元四部录》之体，编成目录六十六卷，所收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元年十二月进上，赐名《崇文总目》。原本在每条之下，都有论述一篇，说明书中的内容，体制很好。《四库提要》承朱彝尊的意见，说是被郑樵把论述删去，只存书名，故《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的只有一卷了。清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十二卷。嘉庆中，钱东垣等又从它书搜集残文，加以考证，编为五卷，并《附录》一卷，得略见此书概貌，虽卷帙不全，但在宋代的官家书目中，好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神宗熙宁、哲宗元祐时，都有书目，见《玉海》引《中兴书目》和《会要》。到了徽宗时，《崇文书目》所收的书，已有不少亡失了。致和中，把续得的书增补进去，改名《秘书总目》。可惜都没有传本。

南宋官家目录

靖康之难，又一次文化的大损失。幸高宗南渡后尽力访求，故馆阁所藏很富。《直斋书录解題》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绍兴改定。《通志略》有《求书目录》一卷，明《文渊阁书目》有《四库阙书录》一部，钱曾《述古堂书目》有《绍兴改定四库阙书(记)》二卷。名称虽异，其实即是一书。惜传本罕见。道光时，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得一卷，题曰《四库阙书目》。又《玉海》：“绍兴初，改定《崇文总目》、《秘省续编四库阙书》。淳熙四年十月，少监陈騏言乞编撰书

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门，计现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复参《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史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闰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版。”今除《崇文总目》有辑本外，其它并无传本。叶德辉始得钞本《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为之考证刻行。近人赵士炜又辑成《中兴馆阁书目》和《续目》。

宋代凡四次修国史，每修一次，必有艺文志，一曰《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二曰《两朝志》（仁宗、英宗），三曰《四朝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曰《中兴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志的每类都有小序。后次续修，大抵把后来所得的来增补前志所无。元人修《宋史·艺文志》，便依据这四志加以删并而合为一书。

元代的文教不如武功之盛，并没有撰修目录，只有王士点撰的《秘书监志》载，至正时王道关曾建议编目。当时监中藏书，统计经类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册，子、史、集尚不在内，尚称丰富。但对王道关的建议曾否采用，则不得而知。

明代《文渊阁书目》和《内阁书目》

明正统时，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二十卷，其体例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五十橱，每书只著书名和册数，而不著撰人和卷数，甚至于往字三橱的新志，大半并册数都没有注。钱大昕谓“此目不过内阁之帐簿，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比”，在历代官家书目中，编次是最草率的了，但也开辟了后来藏书家目录之一派。神宗万历时，张萱等把阁中藏书重加整理，编为《内阁藏书目录》八卷。分为部类，补了撰人姓名，偶有几种附有解题，虽很简略，又卷数也不能全著，缺点尚多，然比《文渊阁书目》整齐得多了。

清代《四库总目》

清代文教大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为一大盛举。乾隆三十九年，下诏访求遗书，四方藏书集中京师。于是开馆延士，作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分为应刻、应钞、应存目三种。又从朱筠的建议，于《永乐大典》内搜辑佚书，检出没有传本的用活字排印，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益实用者，精钞详校，汇为《四库全书》，藏于文渊阁。其认为内容较差的，只存书名，谓之存目。每书都校其得失，举其大旨，列于本书卷首，名曰提要。又合各书的提要为一编，为《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又因卷帙太多，翻阅不便，另辑《四库简明目录》二十卷。总纂是纪昀，至四十六年才全书告成。虽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然集中了一时的专家学者的力量完成的这样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吸收其精华，吐弃其糟粕，仍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所不可不读的一部好书。

清代的《天禄琳琅书目》

乾隆四十年又命于敏中等把昭仁殿所藏的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其例以书的刻版时代为次，一书而两刻皆工致，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详其锓梓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并一一考其时代、爵里，著授受的源流。嘉庆时，又命彭元瑞等依前编例为《天禄琳琅续编》二十卷。这一目录，遂开了后来藏书家专重版本目录的先例。

以上综合叙述了自汉至清的官家目录，可以看到历代藏书的盛衰和学术的兴替。因为藏书和学术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大抵目录兴盛的，它的学术也兴盛，反之亦然。今天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需要批判地接受前人积累的丰富知识，那末，对于目录学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第八节 私家目录

私家目录的溯源

前面所述史志、官家两类目录，大都据当时所见书籍著录，即如《汉志》之据《七略》，《隋志》之据《七录》和《大业正御书目录》，虽出于间接，由于《七略》、《七录》和《大业正御书目录》都是可以确信的，就等同于知见目录了。只有少数如郑樵《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才不足为凭。至于私家目录，大都把自己收藏的书籍编目，收藏有多少，不可能凭它来看学术的全貌，然它对于考征古文献的存佚、真伪等，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私家藏书的风气，虽自古有之，而目录的传世，则始于宋，盛于明、清。私家藏书目录最早而可考的，据《梁书·任昉传》：“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高祖使学士贺踪，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这是任昉的藏书确有目录。再推而上之，阮孝绪《七录序》：“遍致宋、齐以来王公缙绅坟籍之名簿。”可知任昉以前，王公缙绅所藏已有目录，《玉海》引宋李淑《邯郸书目序》：“儒籍肇刘《略》、荀《簿》、王《志》、阮《录》，迄元母乃备。藏家者唯西斋著目。”他说私家藏书目录始于唐吴兢的《西斋书目录》，这是考证未确。

私家目录有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作的，便不是只据私人所藏，而必须博采旧目了，如阮孝绪的《七录》，就属这类。宋王应麟《玉海》中的《艺文部》，也当属于这类。其它属于私人所藏的目录，宋明以来传世的，实在不少，有的内容丰富，编撰有体，可资参考；也有只罗列书名，等于帐册，实无所用的。下面就比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来作介绍。

梁阮孝绪《七录》

私家目录而在目录学方面有重要地位的，当以梁阮孝绪的《七录》为第一部。《梁书·处士传》：“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大同二年卒，年五十八。门人谥其德行，谥曰文贞处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余卷，行于世。”又他的《七录》自叙：“凡是宋、齐已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阮孝绪只是一个处士，没有官爵，所以没有参加编写官家目录的机会。然而他却有志于编写一部有系统的可以补史志和官家目录的新目录。个人收藏是万万不够的，必须广泛地搜罗王公缙绅的名簿。也可说是汇集了宋、齐以来私家书目的大成，可能包括了任昉的书目在内。

《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五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这五录即用经、史、子、集的次序，不过稍变了名称。至技术别为一录，即仿刘孝标的《文德殿书目》的成例。外篇二录：一曰《佛法录》。二曰《仙道录》。《汉志》道家在《诸子》，神仙在《方技》，本非一家，那时尚没有佛。道士的经，也出于东汉之后。荀勖作《中经簿》时，佛经只有十六卷（见《七录叙》），应列在近世子家，道经当也是同例。王俭作《七志》，因这二家非《七略》所有，所以附见于后。到梁时佛经的翻译大盛，也由附庸而蔚为大家，故别立一录，而以仙道作配，共成七录。我们每把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并称，似乎不分上下，其实王俭的《七志》是纯乎复古，《七录》才是斟酌于古今之间，又就书的多少来分部，着重实际，而不偏执前人之成说，应该在王俭之上。可惜原书已亡，只有《广弘明集》中保存了一篇叙文。

阮孝绪《七录》的编成，得到友人刘杳的大力帮助，自叙中已提及。刘杳自己也有《古今四部书目》，阮序说：“通人平原刘杳，闻余已著先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大约就是指这部《古今

四部书目》。

唐开元时的毋煨，参加过《群书四录》的编修，又自著《古今书录》四十卷，本是私家目录，后被钞入《旧唐书·经籍志》，便列入官书了。他又有《开元内外经录》十卷，《旧唐志》引自叙：“其外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录，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以释、道并录，而近人姚名达《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却漏未列入。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是两部重要的著作。后来有人称目录学为晁、陈之学，表明了他们两人在目录学方面的显要地位。

晁公武字子止，巨野人。官至敷文阁直学士，世称昭德先生。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数送给了公武。公武把这些书一一校讎，并写出每书的大略，汇编成这部《读书志》。书中不但有读书的心得，又附入了不少遗闻佚事，可以作为辨章旧闻的材料。他这时作守荣州，所以加上郡斋两字。此书传世有衢州和袁州两个本子。公武原书先在蜀刻行，后来蜀中另刻了姚应绩编的二十卷本，内容有所增加。淳祐己酉，南充游钧传刻姚本于信安郡，这就是衢州本。番禺李安朝于原志四卷之后，另录赵希弁藏书中有公武题识者为《附志》一卷，录衢州本姚氏所增部分为《后志》二卷，又增订《考异》一卷，刻于宜春郡，这就是袁州本。宋刻真袁本失传已久，前人所见的钞本，已不是原书面貌，直至张元济得到了故宫所藏宋刻真袁本影印，遂解决了以前许多误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人。这书每种详载卷数和撰人姓名，并品题书中的得失，考证极精，与《郡斋读书志》相似。倪灿、黄

虞稷《宋史艺文志补》作五十六卷，今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辑出的，分为二十二卷，已不是完书了。相传毛晋有宋刻半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旧钞残本，存《楚词》类一卷，别集类三卷，云是陈氏原本。卢文弨又得子部数卷于鲍廷博家。那末，此书世间尚有原本全书存在，也未可知。其例，把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不标经、史、子、集之目，其实列经之类凡十，史之类凡十六，子之类凡二十，集之类凡七，仍是按照四部的分类法。

尤袤《遂初堂书目》

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一卷，在宋人只有书名的目录中，这是仅存的一种。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他藏书极富，公余常闭户谢客，手钞古书，曾向友人李焘说：我手钞的书，饥读之当肉，寒读之当裘，孤寂读之当友朋，幽忧读之当金石琴瑟。此书分经为九类，史为十八类。子为十二类，集为五类，非但没有解题，连卷数及撰人姓名也没有注出，唯别集、总集两类尚有注出的，体例又不一律。李文简说：“延之所藏甚富，后遭郁攸之厄，此本殆烬余之目矣。且《放翁集》亦录入，是出尤氏后人所辑，非原书也。”据此，卷数和撰人姓名当是被后人删削。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收入了《香谱》、《石谱》、《蟹录》等无类可附的书，这是最好的创例。又一书而兼载数本，如《史记》有川本、严州本，《前汉书》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后汉书》有川本、越本，《三国志》、《晋书》都有川本、旧杭本，也开了后来目录兼载各本的一派。此书虽只寥寥二十多叶，有如书估账簿，然仍颇有可取的地方。

明高儒《百川书志》

《百川书志》二十卷，明高儒撰。儒字子醇，号百川子，古涿人。明嘉靖时武弁，好藏书，尝谓：“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他费了六年的考索，分四部，列九十三门，成此二十卷。

每种大都有简单解题，尚称明晰。又把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施耐庵的《忠义水浒传》列入了史部的野史类，王实甫、关汉卿等的戏曲列入了史部的外史类，瞿佑的《剪灯新话》列入了史部的小史类。这些在封建时代士大夫所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不收入子部小说类而收入了史部，这是他的独特的看法。这书《四库全书》中没有著录，流传很少，一九一四年叶德辉才据钞本刻行。

钱曾《读书敏求记》

《读书敏求记》四卷，清钱曾撰。曾字遵王，自号也是翁，常熟人，为谦益的族曾孙。这书专记所藏宋元旧钞各本，多论缮写刊刻的工拙，对于考证不甚留意，开了藏书赏鉴的风气，后来颇为盛行。

《四库提要》指出了它分类配隶和真伪不辨的错误，同时也承认它“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故友章氏钰为撰《校证》，广搜博引，遂为研究版本学不可不读的要书。

清黄丕烈《蕘圃遗书》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苏州多藏书家，而尤以黄丕烈最为杰出。这时，毛晋、钱曾、季振宜、徐乾学诸家的藏书正陆续散出，多被他收得。他精于鉴别，宋元佳槧，精校名钞，一时集中在士礼居。先取宋刻本一百多种，属顾广圻作《百宋一廛赋》刊行，其全目歿后由瞿中溶编定，竟不知所在了。幸而他每得一书，必详细地校勘，往往附以题识，由于见闻之广，论断之精，名言法语，可采的很多，所以，后来谈藏书的都推他为一大宗。先有潘祖荫、江标、缪荃孙等相继搜集为《士礼居题跋记》刊行，我也曾汇辑为《蕘圃书跋合编》，内容较《读书敏求记》更广博精当。

黄丕烈的流派，先有常熟之张，又分为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各有书目，分述如下：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昭文张金吾撰。他把所藏宋元旧槧、钞本中有关实学而传布不广的，略依《四库总目》的次第编载，《四库》未收的也以类附入，大致元以前为详。它的特点，凡一书必先列某某刻本，兼载各家序跋，仿马端临《经籍考》和朱彝尊《经义考》的前例，在私家书目中尚属创见。再就原书加以考证、校雠，然后会集所得，各为解题。各书标目，悉依原本。所增的时代及撰著等字，以阴文为别，也颇清晰。其体例最善，后来藏书志多仿效它。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常熟的藏书风气是有历史根源的，钱谦益、钱曾、毛扆虽有目录流传，但都没有解题。《读书敏求记》偏重赏鉴，《爱日精庐藏书志》后来居上，至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而始称完美。瞿氏先延黄廷鉴、王振声任编撰，后延王颂蔚、管礼耕、叶昌炽为校订，都是著名的专家。《周易》、《左传注疏》十行本，《穀梁注疏》宋监本，各附校勘记，体例极善，也是创例。又补《周易象义》之阙，正周氏本《毛诗传笺》、汪氏本《公羊解诂》之讹脱，读一书可得数书的功用。在近世藏书志中，尚没有超过他的。

杨绍和《楹书隅录》

聊城杨以增当嘉、道间，喜收书籍，多获黄丕烈旧藏，筑海源阁为贮藏所在。他的儿子绍和，把藏书的一部分，包括宋元刊、钞本、校本，各记其行款、印章、题跋，成《楹书隅录》五卷，又《续编》四卷。中以《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四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都是宋刻佳本，最煊赫有名。惟绍和所附考证殊属寥寥，且多舛讹，只可供藏书家的参考，而非读书家所亟需，在四家书目中评价较低。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当太平军起义时，杭州遭封建统治者的破坏很大，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在兵火中遭残损，经当地丁丙兄弟极力保护，并把残缺的一一钞补，复为全书。他自己的藏书，编成《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每种各有解题，考订虽不如瞿目的精审，而搜集材料却非常丰富，在瞿目之上。瞿目注重宋、元刻本，他所著录的宋、元刻较少，而明刻却甚可观。他的特点，尤在留意校本、稿本，后来刻书者往往向他借取材料，使之能为研究者所参考。四家书目中当与瞿氏并重。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归安陆心源得郁松年的宜稼堂藏书，又有力好古，江浙旧家的遗书，都奔凑而至，遂以藏书雄冠海内。他所著的《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出于李宗莲之手。仿《爱日精庐藏书志》例，全录各书序跋，而考证语则别编《仪顾堂题跋》及《续跋》各十六卷。他楼名皕宋，是夸张藏有宋刊本二百部，将掩过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实际不过百十部，其它则是把《玉海》附刻，《百川学海》之类拆散分列以充数罢了。他校刻的丛书和自著书，都很草率，不像出于大藏书家之手。光绪三十三年，皕宋楼所藏全部被日本岩崎氏以日金十一万八千元买去，中华国宝，流于异域，这确是一件不可弥补的损失。

晚近有名的藏书志

近时私家目录较有系统的，有缪荃孙的《艺风藏书记》八卷、《续记》八卷、《再续记》七卷，叶昌炽的《滂喜斋藏书记》三卷，邓邦述的《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又《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缪荃孙代张钧衡的《适园藏书志》十六卷，张元济的《涵芬楼烬馀书录》四卷，又代潘宗周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四卷，这些都是有解题的。其它只有书名的，则多不胜举，且与目录学关系不大，一概从略了。

第九节 地方著述目录

方志艺文志的重要

地方志乘，本是一地方的历史，与国史不过具体而微，国史有艺文志，所以纪一代的文献；志乘有艺文志，所以纪一地的文献，它的功用相等。且各地的艺文志倘是都能编得征实可信，那末，汇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史艺文志。由于每一地方范围较小，访求的也耳目易周，只要每地有几个有心人，就容易成事。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中有《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三曰因地以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京口记》者，润州记也。《东阳记》者，婺州记也。《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迹》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钱氏庆系图》，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言》虽亡，君俞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如此之类，可因家以求。”这两个求书方法，说明了访求地方文献的有利条件，而以本地人做访求工作，当比外地人更周密，所以志乘之列艺文，几乎是不可阙的项目。

方志艺文志创自《剡录》

地方著述目录的创始者，在北齐、北周之间。刘知幾《史通·书志》篇：“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语曰：虽有芝麻，无弃菅蒯。于宋生得之矣。”《关东风俗传》虽已失传，观其书名，可知是关东的地方志，它的《坟籍志》，罗列当时的书名撰者，无

疑开后来方志艺文的先例了。

《宋史·艺文志》有《川中书籍目录》二卷，又《诸州书目》一卷，好像是属于地方著述的书目，但姚名达据《宋会要》考得这两个目录是川中和诸州藏书之目，并非记本地人的著作。在宋代的方志中，《嘉泰会稽志》有《遗书录》，惟所录的是整篇诗文，并无书目。只有高似孙的《剡录》卷五有书有文，所谓书，是罗列了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孙绰、许询、支遁、秦系、吴筠、灵澈、郑言、谢灵运、顾欢、葛仙翁十四人的著作和阮、王、谢氏家谱的名目共四十二部，各有卷数。所谓文，是专钞谢安、戴逵等的单篇文章十五篇，皆与剡有关的，并非都是出于本地人之手。这书成于嘉定甲戌，现存方志有目录的，没有比它再早的了。

《剡录》并不称为艺文志或经籍志，后来用其实而变其名，也是取法乎史志。但内容很不一致，如同称艺文而或录书目，或录诗、文，虽都源出于《剡录》，而没有统一的规定。倘为了便于认识起见，不妨把记书目的称经籍，录诗文的称艺文，虽不符合于《汉书·艺文志》的初义，似也不妨因时变通。

方志艺文志的两种体裁

地方目录又有两种不同的体裁：一是以书编次的，一是以人编次的。以书编次的是史志艺文的通例，以人编次的是方志艺文的变例。这变例的问题，尚须研究。《剡录》载戴、阮、王、谢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与这里的以人编次，性质也不同。以人编次的原因，可能是依某人的传志，后面罗列了所著书的名目；修志者照样钞下，约略依时代先后排列就成了。这未免有些因陋就简，然偏处一隅，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地著述无多，倘必照四部分类，那便阙门太多了。在人文较盛的地方，就应该以书次为妥。苏州向来是人文最盛的地方，历代著述很多，参加修志的，道光志有黄丕烈，同治志有叶昌炽，都是有名的专家，为什么两志的书目和艺文都是以人而不以书编次呢？推究起

来，也有一个原因。以书编次的，必须每一部书都经目睹，详察内容，才能妥当；倘只据书名，往往把内容误认，闹成笑柄。可是修志者所据材料，一是旧志的旧目，二是采自各家书目，三是根据各人志传的附目，四是采访所得，都不可能一一目睹。为慎重起见，反不如以人编次为妥了。以人编次的又有一种方便，在没有书名索引的线装书，可以检一人而他的著述便全部在目，不须按部去寻。但这限于只有书名的经籍志，倘有解题的，就以书编次为宜了。至今这两种不同的体裁，还是并存着。

方志艺文志的单行本

方志的修辑，由于条件的不同，大致通志比府县志好，大府名县又比一般的府县好；又要看主修的人，倘是有名的学者，也一定比较好。艺文是方志中的一项，自然不能例外。方志中的艺文有别出单行的，必为了它的内容丰富和体例精善，如郑元庆的《湖录经籍考》六卷，就是《湖录》中的一部分。《湖录》是湖州的地方志，郑元庆这部书是向来有名的，可惜全书未刻而失传了，吴兴刘氏嘉业堂得《经籍考》钞本付刻，体裁是以书编次而每种都有解题。管庭芬原编，蒋学坚续编的《海昌艺文志》二十四卷，本是《海宁州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编次的，而又把作者的姓按韵目来排列，检查很方便，每人著字号仕履，每书附序跋及按语。龚嘉俊等的《杭州艺文志》十卷，本是《杭州府志》的一部分，以书编次而不附解题。故友丁祖荫的《常熟艺文志》一卷，本是《常熟县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编次，按韵排列而不附解题。这些别出的单行本，即作为独立的著述，也未尝不可。又《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凡是志中有艺文、经籍、书目的都特别注出，参考很方便，也是编目的一种方法。

方志艺文的专著

地方著述目录不载方志而别为专书的，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有明祁承焯的《两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明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十卷。周天锡《慎江文征》，有明姜准的《东嘉书目考》。这些书都已失传。洪亮吉《更生斋集》有邢澍《全秦艺文录叙》，称其书仿历史艺文志，而参以《经义考》之例。今《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有邢澍《关右经籍考》十一卷，大约就是这部书后来的改名。这是现存地方目录专书中最早的了。

总论方志艺文的体例

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三十三卷、《外编》二卷，义例精审，条理完密，可以说是专书中体例最好的一部。全书以书编次，而全录序跋，仿马氏《经籍考》、朱氏《经义考》例。又每书下注存、佚、阙、未见四目，也是用《经义考》例。于是一扫滥列虚名、有目无书的流弊。每书最后，间有自加按语，考证都确有所见，绝无空论。《叙例》论断限有一则，关于侨寄者云：“郡邑之人，迁徙无常，父子之间，籍贯顿异。如不有界域，则一卷之中，人殊燕越，体例芜杂，不足取信。此编所收文籍，区别特严。大抵自内出者录父而删子。（原注：如经部录叶味道《仪礼解》，而子部不录叶采《近思录》之类。）以父尚温产，子则异籍也。自外人者录子而阙父。（原注：如集部录徐玘《二薇亭诗》，而经部不录徐定《春秋解》之类。）以子既土著，父犹寓公也。”一般方志艺文收录，有的以多为贵，有的失于稽考，往往名不副实；孙氏这个断限标准，是很谨严的。又《叙例》第十则：“游宦名贤，实多载述。如緝之《郡记》，开编谱之闕规；子温《橘录》，萃永嘉之珍产。考征所籍，桴緝须详，然主客之间，当有畛域。而温州旧志，并与本郡著述相厕，尤为无例。今别录为《外编》一卷，以为搜讨旧闻之助。”方志著录，自当以本地土著为主，而外地人的有关当地著述，当然也不可不收，但不应主客相混。孙氏别列《外编》以专收这一类书，也是最妥当的办法。

继孙氏而起，为一地艺文专书的，有项元勋的《台州经籍志》四十

卷、胡宗楦的《金华经籍志》二十四卷，都是一府的专书。故友陆惟鏊的《平湖经籍志》十六卷(原书三十二卷，后半未刻)，则是一县的专书。徐世昌的《清畿辅书征》四十一卷，则是断代体的。

第十节 专科分类目录

专科目录的溯源

藏书家的目录，旨在各部各类的齐备，不论内容怎样，都须兼收并蓄，而对于读书人来说，要求是不同的。读书人的术业有专攻，对于所攻的某一类书籍，需要尤为迫切，搜罗更须广博，于是专科的目录，就为适应这要求而产生了。

汉初韩信、张良的次序兵法，删一百八十二家为三十五家，虽无法知道它的内容，但无疑是专科目录的创始者。佛法传入中国，翻译的经典很多，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有朱士行的《汉录》一卷。西晋惠帝末，有竺法护的《众经目》一卷。怀帝永嘉中，又有聂道真的《众经录目》一卷。以后编目的不下数十种之多。《隋志》有《法书目录》六卷、《名手画录》一卷，则书画有专目。《新唐志》有杨松珍《史目》三卷、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则历史有专目。宋志有欧阳修《集古录》五卷、崔君授京兆尹《金石录》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又《诸道石刻目录》十卷，则金石有专目。大约时代愈近，则分科愈细，专目的分类也愈多。从清至今，作者纷起，对于科学研究者的帮助确是很大。

专科目录的门类

专科目录的门类，约可分为经解目录、译书目录、哲理目录、文字目录、教育目录、社会科学目录、自然科学目录、应用技术目录、艺术目录、文学创作目录、地理目录、金石目录、历史目录等十多种。今

略举其体例特善、搜集较备者以供参考。

朱彝尊《经义考》

清朱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是总结历代经学书籍的大目录。其书初名《经义存亡考》，只列存、亡二例，后来更分为存、阙、佚、未见四例而改今名，这样区别，最为翔实，故后来目录家多取为法则。又仿马端临《经籍考》而推广之，每种书下遍辑史传、地理志和各书序跋、诸家之说，或附自己按语。分为三十门：御制敕撰一卷，经义十五门共二百五十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合一卷，刊石五卷，书壁、镂版、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一卷，自叙一卷，共三百卷。其宣讲、立学、家学、目叙四门原阙，则因朱氏未及完成而卒，遗稿本无。惟朱氏虽广稽博览，究有一定的限制，有些以为已佚已阙的书，后来续有发现。小学只载《尔雅》一类，而并没有遍考小学的全部。元、明以下，或只据其它书目转载，因而序跋多漏去未录。后来翁方纲有《经义考补正》，谢启昆有《小学考》，都是弥补这些缺点的。

《小学考》和《许学考》

朱氏《经义考》于小学类只有《尔雅》二卷，而没有形声、训诂，未免阙而不完。谢启昆乃属胡虔、郑夔依前例续考补之，冠以敕撰二卷，次为训诂六卷、文字二十卷、声韵十六卷、音义六卷，共五十卷。朱氏于同时师友的著作，并皆收入。此书则一律不收，只于按语中及之。史传有不录现存者之例，私家著述本来不必效法，而反致多所阙漏。毕沅的《释名疏证》有楷字和篆字两刻本，篆字刻本是定本，内容稍有不同，这里只收楷字本，盖误为和篆字本内容全同。这类小缺点还是有的。又如清人对于《说文》的研究，著述如林，这里所收寥寥。黎经诰又别撰《许学考》二十六卷以补其阙。学问愈推愈细，著作愈出愈新，既有为过去的作总结，就有待于后来的补充，看《经义

考》的发展为《小学考》，又为《许学考》，可知学问的无穷，而编目也非容易了。

章学诚《史籍考》的拟例

我国古籍，以史部为最富，经部既有了朱氏总结的目录，史部似不容没有，乾隆时毕沅属大史学家章学诚担承编纂《史籍考》的工作，当然是最适当的。章学诚跟着毕沅在开封、武昌专力纂辑，全书将成，而毕沅因事降职，工作遂告停顿。嘉庆时，学诚再得谢启昆的相助，在杭州继续编辑，成书与否，没有下文。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今传学诚的《论修史籍考要略》一文，弘纲毕举，精义独标，可见其规模之宏大。其目：“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版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中惟十三的制书宜尊，十四的禁例宜明，犹是封建余毒，必须删去，其它已为编辑《史籍考》的确定了体例。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

近人所撰专科学目录体例称佳者，当推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其书十二卷，分为十类，每类又分子目。一曰史传：一、专史，二、小传，三、通史。二曰作法：一、体制，二、图谱，三、歌诀，四、法则。三曰论述：一、概论，二、通论，三、专论，四、杂论，五、诗篇。四曰品藻：一、品第，二、评鹭，三、比况，四、杂评。五曰题赞：一、赞颂，二、题咏，三、名迹跋，四、题自作，五、杂题。六曰著录：一、记事，二、前代内府所藏，三、一家所藏，四、鉴赏，五、集录。七曰杂识：一、纯言书画者，二、不纯言书画者。八曰丛辑：一、丛书，二、类书，三、丛纂，四、类纂，五、摘抄。九曰伪托：一、书部，二、画部，三、书画部。十曰散佚：一、书

部，二、画部，三、书画部。对于未见的，别辑一篇，附在十类的后面。首有总目叙略，说明归类的理由，并于总目各书下略注撰人和书的内容。各类皆先列书部，后列画部，并各依时代为次。各书皆有解题，除了说明内容之外，附以评论。又节录原书序跋之有关涉者。末附著书时代一览表，分著者、年略、书名、成书年份、类别五格。最后有著者索引。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

其次为林钧的《石庐金石书志》二十二卷，仿藏书志例，每书有题要叙述大旨，并录题跋印记。所收书九百六十九种，分类十二：一曰分地，二曰断代，三曰录文，四曰存目，五曰图谱，六曰石经，七曰记载，八曰考证，九曰释例，十曰字书，十一曰法帖，十二曰杂著。略依叶昌炽《语石》以书体为准，不问古物的种类，故分类颇有失宜的，不如容媛《金石书录目》以器物为纲而分类更为详密。此书的优点当在解题，由于都是据自己所藏书著录，故得一一寓目，撷取梗概，比较可信，不如展转钞录，印象模糊之谈。

以上略述有解题的专科学目，以其对研究者尤为有用。其它如黄文暘的《曲海总目提要》，近人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周庆云的《琴书存目》，瞿宣颖的《方志考稿》，日本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也都有解题，可作参考。

近人对于专科学目的编制，日渐重视，陆续出版了不少，分类也愈细，由专科而专题，如《楚辞》、《史记》和敦煌古籍都有较完整的书录，对于科学研究大有帮助。

第三章

版 本

第一节 版本的起源和发展

版本的本义

自从有了文字，便有著录文字的东西，经过了刻石、镂金、甲骨、竹简、木版、帛素、纸以至雕版印刷的发展历程。在没有雕版印刷以前，文化的传布还不能普遍。雕版印刷一次可有数十部以至数百部的成书，它对文化发展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后来因之而有版本这门学问。

关于版本以前的书籍体制，留在下节再扼要地谈，这里只就版本两字作解释。

《说文·片部》：“版，片也。牍，书版也。”《论衡·知量》篇：“断木为槩，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是用断木析成为片，再用刀来刮削使可作书，这就叫做版。《周礼》所谓版图的版，便是这样。又叫做方。《周礼·哲族氏》注：“方，版也。”《内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谓今之牍。”是据版的形式为名的。这是版

的起源，和后来加以刻字印刷的版是不同的。

《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这里所持的本是什么呢？是汉时通行的竹简和帛素。《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引《风俗通》：“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竹简和帛素，都便于手持。后人又称书籍为书本，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汉书》云：‘中外提福。’字当从示，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后汉书·酷吏·樊晔传》：‘宁见乳虎穴。’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这个名称，至今还是行用着。

版本名词的始见

版本两字连为一个名辞，始见于《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本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又《崔颐正传》：“咸平初，诸经版本多舛讹，真宗命择官详正。”是北宋初已有了。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叶德辉据此谓：“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他把版本两字作分别解释，说很精核，可以明了所谓版本，并不限于雕版印刷的书籍，而实际上包括没有

雕版印刷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钞本、稿本在内。

版本与造纸的关系

版本的繁盛，与造纸的发明有很大关系。纸在我国很早就有运用，在《汉书》中就有用纸的记载，近年并有实物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陕西省灊桥发现西汉的纸》：“铜镜三面……正面有布纹，并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织纤维作成的纸。纸上有明显的布纹……从出土器物看，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仍可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织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似可说明纸的发明，远在西汉以前。”不过这时尚没有用来钞写文件和书籍，大约生产还是不多的。东汉蔡伦，采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作造纸原料，其质更加精美。到了晋朝，已不用竹简和帛素而专用纸了。

《大唐书仪》载李虔《续通俗文》和《太平御览》引《桓玄伪事》，都有这样的记载：“桓玄令曰：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今罗布淖尔北所出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共三纸。柏为前凉张骏时人，见《晋书·张骏传》。这可证明纸的用于文件了。而用于书籍，尚在其后。

雕版创始的各种传说

雕版始于何时，据近人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有七种不同的说法：一，汉朝说。二，东晋咸和说。三，六朝说。四，隋朝说。五，唐朝说。六，五代说。七，北宋说。前三种说法，都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第四隋朝说，信从的人最多，它的根据是明陆深的《河汾燕闲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后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转引，改悉令雕撰为悉令雕版，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又转引改为悉令雕造，以坐实隋代确有雕版。其实都非原

文，原文是出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这两句作“废像遗经，悉令雕撰”。陆引本不误而解误，胡与孙作版、作造，一字之误，全非本意。二十多年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出土了一页残破的纸片，上有“自官私延昌州卅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残文两行。延昌是高昌王麴茂的年号，卅四年当隋开皇十四年。这个残片，现存英国，据说是雕版印刷的，曾经轰动一时。后来英国的考古家鉴定并没有印刷的痕迹而取消了前议。这样看来，始于隋朝的说法，也是难能成立的。

雕版始于唐代的实证

元稹长庆四年为白居易诗集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摹勒，衔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赵翼《陔馀丛考》说：“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唐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唐柳玭《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輿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以上所举的白居易诗、日历和小学字书，当时即以雕版流行，日历虽经冯宿的禁断，但事实上终是没法禁断的，至今还存在着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历书实物，可惜已流入海外了。

唐代佛经的雕版

雕版术的发明，同时也给宣传佛教提供了工具。司空图《为东都

敬爱寺讲律僧惠瓘化募雕律疏》(文载《一鸣集》)云:“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镂。”这时已为重刻,则以前早有雕本了。日本僧宗睿于咸通三年来华,咸通六年归国,除携回经卷一百三十四部外,在带还的杂书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见日本僧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所谓印子,就是印本。袁枚《随园随笔》:“余于一处见刻本佛经,有唐时年号及写经人姓名,字画工整,总合一卷,相连而书。此亦在冯道蜀刻之前矣。”虽没有说明什么年号,但经目睹,应该是可信的。这都是见于记载的。而现存实物,有敦煌石室所出的咸通九年王玠造的《金刚经》。它用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十六尺,完整无阙。第一张扉页是佛给孤独园说法图,以下是经文,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图和经文,线条挺劲,刀法圆熟,已是成熟期的作品。咸通九年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现存最古的实物。但这卷中外驰名的唐刻本,已于一九〇八年被英人斯坦因携去,现藏伦敦博物院。

五代刻书的发展

版本始于唐代,既有实物证明,是无可怀疑了。但那时都是些零星的小品,尚没有雕刻整部的经书。直到五代唐长兴三年(932年),才把《九经》雕版印刷。经这一提倡,官刻本以外,又有私刻本,包括私人著作。又有佛教、道教之徒,雕刻整部经典。刻书事业,蒸蒸日上,开了两宋刻书极盛之风,在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件大事。但现存的已经很少了。

后唐的开雕《九经》

宋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

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缙，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颢、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校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这次奏请刻《九经》印版的是宰相冯道，它的规划可称弘大详备，钞写雕刻，既各选能手，又召集了各经的专家担任校对，以田敏为总负责人。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三朝，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前后二十二年之久，才完成了《九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二部，共一百三十册。又《会要》：“显德二年(955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它成书在《九经》后二年。从此儒家经典遂有了标准的刻本流行海内。冯道的人品不足论，然对此书的刊行功不可没。因雕版的机构在国子监，故称为监本，宋人或称为旧监本和古京本。

五代监本的《五经》、《孝经》、《论语》、《尔雅》，是李鹞所写的，今传南宋浙本《尔雅》卷下后，有“国子四门博士李鹞书”一行，就是翻刻五代监本。《周礼》为“前乡贡三礼郭嶷书”，《经典释文》为太庙室长朱延熙书(见洪迈《容斋续笔》)。可惜监本原刻已无一存在，反不如佛经尚有几帙残本。

孟蜀的开雕《九经》

五代时，孟蜀也曾版刻《九经》。《爱日斋丛钞》：“自唐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版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边庭见闻录》：“孟昶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那末，孟蜀的雕版和后唐长兴监本，究竟哪个在先呢？据王明清《挥麈录》：“母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

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后仕王蜀为宰相（案毋昭裔所仕乃孟蜀，此误），遂践其言。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鹗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是长兴监本依蜀本《文选》仿制，却不言蜀本刻于何时。后人都从王明清说，定为监本也在蜀本之后。依王国维的考证：“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即后唐清泰二年，至广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其刊《文选》在相蜀后，自不得在长兴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论》云：周广顺中，蜀相毋昭裔请刊印版《九经》。《通鉴》载昭裔开学馆刻《九经》（原注：即蜀大字本《九经》，与蜀石经无涉），在广政十六年，即周广顺三年，正田敏《九经》版成之岁。昭裔所刊，当仿其制。”与王明清之说正相反，而王国维的引证凿凿可据，当为定论。虽《册府元龟》所载冯道、李愚等奏固发端于吴蜀印版文字，但并不是发端于毋昭裔的《文选》；既然雕版创始于唐，孟蜀在毋昭裔刻《文选》之前，当然已有其它印板文字了。

蜀毋昭裔的刻书

毋昭裔以私财版刻《九经》，已见前引《爱日斋丛钞》，而焦竑《笔乘》所言尤详：“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它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洎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十八九，会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悦甚，即命以版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毋昭裔，见《宋史·毋守素传》。他刻《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外，又有《白氏六帖》。毋昭裔刻书是为了便利天下学者，他的动机是好的，私人刻整部大书，也是他创始的。《旧五代史·和凝传》：“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摹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贯休《禅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县

域后序：“检寻藁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按和凝是后周的宰相，他的集已不传。贯休是蜀僧，《禅月集》二十五卷，有宋嘉熙四年兰溪兜率寺僧可灿重刻本，遂传至今，为私人刻集的创始者。

吴越所刻佛经

吴越国钱俶是信奉佛教的，他曾于显德三年丙辰和乙亥雕印《宝选陀罗尼经》，分藏在经幢和宝塔之中。前一种，于一九一七年在湖州天宁寺经幢中发现。有题记四行：“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篋印经》八万四千部，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后一种，于一九二四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塔砖孔内发现。也有题记：“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已是宋开宝八年了。其它在敦煌石室中也发现了些单篇的佛像和佛经，都有实物存在。

道书的刻行

在唐朝灭亡的第二年(908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余版，藏在龙兴观，印造流行。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五年命道士张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颁行国内。这些只见记载，早已没有传本了。

现存的五代刻本

其它五代刻本存世的，只有敦煌所出《唐韵》、《切韵》二种，载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其书已被法人伯希和所窃取，现藏巴黎图书馆。

五代时的铜版

五代时，又有一种铜版所印的书籍，只见于宋岳珂的《刊正九经三

传沿革例》，说家藏有晋天福铜版本，后来就没有人再提及，想不久便失传，故后人没法看到。我蓄疑已久，恨无从考证。前年疏浚西湖，忽发现了铜版一块，上面刻着阳文《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真言》一篇，为胡彦、武章、唐十五娘于丙午年八月八日募缘置，字体端庄，具有北宋版本风格，所谓晋天福铜版本，即此一类。考丙午为公元946年，即后晋开运三年，上距天福末年(943年)只有两年。丙午上不加年号，因为吴越自宝正六年(932年)始，已去年号，此铜版出于杭州西湖，正可证明是吴越时物。这是短篇佛经，一版可容，如巨编经籍，便工程浩大，岳珂所藏，不言何经，也不言共有几经，至今遂不可考了。今传世有韩文铜版一块，上刻《进学解》中“《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四句十六字，蔡澄、张廷济都说是宋太宗初年颁行天下的刻书式，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序》也说是“前人所传书范，乃刊书的模式”。我以为这块韩文铜版，可能就是五代时刻铜版书的模式，因为没有年号，只凭字体来审断，故漫定为宋太祖初年。倘使《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真言》铜版没有丙午年三字，也可以说它是宋初物了。由彼证此，可以略得五代铜版的概况。并可推知，后晋有之者，吴越也有之，其它地方也一定都有的。

第二节 版本的重要

写本的易于窜改

在没有发明版本之前，大都凭手钞本。整部的书，手钞是很费力的。在手钞时有意和无意的改窜和舛讹，是不可避免的。远在东汉，各家的经本，文字就有不同，以至有人用财物贿赂兰台的掌书者，私改漆书以符合他的家本。所以熹平四年有命蔡邕等书刻石经的事，因为刻石是不能擅改的，这才确定了一个标准本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摹拓的方法，故远近的学者们，只好亲自到太学来照石刻摹写。后来有了

雕版的发明，印刷流布，既轻便可行远，又易于购得。在创始的时候，刻书很慎重，力求没有错误，如前面所讲五代监本便是。但日久弊生，私人和坊贾所刻，也有草率从事，或志在图利，而校勘不精，错误百出的，又发生了同是版本而有善本与非善本的区别，它的正确性需要经过审查才能作决定了。

读书必得旧本的理由

前人主张版本以愈古为愈佳，冯班《钝吟杂录》：“读书当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据。”顾广圻《跋蔡中郎文集》：“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原注：其人，尧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无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欺人耶？敢书此以质尧翁。”又《跋经典释文》：“世间瞽人，往往诋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为浅学，彼固未尝究心于铅槧耳。”他们的主张是大致相同的。冯班的说法，似乎是古非今的思想太重了些。本子愈古，它与作者的距离愈近，展转翻刻的次数也愈少，保存的真面目便愈多，所以可贵；但断定新本都不足据，这是片面的论断。由于冯班生在明朝的末期，这时刻书的风气，大都喜欢改窜古书，他所以有感而发；他所谓新本，是指明末经过改窜的新本，不是说凡是新的都不可据，他仍是根据书的内容作论断的。顾广圻所谓的世有一等人和“瞽人”，确不在少数，由于他们对版本并没有研究，只能作此欺人之谈。所奇怪的是，尧翁（黄丕烈字）是著名的版本学专家，他的门下士偏作出这样不讲本子的论调，无怪乎顾广圻要感慨了。叶德辉说：“尧翁有此门下士，亦可谓失传衣钵矣。”其实封建时代的所谓门下士，大都以倚仗声势、博取名誉为目的，不一定为求学问、传衣钵，明白了这一点，也并不奇怪了。

据误本的为害

宋朱彧《萍州可谈》：“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错误，坤为釜

遗二点，故姚误读为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同样记载，当系事实。福建本是麻沙坊贾所刻的版本，在宋刻中为最劣，故多误字。官本是宋国子监所刻的版本，校勘较精，错误也少。姚祐据误本出试题，岂非受了不讲究版本的害么？

官刻本的注重校讎

因此，后来对于科举所应用的经书，校勘是很慎重的。宋、元诸刻，往往附有牌子，说明校正无误。并有由官府通令慎重办理，沿至明清。明嘉靖闽中刻本陈澹《礼记集说》，有嘉靖十一年福建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略谓：“照得《五经》、《四书》，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吾讹作犹吾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议呈委选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讎，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划毁，决不轻贷。”清康熙时崇道堂刊本《春秋胡传》，书首也附刻康熙三年礼部题复工科给事中王请颁官版经书疏，大意也相同。这样自比书坊刻本要可靠得多，但仍不能说已为最善之本，因为当时的所谓官本，已经不是五代、两宋的旧面貌，而当时的所谓明经师生，有的只是帖括浅陋之士，并非专家。现在试把宋、元善本校嘉靖、康熙本，依然脱讹累累。又当时官府所注意的，只限于科举定制的《五经》、《四书》，《礼记》不用汉郑玄注本而用元陈澹《集说》，《春秋》不用古注而用胡安国《传》，而这两部书的学术价值是并不高的。科举之士，意在功名，对发扬学术来说，是补益不大的。所以明清两代有价值的版本，不一定是官本而反多在私人刻本。私人刻本的面比较广，凡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取材不受拘束，有什么善本就刻什么。校勘比较精，大都出于有专门学识和爱好书籍的人之手。此待下章分

别讲述。

视旧本为骨董的批判

版本被视为骨董玩物，起于元、明之际。明莫是龙《笔麈》：“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讹谬，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异？”明谢肇淛《五杂俎》论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二病是：“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衒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浣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像这一类的对待版本，虽也起了保存传世的作用，但于我们所讲的版本，并无多大的意义。因为把它和珠玉等视，而比爱好珠玉更为风雅，致使一般富贵者流趋之若鹜。如王世贞宁失一庄，换得宋版《两汉书》，并把自己的小像绘于卷首，以表示珍爱。朱大韶以美婢易得宋版《后汉纪》，饰以古锦玉签。后世且传为佳话。洪亮吉《北江诗话》分藏书家为数等，把黄丕烈、鲍廷博列为赏鉴家，他们对版本源流，钻研很深，校书和刻书，成绩斐然，王世贞、朱大韶并不得与比，乃世之多财翁，收藏几部宋版书，就自诩为赏鉴家，不知人们方嗤之以鼻呢。

读书而不知版本的批判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好古者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王鼎丞观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时，尝买得宋槧《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观，则先令人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之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弃之。

余大笑去。”这一故事，正可说明两种人对于版本的认识。陈其元就是顾广圻所称的“瞽人”，他匆匆地一看，就说是“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本”，这是何等的武断。即就表面字体来说，宋版的端浑和读本的死板，一望可知，怎么说无异呢？无怪王定安要斥他非解人了。王定安是把宋版视同珠玉骨董的代表。看他“令人负一棣出”的表演，确是描写得非常生动。一经陈其元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便茫茫然。倘是真的读过这宋版《孟子》的话，对于陈其元所提的问题，必能一一答复，教陈其元折服，才不辜负了这部好书，可是他只在装潢上讲究，而内容却不注意，便自以为是赏鉴家了。

谈版本不能脱离校雠

王定安所藏的宋版《孟子》，不知是宋朝哪一个刻本，而就他的不注意内容来说，还不知是不是真的宋版。不过，陈其元用它比监本，可知是《四书》中的《孟子集注》了。世传宋版《四书》有淳祐丙午泳泽书院刻本（实为元至元刻本，淳祐二字系剗改，但前人相承为宋刻），它与普通读本不同之处，首先是：《孟子集注》本为十四卷，这是赵岐注本的原卷数，明初刻本尚如此，今本并为七卷了。其内容如：将以衅鍾，作衅鐘，下钟鼓并同。行者有裹粮也，作裹囊，与《盐铁论·取下》篇云行者有囊合。思以一毫，作一豪。矢人惟岂不伤人，作惟恐，下同。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无也字。又从而为之辞，无而字。予三宿而出昼，作而后出昼。其命维新，作惟新。井地不均，作不均。有攸不为臣，作惟臣，注同。按赵注无不惟念臣子之节，本作惟也。此率兽而食人也，兽上有禽字。瞽瞍底豫，作底豫，注有底之而反四字。王使人瞰夫子，作眈夫子，下眈良人同。必至于穀，作必志。见且犹不得亟，作由不。可以无饥矣，作足以无饥矣。亦不陨厥问，作不殒。来者不拒，作不距。人能充无穿窬之心，作穿逾。俱与唐、宋石经及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合。这尚是《孟子》的正文。至于朱熹的注，纣之去武丁未久也注：凡七世作九

世。阎百诗《四书释地》尝言其误，宋本并未曾误。抱关击柝注：柝，夜行所击木也，作行夜。《四书释地》引何屺瞻曰：《集注》“柝行夜所击木也”，本用赵氏注，今皆讹为夜行，虽监本亦然。百诗谓：行夜、夜行，何啻霄壤。（本陈鱣《宋本四书跋》）行夜的行字，当作察字解。（《吕氏春秋·季夏》“入山行木”注：行，察也。）行夜等于说查夜，所以要击柝以示警惕，倘是夜行，哪里见过夜间行路的人都要击柝呢？两个字一倒转，意义完全不同了。一般人只晓夜行而不晓行夜，以误传误而不知改正。类于这样的事，古书中是常常可以遇到的。因此，宋本比之一般读本（包括监本），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王定安只要举出十四卷和七卷，行夜和夜行两条的不同来答复陈其元，陈其元一定哑口无言。

第三节 版本前的文献材料—— 甲骨、金石、简牍

甲骨用于贞卜的说明

古代贞卜之事，大都用龟甲刻辞，在古书中可考的，《诗·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郑玄笺：“契，开也。”开和刻同一意义，是刻用龟甲的明证。它的卜法，在《周礼·蕤氏》并杜子春、郑玄两家注中说得很明白。《周礼》：“蕤氏掌供燹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燹，遂歛其焮契以授卜师。”杜子春云：“燹谓所爇灼龟之木也。契谓契龟之凿也。”郑玄谓：“《士丧礼》曰：楚焯置于燹。楚焯即契，所用灼龟也。焮谓以契柱燹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师，用作龟也。”孙诒让《周礼正义》：“杜意燹为灼龟木，别有凿龟之器，谓之契，盖以金为之，若钻凿之类。《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契即契之假字。盖契木之凿，亦所以钻刻，故直谓之契也。依杜义，灼龟用燹，凿龟用契，灼凿不同物。郑则谓钻即用灼木，二

义不同。以《史记·龟策传》考之，则钻与灼自是二事，故太卜先郑注亦谓先凿后蒸，叙次甚明。但焮契则确为灼龟之木，窃意龟卜所用有金契，有木契。金契用以钻凿，木契即楚焮，用以蒸灼。以二者皆刻削其耑使锋锐，故同谓之契，实则异物也。杜、郑偏据一隅，故滋淆悟。”他们所说的虽是周代卜龟之法，然推而上之至殷代的卜法，也不会有什么大异。孙氏综合了杜、郑两家之说，知道开龟有金契、木契两种，金契用来钻刻，木契用来燃灼，它是异物同名。这一意见也很精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殷代龟甲之外，还有兽骨，凡经火灼过的地方，多在里而不在表，皆钻作三角形的小坎，取其甲质薄了，经火容易坼裂。坎有钻得很深的，可知不是木契所能奏功的。由于孙氏亲见甲骨原物，据以诂释经义，所以不同于纸上空谈，反可胜于汉儒的偏据一隅了。

甲骨的发现和有关著作的印行

甲骨的发现和被学者们所注意，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城西北五里，有村名小屯，在洹水之南，即历史上的洹水南殷墟。有农民刨地而得甲骨，当时用来填塞枯井，或磨粉作刀尖药，或论斤卖给药铺作为龟版和龙骨。把有文字的都括去。后来被骨董商把有文字的甲骨售给考古家王懿荣而得高价，于是农民们就大量地挖掘，求者也渐渐地多了。王懿荣所藏的归刘鹗，选印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这是汇集甲骨资料的第一部成书。孙诒让据以作《契文举例》，这是甲骨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后来罗振玉选印了《殷墟书契》前后编和续编，又撰《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撰《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他们的研究益精深，称为罗、王之学。而后收藏和考订者益多，便成为专门之学。至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杨树达的《积微居甲文说》等书出，遂集甲骨学之大成。

甲骨文中的历史内容

甲是龟甲，骨是兽骨，是殷商时代卜官用来贞卜的材料，国之大事用龟，余事用骨。现发现的多零星不全的小块，上面刻有文字，有的用朱、墨笔书写。文字最多的有九十字上下，系正反两面相接。时代始于盘庚，直到殷末。殷人的典册应该是书于竹木上的，今已无存；这用甲骨刻辞的是当时王室的文书纪录，也就是殷代的王室档案，所以包括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它的分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列贞卜事类为八项：祭、告、辜、出入、田猎、征伐、年、风雨。又有杂卜一项。其中所谓辜者，只有六条，按其内容来说应属于征伐。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则分为十二项：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董作宾的《殷历谱》则分为二十项：祭祀、征伐、田狩、游、辜、行止、旬、夕、告、旬、求年、受年、日月食、有子、娩、梦、疾、死、求雨、求咎。我友胡厚宣则分为二十四项：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卜占、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项。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则除干支数字外，分为五类：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大致分类以愈后愈详，但也不免流为繁琐，有的可以不必分，所以应该认为郭氏的分类比较简括适当。

甲骨研究的分类

对于甲骨的研究工作，近人归纳为十五项：文字、文法、断代、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生先妣、庙号、亲属、百官、农业及宗教、身分。

甲骨在文献上的价值

我们研究上古史，由于材料的缺乏，每感到无从措手。在二千多年之前，孔子就感叹于殷商文献之失考。司马迁作《史记》，对于殷

商材料，也不过根据《诗》、《书》和《世本》。而正考父所校的《商颂》只存五篇；《书序》所录，亡佚的也过半；《世本》一书，今又失传已久。我们在三千年后，得见孔子、司马迁所没有见到的材料，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从我国现存的古文献材料来说，也没有比甲骨文再早的了。这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正有着无量的前途，须待我们的努力。

上古镂金的记载

刻石镂金，据古书的记载，是书籍最早的形式。《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桓谭《新论》：“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余处，而可识者七十二。”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引《韩诗》：“自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无论是七十二家、万有余家，现在泰山上都无一字留存；即当时管仲、孔子所认识的也寥寥无几，只可说是无征的文献了。

《穆天子传》：“天子观春山之上，乃为铭疏于玄圃之世，以贻后世。”又：“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平阿无隘，四彻中绳，先王谓之册府。”这书出于汲冢，虽小说家言，而必有所据，是周时的群玉山，已有册府之藏，其为刻石是无疑的。以后有周宣王的石鼓、秦始皇的刻石，已开了后世碑版之风。还有刻在玉上的。玉者，石之英也，和石刻无异。《大戴礼·保傅》：“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素问》：“著之玉版，每旦读之，名曰玉机。”而《诅楚文》原来也刻在玉上的。

周代镂金的记载

《周礼》：“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剂谓券书，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六庙之

六彝，欲神监焉。小约剂，万民约也。丹图未闻，或有雕器簠簋之属有图象者与？《春秋传》曰：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其旧典之遗与？《墨子·鲁问》：“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这些都是把文字刻在鼎彝上的。今见于经、史的，《左传》有正考父鼎、谗鼎，《大戴礼》有武王盘盥等，《小戴礼》有汤盘、卫孔悝鼎，《汉书》有司臣鼎、仲山甫鼎。又如《左传·昭公六年》的郑人铸刑书，又二十九年的晋人铸刑鼎，《庄子·徐无鬼》篇的《金版六弢》，都是一类的。现在传世的实物，尚有商、周遗器，而刻石则莫早于旧说为周宣王造的石鼓，论时代已稍后了。今略述最著名的金石，以见它和书籍的关系。

古器物的名类

古器有铭文的，据《意斋集录》，有钟、罍、铎、鼎、敦、尊、彝、壶、铎、盃、簠、簋、盘、匜、甗、鬲、豆、盥盥、卣、觶、觚、觥、斝、角、爵、区、铍、距末、权、诏版、刀、铎、炉、铜、釜、奩盖、钊、斨、甗、泉范、农器、铎凡四十二种。每器的字数，自一字至四百九十七字不等。

历代金文的著录

古器物的出土，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许慎《说文解字叙》：“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直到隋、唐，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只因认识的人不多，而记录也不详细，又没有发明椎拓的方法，所以文字大都湮没不传。到了赵宋以后，古器的出土始被重视，当时秘阁和太常，都收藏得很多。刘恕、欧阳修这辈人也大力搜罗，并征求拓本。又有杨南仲辈为作考释和图形，于是其学大兴。今传世的，有吕大防的《考古图》十卷、《续图》五卷、《释音》五卷，王黼等奉敕撰《宣和博古图》三十卷，是既图其形，复摹其款的一类；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二卷，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是以录文为主

的一类；欧阳修的《集古录》十卷，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黄伯思的《东观馀论》二卷，董道《广川书跋》十卷，是虽非古器专著，而也兼收的一类。翟耆年《籀史》所载而今已失传的，尚有三十余家之多。元、明两代，对于此事不甚注意。到了清代而又转盛，自《西清古鉴》、《宁寿续鉴》外，私人著述以阮元的《积古斋彝器款识》、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吴式芬的《攬古录金文》、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为搜罗最富，考订也详；但由于影摹雕木，不免有点画失真的地方，又有鉴别不精，真伪杂糅的遗憾。至吴大澂的《愔斋集古录》二十六册，用墨拓原本影印，遂超轶以前诸家之上。罗振玉《古金文存》，为集大成之作，可惜没有考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杨树达的《金文说》，尤多卓越的见解。近年来，古器物不断有所发现，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集，至于考释则尚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金文的文献价值

古器铭文的价值，也似甲骨文一样，可以考复杂的文字流变，获丰富的历史材料。就文学来说，可补《诗》、《书》的遗逸。今约举其例：

虢季子白盘：先叙虢国名白字季子的作这个盘，其次叙他对敌人作战的功勋，最后叙周天子给他赏赐的东西，通篇有韵，仿佛《诗》中的《雅》、《颂》。共一百十一字。今陈列在北京太和殿。

毛公鼎：西周初太史所作的诰命，载成王册命毛公的辞。毛公本是诸侯，人为王的正卿。这篇从文、武开基及周、召诸人同心翊辅说起，转到守成的不易，匡济的需才，然后分三段铺叙：第一段叙毛公为卿士事，第二段叙毛公为诸侯事，第三段叙毛公为司马事，而末叙周天子赏赐的东西。全篇共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金文中文字最多的。现在台湾。

盂鼎：也是周成王时的器，首叙文、武两代相承禁酒事，与殷纣君

臣沉湎于酒作对照，作为亡兴的借鉴。中叙命盂的辞，略谓：我所以命汝，非有它道，只有取法文王与文王命卿士禁酒。那时盂的先祖南公本在文王卿士之列，亲受文王教泽的，故又命盂取法先祖。末叙命盂为侯伯及所赐车服和民献。凡二百九十一字。

克鼎：为克受王册命而作的器，文内论次先人的美德，分为两篇，前篇称扬他的先祖，后篇述王给他的册命；篇虽分而文气仍是一贯。凡二百八十五字。这鼎和盂鼎，不但文字多，又为吉金中最大的器，今陈列在上海博物馆。

散氏盘，内容记矢、散两国勘定疆界的事，即是《周礼》所称的地约。前半叙两国疆界所经的道路，立表来作标识。中叙两国官吏履勘的事。末叙两国誓词及绘图和衅器。凡三百五十九字。此器现在也在台湾。这些铭文，和《诗》、《书》有同等的地位，不过文字奇古，句法质朴，没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是不容易读通的。

其它可以补正经籍缺误的，更不胜枚举。如《师虎敦铭》可补《周礼·军司马》。《静敦铭》可补天子大射礼。《大敦铭》可补大夫相见礼。《县妃彝铭》可补大夫昏礼。《廌令鼎铭》可补天子耕藉礼。《召伯虎敦铭》可补大夫告庆礼（本黄公渚《周秦金石文选》）。周代的礼制，经过了六国的废籍，秦政的焚书，亡失的太多了，这些金文材料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新发现的鄂君启金节

近年来古器的发现很多，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在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为从来未见的最突出的文献。据《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殷涤非、罗长铭所记：“鄂君启金节是用青铜制成，它的形体极像今日文具中用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一个竹节，分器面为两段，上长下短。器面上镂刻八条阴文直线，以为错金字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画熟练劲秀，与寿县朱家集楚器刻铭相较，体势如一。四件中有三件长短宽厚相同，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

圆的竹筒，应为金节的第二组。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三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相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三件。这一件应是属于另一组的，暂定为金节的第一组。这样分组方法，是与金节铭文符合的。第一组一件，铭文计九行，每行十八字，又重文二字，合文一字，共一六五字。第二组三件，铭文每件计九行，每行十六字，又重文四字，合文二字，共一五〇字。这三件文字内容全同，但与第一件不同。”郭沫若根据金节首“大司马邵郢败晋币于襄陵”句，从《史记·楚世家》考得是楚怀王时物。第一组是水路通行证，第二组是陆路通行证，并载过关征税的事。考金文中，有格线的，如克鼎有阳识方格，宗妇鼎有阴识方格，与此金节的八条阴文直格，都是为了镂错文字的方便，而这八条阴文直格，已创造了后来版本行格的先例，谈版本学的不可不知。

金刻为周秦两汉的书籍

古器物铭文，为古书籍的创始。古者大事勒之鼎彝，这就是三代的书籍。唐以前没有雕版，而周秦两汉有金石刻，这就是周秦两汉的书籍。《宋史·艺文志》目录类，始以金石和目录并列，《四库提要》也把金石列入目录类，都符合这个意义，不过《四库提要》把《考古图》、《博古图》等列入子部艺术的谱录类，犹为未达一间。

周秦的石刻

上古封泰山禅梁甫的刻石，既不可见，现在存世的实物，自当以石鼓文为最古了。石鼓凡十，每鼓刻诗一章，合为一组。内容为田猎、渔狩、除道、植树及从臣献禽之事，有类于《诗·小雅》的《车攻》、《吉日》。文作古籀，有龙翔凤翥的姿态。它的时代，前人有周宣王、秦襄公、元魏宣武帝、北周文帝四种不同的主张。后二说早已否定。周宣王之说，传闻最古，清人多从之；秦襄公之说，事实较确，近人多主之。而其为先秦的遗迹则是无疑的。又有秦惠文王的《诅楚

文》，刻在玉上。秦始皇的峰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刻石，刻在各地崖石上。以后刻石风气日盛，今约述有关书籍版本的如下。

汉石经为经籍版本的创始

王应麟《困学纪闻》：“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颀，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考《晋书·裴颀传》：“颀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其实只有颀的奏请，并没有刻石。南宋以后，清乾隆朝石刻蒋衡书的《十三经》于国子监，合之汉、魏、唐、后蜀、北宋、南宋仍为七经。

汉石经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颺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阡陌。”又《儒林传序》：“自太初后，游学增盛，大学至三万生。然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外，使天下咸取则焉。”据此，当时是为了禁止私改漆书经字及平息忿争，始命蔡邕书丹刊石，书作一字隶体，盖为刘向父子校书后的又一大事，也为经籍有刊本之始。至或言《五经》，或言《六经》，各家考释不一，今按熹平所刻经数，实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又《公羊传》、《论语》，皆当时学官所立，以一家本为主，兼存诸家异同于后。如《诗》用《鲁诗》本，有齐、鲁二家异文。《公羊传》有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经董卓之乱，碑便损缺。至宋嘉祐中，始有残石发现。近

年在洛阳故城又出土不少，徐鸿宝辑有专书。

魏石经概略

魏石经刻于魏废帝正始中，故称《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刻石的始末已不详。《晋书·卫恒传》：“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叔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三字石经》，是指用古、篆、隶书三种字体所写的，《尚书》首二碑作品字式，第三碑以后是作三字直下式。所刻经有《尚书》、《春秋》，《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古文都出自孔氏壁中本，《尚书》用马融、郑玄、王肃注本，《春秋左氏传》用贾逵三家注本，皆是当时学官所立的本子。书石的人，据《卫恒传》，先是恒的祖父颢（敬叔名），《魏书·江式传》说是邯郸淳，《晋书·江式传》又说是嵇康，从来争论不定。很可能他们三人都参加过一部分工作，正像汉石经虽主名是蔡邕，还有马日磾、堂溪典等的协作一样。立石于洛阳的太学讲堂前，即在汉石经的西面。晋永嘉时始渐崩败。清光绪时，洛阳始出《尚书·君奭》篇残石，近年有大量发现，徐鸿宝、马衡都有集拓本。

唐石经概略

唐石经刻石始于唐文宗大和七年，成于开成二年，故称《开成石经》。《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这是立石的记载。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九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

二经，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字用真体，正文无注。所据之本，即《十三经注疏》所用的注本（除《孟子》不在内）。当时对这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书石人以外，有校勘兼看书上石的，有覆定字体的，有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的，有校定文字的，有刊定的，有详定的，而郑覃自己担任都校勘，各人都署名以示负责。五代、宋、明，陆续有修补。今全部计二百十七石，完善无阙，在西安大成殿后，称为碑林。拓本繁重，不容易得到，廿年前有人劝军阀张宗昌把石刻照样雕成木版，印刷装潢，都很精美，这是后唐长兴以后第二次覆刻唐石经。汉、魏石经，残阙太多。唐石经巍然独存，是现存经籍最古的完本了。还有一事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汉石经石高一丈许，魏石经高八尺，当时既没有传拓的方法（即后来传拓之本，如此高大，也不便于执持诵读），所以《后汉书·蔡邕传》所谓摹写，只是照碑摹写，故不得不亲临碑下，以至于车乘填塞阡陌。至唐石经石高六尺五寸，一石上分刻成为八列，每列又横截而连属之，每行自九字至十一字不等。这时已发明了传拓的方法，那末，拓墨之后，便可把纸联成卷轴，而成为当时通行的书籍体制，流行可远，不须亲临碑下了。唐末、五代由此发展，易石以木，易白文为墨，于是便发明了雕版的方法，所以唐石经已为雕版创造了条件，并由石刻变为雕版的过渡。

蜀石经概略

蜀石经刻始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毕工于宋宣和六年。故称《广政石经》，又称《孟蜀石经》。赵抃《成都记》：“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凡十经于石。”又云：“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历代石经，都是由国家经费办理，而蜀刻石经，乃出于其相捐俸所成。（版刻《九经》也出于毋昭裔私财，见前。）毋昭裔毅然独力任之，历时八年，其石数千，这和他的雕印《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同样是不朽

的功业。但他刻石经的功绩，几被孟昶所淹没，必须表出。经数为十三：《孝经》、《论语》、《尔雅》刻于广政七年，《周易》刻于十四年，《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十七卷止，均在蜀时刻。《左氏传》十八卷至三十卷、《公羊传》、《穀梁传》，宋皇祐元年田况补刻。《孟子》，宣和六年席旦、彭慥补刻。正文依唐石经，而独兼刻各经注，和其它石经不同。字体为正书。石在成都，南宋时尚完好，嘉熙、淳祐以后才亡灭了。其残存拓本，刘体乾有合印本。

北宋石经概略

北宋石经刻始于宋仁宗庆历元年，毕工于嘉祐六年。故称《嘉祐石经》，又称《二体石经》。王应麟《玉海》：“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六年二月，国子监石经成。”其石仿唐石经分为六列，每列三十四行，篆一行，真一行，每行十字，也取其便于拓墨装成书册。经数除《玉海》所载外，又有《论语》、《孟子》。书石的为杨南仲、谢铤诸人。石立于汴京太学，即今河南开封。经宋中叶之乱，石碑残毁，今开封图书馆有《礼记·中庸》残石。宋拓残本尚有流传。

南宋石经概略

南宋石经刻始于宋绍兴五年，毕工于淳熙四年，故称《绍兴御书石经》。宋高宗擅长书画，曾手写《六经》。《石刻铺叙》：“绍兴十三年九月甲子，左仆射秦桧请镌石以颁四方，卷末皆刊桧跋语。”似刻石是绍兴十三年秦桧的倡议。其实这一年只刻《左传》、《周易》、《尚书》，且都在九月以前。故刻石之始，当据《玉海》“绍兴五年九月赐汪应辰以下御书石刻《中庸》篇”为准，而定为绍兴五年。所刻经有《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

并《礼记》中的《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每石分为四列，和唐、北宋两石经同。《易》、《诗》、《书》、《春秋左氏传》和《礼记》的五篇真书，《论语》、《孟子》行书。小楷结体整秀，有晋人笔法。《论》、《孟》字体较大，笔势稍纵逸。石立于临安太学的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今尚残存八十六石，在杭州。

清石经概略

清石经刻始于清乾隆五十六年，毕工于五十九年。故称《乾隆石经》。这是据蒋衡手写《十三经》摹勒上石的。《清史列传》：“蒋衡，字湘帆，江苏金坛人。矢志键关，历时一纪，在乾隆三年，《十三经》次第写成，扬州马曰瑄为出白金二千镞装潢成三百册，五十函。四年，总督高斌特疏进呈御览，藏懋勤殿。八年卒。卒后五十年，上命蒋衡所书《十三经》刻石太学，御制序文，以垂万世。”书体用真书。蒋衡本非经生，故所据不是善本，弘历不过为了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把它镌石，并非真能提倡学术，所以远远地差于以前的各种石经。原石今藏北京。

单刻本石经

其它单刻一经的，有唐玄宗的《石台孝经》，宋晁公武的《古文尚书》，宋太宗的《草书孝经》，杨南仲的《三体孝经》，高宗的《真草孝经》，清贾汉复的《孟子》。又单刻一篇的，有唐李阳冰的篆书《易·谦》卦，宋司马光的《易·家人》卦、《礼·中庸》、《大学》篇等，其石尚存。

石经的价值

大概蜀以前石经，因为还没有雕版，它所根据的古本赖以传后，故虽多残阙，仍有极高的价值。宋以后雕版盛行，学者可以家有其书，石经就不是必备之品，仅仅作为艺术品看待了。

其它石刻书籍

石刻书籍，除了经典以外，还有小学字书如唐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附刻在唐石经末。松江有吴皇象书《急就篇》，吴兴有颜真卿书《干禄字书》等。有地图，如伪齐阜昌的《禹迹图》、《华夷图》，苏州学有《平江图》、《地理图》、《天文图》等。有医书，如《孙真人千金方》、《铜人腧穴针灸经》都先刻于石，今龙门有《齐武平六年师道兴造像方》，刻于龕的四边。有目录，如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至正十年《密州重修庙学碑》，碑阴列书目一百一十部。其它如滋阳有《韩诗外传》，成都有《林氏小说》（见《郡斋读书志》），庐陵有《九贤事实始末》等。字书因点画易错，医方因人命至重，地图因界线分明，都须刻石，比较正确，推之它书，卷帙倘非太巨，也偶有石刻传世。至长编巨帙，其工程或有超过石经的，则当推道释两家。

石刻道书和佛经

道家书惟《道德经》石刻较多，其外如《阴符经》、道经三种都有存石。而佛经则大而摩崖，小而塔幢，名山奥区，往往多有。例如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经》，始于隋静琬法师，经过了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一直在继续镌刻，分藏在七个山洞中，规模宏大。

简牍的溯源

《说文》：“简，牒也。”《广雅·释器》：“策谓之简。”《论衡·量知》篇：“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可知简是用竹做成的，又有策和牒两个异名。《说文》：“牍，书版也。”《周礼·哲族氏》注：“方，版也。”《内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谓今之牍。”《论衡·量知》篇：“断木为槧，枘之为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牍。”可知牍是以木做成的，又有方、槧、板三个异名。又《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古文作册，今通作

策。”可知简之称策乃借字，本字当作册。先明了了简、牍的材质，然后再区别其施用。《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书赠于方，书遭于策。”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贾公彦疏：“简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孔颖达正义：“简之所用，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书字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据此，方和简策的用途也不同，贾、孔的解释，已很清楚。简是指一片竹，像今天书籍的一页。竹片面积不大，故只能容一行文字，小事内容简单，故一行可尽。倘记大事，便内容丰富，要用多数竹片，把它次第编连起来，即称为策或册，像今天书籍的编连许多页而成为册。至于记录文字多于一简所容，而又不须要编连许多简而成册的，那就不用方，《聘礼》记以百字为标准。方是木牍，像今天商店和办公处所用的记事牌（从前用木制，今多用搪瓷）。牍的又一名称曰枅，《说文》：“枅，棱也。”《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孔子叹觚，即此之谓。其形或六面，或四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今俗犹呼小儿学书简为木觚章，盖古之遗语也。”枅作觚，和册作策同，都是用假借字。

孔壁竹简

汉以前的书籍，都是用简牍，尤以竹简为主要。自从秦始皇焚书，古书受到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汉代抱残守缺，山岩屋壁，时有前人秘藏的发现，而尤以鲁恭王在孔子宅壁中所得为最重要。相传是孔子后裔孔鲋在秦时所秘藏在这里的。《汉书·景十三王传》：“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所谓闻钟磬琴瑟之声的话，当是为神化这件事而编造的。而只说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记载得太简单了。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鲁恭王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

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他们作了详细的补充，并把简的制度和脱误都说明了。又在《志》中罗列了《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一篇的目录。刘向父子所校的中古文，就是这些本子，从而建立了经古文之学。

孔壁竹简的长度，根据孔颖达《春秋正义》引郑玄注《论语序》：“《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可知《六经》之策，都是用二尺四寸的。贾公彦《仪礼疏》也引郑氏《论语序》，却作：“《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二说显然不同。据荀勖《穆天子传序》：“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可证汉以前的简是用二尺四寸的，贾氏所引恐误。既然《六经》之策一律是二尺四寸，为什么许慎解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呢？这是许氏所解的册，是指朝廷的册书，并不是指书籍。每一简的字数，据郑玄注《尚书》说是三十字一简。以二尺四寸的简，写上三十个字，当然不成问题。但刘向校中秘书，他所记每简的字数，却有不同。他据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可知每简字数多少，本无一定，甚至一书之中，也有二十五字与二十二字的不同，证以近出的大量简牍，尤可说明字数是不必拘泥的。牍的长度，大约汉尺一尺长，故汉人谓之尺牍。

晋汲冢竹简及以后的几次发现

简牍的发现，自孔氏壁以后，见于古书记载的还有四次：第一次发现在晋太康二年(281年)。《晋书·武帝本纪》：“咸宁五年十月戊寅，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文十余万言，藏秘府。”(《荀勖传》作咸宁初，《束皙传》作太康二年，荀勖校定《穆天子传》序、傅畅《晋诸公赞》并作太康二年。)这次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担任整理的如荀勖、束皙，也有足够的学术水平，当时经整理的，有十七种，七十五篇，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只有《纪年》十二卷、《周书》十卷、《古文璣语》四卷、《穆天子传》六卷四种，其余都已湮没了；这四种中《古文璣语》早已失传，《纪年》又被伪本所乱，《周书》有人考得并不是今之《逸周书》，实际只存了一种。第二次发现在齐建元元年(479年)。《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缺文也。”这次发现，不知共有多少，大概多被盗宝的烧掉了，王僧虔所见的虽只有十余简。他的鉴定倘是正确的话，当可补《周礼·冬官》之阙，不知他为什么不把它整理写定而使之仍归湮没。第三次发现在宋大观时。黄伯思《东观馀论·汉简辨》：“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黄氏未记出土年月，然首有大观戊子自序，则必在公元一一〇八年之前。黄氏仅据文字尚完的《讨羌符》校《后汉书·安帝纪》，已纠正刻本的错误不少，谓“千载之下，幸是简偶存，得以考正范史所书之误”，其价值可见一斑。第四次发现在宋宣和中。赵彦卫《云麓漫钞》：“宣和中，陕西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内史梁师成得之以入台，未几，梁卒，石简俱亡，故见者殊鲜。”这段记载太简略，发现多少、内容如何，都不得而知；但既然字皆章草，那是汉代物无疑。

梁师成把它摹刻入石，倒是一个好办法，前人没有做过。古文奇字，不是人人能识；木简出土后，不能保存过久。勒石拓墨，既可存其真相，又能流传较久，可惜也亡失了。

以上五次发现，以孔氏壁中书对于学术的影响最大。这些文物，后来相继散失了，实是很大的损失。

晚近的和考释

最近数十年来，始渐有出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甘肃掠得汉、晋木简九百九十一片而去，法人沙畹为作《考释》。又王国维《流沙坠简序》：“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这是出土的地方。王国维与罗振玉把原简付诸影印，又为之考释，并发现了它的内容特点，罗振玉《序》：“遗文所记，裨益甚弘，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岐，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递迁，证许涿长之说。”对于历史、文字学的研究是珍贵的材料。罗振玉又把简中的《仓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书、占书、相马经、兽医方诸书合编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印入《流沙坠简》。

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的居延又发现了木简万余片。其简文记西汉到西晋前后约三百年，每根写一行或两行，一面或两面。每行多的写四十字，少约八九字，数十根简用绳子联结成篇。其中东汉永元五年和七年的广地南部官兵兵器簿，是用七十多根木简编成的，内容记载着破胡燧和润上燧的器物名目，是现存最完整的汉代书籍。其它还有信札、伤寒药方等。劳幹著有《居延汉简考释》，原物现在台湾。

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二月，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

掘团，在长沙城外五里牌发掘战国时代的楚墓，发现了三十七根残竹简。文字奇特，多不可识。其中偶有可识的，如，“金戈八”和“鼎八”字样，大约是记录殉葬品的品目和号次。一九五三年七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理长沙市南门外仰天湖古墓时，又发现了竹简四十二根，长的合公制二二厘米，宽一、二厘米，简上墨书篆文。有写“铁箕一十二，一十二箕皆又绫纆”和“羽觞一壘”字样，也是记殉葬之物。其它零星发现的有好几处，尤奇者，河南辉县和济源县，都发现了玉简。在这些竹简上，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书籍的面貌，并且知道了古代的所谓漆书，其实就是墨书，荀勖序《穆天子传》也说是墨书，他的鉴定并没有错，这也是版本的新知识。

第四节 未有版本前的写本

汉代竹和帛并用

在汉时，书籍用简牍，已如上面所述；同时也用缣帛。《风俗通》：“刘向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竹素就是竹帛。因为竹筒便于刮削改定，故作为校书的初稿。缣帛着墨，深入腠理，倘加涂抹，便不清楚，故必有定本，才把它写上。这是竹帛兼用的确证。《汉书·艺文志》：“《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又《儒林传叙》：“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所藏典策文章，竞共剖取。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知汉代藏书，典策（即竹简）和缣帛并有，竹简无用，故任它剖散。缣帛至改作为帷盖滕囊，可知它的数量不少，也可知当时施用之广了。凡事物的发展，必趋向于便利。竹简繁重，不如缣帛轻便。更由缣帛而发展到纸。初期的纸，它的原料也用丝织纤维，和帛本来没有多大区别。《初学

记》：“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名曰幡纸，故其字从丝。”后来蔡伦从原料和技术上加以改进，纸就代替了帛。

有人根据《论语》“子张书诸绅”和《墨子·鲁问》篇“书于竹帛”二语，而创为春秋末年已用帛的说法。这一考证，未必可靠。绅是大带，子张为急于记下孔子之言，又取佩身不忘之意，故即写在大带上，这是一时特殊的施用，并不能说书绅就是书籍用帛的证据。《墨子》之书，并非墨翟自己的著作，和其它先秦诸子一样，尽多后人托名，偶用后来的词汇，也是可能的，所以这一证据也不能成立。

篇卷名义的解释

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篇：“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记。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各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向、歆著录，以篇卷为计，可以征之《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有称卷，又有称篇，其它尚多。竹简容字不多，一篇文字，便须用简一大束。而帛则数丈之长，也可卷成一卷。后来用帛渐广，可集若干篇的文字写于一卷，于是卷之名也包括了篇在内。再后由用帛而改为用纸了，由卷轴而改为线装了，但是篇卷的名并没有改。至今每一卷中可以容纳若干篇。韦氏说《汉志》所著几篇，即后世几卷，恐尚不可拘泥。

汉唐人多好钞书

纸的施用渐广，而印版尚未发明的汉、唐时代，书籍只有手自传写。《抱朴子》所写反复有字。《金楼子》说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谭新论》说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麟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

篋。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后周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这可以说明当时得书的不易。

除了儒士写书以外，在六朝和唐代还有一种人以钞写佛经和道经为专门职业的，字体跟着时代演变，逐渐趋向简易，谓之经生书。

写本的形式和装潢

写本的形式是卷轴，像现在装潢书画一样。《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大唐六典》：“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这是天府藏书，所以这样奢侈，民间通行的，大都竹签木轴罢了。

写本的用纸和界栏

写本所用的纸，非常细致而耐用，表里都可书写。一般是用黄檗汁染过色的，有防蠹作用，号称硬黄纸。纸面以淡灰色的直线和边栏为界，号称乌丝栏。末后往往有书写人的题记和姓名。

传世的唐写本

汉、唐的写本，年代久远，流传很少。以前所知的，有莫友芝藏的唐写本《说文》残卷，只存木部的一半，有宋米友仁的鉴定题记，据卷中避讳字，定为中唐时人写的。又有蒋斧藏的唐写本《切韵》残本，相传是吴彩鸾写的，旧为元鲜于伯机所藏，有他的印记。这两种授受有绪，现在都有刻本和印本。

敦煌古写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一八九九年，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的莫高窟始被发现。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其中的宝藏，在一九〇七年先被匈牙利人斯坦因盗劫了一部

分，今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一九〇八年，又被法国人伯希和盗劫了一部分，今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劫余的部分，直到一九〇九年，才由清朝政府的学部去收管，在运送来京的途中，又被地方和护送官吏们盗劫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剩余的归了京师图书馆。

莫高窟贮藏的古卷轴，总数约有二万余卷，光被伯希和劫去的精华部分，就达一万卷左右，占全部之半。斯坦因劫去的也有七千卷左右，剩余在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八千卷左右，以佛经居多，已不是精华了。

以伦敦所藏的卷子为例，其中汉文写本约七千卷，印本约二十余卷，还有回鹘文、古突厥文、西藏文的约二三百卷。巴黎所藏的，当然更为可观了。

敦煌写本所涉年代，包括四世纪至十世纪，即东晋后期至北宋初期。它的内容，虽多残缺不全，但是它的价值，却是难以估算的。现有传本的书籍，据发现的写本来比较，写本常有很多的异文，可以正今本的脱误。现已失传的书籍，借写本而得以见其面目。尤其突出的是民间文学部分，如《云谣集杂曲子》、《韩朋赋》及许多变文。文人作品，也有如《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等，都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

敦煌古写本的影印和考释

伯希和劫去了大量的宝藏以后，曾把少数的影印件送给我国的学者。罗振玉汇集了各种影印件，先后印成了《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编，引起了当时学者缪荃孙、王国维、曹元忠、刘师培等人的极大注意，他们都把研究所得写成了题跋，有不少创见。后来又陆续有人向国外去搜访，并摄成影印件。巴黎所藏的，有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二两辑。伦敦所藏的，有向达的《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辑录各家题记的，有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对于敦煌的研究，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号称“敦煌学”。

日本所存的唐写本

日本在我国唐朝时代，就有向当时的政府请求颁赐书籍的历史记载，又每次来我国朝贡的使者、经商的贾人和游历的僧徒，也往往带去了不少书籍。元稹序白居易《长庆集》：“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鸡林就是日本。上面版本的起源和发展一节中所引日本僧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载其在咸通六年带去的经卷和印本《唐韵》、《玉篇》，都是例证。所以日本所藏我国唐代写本的古籍很多，也有他们国人所写，时间相当于我们唐代的。这些写本，有不少是我国早已失传了的。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日本古钞本，以经部为最，经部之中，尤以《易》、《论语》为多，大抵根源于李唐，或传钞于北宋，是皆我国所未闻。”日本的汉学家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和物观的《补遗》，引各种版本中有称古本的，就是这些古写的卷子本，文字往往胜于刻本，阮元撰《十三经校勘记》引用不少，并重刻原书以流行国内。到了清代，有些商人也从日本带回了一些古书，如乾隆时有个姓汪的带回了《论语集解》和《古文孝经》，都是我国失传已久的，鲍廷博重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曾轰动了一时的学者。大约咸丰、同治年间，顾文彬又得到了唐写本《续华严经疏》残卷。《过云楼书画记》：“唐写《续华严经疏》残本，余从同郡金君芷衫得之，金君游日本，从佛眼山僧澈定得之。唐时由中国请至日本，今仍由日本还之中国。一旦归来，欢喜无量。”《论语》和《孝经》，尚不是写本，而这个经卷，真是唐写本了，宜乎顾文彬这样的喜形于色了。

近代影刻的唐写本

光绪中，黎庶昌出使日本，目录学家杨守敬以参赞同往。时当日本维新时代，对古书不甚重视，杨氏有机会大量购求，并遍观公私收藏，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唐写本。光绪十年，他为黎庶昌校刻的《古逸丛书》，复影旧钞卷子本的，有《孝经》一卷、《玉篇》零本残四卷又

二卷、《玉烛宝典》十二卷、《文馆词林》残十四卷、《雕玉集》残二卷、《碣石调幽兰》一卷、《天台山记》一卷。又复影唐写本的，有《汉书·食货志》一卷。又十五年傅云龙刻《纂喜庐丛书》，都据日本所有的古本，有影唐卷子本《论语》十卷、影日本钞本《新修本草》残十一卷。张元济《四部丛刊》也复印了影钞正宗寺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古钞本《礼记正义》残卷。日本人自己复印的，有神田信畅辑《容安轩旧书四种》、《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唐钞本》一集及《景印旧钞本》七集。至于目录的参考，有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董康的《书舶庸谈》和日本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

第五节 两宋版本的概述

北宋继承和发展了五代的刻书事业

宋太祖性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是时长兴监本尤为流行，而宋时国子监仍继续刻了《七经正义》、《史记》、《两汉书》、南北朝七史及医书、算书、《文选》、《文苑英华》等，即所谓北宋监本。是宋初继承了五代刻书的事业，而更扩大到了经书以外。这时的私人刻书，却不闻有继母昭裔之绪的。因为刻书在开始盛行时，技术尚不够精致，经费又不免过巨，故刻书的主要是官司，其次是书坊；官司有一定的规章，而书坊以射利为目的，至于私人刻书尚没有具备条件。经过了靖康之乱，国子监的所有书版，全数被金人掠去，文化上受到一次极大的摧残，所以真正的北宋版本，已经传世不多，藏书家著录，大都是南宋的翻本和刻本了。

北宋刻本的依据

宋版的依据，一种是唐蜀石经。长兴刻本，是依西京石经本雕版的。孟蜀《九经》，是用孟蜀石经复刻的。宋刻经籍，即承其绪。一

种是唐写卷子本。它据唐写本上版所遗留的痕迹，往往可于款式和避讳求得。如北宋监本《经传集解》，有避唐讳民字作民的，见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绍兴本《管子》，有避唐讳虎字作武的，见拙著《管子集校叙录的商榷》。这是避讳的证明。《管子》的款式，先列刘向《叙录》，后接《管子》卷第一，题唐司空房玄龄注，再列第一卷篇目，以次而入本文。这是唐卷子本的旧式。源出于石经的，只有经典，而源出于卷子本的，则凡是唐以前的著作，都有可能，不过它的面目已递有改变了。

北宋监本校刻的慎重

北宋监本，为儒家经籍最早的宋代刻本，原本已没有流传，只有南宋的翻刻本，要考当时刻书的掌故，有孔维《上五经正义表》和秦奭等八人的衔名，这也仅仅见于宁宗时翻刻的《尚书正义》之首，今录如下：

臣维等言：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经正义》，今已见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书契肇启，六籍著而学校始兴。于是体国辨方，必宗乎典礼。修文立教，实本于胶庠，则郁郁乎文，于周为盛矣。后暨法值挟书，复时经战国，或年祀远而篇简烂脱，或师徒众而传授差讹。存历朝错综之文，虽具陈解说；在群儒讲论亡旨，亦互有异同。唐贞观中，国子祭酒孔颖达，考前代亡文，采众家之善，随经析理，去短从长，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余年，讲经者止务销文，应举者唯编节义，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于荣，食禄者多忘本业，一登科级，便罢披寻，因循而舛谬渐滋，节略而宗源莫究。伏惟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道高贯月，德迈重瞳，武畅遐陬，文加异俗。举前朝之坠典，正历代之旧章。崇儒雅之风，三王却辘；阐《诗》、《书》之教，两汉厚颜。臣等谬以

寡闻，幸尘华贯，猥奉穷经之寄，曾无博古之能，空极覃精，宁周奥义。今则逐部各详于训解，写本皆正于字书，非遇昌期，难兴大教。既释不刊之典，愿垂永代之规。倘今雕印以颁行，乞降丝纶之明命。干犯旒冕，臣等无任战汗兢惶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臣维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评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征仕郎守大理寺丞柱国臣轩辕节。

勘官征事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臣胡令问。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柱国臣解贞吉。

勘官承奉郎殿中丞柱国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国子《毛诗》博士柱国赐绯鱼袋臣解损。

勘官承奉郎守国子《礼记》博士赐绯鱼袋臣李觉。

勘官承奉郎守国子《春秋》博士赐绯鱼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请大夫守国子司业赐紫金鱼袋臣孔维。

这一篇表文，对于封建王朝极尽阿谀颂扬，本来没有钞录的必要，因为是宋朝官刻书籍的一种程式，不妨留作参考。端拱元年（988年）是太宗的第三改元，这个本子虽已不传，可以凭此校勘官的名衔，知当时刻书的慎重负责。孔维的都勘官，就是现在的总校，《毛诗》、《礼记》、《春秋》博士，就是现在的专家。又如徐铉在进呈《说文解字》时，也有一篇同类性质的表文：

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东海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铉等，伏奉圣旨，校定许慎《说文解字》一部。伏以振发人文，兴崇古道，考遗编于鲁壁，缉蠹简于羽陵，载穆皇风，允符昌运。伏惟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凝神系表，降鉴机先，圣靡不通，思无不及。以为经籍既正，宪章具明，非文字无以见圣人之心，非篆籀无以究文字之义。眷兹讹俗，深恻皇慈，

爰命讨论，以垂程式，将惩宿弊，宜属通儒。臣等实愧谏闻，猥承乏使，徒穷懵学，岂副宸谟，尘渎冕旒，冰炭交集。其书十五卷，以编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谨诣东上阁门进上。谨进。

雍熙三年十一月 日，翰林书学臣王惟恭臣葛湍等状进。

奉直郎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臣句中正。

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东海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铉。

雍熙三年是公元九八六年，它比孔维上《五经正义》的时间还要早二年。后来历朝官修和进呈的书籍，照例都有这样一篇空洞的文章冠于其首。

北宋刻佛经

北宋版本早于端拱监本的，有开宝六年的藏经，是太祖在开宝四年派人到四川成都去雕造的，号称《开宝藏》。全藏应有五千多卷，今只有北京图书馆藏《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一种，卷上末有“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两行。这还早于杭州雷峰塔发现的吴越国王钱俶的《陀罗尼经》两年，要算现存北宋版最早的实物了。其次南海潘氏宝礼堂藏唐释神清撰《北山录》，序为熙宁元年，大约同时所刻。字作欧体，端凝肃穆，墨光如漆，真是北宋最精之本。其它见于著录的，不是后期刻本，便是南宋修补本了。

南宋修补监本和征集书版

北宋监本书版经金人劫掠，仅保存了少数史书的版片，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十行中字本，和《新唐书》的十四行小字本，到宋高宗南渡，重建国子监于首都杭州以后，才陆续修补出版。同时又重刻了经注和单疏。除了监中自刻之外，又征取外地的刻版入

监，如淮南江东漕司本《史记》、《汉书》、《后汉书》，衢州本《三国志》，台州本《荀子》，温州本《唐六典》等，所以南宋监本的书版，成分很复杂。

南宋的官刻本

南宋时，属于中央政府的刻本，除监本外，又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德寿殿本、左廊司局本。各地方政府和官吏，也都提倡刻书。两浙刻工集中，刊刻尤盛。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的统计，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两浙西路茶盐司本、两浙东路安抚使本、浙东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转运司本、潼州转运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东路转运司本、荆湖北路安抚使本、广西漕司本、江东仓台本、江西计台本、江西漕台本、淮南漕廩本、广东漕司本、江东漕院本、江西提刑司本、公使库本、州军学本、郡斋本、郡庠本、郡府学本、县斋本、县学本、学官本、黉宫本、学舍本、太医局本、书院本、祠堂本。还有只称某州某府的，有杭州本、明州本、温陵州本、吉州本、绍兴府本、临安府本、平江府本、余姚县本、盐官县本、眉山本。这些地方的刻本，主持者大都是内行里手，也有另请专家校勘的，书末往往罗列了校勘者的衔名，所以一般说来，是宋版中的上驷。

眉山刻七史

这些地方政府所刻书，值得一提的是蜀刻本。蜀地自唐而五代，一向有刻书的传统，因而有熟练的工人。到了十一世纪初叶，刻书的中心，由成都发展到了眉山，井宪孟所刻的七史，是眉山刻本的代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阙，始诏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北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

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变，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这就是眉山七史。因为字大如钱。所以称蜀大字本。又为每半叶九行，印本多模糊，所以称九行邈邈本。明洪武时，取天下书版入南京国子监，所以称南监本。元时有修版。嘉靖、万历、崇祯续有补版，所以称三朝本。至清代尚存江宁藩库，嘉庆藩库火，版始毁灭。前后经七百年，是书版寿命最为长久的。

南宋私刻本的繁盛

南宋私人刻书之风盛极一时，号称家塾本。据叶德辉的统计，有岳珂的相台家塾、廖莹中的世彩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临安进士孟琪、京台岳氏、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瞿源蔡道潜宅墨宝堂、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吴兴施元之三衢坐啸斋、王抚幹宅、锦溪张监税宅、武溪游孝恭德菜登俊斋、廉台田家、吉州东冈刘宅梅溪书院、建安陈彦甫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举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刘日新宅、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秀岩山堂、建安刘叔刚宅、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眉山文中、眉山程舍人宅、姑苏郑定、钱唐王叔边家、婺州市门巷唐宅、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刘氏学礼堂、隐士王氏取瑟堂、毕万裔宅富学堂、胡元质当涂道院、杭州净戒院、严陵詹义民、茶陵谭叔端。以上各家所刻书，少则一二种，多或八九种，都有序记牌子可考的。偶有误入的，如麻沙镇的刘仲吉、虞千里两家，可能是书坊。可以考得其人的，如周少府是周必大，祝太傅是祝穆，蔡梦弼、施元之等。而岳珂、廖莹中尤为烜赫有名。其它则已无法考查。又如当涂道院刻

《左氏摘奇》，杭州净戒院刻赵蕤《长短经》，他们不是刻道、佛书，尤为奇特。至其书的精粗美恶，虽有不同，而辅翼官刻的不足，及影响文化的发展，却是其功不小。

岳珂和廖莹中的精刻本

岳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是岳飞之孙。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著作甚富，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程史》、《金陀萃编》、《宝真斋法书赞》、《玉楮集》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就是他校刻经籍的凡例。钱泰吉《曝书杂记》：“宋岳倦翁刊《九经》、《三传》，以家塾所藏诸刻，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覆参订，始命良工人梓。其所撰《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罗列条目，详审精确，不可不家置一编也。”可见他刻书的谨慎不苟。其书今存在的，《五经》有清武英殿及各省书局翻刻本，称《相台五经》。钱泰吉言家置一编，是指翻刻本，原本在清宫，不知是否尚在世间。又有《论语》何晏集解附音义、《孟子》赵岐注附音义。廖莹中号药洲，邵武人。是宰相贾似道的门客，替他鉴定图书，自己也喜欢刻书，周密《癸辛杂识》说他刻的“《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草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池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韩、柳文版心有世彩堂三字，故称世彩堂本，为宋版书中最有名的书，今仅存孤本，蟫隐庐书坊曾影印行世。其它有《春秋经传集解》，见《天禄琳琅后编》。《论语》、《孟子》，今也有影印本。岳珂和廖莹中，他们的人品完全不同，而却同好刻书。但是岳刻《五经》，至今都认为是标准读本，而廖刻《九经》，尽管纸墨装潢不惜工本，只不过是富贵人的豪举，在当时已有人对他的删落经注表示不满。

南宋书坊刻书的繁盛

宋版除了公私所刻之外，又有书坊刻本，可称鼎足而三，临安的陈氏和建安的余氏，各刻有百十种之多，其它据叶德辉的统计，闽中则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阳麻沙书坊、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崇川余氏、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浙中则有杭州大隐坊、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杭州钱唐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铺、临安府金氏、金华双桂堂、临江府新喻吾氏。蜀中则有西蜀崔氏书肆、南剑州雕匠叶昌。秦中则有咸阳书隐斋。晋中则有汾阳博济堂。地址不详的，有棗斐轩、葛氏传稷书堂。宋时书坊至元时犹存的，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书坊刻书，志在图利。其知识较高的，明白必须质量高才能获利厚，所以对书的内容加以注意，并延通人为之校勘，这一类书，便不亚于公私精刻。其次，是偷减工料，欺骗取利，误文脱简，触目皆是，这一类书，以建刻为多，所谓麻沙坊本，为宋版中的下乘，不能拘于年代而等视齐观的。

临安陈氏所刻书

临安为南宋的首都，文化繁荣，也是刻字工人集中之地。而业书的陈起父子，在这有利条件下，刻了不少说部书、唐人诗集和《江湖集》行世。方回《瀛奎律髓》：“陈起，睦亲坊开书肆，自称陈道人，字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尝刊《江湖集》以售。”今传宋刻本有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刊行”题记的，都是他所刻行，与“临安府太庙前经籍铺尹家刊行”的，同称为书棚本。又有姓陈名思的，陈伯玉《宝刻丛编序》：“都人陈思，读书于都市，士之好古博雅，搜遗猎忘，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读，久之，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贗。”杨复吉《梦阑琐笔》：“陈思汇刻《群贤小集》，自洪迈以下六十四家，流传甚罕。”二陈同时同地，同业书，同刻书，而一名

起，一名思。有人以为即是一人，也有人以为他们是父子，叶德辉《书林清话》有考证。由于陈起是读书人，有著作，和一般的书贾不同，所以他刻的书，内容和形式都极讲究，是坊刻书中的精品。而元代戴表元却对他有批评，在《题孙过庭书谱后》说：“杭州陈道人家印书，书之疑处，本以己意改令谐顺，殆是书之一厄。”可惜他没有指出具体的例子。

建安余氏所刻书

福建建阳，地处较安全的闽北群山中，造纸工业非常发达，这就构成了印刷事业的有利条件。十二世纪初叶后，书肆渐多，麻沙、崇化两坊书肆主持人和文人合作，力求迎合时代。除了正经正史以外，还刻了适应科场应试用的类书和民生所需的医卜星相杂书，尤突出的是话本小说，如《武王伐纣》、《三国志》、《五代史》、《宣和遗事》的大量发行。其中刻书最多的为建安余氏，有余志安的勤有堂、余仁仲的万卷堂。《续东华录》：“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等：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版《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槧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版是元非宋。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因考之岳珂相台家塾论书版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刊有堂名，可见闽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名，但不知北宋时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书所载，明季余氏建版犹盛行，是其世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书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着传谕钟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见在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并建安余氏自宋以来刊印书版源流，及勤有堂昉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遗迹已无可考，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时曾否造纸？有无印记之处？或考之志乘，或征之传闻，逐一查明，遇便覆奏。寻据覆奏：余氏后人余廷勳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

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版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版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据此，余氏刻书，始于北宋，至元犹存，世业之久是少有的。余仁仲所刊各经注最精，今有覆本的，如《礼记》、《公羊》、《穀梁》，都精校精刊，宜为岳珂所重视了。其详目见《书林清话》。

佛藏的刻本

佛教徒的刻经，南宋时也有很大的成就。绍兴二年，湖州王永从等倡刻《思溪圆觉大藏》。又淳熙二年，同地又有人倡刻《资福大藏》。这两部大藏，卷帙繁重，超过了当时的儒家书，这是由于集体协作的优越性。

各地刻本的优劣

宋代版行书籍的情况：杭州为首都的所在地，所以刻书最盛，因而推及到两浙和淮南；蜀为刻书最早的地区；福建因纸的生产发达，适合于印刷业的发展。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宋版书，不出这三个地区。关于这三个地区刻书的优劣，前人的评论，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也是这样说，可以说已成了定论。福建本的所以差于杭、蜀，是为了易成而速售，这正是坊贾的目的，当然不能精工。柔木不能耐久，印刷得多些，便要模糊。好的书版，都是用梨木和枣木，取其木质坚硬，可以印刷较多。关于各地刻书的历史记载，如宋人所撰的地方志书《宝庆四明志》和《新定续志》，颇有涉及本郡的版刻，其它方志，却全不注意及此。王国维始据所见和记载的材料，编《两浙旧刊本考》四卷，才使两浙刻本，得到有系统的叙述。陈衍主纂的《福建通志》，有《版本志》两卷，虽不

如王国维的详备，然确是方志中的创例。

毕昇活字版的发明

活字排印的起源，有秦穆公时的秦公敦铭文，共一百字，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又有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的陶量器，上面的诏书四十字，也是用木戳印的。到了北宋时才推广到印书，这个重要的发明，就是毕昇的活字版。沈括《梦溪笔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本。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钱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这一段记活字版的制造和用法，基本上和现在的铅字排印相似，可惜这胶泥活字的印本，没有流传下来。叶德辉《郇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据说藏有胶泥版印的《韦苏州集》。亡友刘之泗据说也藏有胶泥版印的《刘随州集》，见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但依行款和印刷来看，大约是明初活字本。而宋代的活字本，只有南宋嘉定十四年的范祖禹《帝学》和淳祐五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二书，但并不是胶泥而改用木料了。又《天禄琳琅后编》有《毛诗》四卷，云是“宋活字本，《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模印字用蓝色”，虽不著朝代，但蓝色印本，至明代始有，也决不是宋本可知。

其它传世的活字本

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范祖禹《帝学》八卷，有嘉定辛巳刊书题记：“《帝学》一编，元祐中太史范公劝讲金华，摭取帝王务学求师之要，自宓羲迄于我宋，厘为八卷上之，玉音嘉纳，缉熙光明，于斯为盛。其五世孙择能宰高安，刊置县斋，未几散逸。户曹玉牒汝洋，一日访得元本，因俾侵木，以补道院之缺，庶永其传。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齐砺书。”这书的题记说侵木，而缪荃孙则称为宋活字本，他从原书审定，应该有根据，可知这活字不是用胶泥而是用侵木的了。

《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九十卷，旧为丁氏善本书室藏书。据柳诒徵《益山书景》识语：“前有淳祐乙巳良月朔前进士建安陈子和中甫序，末有丽泽堂活版印行，姑苏胡昇缮写，章凤刻，赵昂印四行。宋活字本世所仅见，书中匡贞字缺笔而慎字不避，丁志因其为明人旧藏，又与正德王敕所序嘉靖刊本异，定为天水初槧，淳祐旧编。”这两种活字版，有年号可征，尚没有发现第三种，但可能已是明人翻本。《涵芬楼烬余书录》有五代刊本《妙法莲华经》，据姚朋图跋谓是五代初年活字版印，并说活字当创始于唐季，他没有充足的证据，所以张元济不同意这说法。

宋刻本的版式

宋刻本的版式，每行有直线。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吕氏家塾记考》：“宋之初，去古未远，其刊四部之书，以其多出于卷子本，界栏尚是则乌丝界栏之旧，大抵用单边画，其非美观也，则有左右双边。宋之南渡，流风既远，古法几乎息矣，于是始有四周双边。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经》、巾箱本《周礼》、景德本《仪礼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本《礼记注疏》，则界用四周双边。而秘府《尚书正义》则汴时刻本，则画以左右双边，而修版则多四周双边。是四周双边固非古法，而左右双边，亦未可谓得旧样也。《考槃馀事》云：宋本无四周双边之书。不知宋中叶已有之，故举以正之。”是版本的直

线，源于唐写本的乌丝栏。而四周复加上较粗的线条，在左右的两线，就成了双边(又称双栏)。南宋刻本更在上下也加上一线，就成了四周双边。凭左右双边和四周双边，约略可以定刻本时代的先后，如岛田所举的《尚书正义》可以为证。到后来也颇混淆，并不能据此作为可靠的凭证。

宋刻本的行款

行字多少的计数，以半叶为准，如每半叶若干行，每行若干字。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或谓余曰：宋人刻书，每行字数。如其行数。如每叶二十行，则每行各二十字。每叶二十二行，则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尽然。如《钱竹汀日记钞》所载宋版《仪礼注》，每叶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汉书》每叶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马温公集》每叶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记》每叶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叶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每叶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则其说不足据矣。”有人说宋刻每行字数，如其行数，本来和事实不符，王氏已举了不少实例驳斥了。但是根据行数字数，有时确是可以得出何时何地刻本的一般规律，因为行字数，有的出于刻工的习惯，有的配合了纸张的大小，不会毫无原因的。宋监本各经注疏，每半叶十行，就称它十行本注疏。眉山七史，每半叶九行，就称它九行蜀大字本。书棚本唐人集是十行，行十八字。这些都是看了行款就可以定为某刻本的根据之一。江标撰《宋元本行格表》二卷，每半叶自四行以至二十行，每行自八字以至三十字，悉依行数的多少来排列。藏书家著录宋刻本，一定必详记行款，已成为谈版本的定例。

宋刻版口的各种专名

每叶正中的折叠部位，称为版口。其上下端谓之象鼻。象鼻空白的谓之白口，中间有墨线的谓之黑口。墨线细的谓之小黑口，又谓细

黑口；粗的谓之大黑口。中间墨钉谓之鱼尾，鱼尾便于折叠整齐。鱼尾在上的谓之上鱼尾，在下的谓之下鱼尾。书名及卷数多在上鱼尾下，叶数在下鱼尾上或下。上鱼尾上记每叶字数。下鱼尾下记刻工姓名，可考刻书的时代和地址。左右双边外有耳，耳中记篇名、君号和类目。

宋刻本的避讳

宋刻对帝王的名字，不论已死或活着的，都要避讳，并且与名字读音相近的字，谓之嫌名，也一律要避，立为功令，非常严格。避讳的方法，把这些讳字减去末一笔，谓之为字不成。对生存的或以“今上御名”四字作双行注。因此，要审定版本刻在何朝，只要把全书中的避讳字作一统计，它避到哪个统治者为止，就是那一朝的刻本。然而也有私人和书坊刻本，对庙讳有避有不避，并不一律，又有全不避讳的，如《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的《四明续志》，那就要根据其它条件来审定，不能拘泥于避讳了。

宋时避讳之字，有一帝之名，包括同音的嫌名达五十余字之多的，在封建时代也是个特例。当时功令的规定，有淳熙时的《重修文书式》，绍熙时的《重修文书令》，都载在《宋绍定礼部韵略》。

《淳熙重修文书式》：

玄，胡涓切。悬、县、泫、甸、肱、眩、狷等二十字。

朗，卢党切。恨、烺、狼、阆、浪等二十字。

匡，去王切。筐、眶、恇、劬、廷等十八字。

胤，羊晋切。醢、鞫、引等十七字。

炅，古迥切。颀、炯、耿、肩、憬等十六字。

恒，胡登切。峒、姁等四字。

楨，陟盈切。楨、贞、侦、征、旌、症等十三字。

曙，常恕切。署、抒、箸、薯、树，殊遇切。竖、澍、赎、属等二十六字。

頊，呼玉切。旭、勛等七字。

煦，吁句切。煦、酗、休、响、咻等十三字。

佶，极乞切。媧、郅、鮒、吉，其吉切。咭等十一字。

桓，胡官切。璪、完、丸、院、洹、洹、纨、统、芄、莞、萑、鸛、苒、狙、皖、垣等四十九字。

构，古候切。遘、媾、覲、购、葑、篝、搆、媼、诟、逅、鹵、句、雠、钩、峒、谷、穀、搆、穀、够等五十五字。

育，时认切。慎、蜃等七字。

惇，都昆切。敦、墩、村、鹑、惇等二十四字。内鶉、惇二字，并系殊伦切，与淳字同音，不合回避。若作都昆切，即系与今庙讳同音。合各从经传子史音义避用。

扩，阔夬切。廓、郭、鞞、鞞等十七字。

昫，俞伦切。匀、昫、驯、巡《尚书》巡狩徐邈读。等七字。

《绍熙重修文书令》：

诸犯圣祖名、庙讳，旧讳、旧讳内贰字者连用为犯，若文虽连，而意不相属者非。御名，改避。余字谓式所有者。有他音，谓如角徵之类。及经传子史有两音者，许通用，谓如金作赎刑，其赎字一作石欲切之类。正字皆避之。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为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

诸避濮安懿王讳让者，改避。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皆为字不成，其在真宗皇帝谥号内者，不避。应奏者以黄纸覆之。按真宗谥号，有让德二字。诸文书不得指斥援引黄帝名，经史旧文则不避。如用从车从干，冠以牵字，或继以后字，合行回避。自余如轩冕、轩轻、辘轳、车辕之类，即不合回避。

宋刻本的字体

北宋刻本为欧阳询字体，南宋便参有柳公权、颜真卿的字体了。精刻本有的具列书者衔名，是仿五代刻本《尔雅》有书者李鹞名的前例。如绍兴重刻《毛诗正义》，有淳化原刻书者“广文馆进士臣韦宿

书”四人衔名。又有用名人手写本雕版的，钱谦益《坡书陶渊明集跋》：“北宋刻《渊明集》十卷，文休承定为东坡书，虽未见题识，然书法雄秀，绝似司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无疑。镂版精好，精华苍老之气，凜然于行墨之间，真希世之宝也。”又有把作者手迹雕版者，陆心源《宋刊历代故事跋》：“杨次山辑。首坤宁殿题，为宁宗杨皇后所制。其书乃次山手书付刊，书法娟秀可喜。”又有把名人手札真迹雕版的，缪荃孙《宋刊注渠阳诗跋》：“又有魏鹤山札子，真大参德秀、杜尚书范、李侍郎心传、李大参性传、吕宗卿午、叶秘书大有各家札子题跋，均以手书开雕。”这些都是珍贵的精本，与摹勒碑帖无异，也可见当时刻字工人艺术的高超。

宋刻本的版心高广

著录宋版书，又须记版心的高广。衡量的尺度，以前都用工部营造尺。版心最小的，如显德刊本《宝篋印陀罗尼经》，版心高只一寸九分半。这是卷子式。线装本以《滂喜斋藏书记》著录的《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为最小，版高不及四寸，就是所谓巾箱本，又称袖珍本。版心大的，《滂喜斋藏书记》有《谭津集》，版宽至一尺四五寸。比它更大的，《楹书隅录》有白玉蟾《道德宝章》，书高至二尺一寸有奇，字径一寸五六分。有木记题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轩王宅重刊，已不是宋代原刻了。涵芬楼有《国语》，版心高标准尺二十二寸二分，广三十四寸四分。而纸张乃高至四十五寸一分，广至六十寸。本式之大，极为罕见。

第六节 辽金元版本的概述

辽代书禁的严厉

辽代起自沙漠，太宗耶律德光以武力经略国内，对于文化事业，未

暇顾及，故一切都很简陋。《辽史》中只记有乾文阁，是当时藏书的地方。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元年（当宋大中祥符五年）八月，那沙国来乞儒书，曾诏赐《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道宗耶律洪基清宁元年（当宋至和二年）十二月，曾下诏设立学校，并颁赐诸经义疏。由此看来，似乎辽代也曾刻过《五经》并义疏，又政府也有集中藏书的地方，可是从来没有流传下来。原因是辽对书籍的流通，有极严的禁令。《梦溪笔谈》卷十五：“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龕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辨。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流通书籍，竟定以死罪，封建统治的残暴，骇人听闻。然而终不能禁止，仍有人把《龙龕手镜》一书携至中原重刻。重熙二年（当宋明道二年）的序文，已被蒲传正削去，而今本《龙龕手鉴》却有题统和十五年丁酉（当宋至道三年）的智光序，明徐燊认为辽刻原本，当在这一年，前于重熙三十余年。只此可证辽代确曾有书籍刊行。今《四部丛刊》影印的《龙龕手鉴》，避宋讳改镜作鉴，明为宋代重刻，而真辽本遂绝迹于世间了。

金代平阳刻书的盛况

金源分割了中原，日寻干戈。山西平阳府的平水，即今临汾县，不当要冲，比较安定，于是一辈知识分子和北宋汴梁的刻工们，都为避乱而迁去，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了刻书的机构。《金史·地理志》：“平阳府有书籍。”据钱大昕《跋平水新刊礼部韵略》：“前有正大六年许道真序，知此书为平水书籍王文郁所定。史言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然则平水书籍者，盖文郁之官称耳。”当时的刻书所，既有官立的，也有私人的。发展到十二世纪中叶，便形成了繁荣的局面，不亚于宋代的浙、蜀、闽三省。据《书林清话》所考得的平水刻书，有书轩陈氏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李子文的《重刊增广分门类

林杂说》，张谦的《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平水中和轩王宅的《道德宝章》、《新刊韵略》、《滏水文集》，晦明轩张宅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丹渊集》。平水以外的书坊，有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的《经史证类大本草》，碣石赵衍的《李贺歌诗编》。叶氏所未收的，有《尚书注疏》，见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地理图中刊“平水刘敏中编”一行。又《毛诗注疏》，行款与《尚书》同，见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刘敏中所刻注疏，或不止这两种，余尚未见。又《邙山偈》、《云笈七签》、《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礮溪集》，亦见《文禄堂访书记》。《南丰曾子固先生集》、《黄帝内经素问》、《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庄子全解》，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金刻本的传世，比宋刻要少得多，所以藏书家对它非常重视。

赵城藏经的发现和保存

佛教徒刻经的繁盛，也不弱于五代两宋。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二十多年间，解州天宁寺的《大藏经》版会主办，由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向晋南人民募刻，完成了一部卷帙浩富的《大藏经》。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因称《赵城藏》，为国内外孤本。一九四二年几被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劫去，幸当时八路军在赵城，从日本侵略军魔爪中抢救出来，已仅存四千三百余卷了。一九四九年，由华北人民政府移送北京图书馆度藏，使今之学者，得见早期平水系雕版的代表作。

元代兴文署的建立

元代的刻书，继承了两宋的优良传统，官私所刻，都可与宋版媲美，至今谈版本的，犹宋、元并称。《元史》：“太宗八年六月，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太宗八年，当南宋端平三年，这时已注意于刻书了。他承袭了金代平阳刻书的旧业，今传本有定宗四年平阳

张存惠晦明轩刻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是元代最早的刻本。后来又继续刻了不少有用之书。《续文献通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以集贤大学士许衡言，遣使取杭州等处凡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这是集中保存宋时版片，继续印行。《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七年，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版，以《资治通鉴》为起端。”据王士点《秘书监志》：“至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大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呵。至元十一年，以兴文署隶秘书监，掌雕印文书。三十年，又并入翰林院，召集良工，刊刻诸经子史版本，以《通鉴》为起端。”是早在至元十年（当南宋咸淳九年）已立兴文署雕印文书，可正《百官志》的错误。当时署内有雕字匠花名四十名，印匠一十六名。这是元代官刻书籍的机构。

官刻书和九路本《十七史》

元代官刻书籍，据《书林清话》的统计，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各路儒学本、郡学本、郡庠本、儒司本、书院本、太医院本、官医提举本。国子监本，今只有《伤寒论》一种。兴文署本的《资治通鉴》，据王国维的考证，因有胡三省注，已是复刻兴文署本。郡学与郡庠，不过名称的不同。太医院和官医提举则专刻医书。而刻书的重点，却在各路儒学和书院。又有名为书院而实则私刻的，有方回的虚谷书院，茶陵东山陈仁子的古迂书院，詹氏的建阳书院，潘屏山的圭山书院，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的梅溪书院，郑玉的师山书院。

经呈请核准官刻的书籍，把当时所行的公文列于本书之首，称之为牒。如至元三年庆元路所刻的《玉海》，首有国子监呈本监牒，呈中书省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各路儒学召工开雕牒。至正二年，杭州路刻的苏天爵《国朝文类》，首有翰林国史院待制应奉编修各官，呈本院详准，呈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仍由中书省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下杭州路西湖书院开雕牒。其大部书有数路分别合刻的。太平路新刊《汉书》，目录后有孔文声题记：“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以《十

七史》书难得善本，从太平路学官之请，遍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汉书》率先，俾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经阁，致工于武林，三复对读者，耆儒姚和中辈十有五人。重校修补者，学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费具载学计，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终是岁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学教授曲阜孔文声谨书。”瑞州路学刊本《隋书》欧乡周自周序：“曩序录庐陵乡校，有《史记》、《东汉书》而无《西汉》，及长鹭洲书院，则仅《西汉》一书而已。尝叹安得安西书院所刊经史，会为全书。今教瑞学，有《通鉴》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顺壬申夏，奉省宪令，备儒学提举。高承事言：《十七史》书，书本极少，江西学院惟吉安有《史记》、东、西《汉书》，赣学有《三国志》，临江路学《唐书》，抚学《五代史》，余缺《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若令龙昌路学刊《晋书》，建昌路学刊《南》、《北史》，瑞州路学刊《隋书》，便如其请，俾行之无怠。”又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诸路刊史。《两汉》则太平路，《三国志》则池路，《隋书》则瑞州路，《北史》则信州路，《唐书》则平江路。”书首也各附牒文。这就是元九路本《十七史》的分工。

学校刻书的精善

各地学校所刻，有儒学、郡学、郡庠、府学、儒司、书院等名称，尤以书院所刻为最多。这些书，都附有刻书年月和刻书所牌子，或在书的首末，或在目录后面。顾炎武《日知录》：“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原注：主书院者谓之山长。）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明陆深《金台纪闻》：“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廩饩，余则刻书，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则纠数处为之，以互易成帙，故校讎刻画，颇有精者，非以图鬻也。”即此可见元代官刻书的精善。赏

鉴家只视时代的远近来定宋、元本的价值，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

元代用官款刻私人著作

私人著述由官款所刻的，必由本路呈请，经核准后，动用各路钱粮及学校瞻学田款内开支。倪灿《宋史艺文志补序》：“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进呈，下翰林详看可传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学刊行，故何、王、金、许之书，多类以传。鄱阳马氏《通考》，且出于羽流之荐达，可谓盛矣。”宋宾王《影元钞本曹文正集跋》：“元时名集，动国帑钁版，故得名手书文，良工刊刻。”今所传元刻本，以各路各学名义出版的，数量不少。这个办法，可以提高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不至灾梨祸枣；又因经费充裕，可以工书精雕。

私刻书的概况

元代私宅刻书的盛况，也不下于宋。据《书林清话》的统计，有平阳府梁宅、平水许宅、建安郑明德宅、陈忠甫宅、花溪沈氏家塾、古迂陈氏家塾、云坡家塾、安成郡彭寅翁崇道精舍、虞氏南溪精舍明复斋、平水曹氏进德斋、存存斋、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孝永堂、平水高昂霄尊贤堂、范氏岁寒堂、复古堂、丛桂堂、严氏存耕堂、平阳司马颐真堂、唐氏齐芳堂、汪氏诚意斋集书堂、余彦国励贤堂、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精一书舍、熊禾武夷书室、崇川书府、商山书塾、溪山道人田紫芝英淑溪山家塾、平阳道参幕段子成、云衢张氏、盱南孙氏、建安蔡氏、建安刘承父、建安詹景、刘震卿、龙山赵氏国宝、刘君佐翠岩精舍、西园精舍、梅轩蔡氏。这都是根据各书的序跋和牌记，刻书的人已有十之八九不可考了，所以这里面也许有书坊所刻混入在内，不容易一一区别了。

书坊刻本的特点

元代书坊刻书的盛况，更超过了宋，一则时代较近，传本较多；二

则获利较厚，从业的也较多。比较集中的地区，仍是宋的两浙、蜀、闽和金的平水。据《书林清话》的统计，有刘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平阳张存惠堂、燕山窦氏活济堂、建安陈氏馀庆堂、建安朱氏与耕堂、建安同文堂、建安万卷堂、麻沙万卷堂、董氏万卷堂、云衢会文堂、积庆堂、德星堂、万玉堂、胡氏古林书屋、日新书堂、梅隐书屋、妃仙陈氏书堂、叶曾南阜书堂、敏德书堂、李氏建安书堂、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桃溪居敬书堂、庐陵泰宇书堂、积德书堂、双桂书堂、一山书堂、妃仙兴庆书堂、秀岩书堂、云庄书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三衢石林叶敦、书市刘衡甫、闻德坊周家书肆、建阳刘氏书肆、建阳书林、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建安郑天泽宗文书堂、杨氏清江书堂。这些书坊所刻，少则一二种，多则数十种，其精美者可与私宅刻本媲美。前人说，书坊目的在谋利，所以没有刻大部经史，而多刻医书和帖括、小说、戏曲。不知这正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并且保存了不少民间的优秀文学作品，绝对不能加以轻视。其时还有宋代的余氏勤有堂，直到元代仍在不断的刻书，虞氏务本书堂、郑天泽宗文书堂、杨氏清江书堂，也一直延续到明代。建安叶氏广勤堂，刻书最多，可与宋代的余氏相仿。这都是元代书坊刻本的特点。

小说戏文的发现和价值

元初，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刻了平话小说《唐三藏取经诗话》。当时杭州的杂剧戏文盛行，今有传本的，如《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三夺槊》、《李太白贬夜郎》等杂剧，均题古杭新刊。又《永乐大典》本《小孙屠》等戏文三种，题古杭才人或古杭书会新编，也是这时代的产品。平水书肆，又刻了许多诸宫调唱本和招帖画，俄国柯兹洛夫曾在甘肃甘州古塔内发现王昭君、赵飞燕木刻画和《刘知远传》残本，确是金、元间平水的坊刻本。这都是在黄丕烈士礼居所藏元刻本《琵琶记》以后的新发现。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一向鄙视这类书籍，以为不登大雅之堂，六七百年来，不知毁灭埋没了多少。

元刻本的款式

元刻本的版式，用四周双栏和黑口的比较多。除了翻刻宋版和写字人偶尔沿用旧例外，不避帝讳。书之首末或目录后面，附有刻书牌子，多用碑式，故又称碑牌。又有作钟式、鼎式、琴式的。其详者叙述刻书原由或校勘情况，简者唯记刻书年月或某某书院梓等。

名人手写的精刻本

私宅所刻精本，往往是由名人手写上版的。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茅山旧志》，前元代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编，句曲外史张雨手书，刻之甚精。国初毁于火。”这书的印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有一部，真是精妙绝伦。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元刊周易集解》：“《上经》后跋云：嗣男仲温命儿楨缮写，谨钁梓于读易楼，至正八年，岁在戊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谨志。《下经》后，有至正九年跋，略同。惟命儿楨三字，改孙贞木。象传后有十年跋，亦略同。惟孙贞木，改儿楨植。盖至正中此书初刊祖本也。书法工秀，体兼欧、赵。贞木本有书名，见《书史会要》。植亦濡染家学，手书上版，故能精美如此也。”又《元刊六书正讹》：“元刊元印本，篆文圆劲，楷书遒丽，盖以伯温手书上版者。”我尝见元刊《五服图解》，首有至治壬戌携李龚端礼自序：“故不辞衰老，细字夜书，厥始厥终，皆出一笔，用倒羞囊之余，以资钁梓之费。”以上这些书有的出于作者自书，有的出于子孙所书，他们都是以书法著名，加以刻工的优秀，所以能成此精美的刊物。至一般精刻本，都用赵孟頫字体。徐晋《前尘梦影录》：“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其时为官本刻经史，私家刻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是元刻的用赵体，和宋刻的用颜、欧体，同样成了一时的风气。

王楨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宋毕昇发明了胶泥版，他印的书早已失传，后来的木活字，也只有翻本。然活字比木版，肯定是进步的，所以仍不断地在发展。到了元

延祐元年，东平人王桢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他把活字的大小高低，用小锯和刀子修整得都合乎标准，然后依照韵部编号，按置在两架特制的轮盘上。排版时，摘字的人居中，便可以字就人。详细办法，附载在他所著的《农书》后面。

王桢是元代的科学家，所著《农书》，至今犹流传。他用科学方法，创造了这木活字印刷术，试印过《旌德县志》。故把这一方法，介绍给世之好事者。可惜现在连这部木活字印的《旌德县志》也没有传本了。从他这篇介绍中，知道宋元之际，有过烧熟瓦字和铸锡字两种活字印书法。烧熟瓦字，大约就是毕昇的旧法。铸锡字已开了明代铜活字的先声，都是我国印刷史上有价值的记载。

继王桢之后，延祐六年，广平人马德称做奉化知州，据李洧孙《知州马德称去思碑记》：“活书版镂至十万字。”曾用来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可知活字版自王桢发明以后，确有人仿它的方法来印书。可惜都没有传本（见今人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禁止翻刻的告白

古人出版著作，本没有所谓版权，故任人翻刻，流传自然广了。宋刻《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把古书占为私利，并没有指出不许复版的理由。至于元代，也有乞官禁止翻刻的，始于陈棻的《古今韵会举要》，今传元刻本有陈棻告白：“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铺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这才合于版权的条件。但这项禁止翻刻办法，似乎是发扬文化的障碍，然他为了有“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致误学者”起见，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后来明人刻书，往往犯这毛病，陈棻可说有先见之明了。

第七节 明代版本的概述

南北监的修版和重刻

据《元史》：“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于是宋国子监、元各路学的旧有版片，尽入南京国子监了（简称南雍或南监）。梅鹭《南雍志》：“梓刻书本，《金陵新志》所载集庆路儒学史书梓数，正与今同。则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版既丛乱，旋补旋亡。成化初，祭酒王僎会计之，已逾二万篇。弘治初，始作库供储藏。嘉靖七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刊史书，礼部议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学博才裕，使将原版刊补。其广东原刻《宋史》，差取付监。《辽》、《金》两史，原无版者，购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邦奇等奏称《史记》、《前》、《后汉书》残缺模糊，剜补易脱，莫若重刻。后邦奇、汝璧迁去，祭酒林文俊、司业张星继之，方克进呈。”南雍集中了前代版片，加以修补续刊，以史部来说，就有宋国子监刻的原版，略有元代修补，而明代又陆续修补之，版口鱼尾上都刻明补版的年月。当时所印之本，号为三朝本。若明补无正德以后版，虽略有模糊，仍不亚于宋、元，故后来藏书家，有竟认它作宋、元本著录的。南雍所藏四部版片，《南雍经籍志》所载很详，而印行不多，仍不能满足学者的要求。所以北京国子监复据南监本重刻，只成《十三经》和《二十一史》，主持者为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自万历二十四年始，至三十四年竣事。它只据南监本重刻，不过整齐了行款，没有据其它善本校勘，故论其内容，反不如南雍本远甚。

经厂本的内容

司礼监的经厂，由宦官主持，也刻了不少书籍。他们都是不学无

术之徒，除了帝皇御制和科举腐朽书之外，有用书是不多的。由于经费充裕，所刻都是大版精刻，印刷装潢，无不讲究。目录家称为经厂本或内府本，今有《经厂书目》一卷。

官署刻书和都察院刻小说

在京城各机关，如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钦天监、太医院，都刻了与他们职掌有关的书籍；独都察院刻有《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一般封建士大夫便大加反对，说“堂堂风宪有司，而刻书如此轻诞”，真是迂腐之见。

书帕本的评价

王士禛《居易录》：“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由于这个关系，明代外省官司掀起了刻书的高潮，其书目见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的，已不下数千种。其中尽有访求善本，精心校勘的，自然也不免有草率从事，敷衍塞责的，全视刻书者的学术水平来分别。对于后者的刻书，顾炎武《日知录》曾作公正的批评：“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贶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昔时人覲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这样的刻书，反造成浪费，贻误学子。所以书帕本在明刻中为质量最下的一种。但这还算是附庸风雅，后来干脆改用白金，贿赂公行，明末封建士大夫的寡廉鲜耻，竟落到如此地步。

藩府刻书的发达

明代官刻的书籍，远不及宋、元的精善，而诸王藩府所刻，却颇有佳本，由于明时藩王就封，例有赐书，诸王也颇有闲居好学的，于是礼聘通儒，翻雕古籍，校印了不少精美的善本。据叶德辉的统计，有蜀

府、宁藩、代府、崇府、肃府、唐府、吉府、晋府宝贤堂、益府、秦府、周藩、徽藩崇德书院、沈藩、伊府、鲁府敏学书院、赵府居敬堂、辽国宝训堂、楚府、德藩最乐轩、潞藩，都是现有刻本流传的。又周弘祖《古今书刻》著有弋阳王府、淮府、汝府、韩府、庆府，都有书籍刊行，虽其本罕见，而一时刻书风气之盛，可以想见了。其中以宁藩朱权和晋藩朱钟铉较为突出。朱权为太祖第十七个儿子，钱谦益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提要》有《宁藩书目》一卷，说他所纂辑刊刻之书，有一百三十七种之多，并附有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词曲、院本盛行于元、明之间，他所刊刻的必多未见秘本，可惜已不尽流传，至于道家炼度斋醮诸仪，则因朱权迷信神仙而广为传布，是不足为训的。朱钟铉为太祖的曾孙，他博古喜法书，曾刻《宝贤堂法帖》。今世传书画，有晋府图章的，即是曾经他收藏的。他子孙都好学嗜古，代有刻书，今传世的如重刻张伯颜本《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是有系统性的。至朱权的七世孙朱谋埈和周藩朱棨的六世孙朱睦㮮，则凭藉了家中藏书之富，著作等身，成了明代有名的学者，这是藏书刻书所收得的果实。

私刻本的精华

明代私人刻书，因时代未远，传本相当繁富，还没法作完整的统计，但可称为精品的，究属不多。《书林清话》有“明人刻书的精品”一则，已略举其例。大概刻书的人是有名的学者或藏书家，其书必佳，因为他们校勘必谨严不苟，底本必真实可靠。例如吴郡沈辨之的野竹斋、昆山叶恭焕的蓁竹堂、震泽王延喆的恩褒四世之堂、吴郡袁褫的嘉趣堂、澶渊晁璠的宝文堂、东吴徐时泰的东雅堂、嘉禾项笃寿的万卷堂和项德棻的宛委堂，以及江阴涂祜、南平游居敬、余姚闻人诠、福建汪文盛、元和吴元恭等所刻书，论其价值，并不亚于宋、元本，不可因明刻而轻视。他们所据的底本，大都为宋刻之上乘，有的照样翻

刻，有的加以整理。有许多宋刻早已失传，幸有明翻刻本留存，它的价值，便相等于宋刻本了。这是照样翻刻的优点。崇祯六年吴郡赵均翻刻宋麻沙本《玉台新咏》，也是明刻精本之一，后人往往撕去书跋，冒充宋刻，可知它槧印之佳。但据冯班说：“宋本行款参差不一，赵氏刻时，已整齐一番，且多改易字。”这是加以整理的证据。大概翻刻不等于影印，原本的优点，必需保留，不容许擅改，而缺点当然应该改进，如赵均改变原本的参差不一便是。不过改易字又必须有所根据，不容臆改。明人刻书，在嘉靖以前，犹知慎重；后来渐私心自用，不但窜改，并且删节，如胡文焕的《格致丛书》，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公然割裂首尾，改头换面，简直是焚书而不是刻书了。

毛晋汲古阁的刻书事业

明人刻书之多，莫过于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重行雕版。观顾湘所作《汲古阁版本考》，真是琳琅满目，为前代所未有。当时印刷流传甚广，虽逾三四百年，坊间仍可常常遇见，世称毛刻。它的沾溉来学，功不可没。

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子晋初名凤苞，晚更名晋，世居虞山东湖。父清，孝弟力田，为乡三老，而子晋奋起为儒，通明好古，强记博览，不屑俚华斗叶，争研削间。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者远祖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义。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进以巨儒事钩纂，要以岐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讎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缙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经史既竣，则有事于佛藏，军持在户，贝多滥几，捐衣削食，终其身芒芒如也。盖世之好学者有矣，其于内外二典世出世间之法，兼营并力，如饥渴之求饮食，殆未有如子晋者也。生五子；襄、褰、袞、表、宸。”

他是钱谦益的弟子，传受了绛云楼藏书衣钵，又家富于财，所以有力量遍搜奇秘之书。相传他曾揭榜于大门上：“有以宋槧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的门前了。邑中人都说：“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终于成了大藏书家，《士礼居丛书》中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虽只著录了他藏书中的一部分，已够惊人了。钱谦益对他刻书的意旨，已说得很清楚。尤其是刻《十三经注疏》，在举世溺没于宋明理学之时，而提倡汉唐旧学；刻《十七史》，在举世从事于详节选本之时，而提倡整部全史，这于清代学术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晋刻书的事业，以幼子扈而得传绪，所刻益多。扈字斧季，他手校的书籍，为藏书家所推重。他们父子对于刻书的兴趣，可在毛扈的《钞本五经文字跋文》中见之：“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扈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扈曰：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刻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多矣，窃恐秘册之流传尚十不及一也。”毛扈接受了父训，专以流传秘册为务。当时相助校勘的，如陆貽典、周荣起等，都是有名的专家。

毛氏所刻书，大都版心有汲古阁三字。又如《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浣花集》等，版心有绿君亭三字。它所用的纸，是江西特造的，厚的曰毛边，薄的曰毛太，至今仍沿这名称。明刻书对于帝讳，本来是不避的，到了天启、崇祯间，始渐严密，光宗常洛的常作尝、洛作雒。熹宗由校的校作较。毅宗由检的检作简。毛刻本对这些讳字都照避了。

毛刻本的评价

毛氏父子这样的专志于刻书，又有陆貽典、周荣起等专家的相助，所刻书应该没有遗憾的了，但事实却相反。孙从添《藏书纪要》：“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又：“毛

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陈鱣《元大德本后汉书跋》：“堯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顾广圻《陆游南唐书跋》：“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本，故以体分统前后集并为三卷，或以意改之。”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自序：“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则校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张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据次立剗改。又识见弩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纆戾多端哉。”据这辈专家学者的批评，毛氏刻本，几乎是一无足取了。我们应该对它作怎样看法呢？我以为毛氏藏书既多善本，重刻时不能一一据以详校，又有既据宋本，不纤悉照摹，而用己意校改，当然是个缺点。其间也许有其它原因存在。譬如原书的刊刻在先，而善本的收得在后，就发现底本与刻本的不同了。他既得善本之后，因为刻书太多，势不能一一修改。但他的主观是要求精益求精的，只好选择几种来改正和重刻，如陆游《南唐书》的重刻便是。也有他并没有见过宋本，只得根据别本付刻。这就不应该据宋本来攻击他的错误。如《李群玉集》，毛氏以体分统前后并为三卷，究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倘是他见到了宋本，自然不必多此一举。至于毛晋和毛扆的校刻《说文》，前后共经过五次的校改。段玉裁说他纆戾多端，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看一看毛氏的时代。明代对于《说文》之学，除了赵宦光外，本来是很少有人注意的。所以连《说文》这部书，也几乎失传。以顾炎武的博学，生平尚未见过《说文》原本。经毛氏重刻才家有其书，蔚成清代许学的盛况，他的功绩就在这里。至于毛氏父子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许学的水平和成就，自不能与段玉裁这样的大专家来比；以许学极盛时的准绳，来衡量萌芽时的版本，是不适当的。毛氏刻了十余万的版片，当

然有不少缺点，对这些缺点严肃地指出来，使后人不被所误，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强调了部分缺点而否定他的重要成绩。

书坊刻书的繁盛

明代私刻和坊刻的书籍，也多用书院、精舍、书堂、书屋、山房、斋、馆等名称，而坊间所刻，又有冠以“书林”或“书户”二字的。

《书林清话》的统计，也遗漏尚多。私刻的优劣，在前条已发其凡，而坊刻的范围，虽遍及全国，仍以福建的建阳为盛，这是承袭了宋、元以来的传统。嘉靖年间纂修的《建阳县志》有一张书坊图和书目，可以推知那时书坊分布的情况和书籍出版的动向。其中刻书独多的，是刘洪的慎独斋和刘宗器的安正堂，书林世业，可以媲美宋、元时的余氏了。

坊刻中堪称精品的，又有吴郡顾春在嘉靖时刻的《老子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荀子》、《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中说》，称世德堂《六子全书》。金台汪谅刻的许多古书，在他所刻的《文选》的目录后面，附有一篇详目：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翻刻《司马迁正义集解史记》一部

翻刻《梁昭明注解文选》一部

翻刻《黄鹤注解杜诗》一部

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

翻刻《注解唐诗》一部

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系医书

翻刻《武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

俱宋、元版。

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

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

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

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

重刻《书对押韵》一部

重刻《孝经注疏》一部

俱古版。

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版校正新刊。

此为书坊售书目录广告的始见。他分翻刻和重刻两种项目，可见雕版的不苟。又有徽州的余象斗，刻了《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这些都是书坊所刻的精本。

华氏和安国的活字本

活字印书，虽创始于宋、元，而没有流传，到了明代，才渐渐地发展起来，尤以无锡的华燧、华坚、华理和安国所印的书为最多而最有名。

邵宝《会通君传》：“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辨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质焉。继而为铜字版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他印书的款式，如《容斋随笔》每番中缝上方有“弘治岁在旃蒙单阙”八字，下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八字。今传本除《容斋随笔》外，有《校正音释书经》、《校正音释春秋》、《古今合璧事类前集》、《文苑英华纂要》、《文苑英华辨证》、《锦绣万花谷》、《诸臣奏议》等。华坚的姓名，不见于郡邑志乘，叶昌炽、叶德辉均疑为华燧的从子行。根据他所印书的署款，知其字允刚，而时代则在正德乙亥、丙子之间，如《春秋繁露》末有“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行”一条，版心都有“兰雪堂”三

字，因称为兰雪堂本。此外又有《艺文类聚》、《蔡中郎集》、《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等。《无锡县志》：“华理字汝德，以贡授大官署丞。善鉴别古奇器法书名画，筑尚古斋，实诸玩好其中。又多聚书，所制活版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他与华燧的关系已不可考，但定是一家人，印书的时代也相同，所印《渭南文集》有“明弘治壬戌致光禄署丞事锡山华理汝德得溧阳本因托活字摹而传之”云云。此外又有重印宋左圭的《百川学海》。安国本为明代的大收藏家。《无锡县志》：“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好古书画彝鼎，购异书。”《常州府志》又云：“尝以活字铜版印《吴中水利通志》。”此外又有《春秋繁露》、《颜鲁公集》、《魏鹤山集》等。数量不如华氏之多，而校勘较为谨严。

华氏活字本的批评

活字印书虽便于速成，而校勘却不可不特别谨严，否则便鲁鱼满目，反成了恶本。华氏所印书，重之者则谓“流传至今四五百年，愈久而愈稀，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宋槧名钞，争相宝尚，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槧，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书林清话》）然明陆深《金台纪闻》已深致不满了。他说：“近日毘陵人用铅锡为活字，视版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虽小故，可以观变矣。”更具体地说，《天禄琳琅书目·白氏长庆集》：“其书于一行之中，分列两行之字，全部皆如小注，遂致参差不齐，则其法虽精，而其制尚未尽善也。”顾广圻《文苑英华跋》：“是书字句多所脱遗，未为精善，以其出自宋本，存之。”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是书除此本外，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谬误不可枚举。如卷四十六谢泌《论宰相枢密接见宾客疏》，卷六十一傅尧俞《再论朱颖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苏辙《乞募保甲优等人刺为禁军疏》，存首二行。吕陶《论

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叶。活字本俱删去，犹可曰以其残缺而去之。最可异者，如卷廿六司马光《论任人赏罚要在至公名体礼数当自抑损疏》，‘恩虽至厚而人不可妒者何也？众人’下此本缺两叶，活字本于‘众人’下竟直接傅尧俞《上慈圣皇后乞还政疏》‘诚赞翊援皇帝于藩邸以继大统’。卷一百廿四范纯仁《乞检阅保甲疏》，‘乞并结盘缠赴阙委殿前’下，此本缺两叶，活字本于‘殿前’下竟直接王岩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罢畿内保甲第二疏》‘释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贯，不顾文义之隔绝，藉非宋本尚存，奚从订正其误？”严元照《容斋五笔跋》：“纸墨古雅可爱，然亦颇有讹脱。《随笔》第十一卷，合九十两条为一，脱去字二百七十九。《续笔》第三卷，又合九十两条为一，脱字百七十九。第九卷末，则脱三百有六字，误杂于十一卷之首，则中夹注皆不具，盖由铜版无小字而然。凡容斋所自称名，皆脱去迈字，不可解也。”陆心源《重雕兰雪堂本蔡中郎集序》：“明弘治中，华坚兰雪堂活字本，即从欧出，传古虽殷而讎校甚疏，或上下互例，或形近互讹，亥豕鲁鱼，无叶不有。”据此看来，华氏印书草率，竟不加校勘，至造成出乎意料的大错误，被人们诟病，这是印书者不负责任。

其它活字精本

其它活字印本，有金兰馆的《石湖居士集》、孙蕡《西庵集》，五云溪馆的《襄阳耆旧传》、《玉台新咏》，芝城的《墨子》，五川精舍的《王岐公宫词》，苏州孙凤的《阴何诗》，建业张氏的《开元天宝遗事》。大都是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中叶苏南一带的出品。他如蜀府的苏辙《栾城集》，倪灿的《太平御览》，无名氏的唐人集等，不在少数。尤以早期的碧云馆本《鹖冠子》对后来活字本影响为大。《鹖冠子》的版心上刊“宁”字，下刊“碧云馆活字本”六字，次叶刊“弘治年”三字，乾隆时，李质颖曾把它送到《四库全书》纂修馆去，引起

了清高宗弘历的注意，其《题武英殿聚珍版诗》自注云：“昨岁江南所进之书，有《鹞冠子》，即活字版，第字体不工，且多讹谬耳。”据说后来武英殿聚珍版，就是摹仿着《鹞冠子》的活字，加以改进而制作的。

名人手写的精刻本

以名人手写上版精雕的，洪武本《宋学士文粹》末有识语：“右翰林学士承旨潜溪宋先生《文粹》十卷，青田刘公伯温所选定者，济及弟洧约同门之士：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相与缮写成书，用纸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印工十人侵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云。洪武丁巳七月门人郑济谨记。”又《渊颖吴先生集》，有“金华后学宋璩誊写”一行。文林的《温州集》，是他的孙儿文徵明手写。方孝孺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宋璩为宋濂的儿子，以精于书法著名。文徵明更是书画大名家。这些刻本都不亚于前代苏轼、赵孟頫的写刻本。

木刻画的艺术成就

木刻画的技术，在唐末已经很高了，前面所提的唐咸通九年王玠刻的《金刚经》扉叶，是现存的实物。宋时木刻画用途更广，从宗教画发展到应用科学、考古学，如《证类本草》、《营造法式》、《宣和博古图》、《三礼图》，都有精美的插图。到了元代，范围更广，小说、戏曲，也有插图。发展至明代，就有徽州派木刻画的兴起，它的风格，不仅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了。万历时，南京唐家开的书籍铺，如世德堂、富春堂刻的小说戏曲和《列女传》插图，犹是建阳风格。而文林阁和陈家的继志斋，却是标准的徽州派。那时徽州黄、汪两姓刻工，尤可独步一时。黄璘、黄应泰刻《程氏墨苑》，黄应瑞刻《女范编》、《大雅堂杂剧》，黄应光刻《琵琶记》、《昆仑奴》、《元曲选》，黄一楷刻《北西厢》，黄一彬刻《青楼韵语》、《西厢五

剧》，黄应组刻《坐隐图卷》、《人镜阳秋》，都已达到了木刻画的高峰。汪忠信刻《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作风也和诸黄相近。此外《水浒传》、《金瓶梅》、《吴骚合编》的插图，虽成于众手，尤为精丽。那时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为木刻家创作了画稿，如丁云鹏画《列女传》和《程氏墨苑》、陈老莲画《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由于他们的合作，木刻画艺术更见异彩。谢肇淛《五杂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覃精聚神，穷极要妙，以天巧人工，为传奇耳目之玩。”这倒不是虚赞。郑振铎编印的版画集，可谓集其大成者。

彩色套印的发明

彩色套印术的兴起，也是明刻特点之一。元至元六年，中兴路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注和灵芝图用朱墨两色，已用套印术，但还不多见。明代天启、崇祯间，凌濛初、闵齐伋两家刻书，几乎全是朱墨或五色套印的了。凌、闵两家，都是浙江吴兴人。凌汝亨刻《管子》，凌濛初、瀛初刻《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闵齐伋刻《东坡易传》、《左传》，《老》、《庄》、《列》三子，《楚辞》，陶靖节、韦苏州、王右丞、孟浩然、韩昌黎、柳宗元诸家诗集，蜀赵崇祚《花间》词，闵昭明刻《新镌朱批武经七书》，都是墨印朱批，字颇流动。它如三色套印的，有《古诗归》、《唐诗归》，用朱笔的钟惺，蓝笔的谭元春。四色套印的，有凌瀛初刻《世说新语》，用蓝笔的刘辰翁，朱笔的王世贞，黄笔的刘应登。徽州的胡正言应用了当时流行的“短版”、“拱花”二法，编印了《十竹斋画谱》和《笺谱》二书，设色妍丽，刊版工致。所谓短版，是表现画的深浅浓淡。拱花，是和现在的凸版相似，印时用纸压在版面，花纹就一一叠现在纸上了。这种彩色套印，已不是一般书中的插图，而是画家临摹用的彩绘课本了。

精刻的产地苏州与徽州

有明一代的刻书，在初期洪武至弘治一段，犹不脱元刻风格，多用黑口，字体流丽疏落。中期正德、嘉靖一段，多用白口，字体渐趋方整。尤多依据宋本翻刻的，宋讳也缺笔，比较谨严。隆庆、万历以后，字体渐形呆版，刻书者好用私意删改古书。此是大概的情况，当然也有例外的。至刻书的地区，据胡应麟《经籍会通》：“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宋本称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陆深《金台纪闻》：“今杭绝无刻，国初，蜀尚有版，差胜建刻。今建益下，去永乐、宣德间又不逮矣。惟近日苏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观。”谢肇淛《五杂俎》：“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讎，故舛讹绝少。”是明刻的精本，多出于苏州、徽州两地，与宋、元时不同了。

明刻当与宋元刻等重

明去宋初约四百年，当时已非常重视宋刻本，今去明初已六百余年，那末，更应该对明刻本加以重视了。黄丕烈《明刊陈子昂集跋》：“往闻前辈论古书源流，谓明刻至嘉靖尚称善本，盖其时犹不敢作聪明以乱旧章也。余于宋、元刻本，讲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版尚有讲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睹。若明刻人不甚贵，及今不讲明而切究之，恐渐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这真是甘苦有得之言，往年我与邓邦述、吴梅纵言及之，他们意见一致，吴遂名所居曰百嘉室，邓名所居曰百靖室，盖仿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和陆心源的皕宋楼。把明本与宋本等视，是很有意义的。

第八节 清代版本的概述

康熙至乾隆内府刻书的盛况

清朝在康熙至乾隆时代，圣祖玄烨和高宗弘历，为了巩固他对汉族的统治权，采用某些文化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他们命词臣编纂了许多卷以百计的大部书籍，又大量地翻刻古书，因而在官刻版本来说，不但数量上远远地超过了宋、元、明三朝，而雕刻技术和印刷装潢也可首屈一指。

《清宫史》的书籍门，有详细的分类目，为实录、圣训、御制、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校刊、石刻，共十六类。《续宫史》增入圣制、御题、鉴藏、钦定、图像、图刻、图绘七类，而除去仪象、总集、目录、类书四类，定为十九类。就它的分类，即可知当时刻书的丰富了。今分别各种版本，简述如下：

宋字体和软字体

据《清会典》，当时刻书的写官所作字体有一定的格式：方体的称宋字；楷体的称软字。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雍正朱批谕旨》、《宗镜大纲》及《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则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经》、《全唐诗》、《全金诗》等，则用软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铸。又有袖珍本，弘历为了校铸经史的梨枣余材，不令遗弃，仿古巾箱的遗式，刻《四书》、《五经》、《史记》等十种，题曰《钦定古香斋袖珍版书》。它如《九通》等重要书籍，多不胜举。康熙时，徐乾学代纳兰成德校辑宋、元人的经学书一百三十九种，为《通志堂经解》。后来成德的父亲明珠失败了，弘历把这书版攫为己有，加上谕旨一道，对徐乾学、纳兰成德二人严加申

斥，命馆臣订正谬误，改题为《御定补刊通志堂经解》，这与他父亲胤禛的攫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同一手段。

铜活字和木活字

雍正四年，陈梦雷用新制的铜活字，排成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二十册。这是从来未有的大百科全书，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版印刷工作。后被世宗胤禛一道谕旨，攫为己有，这批活字也被没收到宫中去。又印了些《律吕正义》、《数理精蕴》等书。后来这批铜字渐被盗窃，乾隆初年又把它销毁了铸钱。弘历《题武英殿聚珍版诗》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藏工，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为非计。且使铜字尚存，则今之印书，不更事半功倍乎？深为惜之。”乾隆三十八年诏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为世所罕见的秘本，镌版通行。其时金简管武英殿刻书事，奏准以木活字排印，特著《聚珍版程式》一书，在印刷史上很有参考价值。聚珍的名称，是弘历因活字版的名不雅驯而更易的。聚珍版所印共一百三十八种，每种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首叶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每叶十八行，二十一字，是一部最好的丛书。

复宋元、套印、篆文、清文、图绘各种刻本

又复刻了宋元人的善本，如宋相台岳氏本《五经》，咸淳本朱子《周易本义》，淳祐本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元赵孟頫写刊本《道德宝章》等，都是校勘精严，雕镌古雅，已开了后来黄丕烈、顾广圻等刻书的风气。自明闵、凌两家发明了套印法，清代殿本更加以改进，用朱墨套印了《雍正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一百十二册外，又印了《协记辨方书》、《万年书》、《词谱》、《曲谱》等。并有用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诗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

命张照等摹刻小篆《六经》、《四书》，又刻了不少清文和清文汉文合璧的书籍。胤禛佞佛，刻了不少佛经。至如《皇舆全图》、《西清古鉴》等，图绘之精，尤为前所未有。

各种版本名称和特制纸料

这些精刻书籍，因清制书籍碑刻，均隶内务府，故世称内府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刻于武英殿，故称殿本。《全唐诗》由两淮盐政承办于扬州，故又称扬州诗局本。所用纸张，均为精选特制，白的名开花纸，一称桃花纸。黄的名太史连，一称红泥边。傅增湘说：“开花纸洁如白玉，太史连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装褙尤精。”它既综合了前代刻书的各种形式，吸收优点，加以发展改进，所以精妙独绝，在版本上放一异彩。

各省官书局刻本

外省官刻本，远不如宫廷所刻之多。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曾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侵木通行。其时承命开雕的，只有江宁刻八种，浙江刻三十八种，均改为袖珍式。江西刻五十四种，福建刻一百二十三种，均依原式。到了同治五年各省设立书局，始大量刻书。如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刻《史记》至《周书》，又《南》、《北史》十五史。淮南书局刻《隋书》。浙江书局刻《新》、《旧唐书》及《宋史》。湖北崇文书局刻《新》、《旧五代史》及《明史》。江苏书局刻《辽》、《金》、《元》三史。其中以金陵所刻为最好，《史记》附有张文虎的《札记》，淮南的《隋书》也附有薛寿的《考异》，大概当时准备每史都要这样做的，可惜没有成功，只是翻刻了汲古阁本和殿本，并没有重加整理。当时书局也为人才集中之处，金陵有张文虎、唐仁寿、戴望、刘恭冕、刘寿曾等。浙江有黄以周、李慈铭、张鸣珂等。浙江所刻的《二十二子》和《九通》、《续通鉴长编》等，都是善本。粤东书局重刻了《通志堂经解》，福建自道光至光

绪陆续增刻了聚珍版二十五种，合为一百四十八种。其中《春秋传说纂例》等十种，并非聚珍版原有而误入，后来广雅书局复刻福建本，并承其误。淮南书局虽所刻较少，而它把《毛诗注疏》和《三国志》的小字双行都改用了大字单行，行款爽朗，颇便于老年人的目力，据说是何绍基所创议的。《三国志》是用木活字排印，现在这两种书均不多见了。光绪时，张之洞为两广总督，设立广雅书局，所刻以史部为多，合为《史学丛书》，所据底本是未刊手稿或罕见传本，都极有价值。湖南的思贤讲舍，由王先谦主持，也刻了不少有用书，可惜都是单行，没有汇编。

清初私家精刻本

私家刻本，也随着官刻的发展而发展，一辈学者和藏书家，又起了鼓动的作用。无锡秦鏊刻的巾箱本《九经》白文，深为王士禛所赞叹。《分甘馀话》云：“近无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劖剔最精，点画不苟，闻其版已为大力者负之而趋。余曾见宋刻于倪检讨雁园灿许，与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吴郡张士俊复宋刻《广韵》、《玉篇》、《佩觿》、《字鉴》、《群经音辨》，称《泽存堂五种》，曾进呈御览；钱塘汪立名刻《汗简》、《新集古文四声韵》、《白香山诗长庆集》等，他们都受朱彝尊的影响。曹寅刻《集韵》和《楝亭藏书十二种》，为承办《全唐诗》时刻于扬州，故也称扬州诗局本。金檀刻《高青邱集》、《巽隐集》。马曰璐刻《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韩柳年谱》等。他们本是藏书名家。其单行则缪曰芑复宋刻《李太白集》，陈宏谋刻司马光《传家集》，其巨帙则《通志堂经解》外，如席启寓的《百家唐诗》等，均康、乾时名刻。槧印精良，初印本实不亚于殿本。

嘉庆道光两朝刻书的中心人物

嘉庆、道光两朝私人刻书，当以鲍廷博、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

四人为中心人物。他们总结了历代刻书的经验，又学问渊博，考订精严，耗一生精力来从事铅槧，不但掀起了刻书的高潮，校刻之精善也超越前人。

鲍廷博字以文，又字绿饮，安徽歙人，寄寓杭州。性嗜藏书，当四库馆采访遗书时，以家藏秘籍六百余种进呈。他对书籍的笃好，如饥渴者之于饮食。翁广平《鲍绿饮先生传》：“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叶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版口，即曰此某氏版，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卢文弨《征刻古今名人著作疏》：“吾友鲍君以文者，生而笃好书籍，于人世一切富贵利达之足以艳人者，举无所概于中，而惟文史是耽。所藏弃多善本，并有人间所未尽见者，进之秘省之外，复不私以为枕秘而欲公之，晨书暝写，句核字讎，乃始付之梓人氏，枣梨既精，剞劂亦良，以是毁其家不恤也。”这些记载，可以见其为人了。他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一百九十八种，二百四十册，许多几被湮没的文化遗产，赖他付刻得重见于世。

卢文弨字绍弓，抱经其堂号，人称抱经先生，余姚人。严元照《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先生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他本是校勘专家，所校正的书，都有校记，精确无误。取《经典释文》等若干种并自著刻为《抱经堂丛书》，其余则无力尽刻，乃汇集三十八种的校语为《群书拾补初编》，其未收的还是很多，后人多有传录本。

黄丕烈字尧圃，吴县人。吴中大藏书家，所居曰百宋一廛，所藏皆宋本的精品，顾广圻为之赋。王芑孙《陶陶室记》：“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尧圃者也。尧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敞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尧圃亦时自笑也，故

尝自号佞宋主人云。”这段描写，很能形容堯圃对古书的嗜好。他把最好的版本如《国语》、《战国策》等，为之照样复刻，并附《札记》，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有钱大昕等助其鉴定，顾广圻等助其校订。故《士礼居丛书》几与宋、元本等价。他的版本学著述，我辑有《堯圃书跋合编》。

顾广圻字千里，以字行，号涧菴，又号思适居士，元和人。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居士喜校书，皆有依据，绝无凿空，其持论谓凡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深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语，以之自号云。”他提出了不校校之的口号，在校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详下章谈校勘节。因为出身寒士，自己无力刻书，就帮助当时的藏书而好古者校刻了许多古书，不自署名，赖馆谷以维持生活。为孙星衍刻《说文解字》、《古文苑》、《尚书考异》、《唐律疏义》、《宋元检验三录》、《广黄帝本行记》、《轩辕黄帝传》，为张敦仁刻《礼记》、《仪礼注疏》、《盐铁论》，为黄丕烈刻《国语》、《国策》、《焦氏易林》，为胡克家刻《文选》、《资治通鉴》，为秦恩复刻《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奉天录》、《词学丛书》，为吴鼐刻《韩非子》、《晏子春秋》，为汪士钟刻《仪礼疏》、《鸡峰普济方》，为廖寅刻《华阳国志》，为沈恕刻《绍熙云间志》，为洪莹刻《名臣言行录》，为从兄之逵刻《列女传》。自刻只复吴元恭本《尔雅》一种。以上各种，大都据宋、元善本精摹复刻，而各附考异于后，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出于诸家所刻之上。

以上四家所刻书，鲍廷博、卢文弨均用宋字，综合多种材料。黄丕烈、顾广圻均用影仿宋元旧本。后来刻书的风气，不出乎综合和影仿两派。叶昌炽曾称他们所刻书为清朝宋版，以体现它的价值，并不是偶然的。

名人手写精刻本

康乾时的精刻本，有出自名手所写的，如张弼为顾炎武写《音学五

书》，倪霁为薛熙写《明文在》，林佶为王士禛写《渔洋精华录》、为汪琬写《尧峰文钞》、为陈廷敬写《午亭文编》，张敏求为朱彝尊写《曝书亭集》，王鸿仪为王士禛写《带经堂诗续集》，均极写刻之精妙。其时软体字本，虽不具名，也多出于名手。徐乾学《读礼通考》和秦蕙田《五礼通考》，巍然巨帙，其初印本，叶昌炽谓：“纸白如玉，墨光如漆，字体仿欧阳信本，须眉毕现，奕奕有神。阅之心开目明，令人不忍触手，真书中尤物也，索千金不为奢。”（《缘督庐日记》十六）这评价非常允当。后来有江声以小篆写《尚书集注音疏》、《释名疏证》，金农以隶体写《冬心先生诗》，郑燮以行书写《板桥集》，张敦仁以草体写《通鉴补识误》，尤别树一帜。其它楷书精品，余集写《志雅堂杂钞》、《续夷坚志》、《庚子消夏记》、《百衲琴》，许槌写《字鉴》、《六朝文絮》，顾莛写《补元史艺文志》，初刻初印，都可以方驾宋元。

年羹尧与和珅所刻书

当时声势烜赫的官僚，也有刻书以附庸风雅的，年羹尧刻《陆宣公奏议》，用软体字，所据非出善本。和珅刻《礼记注疏》，号称覆宋，实据书估伪本。故刻印虽精，只好当骨董，不为学者所尚。

名刻本的缺点

又有出自名家，向称精刻，而按其内容，实多舛讹的。如宋萃于康熙己卯所刻《施注苏诗》，出邵长蘅手，以宋刻原本校之，则割裂补缀，多半杜撰。缪荃孙《艺风堂再续藏书记》残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与康熙己卯宋漫堂刻本核对，方知刻本之谬。宋原本缺序目、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共十卷外，余注无不增删，有旧有注而今无者，有旧有注而今易之者，有旧注短而引申之者，有改易书名者，几无一完篇，仍是明代刻书之故态，逊黄堯圃、胡果泉多矣。”又

如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淮南子》，出钱坵手，云据《道藏》本，今以《道藏》本校之，自行款以至内容，全不符合。王念孙《淮南子杂志序》：“近日武进庄氏所刊《道藏》，实非其旧。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从各本。其《藏》本与各本同误者，一概未能厘正。更有未晓文义而辄行删改及妄生异说者。窃恐学者误以为《藏》本而从之，则新刻行而旧本愈微，故不得不辩。”卢文弨《校本淮南子跋》：“借《道藏》本校，知所有古字，皆出钱君所改。”顾广圻《校本淮南子跋》：“此淮南王书武进刊本，校则嘉定钱坵献之也。钱实未见《道藏》，所见校《道藏》本耳，故其称说，全无一是。”所以评定版本的优劣，不可只凭耳食，也不可过信古人，必须亲自动手，从实践中得出结论，才是可靠的。

丛书的发展和特色

自鲍、卢、黄、顾提倡刻书，一时响应者蜂起，尤以丛书为一大特色。丛书虽始于宋俞鼎孙《儒学警悟》，明人继之，其佳者不过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胡维新《两京遗编》、沈节甫《纪录汇编》、程荣《汉魏丛书》、吴琯《古今逸史》等若干种。至清代遂称盛极。其与鲍、卢、黄、顾并时的，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出惠栋手。吴騫《拜经楼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出江声、孙星衍、钱坵手。孙星衍《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多出顾广圻手。顾修《读画斋丛书》，出鲍廷博手。不下数十种。其后，综合派以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和伍崇耀《粤雅堂丛书》为最佳，钱刻出张文虎手，伍刻出谭莹手。影仿派以蒋凤藻《铁华馆丛书》和黎庶昌《古逸丛书》为最佳，蒋刻出叶昌炽手，黎刻出杨守敬手。其它专门学科，经类有阮元《学海堂经解》、王先谦《南菁书院经解》、钱仪吉《经苑》。词类有朱祖谋《彊村丛书》。辑佚类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郡邑类有王灏《畿辅丛书》、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一姓所著书有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

陈寿祺、陈乔枏《侯官陈氏遗书》。一人所著书有顾炎武《顾亭林先生遗书》、王夫之《船山遗书》。这类丛书日出不穷，为编目录的，自顾修《汇刻书目》以后，不下数十家，近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所收近三千种之多，而清代实居大半，可谓洋洋大观了。

有名的刻工和写者

宋刻间有刻工和缮写者姓名，相沿成例，清刻本也如此。嘉道时精刻，多出江宁刘文奎、文模兄弟，卷末往往有款识。顾广圻经办的影宋刻本，写者为许翰屏，见徐晋《前尘梦影录》。《铁华馆丛书》写者为金缉甫，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原书末均不具名，非经徐氏、叶氏提出，已无人知晓了。

双钩本的技术

又有一种双钩本，乃施之于旧拓碑版。昔人于旧拓孤本，往往精心钩摹，加以填廓，谓之响拓。后来进而雕于版，凡剥蚀残缺，一丝不苟，而仍须保持旧拓的神韵。故工人必具有高度的技术，黄易的小蓬莱阁、徐渭仁的随轩、许槌的古均阁、吴云的两鬯轩、杨守敬的飞青阁，都有刻本。现在发明了珂罗版影印，无须再用摹刻，这种双钩本，仅留作版本艺术的遗物。

刻书用古体字的流弊

明嘉靖时，许宗鲁曾创始把《说文》字体写作正楷，刻成《国语韦昭注》和《吕氏春秋》两种。同时陆钺也效之刻《吕氏家塾读书记》。此等书在表面上看来，好像非常古雅，其实由于明人不通六书之学，其中错误很多，是不可据信的。清嘉庆十八年，庞佑清刻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也是用楷写篆体，雕印都很精致。邵瑛《说文群经正字》、严可均《唐石经校文》、黄以周《礼书通故》，都是这样，他们深通许学，非明人之比；又其书本是研究经学文字的专著，和普通书不同，所

以在版本上有相当的价值。可是有好奇之人，用这种字体来刻一般普通书，如范锴的《汉口丛谈》、《浔溪纪事诗》、《花笑顾杂笔》，令读者但觉杈丫满纸，瞠目结舌。

清末刻书的盛况与提倡者

光绪元年，缪荃孙协助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末附《劝刻书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加精雕。（原注：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张之洞这一提倡，影响很大，清末刻书者纷起，少则一二种，多则数十百种。单经缪荃孙主持的，就有武进盛宣怀的《常州先哲遗书》，贵池刘世珩的《聚学轩丛书》，乌程张钧衡的《适园丛书》，吴兴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的一部分，以及自刻的《云自在龕丛书》等大部书，在取材、校勘方面，都极审慎，可称善本。缪荃孙是清末承继鲍、卢、黄、顾之遗绪的一位大家。

第九节 已有雕版后的钞本

科学研究应重视手钞

自有雕版代替了手写，文化的传播更加迅速、广泛，但并不是说，钞本便从此失去了它的价值。苏轼《李氏山房记》：“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风》、《雅》、《颂》；而楚独有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

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对于这个问题，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我少时犹见老辈学者们，多好手钞经史等书，盖书凡经过手钞，便字字入神。又见有插架充栋，陈设井井，而从不触手，徒供装饰的。苏轼、叶梦得之言，确有相当道理。可见有了刻本，还是需要钞写，这是从治学方面来说。

旧钞本的优点

从版本方面来说，钞本有不少优点，例如刻本所据非足本，或经后人删节，而钞本却是完整的；刻本所据多舛误，而钞本却源出于古本的；刻本所据为初稿，而钞本却是定稿的；又有钞本出于名人之手，当与法书名画等视的；又有从未刻过，已将失传的。所以陈继儒《太平清话》这样说：“钞本书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断珪残璧。”但是这类钞本，先要加以审定，如时代、传授、收藏等问题，不是凡属钞本都是好的。

古人多好钞书

苏轼既主张手钞，相传他曾手钞过不少大部书，年代久远，都已失

传，只有上面提到的《陶渊明集》，犹是据他手钞付刻的。元赵孟頫也手钞了《两汉策要》和其它单篇文字，张丑《清河书画舫》著录的就有十余种之多。这种风气，直到明清，还是相继不绝。可见虽有了刻本，手钞本还是应该重视的。

明代的大钞本《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时，制成了一部卷帙繁富、空前未有的大钞本《永乐大典》。《明实录》：“永乐元年七月，谕翰林侍读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是朱棣指示编辑《永乐大典》的方法和内容。明年十二月，完书进呈，赐名《文献大成》。这样浩繁的大书，只有一年多就完成，当然是草率的，所以朱棣也不能满意，认为必须重修，改命姚广孝、刘季篾、解缙三人为总监修，至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参与其事的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之多，成书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并钞成正副两部，正本藏在文渊阁，副本藏在皇史宬。永乐十九年移都北京，此书也移藏于北京的文楼。嘉靖间，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幸未被毁。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钞正副两部，命高拱、张居正校理，至隆庆初告成，历时六七年。明亡，原本并毁。至清乾隆时，其重钞残本尚存翰林院敬一亭中，庚子之役，始尽毁灭散失，又多被英、美、日所掠夺。现在中华书局已把现存之卷全部影印。这部文献上的巨大著作，才得重见于世。

《永乐大典》嘉靖重录本，每册高二尺，广尺二寸。每叶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朱丝栏，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每卷末有重录总校官、分校官、书写生员、圈点监生衔名六行。硬面宣纸，用

黄绢连脑包裹。卷末空白副叶两张，均被裁去大半叶以为他用。傅增湘曾影印《宪台通纪》一册，中华书局也选印乌字一册，均保留了原来的形式。

《永乐大典》的优点，第一，在它保存了许多现在已经失传的有价值的古书。朱棣本是一个好修文事的统治者，当时内阁的藏书丰富，很多为人间未见的，都被收入其中。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朱筠建议把《大典》中失传的古书，开局搜辑。已辑出的，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凡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它私人辑出而可考的，有徐松的《宋会要》五百卷、《宋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政和五礼新仪》若干卷、《秘书省续到缺书》二卷、《河南志》四卷、胡敬的《大元海运记》一卷、施谔《临安志》十六卷、孙尔准的《仇远山村词》、缪荃孙的《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泸州志》等。没有辑出的材料还是很多，真是无尽的宝藏。第二，它突破传统的拘迂看法，收入了一些戏文作品，为研究戏曲史的重要材料。一九二〇年叶恭绰在英国伦敦小古玩铺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小孙屠》等戏文三种，一九三一年把原本影印，又收入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第一种。缺点是，用《洪武正韵》为纲，把所有的古书都拆散分隶于每韵之下，体例又很不一致，显得割裂庞杂，漫无条理。

元明两代的名钞本

元、明两代以钞书著名，而其本为藏书家所重视的，如至正时的孙道明。孙字明叔，华亭人。他本是市井人，而惟以钞书为乐，所钞不下数千卷。正德时的柳奂，字大中，吴人。他手钞之书，往往附以小诗。嘉靖时的钱穀，字叔宝，吴人。文徵明的弟子，书法得其师传，精妙绝伦。姚咨，字舜咨，无锡人。所钞多僻冷失传之本，版口有茶梦斋三字。这辈都是耽幽乐隐，不嗜荣利的高尚之士，他们嗜书出自天性，不求后世之知，而后人得其手迹，往往与宋、元版等视而珍藏。

其它名钞，如吴宽的丛书堂，叶盛的赐书楼，文徵明的玉兰堂，王宇泰的郁冈斋，沈与文的野竹斋，杨仪的七桧山房，秦四麟的致爽阁，祁承焯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谢肇淛的小草斋，钱曾的述古堂以及冯舒兄弟，他们都是大藏书家，所钞都从善本或孤本，又校勘精细。版口或边栏刻有斋堂名，善鉴的可一望而知。

毛氏汲古阁的影宋钞本

明钞本中突出的是毛晋汲古阁的影宋钞本。什么是影宋钞本？它是把白纸影在宋刻本上，逐字逐笔的细心描写，务求与底本无丝毫之异，确是一种精心细致的作品。孙庆增《藏书纪要》：“汲古阁影宋精钞，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所钞甚少。”惟其这样的精致，所以不可能多的。又多属小种，大部书绝少。流传之本，经影印后，其精美有时还胜过宋刻。当时有人赠毛晋诗云：“人门僮仆尽钞书。”可见他对于钞书的热心。在今天既有照相影印的发明，自然没有人再作影钞了，但这种影宋钞本，在艺术上仍有较高的价值。

清代的大钞本《四库全书》

清高宗弘历时，又制成了一部胜过《永乐大典》几于两倍的大钞本《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任皇室郡王及大学士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然实际上任编纂的，只有总纂官纪昀、孙士毅、陆锡熊三人，而纪昀之力尤多。其他参与其事的，都是有名学者，如总目协修官有程晋芳、任大椿等。校勘《四库全书》纂修兼分校官有邵晋涵、周永年、戴震等。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有姚鼐、翁方纲等。缮书处分校官有金榜、孙希旦、赵怀玉等。篆隶分校官有王念孙等。主持人经部为戴震，史部为邵晋涵，子部为周永年。每种前冠提要一篇，对学术源流、内容大概加以说明。至乾隆四十七年全书告成。总计存书(指收入《四库全书》的)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

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库全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共钞成七份，每份装订三万六千册，册面经部用青绢，史部用赤绢，子部用白绢，集部用黑绢，分象春夏秋冬四时之色，共六千七百五十二函。这七份分藏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的称为内廷四阁，又省称北四阁。其它三份，一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一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称为江浙三阁，又简称南三阁。总称为七阁。北四阁本，用开花榜纸，南三阁则否。北阁本较南阁本稍宽大。乌丝栏，后具校写官名衔，与《永乐大典》同。商务印书馆曾选印了四种，完全照原书形式。

现在所存的四部：文渊阁本存台湾。文溯阁的由奉天移藏北京故宫图书馆。文津阁的由热河移藏北京图书馆。文澜阁的由丁丙补全，今仍藏杭州浙江图书馆。其余均毁于兵火。商务印书馆曾从其中选出内容佳而传本少的若干种，影印为《四库全书珍本》。

《四库全书》的优缺点

《四库全书》的优点是每书都作了一篇提要，把内容介绍给读者。尽管还存在着很多错误，后经胡玉缙、余嘉锡驳正，然大体上还是比较完善的空前的著作。缺点是：弘历的编纂这部书，是别有用心的。清军入关之后，士民们排满情绪非常激烈。弘历利用修书来缓和这种矛盾，使他们耗精弊神于书本中，一面又借求书之名，行焚书之实，因有排满思想而被禁毁的，据英廉的奏称：“共看出应行销毁的一百四十四部，应酌量抽毁的一百八十一部。”姚觐元刻《清代禁毁书目》跋称：所见吴文昇藏本，“约略计之，除馆本外，尚千有余种”。又四倍之。可见弘历摧残文化的罪状。

清代的名钞本

清代有名的钞本，更多不胜举，例如曹溶钞本，版心有携李曹氏倦

圃藏书八字。徐乾学钞本，版心有传是楼三字。惠栋钞本，栅栏外有红豆斋藏书钞本七字。赵昱钞本，栅栏外有小山堂钞本五字。吴焯钞本，版心有绣谷亭三字。金檀钞本，版心有文瑞楼三字。王宗炎钞本，栅栏外有十万卷楼钞本六字。朱彝尊、鲍廷博、吴騫、汪远孙四家钞本，皆用毛泰纸，无栅栏。大抵辨别这些钞本，必须熟悉藏书家的掌故，又须多见多闻，从实践中来。不是简单地可以明了的。

第十节 鉴别版本的方法

鉴别当凭实践

鉴别版本的方法，主要得多实践，积累经验，常有老书贾的见识，要比一般读书人高明得多，就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有的更由书的表面而进一步认识到内容，如嘉道时的书贾钱听默、陶正祥辈，颇为收藏家们所佩服。

叶盛屠隆论鉴别宋版

前人指出宋版书特点，以供赏鉴家参考的，如叶盛《水东日记》：“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则刻工私记本版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以及字总数，余所见当时印本如此。浦宗源家有司马公《传家集》，行款皆然，又洁白厚纸所印，乃知古于书籍，不惟雕镂不苟，虽摹印亦不苟也。”这是说宋刻书多白口（其款式已见前章），更及用纸之佳。案宋本书所用纸，如屠隆《考槃馀事》：“王弇州藏宋版《汉书》，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世不多见。其次则为椒纸，《天禄琳琅书目·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后有木记云：“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取其可免蠹鱼的损伤。一般用纸，则如陈继儒《妮古录》所说，“宋纸于明望之，无帘痕”者为多。又有用旧纸的，背面为官府文牒或私人尺牍，更可提供历史考据材料。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有传视宋刻者，其文钩画如绣，手摸之若洼隆然。”这是用墨和印刷之佳，都是宋刻的上品。

屠隆《考槃馀事》有论宋版一则，最为详尽：“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未经后人重刻，惜不多见。佛氏医家二类更富，然医方一字差讹，其害非轻，故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经燥无涇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元刻仿宋单边，字画不分粗细，较宋边条阔多一线，纸松刻硬，用墨秽浊，中无讳字，开卷了无臭味。有种官券残纸背印，更恶。宋版书以活衬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而遗存不广。若糊背宋书，则不佳矣。余见宋刻大版《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真不可得。又若宋版遗在元印，或元补欠缺，时人执为宋刻。元版遗在国初补欠，人亦执为元刻。然而以元补宋，其去犹未易辨。以国初补元，内有单边双边之异，且字刻迥然别矣。”

孙庆增论鉴别方法

孙庆增《藏书纪要》：“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徒为有识者所笑，甚无谓也。如某书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钞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于南北朝何时何地，（《藕香零拾》本加注云：案此云南北朝，当指宋、金、元之间，下同。）如何为宋元精旧钞本，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再于各家收藏书目、历朝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敏求记》、《经籍考》、府州县志书内志书、文苑志、书籍志、二十一史经籍志、名人诗文集书序跋文内查考明白，然后四方之善本秘本，或可致也。”眼力精熟，须具丰富的经验；考究确切，又要精细的校勘；查考明白，更离不了目录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赏鉴，而迥不同于骨董和玩物。从前要具备这些条件比较困难，因为私人藏书，不容易看到。现在所有传世的善本，已有十之七八归之

图书馆，随时可去找寻；加以出版事业的进步和发达，不少孤本秘籍，已经或准备在陆续依照原式影印出来；又有集合了各种宋元版选印样张的书影，便于广大读者查考鉴别。

书贾作伪手段

《考槃馀事》又云：“若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版书，特钞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牌鹿纸，筒卷，用椎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字，留空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人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蛊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这段记载，不但论鉴别宋刻的方法，并及元明刻及用纸，尤其于书贾作伪欺人的伎俩，尽情地揭露，读书者加以注意。

郭麐《灵芬馆诗话》，又有补充屠隆所未及：“近时贵宋版书，于是作伪滋多，有以明人及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作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刊年号以实之。而鉴别收藏家，争考偏旁字画，断断如也。”这些确是事实。以明清仿宋精刻染色欺人的，如明袁褰的《文选》，赵灵均的《玉台新咏》，清阮元的《列女传》，去其刻书序跋和牌子，前人受欺误为宋刻者，不止一二人。又如叶德辉刻复宋本《南岳总胜集》，贾人染色改装，以缪荃孙这样的大赏鉴家，也竟误认为真宋版，一时传为笑柄。其伪刊年号以实之者，如乾隆时内府所刻《四书章句集注》，称为复刻宋淳祐本，因为朱熹序后的牌子有云：“于是补其残缺，置诸泳泽书院，嘉与学者共

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识。”后来孙家鼐重刻，当然毫不怀疑。至陶湘得见据刻的原本，始知“学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写痕迹。其实泳泽书院始建于元代，宋朝何来此书院。淳祐二字为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书影中明显可据，当时不加考订，疏于鉴别，遂被书贾所欺。类此的很多，应该特别注意的。

蒋光煦《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跋》：“旧刻旧钞本之中，荇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画以就讳，刊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铲它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覆变幻，殆不可枚举。”可知这种鬼蜮伎俩，自明至今，都是有的。只为有利可图，便钩心斗角以为之，其实只可以欺视古书为骨董，以代价的高昂来表示他的豪富，而绝不一究内容之徒。倘是真能读书的，一经校勘，其伪立见。所以谈赏鉴，一定要把校勘作根据，决不能只讲表面而不重内容。

选择善本的指导

旧刻旧钞，究是不可常遇之物，为切合我们的实用，倒是在普通版本而容易购得的为首要。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有“读书宜求善本”一条，他这样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又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他指出的本朝刻本，就是鲍、卢、黄、顾们所刻的号称清朝宋版的这类书。密行细字的固多佳本，就是疏行大字的也有佳本，这倒不必在形式上过于拘泥。不过鲍、卢、黄、顾所刻的原本，现在也是希见可贵，不是人人可得，好在清末各书局和私人翻刻的很多，又近数十年来把原本影印的也不少。

为了实用而购书，指导我们鉴别方法的，有张之洞的《书目答

问》。它在每种书名下，注明了各种通行的精确可靠的版本，确是给初学以入门指导。听说北方有名的大书店，他们教授学徒，就把这本书作为课本。不过书囊是无底的，张之洞所没有见到和后来继续刻印的，这就要后人替他不断地补充了。叶德辉曾做过这项工作，在原书上密行细字，几如蚊子，可惜没有发表。已有刻本的，有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至于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和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凭他们目睹的版本，随时记在《四库简明目录》的眉端，积累了数十年，就完成了一种著作，而给后人研究版本以很大的帮助。有志于版本这门学科者，倒大可学习他们的办法。

第四章

校 讎

第一节 校讎的起源

校讎字义的解释

《说文》校训木母(母字或误为田，今本作囚，并非)，本是横木的名称，与校讎的意义并无关涉。校讎的校，它的本字，应该作推。侓、交二字，在音韵上又是同部，故可以通假，所以，校是推的假字，而其意义为敲击。《说文》：“推，敲击也。”校讎这个名词，是汉刘向创造的。李善《文选·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这说明讎字的意义，是要具有非常严肃的态度。《太平御览》六百十八所引同，但“一人读书”作“一人读析”，那就更加明白了。至于讎校倒称校讎，并无不同的意义，不过是相沿的习惯罢了。

校讎又称校勘

勘字见《说文新附》，云“校也”。《广韵》五十三勘同。《玉

篇》：“勘，苦紺切。覆定也。”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勘，古亦作刊。古书用竹简，故校勘字作刊。《广雅》刊训定，《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义并与勘合。”据此，刊有削和除两义，故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把竹简上的错误，用刀来削除改正，然后才成定本，故《风俗通义》又云：“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所以刊又有定义。后世习于刊削之义，因之校刊不同于校勘，校刊之刊指刻书言，校勘之勘指定书言。又有人把校雠与校勘加以区别，说校雠的任务大，范围广。其实校勘不过是正文字罢了。这个界义，是不必要的。

最早的校雠家正考父

《国语·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玄《商颂谱》同，孔颖达《正义》：“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史校之也。”可知现在《商颂》各篇的次序，是经正考父从周太史的本子校定的。正考父为周宣王时的宋大夫，孔子的七世祖。他是校勘事业的发端者。传到了孔子，凡六艺都经他勘定。王充《论衡·效力》篇：“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诂上》：“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矣。”凡是作、录、删，总的说来，都可包括在校勘的范围以内。

孔子校书的阙疑之法

孔子对于古书的残缺，倘没有确信的证据，宁可保留原状，决不凭私意窜改。可是当时人已好用私意窜改，至使古书失去真相，所以他慨叹地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篇）包咸注：“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有马不能调良，则借人乘习之。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凿。”（《耆旧续闻》：“有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阙文。后人见此语颇无谓，遂从而削之。故圣人叹曰：今亡矣夫。盖叹此句之不存也。”案宋刘元城创为此说，录备参考。）这是孔子校书的正确态度。《汉书·艺文志》：“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寢不正。”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诡更正文，响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耀于世。”和班固所言衰世之弊是相同的。

孔子校书的反对穿凿，可在他所修的《春秋》中得到证据。桓公十四年经：“夏五。”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耳。”孔广森《公羊通义》：“本当言夏五月干枝，郑伯使其弟语来盟，简札烂灭，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无信，故进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旧文，无所增损，亦因以示史阙疑之法。”《春秋》之例，凡是桓公之盟，皆有日子以著其无信，而这里的日子已经烂灭不存，当然不能杜撰一个日子补入。那末，据它处的书法，五字下应该有月字，或者去掉五字而只留夏字，孔子为什么不这样修改呢？为要表示历史应该有阙疑之法，所以仍只留“夏五”残文。又庄公二十四年经“郭公”杜预注：“盖经阙误也。”洪亮吉《左传诂》：“虢、郭音近义通，此郭公即虢公。虢公下必系以事，而史阙之。”这单是郭公二字，没有上下文，显然是有阙误。洪亮吉虽考得郭公即虢公，但下面究竟是什么事情，虽举了些猜测的话，仍不敢悬断。孔子修《春秋》，宁保留这阙文，以存真相，至《公羊》、《穀梁》两传，就把上文赤归于曹一条和郭公连文，而说郭公名赤，失国而归于曹（《左传正义》）。然为什么郭公倒置赤下，《公羊传》虽有他的解释，而杜预终认为“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由于《公羊》授读有异，不可强而为一的。

关于阙文和穿凿的举例

关于阙文的穿凿，可以据例来说明。王应奎《柳南随笔》：“《周



武王几铭》：皇皇惟敬，□□生垢，□戕□。《诗归》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周元亮亮工、钱尔弢陆灿两先生俱辨其谬，以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盖阙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近余见宋版《大戴礼》，乃秦景暘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则周、钱二公之言殆非也。”《周武王几铭》载在《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诗归》为明钟惺、谭元春所评选。四个口形，钟、谭认为是口字，据以评这首诗用字之妙；周、钱则认为本作□形，是相传阙文，并不是口字；王应奎又据秦景暘藏的宋版来证明周、钱的错误。它的是非，究竟怎样呢？应该作更细致的推究。刻本书的阙文，例作□形的方空圈，然而它和口字很容易相混，有的□误为口，也有口误为□。这首铭的文义古奥，倘是口字，确有些不很顺利，周、钱的认为阙文，也有相当理由。钟、谭是文学家，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是口字，而且这口字用得非常之妙。明人虽好窜改古书，也不能不问情由，硬加在他们头上。王应奎所据是宋版，宋版本来不是完全正确的，何况□之与口，凡是刻版多容易互混。他们似乎都没有仔细看过北周时卢辩的《大戴礼注》。卢辩注云：“听，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云：“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据卢辩的注，明明是口字而不是阙文，钟、谭并没有错，即便有错，也是卢辩的错，而周、钱却硬加在钟、谭头上。王应奎只看见宋刻作口，而没有看见下面的注，不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也是读书的疏忽。不过铭的是几，而内容却强调了口，好像没有多大联系，虽则卢注补充了说：“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这句话兜了一个圈子，究竟是不是正确？还有研究的余地。倘使这□形真是阙文而不是口字，那末，穿凿的应该是卢辩。在没有北周以前写本发现，没有可信的证据时，宁可保留它的原状。《诗归》第二句“□口生垢”，传世各本都作“口生垢”，钟、谭误加了一个口，所以误作了“四口字叠出”的评语，这倒是需要指出的错误。

孔子校书的方法

孔子校勘古书非常谨严。《春秋》昭公十二年经：“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休《解诂》：“子谓孔子。乃，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案《春秋》经例，这一条应该作“齐高偃帅师纳北燕公子阳生于某地”。孔子所见的鲁《春秋》，“公子阳生于某地”只残存了“伯于阳”三字，无法解释。昭公十二年，正当孔子二十三岁，具知其事，因而他知晓“伯于阳”三字的错误而说“我乃知之矣”。他知晓怎样的错误呢？何休替他作了解释。“公误为伯”，因为周代五等之爵为公、侯、伯、子、男，公和伯都是爵称，在概念中容易含混，于是公就误作伯了。“子误为于”，则因两字形体相似而误。阳字没有问题。从生字以下，则因竹简上被刊灭而遂致有阙文了。这“伯于阳”三个字，同时显示了古书所以致误的不同原因。《公羊传》其下又云：“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何休《解诂》：“如，犹奈也。犹曰奈女所不知何？宁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亿错。”旧疏：“孔子云：当是岁时，我已年立，具见其事，奈汝在侧之徒不见之何？孔子虽知‘伯于阳’者是公子阳生，但在侧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谓已苟出心肺，故曰，宁可强更之乎？”说明孔子虽明知其误，只能以口说传之，而决不轻加改易。孔子的用意，在于替后人立法，不要拿自己的拟度来随便措置，这是对待古书正确的态度。乾、嘉时人覆刻宋本，虽明知其误，也不改易，但下注校勘语，或别附札记，是得之于孔子校书的方法。

子夏校书的事例

孔门弟子，能传校勘之学的，当推子夏。子夏姓卜，名商，卫人。《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史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

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豕能涉河，既不合情理，而史家特为记上历史，更属无谓；况和晋师二字怎样联在一起呢？可是穿凿附会之徒，尽可说《春秋》有记异之例，如六鹤退飞，为什么不能三豕涉河呢？又可说汉朝颂扬地方官的治绩，说虎为渡河，为什么豕不可涉河呢？而子夏则从字形求之，知“三豕”为“己亥”之误。己亥是记晋师渡河之日，为史家载笔的通例。后来到晋国去访诸史载，果是己亥二字，可证实子夏所见的正确。古来文字因形近而致误的，是普遍的事情；校书的必各据当时通行的或后来演变的字体来推求。子夏时通行的是古文，己的古文作己，只要中间的两短竖稍为漫灭，便成为三字了。《说文·豕部》豕的古文作, 《亥部》亥的古文作, 两字的古文形甚相似，那末亥误为豕，又是很自然的。子夏这一校书方法，我们应该奉为准绳。

第二节 校雠学的重要

校雠须戒望文生义须通古今语言

言校雠学的重要，没有比阮元序王引之《经义述闻》的话再确切的了。他说：“昔郢人遗燕相书，夜书曰举烛，因而过书举烛。燕相受书，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也。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误会举烛之义，幸而治。误解鼠璞则大谬。由是言之，凡误解古书者，皆举烛鼠璞之类也。”这两个引喻说明，要正确地阅读古籍，切戒望文生义，须熟悉古今语言。第一个引喻，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相把举烛两字，细细研究，可以说煞费苦心了，得出了尚明和举贤的结论，燕国因而大治。这是望文生义，虽则结果很好，但完全不是郢人的本意。第二个引喻，见《庄子·天下》篇《释文》，同一个璞字，而郑人和周人有绝对不同的解释，以至闹成买玉得鼠的笑话，何况古今殊异的不同语言呢？倘是不

通训诂而随便把今语解释古语，一定会发生误会。研究古书，必需正确认识作者的本意，而校正文字，使无错误，尤为根本问题。

校讎须戒爱奇和无识

古书之有误字，它的原因，一是无意的，一是有意的。无意的误，尚可谅解，有意的误，也有两种原因：一是爱奇，一是无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别风注雨，今《尚书大传》作别风淮雨。”刘勰曰：“《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曰：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诰，已用淮雨，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这里引《尚书大传》别风淮雨，以《帝王世纪》校之，明明是列风淫雨之误。然而傅毅的文章，范曄的《后汉书》，都宁可用别风淮雨，他们并非不知道别淮是误字，但出于爱奇之心，遂不顾文义之安，至使传误至今。刘宾客《嘉话录》、李焘《尚书故实》皆云：“韩昶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案秦汉之制，乘舆饰以黄金，谓之金根车，《汉书》中常常可见的，世间哪里有金银车呢？韩昶的思想中，只知有金银，便悍然改根为银，这样的校书，宜乎被人所讥笑了。韩昶为古文大家韩愈的儿子，幼时为孟东野所嘉奖，并非不学无术之徒，尚且闹这笑话，不能不说他是无识。世间号称读书人的，不乏这样的爱奇和无识者，所以古书中的错误便相当多了。

宋版有不可尽信

张昞《云谷杂记》：“东坡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都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误谬，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北宋时已有以意改书的人，苏轼并举出《庄子》乃疑于神的疑字，当时通行的版本已擅改

作凝了。《云谷杂记》又云：“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为严州，今所刊《元丰九域志》乃径易睦州为严州。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学，皆由此也。”张昞是南宋人，这时刻书的好擅改，比苏轼时更多了。元丰为宋神宗年号，比徽宗的宣和要早三四十年，书名《元丰九域志》，怎么会有三四十年以后所改的严州呢？这因刻书在宣和以后，那时人只知有严州，而不知以前是名睦州，反以为睦州是误而就改作严州了。戴震云：“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年谱》）昔人对于宋版书的嗜好，钱曾《述古堂藏书自序》云：“生平所嗜宋槧本为最。冯定远每戏余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不能已于佞也。”后来黄丕烈和他有同嗜，因自号佞宋主人。宋版书经他们的提倡，遂有以为宋版必定正确而无误，而不知并不这样。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司马温公贻刘道原简云：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又校得绝不精，只如沈约《叙传》，差却数版亦不寤，其他可知也。温公之言如此，今世率矜言宋槧，观此当亦爽然自失。”北宋官刻精校的书，尚且如此，何况私刻和坊刻呢？所以过信宋版是不对的。陆贻典校《管子》跋：“古今书籍，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姑从其旧也。”这才是对宋版书的正确看法。推而至于古写旧钞，都是这样，校书者不可不知。

明版多出擅改

明人刻书好删改，尤其是嘉靖以后。可举陈禹谟刻的《北堂书钞》为例。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旧钞本北堂书钞》：“此本系永兴原本，未经陈氏增删窜乱者，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册，卷一百三十九《车总裁》篇，俱系大字无注，与全书异，陈氏改从一律，立题分注，遂使原本面目不可复识。且所增补，或孱人五代十国事，更失限断。藏书家每以不得一睹原书为恨。今细核陈氏之书：大约原书所

引之句与题不甚协者则删；绝无文义可通者则删；其书人人习读无所用注者则删；其书世无传本不复可校者则删。或改引他书：如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则改引范蔚宗书；十八家《晋书》，则改引房玄龄书是也。有原本正文而改作小注者；有原本小注而改作正文者；有陈氏所增而未注补字者；有陈氏稍加增改而注补字者。搀乱删改，不可枚举。”这样的大胆删改，令人惊骇。倘没有原本校对，怎会发现这许多弊病？明刻书中虽未必都像陈禹谟这样，可是舛误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所以有校讎的必要。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

陈鱣《元大德本后汉书跋》：“今本《郑康成传》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是本无不字，与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吾师阮抚部《山左金石志》云：为父母群弟所容，犹言幸为亲包覆成就，盖不欲举亲之失如此。自后校书者因前不乐为吏，父数怒之，遂疑此书为父母群弟所容为不相合，辄妄加不字，踵谬至今，是碑远胜今本《后汉书》。鱣今得见元本《后汉书》无不字，斯可宝也。”《后汉书·郑玄传》中这两句话，是在他的《戒子书》中。他在训戒儿子的书中，提出自己因家贫不乐为吏而不为父母群弟所容的话，这是显然不满于父母群弟的惟利是图，甚至不能相容，那末，家庭环境的恶劣，是多么可怕。郑玄是封建时代的大儒，儒家哲学以孝弟为本，决不会有这样的态度。在儿子面前提出他祖父和叔父的不是，也不是提倡孝弟之道了。阮元的解释，确是合乎情理。他据史承节所撰碑来校版本之误，史是唐人，可见唐本《后汉书》并未有误，而误在宋朝的刻本。这大德本独不误，所以可贵，这一字之错，有关郑玄的立身道德，不同寻常。并可见元刻未必不如宋刻。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失去本意

《柳南随笔》：“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

然。如《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继为世，盖指弃与不窾而言，谓昔我先王世居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记·周本纪》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专属之一人；又几误为周家之后稷矣。若将吾先二字读断，则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献曲’，注云：‘曲，乐曲也。’曲字与典字笔画相近，今本遂多误刊，而不知瞽之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画也。规字与亲字笔画相近，今本亦多误刊，而不知既云亲往，下文不应又说未果也。”这所举三条，大都本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首两条是宋天圣明道本《国语》与今本的异文，都以宋本为是，今宋本黄丕烈已经翻刻。后一条宋本《陶集》作“欣然规往”，正因为尚在规画而致后来未果，文义本很明白，然而《桃花源记》人人熟读，竟没有感觉到亲字和未果字的矛盾。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文义模糊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元大德本南史》：“《谢瀹传》：瀹尝与刘俊饮。俊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俊甚惭。案俊为刘劭子，流湎音与刘劭同，瀹以俊斥其父名，故引张景阳《七命》之文以报之，是以俊惭。汲古刻本误流为沈，遂致不解所谓矣。”古人认为在子孙前呼其父祖之名是不敬，今刘俊对谢瀹面斥谢庄儿，所以瀹用《七命》成句，借音同之字，斥俊父名刘劭以报之，正是晋人的雅谑，词令比刘俊要高明得多，所以俊深觉惭愧。毛晋等只知酒有沈湎之说，流和沈字形相近，竟以为误字而改之，致刘俊因何而惭，全不明白，《七命》文载《文选》，又似未曾读过，倘无大德本校对，将不知其所云了。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事态轻重悬殊

张元济《校史随笔·南齐书》：“殿本纪第一，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血出，众疑行毒害。三朝本、汲古本均作殷言中血

出，言字不可通。明监本改为舌字，然其人生存，仅仅舌中血出，何足以言毒害。是本乃作殷亡口中血出，原板亡口二字略小，墨印稍溢，遂相混合，由亡口而误为言，由言而变为舌，愈离愈远矣。案《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义宗子遐，字彦道，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卒，未大殓，口鼻流血。与本殷亡口中血出云云相合。殿本沿监本之讹，而案情轻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因亡口二字略小且墨溢，遂误合为一言字。又因言字不可通，而改为舌字。古书的展转致误，真是不可思议。然舌字的仍不可通，徒令读者怀疑而已。今以绍兴蜀中重刊本校正各本之误，并得《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的旁证，而当时案情，可以明白无疑了。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谬认他人之父

《校史随笔》：“《南史·孝义·江泌传》：乘牵车至染乌头，见一老公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各本同。是本躬自步去下，武帝上，作染不作梁。案本史《梁武帝诸子传》，有南康简王绩，而无子琳其人，子琳实为齐武帝第十九子，见《齐武帝诸子传》。《齐书·江泌传》亦言世祖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且染为上文染乌头之省文，步去下缀此一字，于文义亦较完足，校者偶未省察，疑染字为不文，任改为形近之梁字，诸本沿之，而子琳遂永谓他人父矣。”染与梁字形相近，校书者熟知梁武帝，又不知染为上文染乌头的省文、反以为误而改去，不知齐之与梁，既是两朝，而齐武帝又早于梁武帝二十多年，于是齐武帝无端失去一子而梁武帝忽多了一子，后来读史者或反以为《梁武帝诸子传》中误脱一人，幸有宋刻眉山本《南史》不误，而子琳始得归宗于萧颐(齐武帝)。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不解所谓何事

《校史随笔》：“《辽史》志第三十一《刑法志》：皇妹秦国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张隋，本宋所遣洵者，大臣觉之以闻。召诘款

伏。按《周礼·秋官》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沟。郑氏注：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张隋为宋遣至辽之间谍，沟者取义，盖本于此。明人覆刻，不加深究，竟认为残缺之‘的’字，妄补数笔，而文义遂不可通。殿本亦沿其误。”由于沟字的希见，校者又不读《周礼》，致误改为的。殿本经当时儒臣校勘，也没有发觉是沟的误字，如非元刻存在，将无法了解它的意义。所以校勘之事，必需多读书，《周礼》郑玄注不是解释得非常清楚吗？郑以汉制作比，张元济更以今称间谍作释，其义才大明。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致所姓两歧

杨守敬《校元本论语注疏跋》：“今世所传《论语注疏》，以十行本为最古，然脱误亦不少。如《序解》疏中少府宋畸，十行本以下并作朱畸。据《汉书·艺文志》、《释文叙录》皆称宋畸，此本与《汉志》、《释文》合，若无此本，则宋、朱二字，竟不能定为谁误。”宋和朱也是字形相近，很容易混误。宋畸的历史，又没有它处可考。十行本是宋刻监本，比较可信，而显与《汉志》、《释文》不同，究竟姓宋还是姓朱？今得元刻作证，畸为宋姓才确定了。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谓书有佚文

严元照《蕙棣杂记》：“《白虎通》云：《书》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宋元刻本皆曰逸篇明刻本逸上衍一亡字，后人妄疑亡无通用，遂谓是《周书·无逸》篇文。殊不知《无逸》完好，何由有此语？”现存《古文尚书》，已逸去十六篇，它的残文往往见引于汉以前人所著的书中，《白虎通》是班固集合白虎观诸儒讨论的材料，其中有《尚书》的逸篇，本来不足为奇的。但明刻本忽然误加上一个亡字，亡无通用，今《汉书》中无字都作亡，后人因而认为这句是《无逸》篇的逸文。不知《无逸》篇现存，完整无缺，决不会有逸文。这是由于明刻误加一字而误会的。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使失去原名相沿不改

《新唐书·艺文志》有《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引其父说：“卒者，杂字之误。仲景序云：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其为误写可知矣。”杂字残存了左边的一半，因其不成字，又去掉两点变作卒字，《唐志》就著录为《伤寒卒病论》，至今仍之。不知张仲景自序明明作《伤寒杂病论》。这两部书有三个内容：一、药方。二、伤寒。三、杂病。倘作卒病，很容易误解卒为死亡之意，医以治病，怎么称死病呢？又容易误解卒为猝之假字，以为所论为猝发的暴疾，又与内容不符。不考仲景自序，而据误字定名，可谓卤莽之至了。

古书有因一字之误而可见读者立场观点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王引之《经义述闻》：“劫人而取其财，不得谓之取人。取读为聚，人即盗也，谓群盗聚于泽中，非谓劫人于泽中也。《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艺文类聚·政治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览·治道部三》，引此并作‘聚人于萑苻之泽’，盖从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于泽中劫人’，则误读为取与之取矣。”服虔汉人，他的注本，原作聚人。杜预所注的本子，却误作取人。他就作取与之取来解释。承上文的盗字，那末，取人就是劫人了。过去剥削阶级的史籍，往往把人民起义斗争诬蔑为劫掠行为，杜预把取人曲解为劫人，也是基于这种立场观点的。尽管取聚本可假借，服虔本作聚人，都不暇注意，而硬说是劫人了。我们今天做校勘古书工作，须端正立场观点，才能正确理解古书的意义。

古书之误有多至数百千字

以上一字之误的举例，在校勘古书中，不过千百之一二，其它两字以上的错误，一句以上的错误，甚至脱漏有数十字至数百字的，更是不

胜其举。《礼记》是一部必读之书，哪知错误出乎意料。惠栋据宋黄唐刻七十卷本校汲古阁本，得讹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阙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明朱谋埜刻的《水经注》，也算是部好书，戴震据《永乐大典》本校之，不但字句之讹，层见叠出，其中脱简错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余字的。凡补其阙漏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三千七百一十五字。通津草堂和程荣所刻的《论衡》，都是明代的善本，然以元刻本校之，脱至四百字。殿本《宋史》，校元刻本，《田况传》脱一叶四百字，《张栻传》脱一叶四百零五字。这样看来，真是满目疮痍，倘不校正，怎么能读呢？

轻改古书的谬误

顾炎武《日知录》：“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钜，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顾炎武对于这位不读书的校勘家，还称许他遵守本文不敢辄改。尽管他的怀疑都是错的，注在下面，读者自能辨别，不至影响原文。倘像明末人的臆改，就是顾氏另外所举的把壮月改为牡丹了。明人重刻赵明诚《金石录》，序文末记上壮月两字，《尔雅·释天》，八月为壮。校者不读《尔雅》，无怪大胆地把壮月改作牡丹，字面很美丽，可是牡丹是开在春天，而壮月恰恰是秋天，这不是大错而特错吗？张元济《校史随笔》云：“明人刻书，每喜窜易，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所以我们遇到文从字顺的，也得要细心校勘，不要被牡丹这样美丽的名词所眩惑。

凡书不能无误字

凡是书籍，总是有错误的，精刻精校本的错误比较少些，还是需要校勘。宋宋绶曾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每三四校，犹有脱误。”譬喻得很对。杨守敬《宋蜀大字本史记跋》：“忆余在日本初晤森立之，以古刻书相质，余谬言此书讹误满纸，虽古刻，未可奇也。立之赧然曰：君于古书未也。书无讹字，尚何足贵乎？余乃相视而笑，以立之为知言。”森立之是日本的目录学家，著有《经籍访古志》。“书无讹字，尚何足贵”，正说明即便宋元善本，也是有讹的，贵在读者能心知其致误之由，而多方找寻证据以校正之。这提论非常精辟，宜乎杨守敬佩服他为知言了。

如何正视校讎

也有对于校勘抱着轻视态度的。方东树《汉学商兑》：“抱经先生一生精力，毕瘁于校书。黄忍庐讽之曰：读书以求益也，今书受君之益矣。黄名登贤，昆圃先生子也。”俞樾序孙诒让《札迻》也引这两句话。昆圃名叔琳，大兴人，康熙时有名的藏书家。登贤于修《四库全书》时，曾进家藏得奖，也非不知书的。然而他讥讽卢文弨的话，虽是戏谑，实为大误。读书是为了求益，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所读的书错误连篇，像上面所举这些例子，那末，试问所得的是什么益呢？恐怕反而是害了。又有焦循的《里堂家训》也这样说：“自有考据之日，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学。相台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经》，此其嚆矢也。本子之学者，不问经之旨趋，而但诂旧本之多，宋版之贵，较量于一字半句，以鸣得意，无异市井牙侩，终日为估客比兑银货而已，究一无所有也。更有甚者，信其讹误者为真，转将不误者改而致误。”他称校勘为本子之学，认为真正的校勘，不是停留在本子上面，而必须深入研究。他目睹当时专讲本子学的人们，不问旨趋，反改不误而为误，这是没有价值的。又说：“人各有所近，高下浅深，必难一致。本子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若习为高论，

鄙弃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窥测，浮而无实，尤为切戒。”才学有高低，不能为高深，就是做些浅显的本子学，仍是可以的，不要因而鄙弃一切就是了。他是针对当时的学风而发，我们不能认为他轻视校勘。对于校勘，应该承认它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但只是接受文化遗产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第一步，从第一步前进至万里远程，这才是我们学习校勘学的目的。

第三节 校雠必备的条件

具备众本和明通文字、训诂、音韵

《论语·卫灵公》：“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孔子认为如果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要准备着创造有利条件。校雠的基本对象是书本，没有书本，就用不着校雠，没有更多的更好的书本，也无法做好这工作，所以第一个条件是具备众本。至于只把许多不同的书本，机械地核对一下，两两相同，没有差别，就算完成了任务，那是只要细心一点，人人会做的事情，根本谈不上科学。一定要掌握文字、训诂、音韵三方面的知识，把它运用于校雠，才能够求得作者的本意。这三方面的修养，又并不是从校雠本身可以求得，而必须更多地读古书，和更好地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才能创造性地发挥它的作用。

刘向校书的具备众本

汉朝的建立，正值秦始皇焚书之后，古书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汉朝初兴，就注意于收集遗书，并广开献书之路。武帝刘彻时，感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又订定了藏书计划，设立了写书的专员，连诸子传说一类的书，也收藏在秘府，所以书籍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到了成帝刘骞时，因为以前所收集的书籍已有散亡，开始大规模地求书和校书。《汉书·艺文志》：“河平三年秋八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

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那时的书籍，有原来秘府所藏的，有当时陈农所求得的，中间各种复本也多了，为刘向等创造了校书的有利条件。刘向又广搜各官署和私人的藏书，材料更加丰富了。据他所著各书的叙录，校《晏子》所得的不同本子，有中书(即秘府藏本)，有太史书(即史官所藏本)，有长社尉臣参书，有他自己的藏书。校《筮子》所得的本子，有中书，有大中大夫卜圭书，有臣富参书，有射声校尉立书，有太史书。他根据许多不同的本子，才发现篇简有多少重复，文字有脱漏舛误，而校正写定以传世。可见校书必备众本的重要了。

清人校书的备具众本

自刘向以后，校书必备众本成了一定的原则。而且愈到后世，古书的不同本子也愈多，应该就力之所及，目之所见，遇到一本便校一遍，唐陆龟蒙说：“值本即校。”这句话是很对的。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每经都汇集各本，有汉唐蜀宋的石经，有宋元明的刻本，有影宋钞本，有各家校本，有各家专著，有日本本，有高丽本：卢文弨代谢墉校《荀子》，所据的有影钞大字宋本、元刻纂图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钟人杰本。惟其所据本子之多，才能比较异同而得到正确的面貌，成为一部读《十三经》和《荀子》的主要参考书。

近人校书的备具众本

就近人的校勘事业来说，鲁迅校《嵇康集》序称：“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宗缙本

《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同异。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是和乾嘉以来校勘古书各具众本的方法是一致的。闻一多的《楚辞校补》，首附的校引书目版本表，有六十五种。马叙伦的《老子校诂》，后面附的引用书目，有一百六十九种。他们所采用材料更广了，不仅向古类书和古书注释中去寻，并且连笔记之类，只要有片段的有关材料也从不放过，《老子》不过五千言，而校诂就写了十七万字，可见他校书的仔细和认真了。

今天对各具众本的条件

在解放以前，要具备这条件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善本书掌握在私人手中，视为珍宝，不可能供给我们作科学研究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许多金钱自己购置珍贵的书籍。以往的学者们，都是辛辛苦苦地积累了几十年的时间，又要有机会多和这些收藏家联系，才能看到少数的材料，而年龄已是老大了。现在，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多已集中在各地的图书馆和学校，这不仅对治目录学者，对各方面的研究者，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校雠必通文字学

古书的文字，随时代而异，又随书写人的习惯而有所变化，所以作校雠须懂得文字的源流。先秦的书籍，都用古文和篆文，两汉就改用隶书，同一本书，便有古文和今文的不同。后来又不断地变化，六朝隋唐时写书的人，往往参用草书和俗书。自有刻本，又统一用正书。但是所据的底本，有篆、隶、草、俗的不同。当然纷纭纠缠，舛误百出。如果校书的不明篆、隶、草、俗的变化，就无法推求作者的本意，而不免穿凿附会地武断和曲解了。

王念孙《淮南子杂志序》：“《时则》篇：孟秋之月，其兵戊。戊，古钺字也，而各本乃误为戈矣。”案《说文》：“戊，大斧也。徐

错曰：今作钺。”又：“钺，车銜声也。”是斧钺之钺，古字本作戍，而钺为车銜声，别是一义。后来借用了钺字，而戍字遂废。校者见四时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剑，冬用铍，而不识戍为钺之古字，疑秋用戍不相类，于是去其左旁而误为戈字了。又《齐俗》篇：“煎敖燎炙，齐味万方。齐读为剂，味即甘受和之和，味与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误为味矣。”案和字《说文》本作味，今经传皆作和，是从隶书的变体，而味字遂废。齐和，等于我们所说的调和，本是常用的词汇，见于郑玄《周礼注》、高诱《吕氏春秋注》等书。校者不识味为和的古字，而误为形近之味了。这是校书须识古字。

又：“《道应》篇：于是欻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剑。隶书真字或作真，与冥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误作瞑目，且误在敦然之上矣。”案《庄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见丘山。”《管子·小问》篇：“桓公瞋目而视祝鳧已疵。”《韩非子·守道》篇：“瞋目切齿倾耳。”它是表示愤怒的状态，也是常用的词汇。由于隶书相似而误作瞑目，哪有攘臂拔剑而闭了眼睛的勇士呢？一字之错，便成笑话。又：“《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翦羽之矢也。隶书戾字作戾，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误为锥矣。”案《尔雅》“金鏃翦羽谓之鏃”，高注正用《尔雅》，是鏃矢无疑。《国语·齐策》疾如锥矢三句，文与此同，锥字也是鏃字之误，高注却以锥矢为小矢。可见在高诱作注时，《淮南子》尚不误，《国语》已误为锥矢，两书注出于一手而有违异，是高诱也未知锥字为隶体相似而误，遂曲解为小矢了。这是校书须识隶书。

又：“《齐俗》篇：柱不可以摘齿，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读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齿，而不可以持屋也。筵与筐草书相似，而各本遂误为筐矣。”案这两句的意义是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支持大屋，而不可用它剔齿；小簪可以剔齿，而不可用它支持大屋。筐是贮物的竹器，怎能够支持大屋呢？它处也没有把筐解释为小簪的。由于筵与筐草书相似，人们多识筐，少识筵，因而

便连高注也误作筐了。又：“《说林》篇：遽契其舟橈。高注：橈，船弦板。橈，读如《左传》襄王出居郑地汜之汜也。范与危草书相似，故各本橈字皆作桅。”案橈，字本作舳。《集韵》、《类篇》并云：舳，或作桅。草书近似桅，因讹为桅了。这是校书须识草书。

又：“《汜论》篇：奸符节，盗管玺。高注：玺，印封。俗书玺字作玺，而各本遂误为金矣。”案《五音集韵》云：玺，俗作玺。因为尔字俗作尔，便变成了玺，形与金字相似而误。又：“《论言》篇：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定也。俗书定字作定，而各本遂误为之矣。”案此说质有了固定，所以寒暑之变，对它没有影响，倘作之字，便文义不明了。这是校书须识俗字。

识字的重要参考书

要识古字，必须熟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作为基础，再扩充到甲骨文和青铜器款识。隶书，有顾藹吉《隶辨》和翟允升《隶篇》。草书，有石梁《草字汇》。俗书，有颜真卿《干禄字书》。而杨守敬的《楷法溯源》，根据碑碣，逐字罗列，可以看出演变的情况，也很有用。这里不过约举几种，学者可以触类旁通。

校书必通训诂学

训诂的诂字，据《释文》引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尔雅》有《释诂》、《释言》、《释训》，都是举古言而用今语来解释的。古人著书，用当时通行的语言，本来人人都懂得，历时久远了，这语言已经死去，或者有了变化，那就令读者感到诂屈聱牙，古奥难晓。如果懂得了训诂学的方法，就可知道它原来的意义，而不致犯望文生义的毛病。但是要懂得训诂，又必须懂得音韵，因为语言的变化，是跟音韵的变化分不开的。这里为了说明它与校雠的关系，只能从浅近的举些例子，不暇作全面的论述。

古书有把训诂的字来代替经文的：如《易·乾》“元亨利贞”，汉

《史晨飨孔庙后碑》作长亨利贞，以长代元。《华山碑》作永亨利贞，以永代元。彖传“百谷草木藹乎土”，《说文·艸部》藹下引百谷艸木麗于地，以地代土。《书·尧典》“钦若昊天”，《史记·五帝本纪》引作敬顺昊天，以敬代钦，以顺代若。“平秩东作，平秩南讹，平秩西成”，引作便程东作，便程南讹，便程西成，以便代平，以程代秩。这些代替的是训诂字，把它代替了本文，读者就没有困难。如上面所举的钦若昊天，钦若是本文，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史记》用敬顺作代替，那就文从字顺，一目了然了。校讎家倘不懂训诂，如《易》的第一句“元亨利贞”的元字，汉碑有作长字的，又有作永字的，那末，究竟谁是正确呢？不是要堕入五里雾中吗？据汉碑来校正传本的舛误，并不是没有，但是像这类的训诂字，决不能据此来校改传本的。

古书有古人的语言，今人不懂而误解的。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艸蔡，古语也。《说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乱也。亦或作草窃，窃与蔡一声之转，艸蔡之为草窃，亦犹《庄子》窃窃之为察察也。《尚书·微子》篇，好草窃奸宄。草窃即艸蔡，其本义为艸乱，引申之，则凡散乱者皆得言之，故与奸宄连文。好草窃即好乱也。枚传训为草野窃盗，不达古语矣。”又：“娄空，古语也。《说文·女部》：娄，空也。从母中女，娄空之意也。凡物空者无不明，故以人言则曰离娄。以屋言则曰丽廋。离与丽，皆娄字之双声也。《论语·先进》篇：回也其庶乎娄空。此言颜子之心，通达无滞，若窗牖之丽廋闾明也。《史记·伯夷传》：回也娄空，糟糠不厌。则西汉经师已失其解。而娄空之语，独见于《说文》，乃叹许君之书，有裨经学不浅也。”这草窃和娄空一类的古语，死去已久，司马迁是西汉人，枚贽是东晋人，他们也都不懂了，只好望文生义来解释。因为颜回是安贫乐道的，“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就附会说娄空是常常空乏，连糟糠也吃不饱。又因盗贼是往往潜伏在山林草泽之中的，就附会说在草野的窃盗了。俞樾在二千多年之后，才根据《说文》，知道艸蔡和娄空是古人的语言，而求得了真解。校讎者如不懂

训诂，就不免武断地校改了。

训诂学的主要书籍

学习训诂的主要书籍，《尔雅》、《说文》以外，有扬雄的《方言》，刘熙的《释名》，张揖的《广雅》等书。清代的学者们，对这几部书，都做了不少细致的研究工作。其中最佳的，《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说文》有段玉裁《注》。《方言》有钱绎《笺疏》。《释名》有王先谦《疏证补》。《广雅》有王念孙《疏证》。

校书必通音韵学

语言的发音，有地区和时代的不同。先秦人著书，不但《诗经》、《楚辞》是纯粹的韵文，即其它散文中间，也有很多地方是有韵的。古人又常常用音同音近之字来代替本字，即六书中的“假借”。著书的人有秦、楚、燕、越之异，他的语音也就有秦、楚、燕、越的不同了。倘是执一地之语音，就不能通之于其他地区；执现代之语音，就不能通之于古人。所以，校书者须懂得音韵，并据以求得本字，才不致发生误解或误改。今略举数端：

根据韵部来校正舛误。王念孙《淮南子杂志序》：“《原道》篇：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牧与得为韵。高注：牧，养也。各本牧误作收，注文又误作不养也，则既失其义而又失其韵矣。”这两句本是承上文“得其内”而言，能得之于中，才能养之于外。倘误收字而作不养解，使上下文义不贯了。由于刻书者不知牧与得字是韵，而以牧收两字形近误改。又：“《兵略》篇：同欲相趋，同恶相助。同欲同恶，相对为文。欲趋为韵，恶助为韵，各本同欲下脱相趋二字，相助上脱同恶二字，则既失其义而又失其韵矣。”这两句上文“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是利与死韵，情与成韵，而欲与助却非同韵，句法很不调协。据《史记·吴王濞传》，作同恶相助，同欲相趋。可以证明中有

脱字。古韵欲趋属侯部，恶助属御部。由于刻书者不知句中有韵而误脱。又：“《修务》篇：契生于卯，启生于石。石与射为韵。各本启生于石在契生于卯之上，则失其韵矣。”这两句的下文是“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如今本则卯与射非韵，和上文都用韵不一律，故明是两句误倒。又：“《泰族》篇：至治宽裕，故下不贼。至中复素，故民无匿。贼，害也。言政宽而不为民害也。匿，读为慝，谓民无奸慝也。匿与贼为韵。后人于贼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既失其义而又失其韵矣。”据《文子·微明》篇作“至治优游，故下不贼”，可证本无相字。据《群书治要》引此作“至德朴素，则民无慝”，可证本无情字。刻书者不知有韵，误加了两字。

根据韵部来求得假借。王念孙《淮南子杂志序》：“孚子治亶父三年。孚子即宓子贱也。宓孚声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误为季子矣。”治亶父乃宓子贱的故事，它书从没有称他为季子的，《群书治要》引此作宓子，《吕氏春秋·具备》篇同。而《齐俗》篇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太平御览·人事部》引作孚子，《群书治要》作季子。可证孚是宓的假借，作季则由与孚字形相近而误。又：“《本经》篇：异贵贱，差贤不，经诽誉，行赏罚。贤不，即贤否也。后人不知不为否之借字，遂于不下加肖字矣。”这四句的句法一律，都是相对成文，加了一个肖字，句法就参差不齐了。由于不知不即否之借字而误加。又：“《道应》篇：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有道也。适读曰啻，言奚啻有道而已哉，乃圣、勇、义、仁、智五者皆备也。后人不知适与啻同，而误读为适齐适楚之适，遂改有道为无道矣。”奚适其有道也，下接“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语气本是一贯而下。《吕氏春秋·当务》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刻书者不知适为啻的借字而误改。又：“国危不而安，患结不而解，何谓贵智。而读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则无为贵智也。后人不知而与能同，遂改为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矣。”能和而古声相近，故可以通借，古

书中借而作能的，多不胜数，如《楚辞·九章》：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战国策·齐策》：秦始皇使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而字都是能字的假借。刻书者不知而遂颠倒其文了。

音韵学的主要书籍

古音韵学的发明，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项最辉煌的成绩。自顾炎武创始，后来经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张惠言、严可均、江有诰，直到章炳麟，他们愈推愈细，各有著述，可说已经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具备校书的常识，可先读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附在他的《说文注》后面)，再进而读诸家之书。

校雠学的参考材料

文字、训诂和音韵，前人统称之曰小学，本是互相联系着，并不能孤立地来研究。再加具备了各种版本。用这些工具来校雠古书，就没有或很少不能解决的问题。相反地，则如阎若璩《经义杂记序》所云，“疏于校雠，则多讹文脱字，而失圣人之本经。昧于声音训诂，则不识古人语言文字，而失圣人之真意”了。前人已有的成绩，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和参考的材料，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孙诒让《札迻》等书，都是极有价值的著作。

校雠方法的派别

校雠方法又可分为两派。缪荃孙《跋毛刻四唐人诗》：“在毛刻为最精，而改换行款，喜易古字。异本标一作于下。迩来参合各本，择善而从，后来卢抱经、孙渊如墨守此派。敕先(陆贽典字)则据一宋本，笔笔描似，即讹字亦从之，缩宋本于今日，所谓下真迹一等者，后

来黄尧圃、汪闳源墨守此派。一属校雠，一属赏鉴，均士林之宝笈也。”叶德辉《藏书十约》论校勘：“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弼、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他们这样的区别，是根据洪亮吉的藏书家有数等之说。

《北江诗话》：“藏书家有数等：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为考订家。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南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其实洪氏所分五家，本可合并为二家。如第一第二，可合并为校雠家。第三第四而以第五附入，可合并为赏鉴家。赏鉴和校雠，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有功于古书，却是同样的。赏鉴家是用死校法的，这是一派；校雠家是用活校法的，这又是一派。不过缪氏列汪闳源为赏鉴，他并没有校本书流传，所刻书也是他人代校的。叶氏列顾广圻于死校，只可指刻书而言，他的所作考证是用活校法。实际上他是合死校活校为一，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孙星衍所刻书，和卢文弼并不全同，著名的《说文解字》、《唐律疏义》、《古文苑》等，也是顾广圻担任校勘，属于“必存原本”而不属于“择善而从”的。他们的举例，仅仅得其大概而已。

什么是死校法

死校法当始于冯武、陆貽典等。冯武校《文选》跋：“二十二日对此卷，先有对者，与钱氏宋本不同，今一依钱本改窜。亦有明知宋版之误而不必从者，亦依样改之。盖校书甚难，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云。”陆貽典校《管子》跋：“余校此书，一

遵宋本，再勘一过，复多改正，后之览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孙庆增《藏书记要》论校讎：“反覆校过，连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为善本。”后来黄丕烈等都谨守此法。他们的功绩，在凭他的校本，流传了不少宋刻孤本。也是有鉴于明人的擅改古书，志在保存真相。正像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诸儒的抱残守阙一样。现在印刷术发达，宋刻旧钞，正不断地大量地在影印出版，我们对于死校法不复像从前这样需要，但古书的繁多，版本的复杂，不可能完全印出，遇到罕见的版本还是要用死校法存真。又死校也是活校的基础，不可偏废。

什么是活校法

活校法的运用，至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严可均之时，可称极盛。方法是先做好死校工作，再遍搜各书中的材料，然后贯穿了全书的体例，上下文的语气，选择各本之长，定为一本。卢文弨校《荀子·劝学》篇“青取之于蓝”云：“青取之于蓝，从宋本。《困学纪闻》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蓝，无于字。”这是肯定了宋本是而元本非，宋本并有王应麟《困学纪闻》作证，王是南宋人，他所见的本子也没有于字。又校“螾无爪牙之利。注：螾与蚓同，蚯蚓也”云：“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字，无注末蚯蚓也三字，今从元刻。”这又肯定了元本是而宋本非，因杨倞注只说螾与蚓同，并不说蚯螾与蚓同，且蚯蚓也三字是释蚓字，故知元刻正确。又校《不苟》篇“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违。注：皆当其理”云：“《外传》四，作喜即和而治，忧即静而违。此作和而理，避时讳。下句旧本俱作静而理，当由误会注文耳。今从《外传》改正。”这又根据《韩诗外传》卷四之文校正舛误。唐高宗名治，唐人书治皆避讳作理，杨倞唐人，所以也作理。下句旧本作静而理，则与上句理字重复，推其致误的原因，是误会注文“皆当其理”的总释两句，而为下句末字也当作理了。又校《儒效》篇“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云：“宋本无必字，元刻有。案必与毕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亲者取多。其卷一作

畋渔分，有亲者得多。与此不同。”这段说孔子作鲁司寇时，百姓被他感化，阙党子弟，多少皆均分，没有隐藏，有亲者多取些。后人不知必与毕通，把它删去，幸元本犹存，所以肯定宋本非而元本是。这样的校书，常有精心独到之处。但千虑一失，也难免有校改失当，反失其真的。到了顾广圻校刻的古书，依宋本照样摹刻，作校勘记或考证，另编附后，既不改变原文，又不列入当句下，以免隔断文气。这样的态度是客观的，是进步的。后来覆刻古书，多照他的格式。

第四节 校雠所根据的材料

搜求和判断

具备众本，是校雠的基本条件。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必须广搜博览，凡有关本书的，虽残文断句，也都应该利用。另一方面，材料太多了，各持一说，也容易令人迷惑，这又要善于判断了。校雠取资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有的从书名看，好像和本书没有关系，然而中间有极可贵的材料；有的大部书，看似有用，却无甚可取。所以为了搜求材料，读书要博，而运用和处理材料，用心要细，除了具备文字、训诂、音韵的知识以外，还要懂得考据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参杂自己的主观臆断。

据众本合校例

阮元刻宋十行本《毛诗注疏校勘记·关雎序》“后妃之德也”下云：“闽本、明监本、毛本于此节及后节用之邦国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台本无。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释文》混入于注，是也。十行本附释音，与注文疏文皆双行小字，唯《释文》首加圆圈为别耳，故重刻者致误也。又明监本注单行小字侧书，闽本、毛本别为中等字，皆非其旧。”又“风，风也”下云：“唐石经、小字本、相台

本同。案《释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风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案，《正义》标起止云风风，是《正义》本不作讽。《正义》下文又云：风，训讽也。风、讽古今字。凡经注古字，《正义》每易为今字说之，其为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并时依经注误改者矣。”以上各条，都是据各种不同的本子来校正本书。前一条是罗列各本的异同和款式，得出了闽本等把《释文》混入注内的错误。又各本的单行侧书或中等字，都非宋刻的真相。后一条说明风也的风字当读为讽而不当改字。从整部《毛诗正义》求得它的定例是把今字说古字，那末，古字的不当改作今字是很明显的。这必须统贯全书才能确定它的是非，不是枝枝节节地来作校勘的。

据本书互校例

王念孙《读管子杂志·形势》篇：“乌乌之狡，虽善不亲。念孙案：乌乌之狡，当作乌集之狡，狡与交同。后《解》云：与人狡，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狡，是其证也。”又《七法》篇：“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念孙案：财当为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今本材作财者，涉上文聚则而误。”又《幼官》篇：“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神。念孙案：后《中方本图》，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考之以言，一本是也。《尧典》曰：询事考言。故曰：期之以事，考之以言。”又：“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念孙案：适胜，当为胜适，适即敌字也。《兵法》篇云：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是其证。”以上各条，都是取本书它篇文字来校正这篇的误字。《解》（指《形势解》）、《幼官》、《中方本图》、《兵法》，都是《管子》书中的篇名。

据上下文互校例

孙诒让《墨子间诂·修身》篇：“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

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反其路者也。案：路当为务，即冢上务为智务为察而言，谓违反其所当务之事。”又：《尚贤中》：“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故爱其色而使之焉。案：据下文，上使下当有之字。”又《尚同上》：“察乡之所治者何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案：上句所下，据下文当有以字。”又《尚同中》：“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案：义当作乎。下文云：尚同乎乡长，尚同乎国君，可证。”以上各条，都是据上下文来校正误字。但必须细案文语气语意，使上下贯穿。古书文义深奥，别有条例，要防止据后来的文法来擅改。

据同类书互校例

王念孙《读史记杂志·秦始皇本纪》：“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念孙案：欲有当作有欲，若有二字连读，欲学法令四字连读，置欲字于有字之上，则文不成义。法令下当有者字，《李斯传》作若有欲学者，是其证。《通鉴·秦纪二》，正作若有欲学法令者。”又《吕后本纪》：“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孙案：危本作微，谓刘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后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与妃为韵。若危字，则古音鱼戈反，不得与妃为韵。《汉书·高五王传》正作刘氏微。”又《礼书》：“然而兵殆于垂涉。《集解》：许慎曰：垂涉，地名也。念孙案：垂涉当依《荀子·议兵》篇作垂沙，字之误也。《楚策》亦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又《鲁周公世家》：“不干所问，不犯所知。念孙案：知当为咨，声之误也。所问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语》正作所咨。”以上各条，都是举同类性质的书互校。如《通鉴》、《汉书》、《战国策》、《国语》与《史记》都是史部书。《国策》、《国语》又为司马迁所据的材料。《汉书》在武帝以前的传记，多本《史记》。《通鉴》编纂在北宋。那末，班固、司马光所见的《史记》，是汉本和宋本，所以与后来本有不同。

据本书古注校例

王念孙《读管子杂志·七法》篇：“人君泄见危。念孙案：见当作则。故尹注云：君泄其事，则其位危。”又《枢言》篇：“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念孙案：将字后人所加。霸主欲强兵，必重战士之赏，故曰霸主积于战士。据尹注云：卒勇奋。则无将字明矣。”又：“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惟贤者不然。念孙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衍。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无注。若果有此六句，则尹氏何以注于后而不注于前？然则尹所见本无此六句明矣。”又《霸言》篇：“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尹注曰：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于我何贪？念孙案：如尹注，则伐字当为我字之讹。我不谓贪，我不为贪也。古者，谓与为同义。”以上各条，都是据尹知章《管子注》以校正文。尹注虽多浅陋之处，但他是唐人，所据以作注的本子是唐本，比后来展转翻刻的总要可信一些；当然，也要靠校者的善于别择。

据它书古注校例

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郑谱》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引之谨案：咸当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与咸字形相似，因误作咸耳。《史记·郑世家》索隐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又《大戴礼·朝事》：“《朝事》下有仪字，而今本脱之。《覲礼》注疏及《大雅·韩奕》正义，《商颂·长发》正义，《王制·玉藻》正义引此皆作《朝事仪》。”又《礼记·曲礼》：“前朱鸟而后玄武。家大人曰：朱鸟本作朱雀，此后人以他书改之也。《后汉书·张衡传》注作朱雀。”又《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家大人曰：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孟子·离娄》篇云：此之谓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文义与此相似，反服下不当有之礼二字，盖涉上文旧君反服之礼而衍，自唐石经已然。《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无之礼二字。”以上各条，

都是据他书注所引来校正本文。《史记索隐》为唐司马贞撰，《仪礼疏》为唐贾公彦撰，《毛诗正义》为唐孔颖达撰，《后汉书注》为唐章怀太子撰，《世说新语注》为梁刘孝标撰，他们作注时所据的都是古本，所以可正今本之误。凡宋以前人的注释，都可以据校。

据古类书校例

刘师培《墨子拾补·所染》篇：“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案《间诂》曰：言字疑衍。今考《群书治要》、《后汉书·冯衍传》注、《党锢传》注、《太平御览》八百十四所引，并无言字，则言字确为羡文。”又《非儒下》篇：“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糗。案毕校云：《艺文类聚》引作藜蒸不糗。今考《书钞》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并引作藜蒸。《御览》八百五十九亦引作藜蒸不糗。是古本羹字作蒸，羹则后人所改。”又《荀子校补·劝学》篇：“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案元本作江河，非也。《初学记》六，《事类赋注》六，引此文并作江海。《文选·海赋》注，《白帖》六并引作河海。海与里叶韵，若作江河，失其韵矣。”又《大略》篇：“子夏贫，衣若悬鹑。案《书钞》一百二十九，《事类赋注》十二，《御览》六百八十九所引贫上并有家字，当据补。又《初学记》十八引子夏家贫，徒有四壁，疑亦此处脱文。”以上各条，都是据古类书所引以校本文。《群书治要》为唐魏徵撰，《太平御览》为宋李昉等撰，《艺文类聚》为唐欧阳询撰，《北堂书钞》为唐虞世南撰，《初学记》为唐徐坚撰，《白孔六帖》为唐白居易和宋孔传撰，《事类赋注》为宋吴淑撰，此处多用简称。凡宋以前类书都可以据校。明人类书虽多，而多出臆改不可信，故不宜引据。

据《道藏》本校例

张文虎《尹文子校勘记(代钱熙祚)·大道上》：“以简治烦惑。《藏》本治作制，与《治要》合。”又：“必为治以矫之。治字误，明

吉府本及《藏》本并作法。”又：“食不异肉。《藏》本异作兼，与《御览》六百八十九引此文合。”又：“处名位虽不肖下愚，物不疏己。此处有脱误。《文选·任彦昇荐士表》注引作‘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不患物不疏己。’观下文云：亲疏系乎势利。则此处当亦亲疏并举为是，不患误作下愚，字形并相似也。

《藏》本下作不，此其迹之未尽泯者。”又：“君科功黜陟。《藏》本科作料，料字是。下篇亦云料长幼。”又：“谓之曰怪石也。明吉府本及《藏》本，曰下并有此字，此脱去。”又：“弗如一复之。一字衍，当依明吉府本及《藏》本删。”以上各条，都是据《道藏》本来校正古书。《道藏》虽是明正统刻本，然所据多古本，前人没有注意，自从惠栋、钱大昕、孙星衍、顾广圻等发现了苏州玄妙观和南京朝天宫的藏本，据以校勘道家诸子，而其书遂显于世。其初还是据古书的原书，后来更有据注释诸家的本子，如马叙伦《老子校诂》所据，有《道藏》本的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彭耜《道德经集注》和《释文》，白玉蟾《道德宝章翼》，张嗣成《道德经章句训颂》，寇才质《道德经四子古道集解》，吴澄《道德经注》七种。

据释氏书校例

严可均《说文校议》：“玟，一曰石之美者。《一切经音义》卷三、卷六引石之美好曰玟。案瑰下云：一曰圜好明。此脱好字。”又：“芬，艸初生，其香分布。艸初上当有芳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卷十二、卷十九引，芬芳也。”又：“蔘，菡蔘，芙蓉华。《说文》无芙蓉字。《一切经音义》卷三、卷八引作扶渠，盖古文也。注刻小徐作夫容，则近人依《汉书·相如、扬雄传》校改者。”又：“苧。艸乱也。杜林说：艸苧苧兒。《一切经音义》卷廿一髻髻引《说文》作苧苧，发乱也。以玄应语订之，则今本有阙脱，当言杜林说，艸苧苧如发乱也。”又：“喁，鱼口上见。《一切经音义》卷十二、卷十三引作众口上见也。今此作鱼，疑校者辄改。《晋书音义》

卷上引《字林》，亦作众口上见。《汉书·相如传》喁喁然，师古曰：众口向上也。”又：“尋。古文省彳。见部尋取也，此重出。《一切经音义》卷一引卫宏《古文官书》，尋得同体，不言《说文》，则唐本彳部无尋字。”以上各条，都是据释氏书来校正《说文》的脱误。唐释玄应《众经音义》，慧苑《华严经音义》，虽为诂释佛经而作，然所引字书及其它古书，都是唐以前的本子，和后来有所不同。清乾隆、嘉庆时的学者们，发现了这材料，多据以校正古书。光绪时，又从日本传来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内容更为丰富了。除此之外，如《法苑珠林》、《北山录》等释氏书，也有可据的材料。

据甲骨文校例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垓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夂，与亥字相似，王夂亦王亥之讹。”又：“汤名天乙，见于《世本》（《书汤誓释文》引）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振玉）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如大戊，均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以上各条，都是据甲骨文以

校古书，知《史记》的振，《吕览》的冰，都是亥字之误。《世本》、《荀子》、《史记》的天乙，都是大乙之误。

据金文校例

吴大澂《字说·淑字说》：“古文淑皆作𠄎，不从水。许氏《说文解字》有九月叔苴之叔，而无伯𠄎之𠄎。盖自汉人借叔为𠄎，又误𠄎为吊，而𠄎字之本义废矣。周时已假借用之，汉人相因以叔为𠄎，又于经文不𠄎二字多误为不吊。《书·大诰》、《君奭》之弗吊天，《多士》之弗吊昊天，皆𠄎字之讹。汉人误𠄎为吊，因𠄎𠄎二字相近耳。”又《文字说》：“潍县陈介祺所藏兮仲钟云：用追享于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考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为前文人之讹。盖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𠄎，或作𠄎，又作𠄎。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以上各条，都是据金文来校正古书。《大诰》、《多士》的误𠄎为吊，《大诰》的误文为宁，自汉以来已两千多年了，到发现了这些古器，才得校正。甲骨文和金文，已发现的有数千件之多，对校勘来说，是丰富的宝藏。王国维和杨树达、郭沫若在这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

据古印文校例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石洛侯印。《史记·王子侯年表》：石洛侯刘敬，城阳顷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参校《汉书·表》，其世系及始封月日皆合，以石洛为原洛。据此印足正原洛之误。”又：“武平侯印。《郡国志》武平属陈国，陈国故淮阳国，章帝更名。《地理志》淮阳国无武平。然考《汉书·王子侯表》有武平侯璜，东平

炀王子，建平二年五月封，四月坐免，元始元年复封，居摄二年死。疑《地理志》脱。”又：“进符子家丞。莽改地名曰符者甚多，而《地理志》定襄郡安陶，莽曰迎符。迎与进字形相近，疑迎符即进符之讹。”又：“平的国丞。《汉书·王子侯表》：平的戴侯强。《史记·侯者表》的误酌。考《说文》，的在日部，云：明也。从日，勺声。《易》曰：为的颡。后人书的字，多误日旁为白旁，颜师古于《地理志》云：的音丁历反，其字从日。盖见后代多误从白，故特正之，而今本的旁及从日之日，亦皆误白，此印真汉篆之可据者。”以上各条，都是据古铜印文来校正《史记》、《汉书》的脱误。古铜印不过金石中的一种小品，前人集以为谱，也不过供摹印者们的取法。自从瞿中溶用它校正古代的官制和地理，它的价值便不仅是骨董家的赏鉴品了。

据石刻校例

王昶《金石萃编·嵩岳大室阙铭》：“嵩高字，汉碑并作崇，见汉时尚无嵩字。《地理志》有崑高县，云：古以崑高为方外山也。《国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注：崇，崇高山也。据此，知经典有作嵩或作崑者，皆后人改窜之文也。”又《开母庙石阙铭》：“则文耀以消摇。消摇二字不从辵。而《诗》河上乎逍遥。《释文》云：本又作消摇。据此，知汉时尚不从辵，《诗》文出于改窜也。”今人岑仲勉《隋书求是》：“《隋书》本纪四，大业十年八月己巳，班师。庚午，右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卒。他处未见郑荣其人。一九五三年，长安发现武德三年郭荣墓碑，按之皆合，可明郑为郭误。”今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北史·魏广平文穆王怀传》，《洛阳伽蓝记》卷二平等寺作武穆王，《河南金石志图》有《广平王元怀墓志》，亦作谥曰武穆，知《北史》误。”以上各条，都是据石刻来校正经史之误。历代石经，既是书籍版本的一种，为校勘当然的材料，不在此列。这里是指石经以外的石刻文字。这项工作，自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直至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王

昶《金石萃编》、武亿《授堂金石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补史校史，可称成绩斐然。今后各地发现的新材料，正日出无穷，我们还可大力探讨。由于石刻为当时镌刻的文字，大体是可信的。

据封泥校例

杨树达《汉书窥管·地理志》：“掖。树达案：《齐鲁封泥集成》有夜丞之印，夜印，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卷二亦有夜丞之印。王国维云：掖县二志皆从手旁，惟《齐策》‘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及‘东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则《齐策》是也。”又：“盱眙，王先谦曰：《续志》作盱台，《史·高纪》同。树达案：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卷二有盱台丞印，字作台，则《史·高纪》及《续志》作台者是，此作眙者，误也。又案《王子侯表》有盱台侯蒙之，字作台，不误。”又：“雩都。树达案：《封泥考略》卷七有虜都之印，字作虜，与志前文庐江郡雩娄封泥作虜娄者同。吴式芬云：虜通雩。《史记·秦纪》樽里疾，樽字从虜，列传从雩作樽。《匈奴传》系雩浅，《汉书》作系虜浅。树达案：地名宜有定字，不得以同音字为之，此皆封泥作虜者是，志文作雩者，音近误字也。”又：“剧。树达案：《齐鲁封泥集成》有勳丞之印，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卷四有勳丞印，字皆从力，不从刀。《地志》此文及前北海郡劇侯国皆从刀作劇，案《说文》有勳无劇，从刀乃从力之误写也。”以上各条，都是据封泥文来校正史志。封泥发现于巴蜀齐鲁之区，是较晚出的古物，是从汉铜印打印下来的，古时盖用来封缄官文书，等于现在的火漆印。它可以校正两汉的地名和官名的地方很多。

校书当避免的弊端

如上所述，校雠所据之材料是非常广泛的，但又往往玉石相混，有待于研究工作者的正确运用。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诂上》：“一

依故书正新书，依准宋刊，不敢轶其上。其一时据旧籍以正唐宋木石之书，相提而论，据旧籍者宜为甲。及其末流淫滥，喜依《治要》、《书钞》、《御览》诸书以定异字。《治要》以下，其书亦在木，非无讹乱，据以为质，此一蔽也。前世引书，或以传注异读改正文。经典古今文既异，今文有齐鲁之学，古文有南北之师，不得悉依一读，凌杂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时出匈臆，谓世所见者悉流俗本，独己所正为是。其是者诚诸师所不能驳，而亦颇有错悞。”死校派虽于是非不加肯定，态度尚属谨慎。活校派必须具备深博的知识，精细的考证，否则就易犯改窜古书的毛病。如《群书治要》这类资料，不能视同宋板，要利用它的正确部分，驳斥它的错误部分，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等都是这样，否则就要犯章氏所说的第一蔽了。就经学而论，师法和传本是非常复杂的，对这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能条分缕析，各归本真，而必然要犯章氏所说的第二蔽了。段玉裁、臧庸的学问在清代当属第一流，但有时自信过强，不免千虑一失，如段注《说文》，钮树玉、徐承庆等都有订正，顾广圻对臧庸所校书也常表不满，所以章氏也说颇有错悞。

校记和正误表

把校得的异文，附在本书的后面，最早见于《汉熹平石经》。王国维《魏石经考》：“汉石经后，各有校记，盖尽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隶释》谓石经有一段二十余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鸡八字可读，其间有齐、韩字，盖叙二家异同之说。是汉石经用《鲁诗》本而兼存齐、韩二家异字也。又《隶释》所录《公羊》哀十四年传，后有三行，皆有颜氏有无语，是汉石经《公羊》用严氏本而兼存颜氏异字也。《论语》后有包、周及盍、毛、包、周字，是《论语》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周诸本异字也。”这虽已残阙，还可考见各本的异文，后来衍为校勘记或考异等，更由略而进于详了。又有用表格式样，罗列卷、版、行、字、误、改，界格填注，如后来勘误

表的，则始于宋楼大防《乐书正误》，钱泰吉《曝书杂记》称其格式颇精，钞录一叶，以饷校书者。今亦摹写如下：

《乐书正误》格式

卷	版	行	字	误	改
第一卷	四版	十六行	第五字	特	当作待。以此行为式。
四	一	十七			简而无虐，刚而无傲。当作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五	一	六	十	鼓	瞽
	二	八	十六	杨	扬
		二十	三	筦	莞
	五	十	十七	声	升
七	二	九	十三	楷	揩
		十	五	楷	揩
	三	四	五	圭	多此一字。多者当挑去之。
		七	七	幪	应 其下田字音幪。《有瞽》诗：“应田悬鼓。”
八	六	二十二	十六	效	效 字书中无效字，流俗作效，如此等皆当改正。后仿此。
十	四	十四			勇者苦怯之下，添入“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十二字。用写本校。

第五节 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学

刘氏父子校雠的功绩

关于汉刘向、刘歆父子目录的编制，已见前第二章。关于校雠的发明，也略见于本章的前节。现在阐述他们校雠的方法和成绩。

张尔田说：“大哉校雠之为学也！非其人博通古今道术而又审辨乎

源流失得，则于一书旨意，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当汉成世，既命谒者陈农求遗书，向独为之检校，区分类例。今观所传叙录，提要钩玄，往往一二语即洞明流变，有不待详说而犖然者。故孟坚撰史，至以辨章旧闻，推为司籍之功。所谓辨章旧闻者，盖不徒鳃鳃于写官之异同与夫官私著录之考订而已。若但取古今藏本诂正文字，斯始事之所为，向不如是也。”这是他序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的话，恰当地评述了刘向在校雠学上的功绩。刘向的校雠，首先在辨章旧闻，就是搜集了许多旧的文献材料仔细地加以辨别，判断它的是非。也就是吸收它的精华，吐弃它的糟粕，而不持厚古薄今的偏见。然后才能把许多书籍区分类例，把一书内容提要钩玄。至于诂正文字，只是从事校雠的基础。有人以为刘向的校雠学，就在诂正文字，是取其小而遗其大。

孙德谦对刘氏校雠学的研究

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原书都已失传了，清人搜辑的几家，以姚振宗所辑的《别录七略佚文》七卷为最佳，但也不过残文而已，比《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原书二十卷，只是什之一二。就这些仅存的残文来研究他们父子校雠学的内容，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孙德谦的《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把刘氏校雠，分析为备众本、订脱误等二十三个条目，每条都有具体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这里就效法《汉书·艺文志》用《七略》删要的前例，述之如下：

一，备众本。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校雠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提出了广储副本的必要，又分别了官守和家藏，说很精到。

二，订脱误。《汉志》于《易》家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

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于《书》家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据此可知刘向校书，对于订正脱误，是非常注意的。他订正书中的误字，如《晏子书录》：“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榦。”《列子书录》：“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榦，校榦从中书。”《战国策书录》：“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又《北堂书钞》引：“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这里的榦与榦，当与榦同，即表的意义，可知刘向的校书，必把误字表出而加以订正。

三，删复重。《易传淮南道训书录》：“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战国策书录》：“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晏子书录》：“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孙卿书录》：“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筮子书录》：“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列子书录》：“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邓析子书录》：“除复重，为一篇。”这都是刘向合中外各本所有重复之篇，留其一而删其余的说明。然其所删的，必属文字完全相同，倘是有所不同，仍兼收不敢遗失。《晏子书录》：“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其下又云：“外篇重而异者第七。”每章之后有云：“此章与景公酒酣，愿无为礼，晏子谏，大旨同，但辞有详略尔，故著于此篇。”又有云：“此章与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慧星而感，旨同而辞少异尔，故著于此篇。”他对于前古文献，斤斤保存，不敢遗失，益可信他所删弃的部分，必定经过精细的研究，确无保存的价值，决不是随意对待的。

四，条篇目。《汉志》云：“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是一书的原有篇目，刘向都取而分条罗列，就是上面所举《孙卿》、《筮子》

诸书所谓定著若干篇。又有其书篇目经向删减的，如《隋志》所著《贾子》是。又有向所定篇目，多出于今本的。如《隋志》所著《礼记》是。又有向所定篇目，与今本不同的，如《礼记·乐记》正义所著《乐记》篇目是。又有今书虽已亡失，而向于校讎时犹举其篇目的，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所著《明堂阴阳》、《王制》、《申子》、《尹都尉》等诸条是。刘向这几种条次篇目的体例，尤以后一种为重要，如《礼记·王制》一篇，本汉文帝使博士所作。《史记索隐》引刘向《七录》（当作《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可知今本的一篇，原是把三篇合并起来的，倘无刘向举其篇目，后人就无从知晓。

五，定书名。两汉以前的学者，并非专以著书为事，故所有著作，不一定题有书名，校书者可以根据内容，定一名称。又有原名不妥或有歧异的，校书者也可以参酌情况，重为更定，刘向于《淮南九师道训》和《战国策》即是如此。徐坚《初学记》引《别录》：“所校讎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九师书》。”是此书原名《九师书》，今称《淮南九师道训》，为刘向所更定的。《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一书而有六种不同的名称，刘向根据内容，选择了《国策》的名称；又为明确起见，更加上一个战字，并于书录中说明了理由。

六，谨编次。郑樵《通志·校讎略》论编次有七目，尤其重要的是《编次必谨类例论》，他非常推崇专门之学，以为校讎书籍，必须专门名家，才能分析类例。这个主张，是源出于刘向的校书。《晏子书录》：“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可见他对于编次的小心谨慎，必斟酌于轻重得失前后，才能位置安排得

当。《战国策书录》：“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国策》是记各国的史事，其中本无次序，刘向在校雠时，为考其时代而重加编次，然后一国之事，前后秩然不紊。

七，析内外。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风俗通》：“刘向校中秘书。”注云：“言中以别外。”因知刘向校书，如《晏子春秋》分为内篇和外篇，并非有意区别高下，乃是所据校的有中书和外书之别，在删除复重的时候，凡中书所有的称内篇，外书所有的称外篇，内篇犹称天禄本，外篇犹称民间本而已，并没有其它用意。后人不明，以为必有显著的区别，于是阮孝绪《七录序》云：“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刘知幾《史通》于内篇《六家》首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他们的区别内外，并不符合于刘向的本意。

八，待刊改。《风俗通》：“刘向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是刘向虽合中外各本以校一书，但仍不敢确信为定本，而必先写在竹简上，以待别见它本，便于刊改；最后写上帛素。遇到有疑难的地方，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留着以待将来，而决不能凭私意来窜易。假使待之已久，仍无法刊改，有特留空格，以待读者自己去搜寻，这也不违刘向校书的意旨。倘有全无依据，强书就我，对于难解的，悍然改易或削去，使古书面目，反误于校者之手的，未尝没有，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九，分部类。说已见前第二章目录的分类节。《隋志·史部·簿录》云：“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是言书籍的分别部类，必须能剖析条流。分别部类尤精者，章学诚指出了别裁和互著两例：前者是把全书各篇，辨别它的性质，属于其它某一类的，就别行裁出，置在某一类中。后者是因一书名，在两类之中，不妨参错互见。由于刘向明于学术源流，故部类虽分，而心有权衡，可以措置变化，不会搞乱它的体例。

十，辨异同。校雠须善于“正名辨物”。《汉志·易》家云：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这是辨字句的异同。又《孝经古孔氏》，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这是辨篇章的异同。他更进一步，尤善于辨学术的异同。《列子书录》：“《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又：“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尹子书录》：“篇篇叙异，章章义异，其旨同。辞与老、列、庄异，其归同。”他能这样细致地辨识，不是学问渊深，博览多闻，是不可能办到的。

十一，通学术。《列子书录》：“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繆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汉书·元帝纪》注引《别录》：“《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循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又见于师古注的，墨家《我子》则云：“为墨子之学。”杂家《尉缭子》则云：“缭为商君学。”他能这样的明确指出各家学术的派别，必须先对各家学术派别有深切的认识。为校讎学而不懂得这点，那末，群书杂陈，必至瞠目不知所措了。

十二，叙源流。刘向又注意于源流的叙述，如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对各派探讨根源，立论明确；又有关于书的源流，《列子书录》云：“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于《关尹子》云：“盖公授曹相国参，曹相国薨，书葬，至孝武皇帝时，有方士来，以七篇上，上以仙处之。淮南王安好道聚书，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前者关系为大，盖学术必须沿其流而溯其源，才不会误入歧途。钟嵘《诗品》的论诗，刘知幾《史通》的论史，都得力于此。后者为一书之显晦授受，校讎者也必须叙明。后来私人藏书目录，都取法于此。

十三，究得失。刘氏于《诸子略》儒家云：“游文于六艺之中……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此辟儒之患。”又道家云：“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阴阳家云：“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法家云：“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以下都是历举了一家学术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又有综核了一书内容，指出它的得失。《晏子书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这是言其得。下面又云：“文辞颇异，不合经术者。”这是言其失。所以作校讎研究工作，不仅在是正文字，又必需辨别一家或一书内容的得失，才能对于读者起着指导作用。

十四，撮指意。阮孝绪《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又云：“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是刘氏父子的校书，都指出这部书的主要指意，此见于《别录》辑本如《晏子书录》诸篇。其它残文也多有可考的。道家《辛甲》二十九篇：“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兵技巧《蹴鞠》二十五篇：“《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记黄帝也。蹴亦蹋也。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现在《辛甲》和《蹴鞠》二书，久已失传，由于刘氏写下了书中的指意，我们还可知晓它的大概。

十五，撰序录。刘向每校一书，各有序录，载在本书，后来别钞成书，故名曰《别录》。古人著书，如《易》之《序卦》，《书》、《诗》之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有自序，都为揭明大旨，令后来读者可以通晓作者的旨意。自晋皇甫谧为左太冲作《三都赋序》，遂开索人作序之风。于是有假名贵官显仕以博声誉的，有详述行事的，有泛记交情的，于书的本义反很简略，这种序录体例，与刘氏父子便有根本的不同了。

十六，述疑似。古书有不著作者的姓名，目录家注云阙名，亦可

谓慎重了。倘要辨别于疑似之间，而曰某人所撰，则必要博通群书，大非易事。《礼记·杂记》正义引《别录》：“《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汉志》“《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别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汉志》依据《七略》，今于儒家《河间周制》十八篇班固自注：“似河间献王所述。”《阴阳五曹官制》五篇班固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知必取之刘氏无疑。《史记·孟荀列传》附见淳于髡云：“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好像他是学近杂家。又云：“其陈说慕晏婴之为人也。”晏婴是儒家，那末他又学近儒家了。郑玄《周礼注》引《王度记》，是讲制度的书，和《王制》略同。由此看来，《王度记》可能是淳于髡所作，但究无实据，只可说“似”，更见其慎重之至了。在后人，凡是占验之书，托之李淳风，神怪之书，托之东方朔，专辄臆断，可说是不懂得校讎之学。

十七，准经义。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各自著书立说；至汉武帝时，才推尊儒家，而以孔子为圣人。故《史记·孔子世家赞》：“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刘向在司马迁后，他校定群书而一以经义为准，也是必然的趋势。《六艺》一略和儒家，自不待言。《诸子略》中，每家必引孔子的言论为折衷，如道家云：“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阴阳家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云：“《易》曰：先王以明罚飭法。此其所长。”名家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纵横家云：“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农家云：“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小说家云：“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总论又云：“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其它诸略，也都是这样，可知他校理群书的宗旨。

十八，征史传。《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们读古人书，一定要具知人论世之识。刘向校

书，也很注意于此。《汉志》于《晏子》、《荀子》、《管子》、《韩非子》诸书下，皆注云：“有列传。”颜师古曰：“谓《太史公书》。”这即是班固本之刘氏。其它《史记》无传而据所知来略注其人的历史的，于《春秋》“冯商”云：“商，陵阳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几病卒。”于农家《汜胜之》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计若干条，见于颜师古注所引。又于《乐》“《雅琴赵氏》、《龙氏》”云：“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渤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燕间为散操，多为之涕泣。”于小学《史籀》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又若干条，见于《艺文类聚》所引。这一体例，是深得孟子之旨的，后来目录有著明作者简史的，即本于此。

十九，辟旧说。扬雄《法言》：“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这因为二者的学派不同而辟之。校书者对相传旧说与情事不合的，也应该力辟之。刘向于《邓析子书录》云：“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执政。《记》或云‘子产执而戮之’。于《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歆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为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竹刑，简法也。久远，世无其书。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他所举的《记》和传说，均是旧说，误谓子产诛邓析。再举最可信的历史《春秋左氏传》，替子产辨诬，而事实便清楚了。但如《庄子》这样的寓言性质，当然不适用这种方法，要分别来看待。

二十，增佚文。刘氏校书，上面讲过删复重，然也有增佚文的。以《晏子春秋》和《史记·管晏列传》对比，便可知今本《晏子春秋》中有刘向据《史记》增补的佚文。《史记·管晏列传》的《晏婴传》中，有越石父贤在縲继中和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两节，今也见于《晏子春秋》中，原不足怪。但《史记》的赞明明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那末，《史记》列传所载的都是他们的轶事而为《晏子》书中所没有的，这两节事既载《晏子春秋》，就不应该见于《史记》。然却正可以推得刘向校《晏子春秋》时，认为《史记》所载是《晏子》佚文而据以增补。管异之没有注意这点，相反地以为《晏子春秋》而有《史记》两节文字，便是后人作伪之证，那就大误了。刘向校书有增佚文一例，宋王应麟也辑有郑玄《易》注和三家遗书。清人校刻古书，往往增辑佚文，附于全书之末，有网罗散佚之功，是最好的体例。并扩而大之，开了辑佚书的风气，臧庸、严可均、马国翰、任大椿、孙星衍等一时并起，蔚为清代学术中突出的一门，其实也是刘向创始的。

二十一，考师承。两汉的经学，最称发达，对于师承，也最为尊重。他们都能确守家法，成为专门之学，故《史记》、《汉书》于儒林人物，必详记他的师承。刘向校书，也是这样。《孙卿书录》：“李斯尝为弟子，既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又《春秋正义》引《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卫人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赵人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同郡荀卿，荀卿授武威张苍。”《史记·荀子列传》索隐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今存的《别录》佚文，几乎每经都详载传授源流。如荀子和墨子之传授，都历历可考。且李斯、韩非是法家，吴起是兵家，荀子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文子是道家，子夏是儒家，墨子和他们的关系又怎样；其中的变迁消息，都可以探得了。

二十二，纪图卷。古者称左图右书，本是图书并重。《汉志》本

于《七略》。兵书一类，为任宏所校，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而刘向所校的《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中，除《易》家的《神输》五篇图一，《论语》家的《孔子徒人图法》二卷以外，却不多见。宋郑樵《校讎略》遂严厉批评刘氏父子，说他们不知收图，向歆之罪，上通于天；不知兵书虽校于任宏，而书录则仍是刘向所撰，同于后世的总校和分校，向乃总校，那末，兵书的有图，本可属于刘向，况还有《神输》五篇图一和《孔子徒人图法》的存在呢？又刘向自著《列女传》有颂图，歆于《七略》“臣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又明著之，怎能说他们不知收图而加以通天之罪呢？这是郑樵的谬妄。

二十三，存别义。刘向校书，聚集了中外各本，有彼此同载一事，而详略不同，是非莫定的，他便把别义附存书中，而加一曰二字标明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一曰：晏婴子聘鲁。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与一国虑之，鲁不免于乱，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谓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为众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鲁国之群臣以千百数，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数非不众，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顾广圻《韩非识误》：“按一曰者，刘向叙录时所下校语也，谓一见于《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这就是刘向校书时所存的别义。其后又云：“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又：“一曰：公孙鞅曰……”顾广圻谓本书一曰皆同例，是很正确的见解，想原来不止这三条，多经后人删削了。《晏子书录》所谓“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在这里又得一确证。

以上详细地分析了刘氏父子校讎学的内容，后来研究校讎的，大都是源出于此，很少能越出它的范围，所以刘氏父子被推为校讎学者的正宗，是当之无愧的。

第六节 汉晋人的校讎学

校讎为汉学的主要部分

两汉的学术，注重实事求是，后人号称为汉学。校讎之学，自刘向父子奠定基础，遂为汉学中的主要部分，后来的学者，几乎不能越出它的范围。许慎和郑玄，为汉学的代表人物，他们诂释群经和字义，博大精深，然而不能离开校讎这个基本工作。即如高诱的注解子史，也是这样。魏、晋时代，玄学盛行，然一二好古笃学之士，仍能继两汉遗风，从事于古籍的整理。今略述汉、晋两代对校讎学有特殊贡献者，作为范例。

许慎的校讎学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洺长。生建武六年，卒延光三年。《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经异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原书已失传，清陈寿祺辑录成书三卷，并为作《疏证》。《说文解字》十四篇，后附叙、目，卷各分上下，今为三十卷。这是我国古代学术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不仅仅对于文字学而已。因而研究这部书的，便称为许学。

《说文》后附作者的儿子许冲进书表称：“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这件事，《后汉书·许慎传》中没有记载。据段玉裁的考证云：

“安帝永初四年，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儒林传》则云：太后诏刘珍与刘驹馀、马融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云云，与《和帝纪》同。《马融传》亦云：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盖

此时分司其事者，史不尽载，许亦其一也。许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已创造《说文》，历十一年，至永初四年，复校书东观，其涉猎者广，故其书以博而精也。又十有一年而书成。是许慎参加过以刘珍为首的校书工作，有机会饱读东观的藏书，又先后经历了二十多年之久，所以能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说文解字》。他虽没有关于校讎的专门著作，却可于《说文》中知道他的精于校讎。

《说文》根据经古文和鼎彝文

据《说文·自叙》，他曾见到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见到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这些书都是古文，藏在秘府，倘没有校书东观的机会，是不易见到的。他把当时通行而立于学官的今文诸经来相互校讎，而肯定了古文本，《说文》所采用的，“其偶《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和刘向校书的具备众本是一致的。

《说文》是讲文字学的书，对秦书的八体，王莽的六书，当然应该参考。他又提出了“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这是他的校书，不仅采用直接的材料，而兼能采用旁证材料，在校讎学中又辟一新径。

《说文》确守阙文之戒

他又确守孔子阙文之戒，引《论语》“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而申言之曰：“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他深恶人用己私来变乱古书面貌，故一则曰“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再则曰“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在《说文》全书中多著阙字，有形、音、义全阙的，有三者中阙其二或阙其一的。他并不是不能依据字例来补完，而正是他的遵修旧文。又如《说文》有云某声而无某篆的，如由、免诸字，其实并非当时没有这

个字，或是他的遗漏，也是守阙疑之法。后人不知，反有据以补入篆文，是不察许慎校书之例了。

《说文》反对俗书

他对于俗书的破坏形体，谬乱文义，尤痛切言之：“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文字虽然是群众的创造，也必须是约定俗成，或功令所颁布，才能通行。决不能人人自己来造一套，使人家都看不懂，许慎作《说文》是为了“理群类，解谬误”，由讲文字而可推之于校讎，其理是一致的。

郑玄的校讎学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官大司农。生永建二年，卒建安五年。《后汉书》本传：“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他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称之曰郑学。不但兼通群经历算，还能兼通经今古文而折衷求是。著作极多，《毛诗》的笺、《仪礼》、《周礼》、《礼记》三种的注，至今原书完整。其它已失传，清人做了不少辑佚工作，以孔广林《通德遗书》、袁钧《郑氏

佚书》、黄奭《高密遗书》的内容较完备。

《诗笺》的校讎

郑玄据毛亨《诗传》作笺，《毛诗》为古文家，玄乃本习《韩诗》，又兼通《齐》、《鲁诗》，《齐》、《鲁》、《韩》为今文家，和《毛诗》的家法不同，文字有异，所以他的笺，有用三家申毛的，有用三家改毛的，而非墨守《毛传》。如《关雎序》“哀窈窕”笺：“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又“君子好逖”传：“逖，匹也。”笺：“怨偶曰仇。”《邶风·绿衣序》笺：“绿，当为祿。故作祿，转作绿，字之误也。”《鄘风·君子偕老》：“其之展也。”传：“礼有展衣者，以单縠为衣。”笺：“展衣字误，《礼记》作襢衣。”《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笺：“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秦风·无衣》：“与子同泽。”传：“泽，润泽。”笺：“禕，褻衣，近污垢。”其它言某当作某的很多，都是认为今文比古文的意义好，所以依今文来改古文而为之作解。后人斥以破坏家法，而不知这正是他校讎的家法。

《周礼注》的校讎

郑玄注《周礼》，以故书来校勘今书，而每条注出了它的异同。据首篇《天官冢宰》为例：《太宰》：“二曰嫔贡。”注：“嫔，故书作宾。”《小宰》：“四曰听称责以傅别。”注：“傅别，故书作傅辨。”又：“七事者。”注：“七事，故书作小事。”《酒正》：“酒正奉之。”注：“故书，酒正无酒字。”《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注：“故书正为政。”《籩人》：“糗餌粉饘。”注：“故书饘作茨。”贾公彦于第一条疏云：“言故书者，郑注《周礼》时有数本，刘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岩石室。有古文考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注、故云故书作宾。”是郑玄校书时，把今书作底本，而著明故书的异文，择善而从，没有偏执。

又有兼采他人的校语，有的再加以自己的判断。《太宰》：“二曰宾贡。”注：“郑司农曰：宾贡，皮帛之属。玄谓宾贡，丝枲。”《小宰》：“六曰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为廉端。”又：“七事者。”注：“杜子春云：当为七事，书亦或为七事。”《甸师》：“祭祀其萧茅。”注：“郑大夫曰：萧字或为茜。”郑大夫为郑兴，郑司农为郑众，因是同宗大儒，故不称名而称官。第一条郑众是从故书作宾，而郑玄则从今书作宾。第二条是杜子春所校的别一本。古人于不同，必谨志于注，留待后人的论定。第三条杜子春也从今书作七事，但说明故书也有作七事、小事两种。第四条是郑兴所校的别一本。这是博采通人的校勘方法。

《仪礼注》的校讎

《仪礼》的古文，出于鲁淹中和孔氏壁中，见《汉志》。而河间献王所得先秦旧书，也有古文《礼》，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今文则是高堂生所传的。那末，古文有三本，郑玄据以校勘今文，而各著明它的异同。据首篇《士冠礼》为例：“阼西阼外。”注：“古文阼为絜，阼为蹙。”“旅占”注：“古文旅作胪。”“纁裳”注：“今文纁皆作熏。”“面枋”注：“今文枋为柄。”这是参酌了古文和今文，择其义长者作为正文，其异文则附于注中。唐贾公彦于第一条疏云：“郑注《礼》之时，以今古二字并之，若从今文不从古文，即今文在经，阼阼之等，于注内叠出古文絜蹙之属是也。若从古文不从今文，则古文在经，注内叠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时格，郑注云‘今文格为馥’，又《丧服》注‘今文无冠布纓’之等是也。此注不从古文絜蹙者，以絜蹙非门限之义，故从今不从古也。《仪礼》之内，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挽见之。又郑叠古今之文者，皆释经义尽乃言之。”分析了郑玄校勘《仪礼》的体例，并指出校勘之文，不与释经义之语相混，而必列于后。这成为校勘的定例。

《礼记注》的校雠

注《礼记》也用各本互校，据首篇《曲礼上》为例：“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注：“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丈或为杖。”“敛发无髻”注：“髻或作肄。”“跪而迁屣”注：“迁或为还。”凡是称或为、或作的，都是郑玄所据作注以外的本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下云：“郑亦附卢、马之本而为之注。”卢为卢植，马为马融。玄与卢植同师马融。卢植曾撰《礼记注》二十卷，见《隋志》。故他注《礼记》即用卢、马之本校勘，发现有异文，便附入注中。

又有以今字来校释古字的。如“幼子常视无诳”注：“视，今之示字。”“左右攘辟”注：“或者攘古让字。”后来校书的也常行用此例，把今字注在古字之旁。而传钞或刻书者又误入正文，此又须待后人来校正。

校读古书的读如读若等三例

郑玄校雠之业，不仅是比对异同，择善而从；他又能深入研究，知其所以致误之由，而以文字、音韵、训诂通之。段玉裁于《经义杂记序》言之最确：“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成帝时，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向卒，歆终其业。于是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字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已为之补正。凡拟其音者，例曰读如、读若；音同而义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如读为、读曰；谓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义乃了然也。凡审知为声相近、形相似二者之误，则曰当为，谓非六书假借而转写纒繆者也。汉人作注，皆不离此三者，惟郑君独探其本原。其序《周礼》有云：二郑、贾、马之文章，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吾师曹氏元弼云：当作析符复合。）当犹有差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夫就其原

文，所谓相其文义之离合也。就其字之声类，所谓审其音韵之远近也。不知虞、夏、商、周之古音，何以得其假借训诂？不知古圣贤之用心，又何以得其文义而定所从，整理百家之不齐哉？”对于郑玄校书方法的说明，可说是非常详尽。这里所提的三条例子，是汉人为古书作注；于文字方面发疑正读的通例，除了郑玄《诗》、《礼》之外，其它诸经和《国语》、《史记》、《汉书》、《淮南鸿烈》、《吕览》都是这样。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序》中说得更加具体。《序》云：“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了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又分析了比方之词、变化之词、救正之词三种词性。用此方法来读汉以前的古书，当不至有不可通之处了。

高诱的校讎学

高诱，涿郡人。卢植的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历官东郡濮阳令，迁河东监。著有《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三书，今并存。

高诱《吕氏春秋注》自序：“此书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是此注旨在纠正原有脱误和小儒私改，虽不必汇集众本，而其实也是校讎。《四库提要》：“于引证颠舛之处，如《制乐》篇称成汤之时。谷生于庭，则据《书序》以驳之。称南子为釐夫人，则据《论语》、

《左传》以驳之。称西门豹在魏襄王时，则据《魏世家》、《孟子》以驳之。称晋襄公伐陆浑，称楚成王慢晋文公，则皆据《左传》以驳之。称颜阖对鲁庄公，则据《鲁世家》以驳之。称卫逐献公立公子黜，则据《左传》、《卫世家》以驳之。皆不蹈注家附会之失。”历史以事实为贵，诸子的称引，除《庄子》旨在寓言外，每多舛讹。高诱根据可信的记载，加以驳正，虽为注书之事，也为校书之事，而不失为实事求是之学。

《淮南子》高诱注，今有一部分和许慎注相混。其自序云：“建安十年，辟司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其凌迟。于是以朝馔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今书中如《地形》篇：“玉横维其西北之隅。”注云：“横犹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药器也。”《本经》篇：“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注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所谓或作者，是据别一本所校，不但兼载其文，而又兼释其义，也是校雠中的创例。

荀勖校汲冢书

晋汲冢竹书的发现，是继孔壁古文后的一件大事。武帝把这些竹书交给秘书监，当时领秘书监的是荀勖，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因而撰定《中经新簿》，见前第二章。《中经新簿》早已失传，据《隋志》云：“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是其书和刘氏《七略》体例不同。然今传汲冢所出的《穆天子传》，却明明有荀勖的校上序一篇，与《别录》相似。且《晋书·荀勖传》明云：“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都与《隋志》不合，因疑李延寿，敬播修《五代史志》时，已未见《中经新簿》原书。今《穆天子传》校上序幸附原书以存，犹可窥见荀勖校书的体例，特录此以备参考：

穆天子传序

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荀勖撰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仅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

束皙校汲冢书

整理竹书的工作，除由荀勖总其事外，以束皙用力为最多。《晋书·束皙传》言之颇详，且可考见竹书的内容。《传》云：“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官至尚书郎。太康二年（《晋武帝纪》作咸宁五年。《荀勖传》作咸宁初。杜预《左传后序》作太康元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

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晷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束皙等整理成书的共十七种，每种都有简略的内容提要，颇疑《晋书》节取束皙的原文，所以特为列入他的传中。那末，束皙等所校各书，大都像《别录》例撰有叙录，荀勖的《穆天子传》校上序，可能就是这种叙录，出于校者束皙等人之手，而荀勖以总领其事而列衔冠首，和后来《四库提要》的出于戴震、邵晋涵诸人之手，而以总纂纪昀列衔一样。《束皙传》中又载他考证汉简一事云：“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服其博识。”可惜所记太略，不能知它的文字内容了。

第七节 南北朝唐人的校雠学

南北朝学派的不同

在南北朝分立的时代，经学也有南学、北学的区别。《北史·儒林传序》：“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

《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是南北学派不同，故宗尚亦异。《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为南人崇玄学，而以文学自矜，反不如北人的重经学，能得汉儒服、郑之传。校讎为汉学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北朝人较为重视。

邢邵的校讎学

邢邵字子才，河间邺人。官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北齐书》本传：“雅有才思，聪明强记，日诵万余言，博览文籍，无不通晓。有书甚多，而不甚讎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日思误书，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华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是谈校书的名言。因为校讎虽需要材料，然更重要的还是着重思考。古书中积误已久的地方，一朝思而得之，确是一件最舒适的事情。既得其误，为什么自己不校而反要笑人家的校书呢？这正由于，因为今天虽有所得，而明天更读它书，安知没有更新的发明？天下书至死读不能遍，所以误书之必需日思。偏于自信者，往往轻加校定，而实非本意，后人读之，觉文从字顺，不会发现它的错误，那问题就更大了。他答李季节的话，是强调校书要独立思考，才能有所发明，不能完全依赖他人。今天我们读前人校订的古书，即使是最完美的，也仍须自己来思考，才能发现错误，补充遗漏，而符合于科学研究的精神。

颜之推的校讎学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官北齐黄门侍郎。入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生梁中大通三年，卒隋开皇十一年。著《颜氏家训》七卷。《郡斋读书志》：“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四库提要》列入子部杂家类，谓其“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即是这书的有关校讎部分。今本有赵曦明注，卢

文昭补，最为善本。

《勉学》篇：“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字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颞项字，项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翮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探讨，方知误焉。”又《文章》篇：“《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银铛鑱。银铛，大鑱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鑱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这都是说明误本不校的为害，以至误认芋作羊，误读颞项为专翮，误用银铛鑱为银鑱。形之于尺牍与诗篇，又自诩为独得，而不知人们正在窃笑他的不学呢。类此的事例，多不胜举，颜之推特地举出来告戒子孙，可知他对校雠是非常重视的。

读书果是不可不重视校雠，然校雠又谈何容易，《勉学》篇：“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这可以和邢昺的话相参。邢昺因为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所以只思而不校。颜之推也主张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点是两人意见相同的。邢昺是希望读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依赖他人。颜之推是要求校者要缜密思考，不要妄下雌黄。也是如异而实同。

南北朝的学派不同，南北朝的书本也有不同，有所谓江南本和河北本。颜之推就据两本来校正书籍文字，其说多见于《书证》篇，今举例于此：“《诗》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传曰：杕，独貌也。徐仙民音徒计反。《说文》曰：杕，树貌也。在木部。《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又：“《诗》云：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韩诗》亦重为施施。河北《毛诗》皆云

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误。”又：“《汉书》：田冑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称班史呼为田冑。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冑。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冑。”又：“《汉书》云：中外提福。字当从示。提，安也。音匙匕之匙，义见《苍》、《雅》、《方言》。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多从手，属文者对偶，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是所据江南、河北各本，遍及经史。又有所谓世间传本和俗本的，莫不兼收并校而定其是非，已类似后人所撰的校勘记了。

它如据《说文》以正形体，据《尔雅》以正训诂，据韵书以正音读。又所据材料，遍及群书，兼之金石，于校勘之业，已是非常全面而具体，虽不是讲校讎的专书，而确是于校讎有重要的关系，我们应该取法的。

唐代重视校讎

自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学术也归于统一。政治由北并南，而学术则反由南并北，并不是据人的居址分，而是据学的宗尚分。于是《易》宗王弼注，《书》宗伪孔安国传，《左传》宗杜预集解，汉儒服虔、郑玄之学遂渐致衰微，这是学术上的一大变迁。然由于统治者的注意文化事业，一面征求遗书，建馆储藏；一面延聘通儒，从事校理。高祖武德初，有书八万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掌详正图籍。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经籍亡佚，请求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其后贞观、开元，访书校书，相继不绝。所以有唐一代，校讎的成绩仍是巨大的。

陆德明的校讎学

陆德明字元朗，吴人。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生梁大同十年，卒唐贞观初。著《经典释文》三十卷。所释为《易》、《书》、

《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自序云：“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义训兼辨，示传一家之学。”《郡斋读书志》云：“颇载古文及诸家同异。”《四库提要》云：“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待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胡虔《柿叶轩笔记》云：“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其字句音训之不同者，各有意义，可以考见经师相传家法。且多至二百三十余家，故足宝贵。”实是一部内容很丰富、价值很高的校雠学巨著。又德明虽为唐人，其书的创始尚在陈代，完成也在隋前，梁玉绳《瞥记》：“许周生云：《释文》不独创始于陈后主元年，其成书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叙录》中，于王晓《周礼音注》云：江南无此书，不详何人。于《论语》云：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又其书中引北音，止一再见，似书成后入隋、唐，亦不增加也。”案《释文·条例》亦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这里的宋、齐旧本，即颜之推所谓江南本。据此，这部书虽列为唐代著作，它的内容实为南学，和唐代的崇尚南学是符合的，《玉海》引《旧唐书》别本云：“贞观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阅德明《经典音义》，美其弘益学者，赐其家布帛百匹。”其深为当时统治者赏识，不是没有理由的。

朱墨别异和摘字为音

《经典释文》的首列《条例》，自述著述之体，特重在音训，其有涉及校雠的，如：“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非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旧音皆录经文全句，徒烦翰墨。今则各标篇章于上，摘字为音，虑有相乱，方复具录。唯《孝经》童蒙始学，《老子》众本多乖，是以二书特纪全句。”他提出了朱墨别异和摘

字为音的两种方法，也可通之于校讎。朱墨别异，是便于读者循省易了，至今校书者仍用朱墨笔来分别所据的不同版本。在套印术未发明之前，如宋刻《本草》之用阴阳字来代替朱墨。摘字为音，是为了省却繁文。《释文》既与《易》、《书》等原书别行，为检查的方便，必须有一记号。随便摘出有关的两个字作为记号，而把音训双行注于下；有的需要全句的，也可特纪全句。后来撰校勘记的多采用这两种方法。

《经典释文》的四例

《条例》又云：“余既撰音，须定纒繆。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后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犹存之者，示博异闻也。”他的撰音，以定纒繆为正例。以明同异，加刊正，博异闻为变例，和刘向的校讎方法相同。正纒繆即刘之订脱误。明同异即刘之辨异同。加刊正即刘之待刊改。博异闻即刘之存别义。是陆德明深有得于刘向校讎学的意义。

反对改音易字

校讎之学，宜正字体。《条例》云：“《尔雅》本释坟典，字读须逐《五经》，而近代学徒，好生异见，改音易字，皆采杂书，唯止信其所闻，不复考其本末。且六文八体，各有其义。形声会意，宁拘一揆。岂必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著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中，如此之类，实不可依，今并校量，不从流俗。”《尔雅》本是用来解释经义的，今妄人乃多采用杂书来校《尔雅》，常把音和字改易了，这是不可信从的，应该加以校量以取别于俗学，推之它经，都是这样。既是古书，就不能混用后世的俗字，必须校正，这是校书的正轨。

主张兼存俗字

他又主张兼存俗字。《条例》云：“《五经》字体，乖替者多，至

如鼃鼃从龟，乱辞从舌，席下为带，恶上安西，析旁著片，离边作禹，直是字讹，不乱余读。如宠（丑陇反）字为宠（力孔反），锡（思历反）字为锡（音阳），用支（普卜反；《字林》，普角反）代文（武云反），将无（音无）混无（音既），若斯之流，便成两失。又来旁作力，俗以为约勑字，《说文》以为劳徠之字。水旁作曷，俗以为饥渴字，《字书》以为水竭之字，如此之类，改便惊俗，止不可不知耳。”经字的错误，和其它字形声都不会相乱的，人们还容易辨别；倘是和它字形声都相近的，那就不易认识了。所以对这必须特别注意。还有误用已久，已为人们所承认的，像勑、渴一类字，它的本义已久废不用，倘必欲改正，那是泥古不化了。当然，其本意还是不可不知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许君《说文》，象似之象应作像，而许君称象形者皆作象。减省之省应作涓、作媮，而许君称从某省者皆仍作省。重叠之重应作纒，而许君称重文者皆仍作重。可知祭酒惟示人以书契之旨，未尝尽强人以反舌也。后人读书，好骇俗目，自是学古之癖。”陆德明深得于许慎校雠学的旨义。

颜师古的校雠学

颜师古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人。生隋开皇元年，卒贞观十九年。为颜之推之孙，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很深。官秘书监。著作甚富，传世的有《汉书注》一百二十卷，《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也曾参预《周易正义》、《隋书》的修纂。

校《五经定本》

江南本和河北本的文字不尽相同，唐统一南北之后，为了使学术也统一起来，首先着意于群经的文字。于是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号称《定本》。《旧唐书·颜师古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

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是《五经定本》之产生，经过了和诸儒的激烈争辩，从此读经者不再有文字纷歧之感。看他和诸儒争辩时所引据的是晋、宋以来古今本，也是主张南学，和陆德明的引据宋、齐旧本是一致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是不但由于当时的提倡南学，也由于他接受的家学渊源。今《定本》虽已不传，而其说多为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所引用。

《汉书》的校雠

师古的《汉书注》，是史部中的一大著作。先是，他的叔父游秦，对《汉书》研究颇有成绩，《旧唐书·颜师古传》说他“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师古承其家学，更据古本和各家旧注，加以钻研，完成了这部一百二十卷的大著作。本传称“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功臣”。

《四库提要》称“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又称“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王先谦《汉书补注·序例》称“师古注《汉书》，发明驳正，度越曩哲，非仰人鼻息者也”。这些评论，是当之无愧的。宋代刘敞、刘敞、刘奉世和吴仁杰各著书纠举他的错误；虽有些许缺点，仍无损于原书的价值。至今学界犹一致视为是研究《汉书》的必读之书。

颜师古《汉书注》首载有《叙例》一篇，所举的十条例子，不仅可为注书的范例，也是研究校雠学的参考资料。

《匡谬正俗》的校雠

师古又因世俗之言，每多谬误，乃根据经史来匡正之，名曰《匡谬

正俗》。或作《刊谬正俗》，或作《纠谬正俗》，则是宋人避太祖讳而改的。此书本未完成，今本八卷，乃是其子扬庭据遗稿所编定。前四卷皆论诸经的训诂音释，后四卷皆论诸书的字义字音和俗语相承之异，故《四库全书》列在经部小学类，而《提要》称为“考据极为精密”，卢见曾也称“其中所引典籍及诸家训诂，多上世逸书，言辨而确，可资后学见闻”，甚为古今所推重。

校《尚书序》误文

书中有关校讎的，如卷二《尚书》条：“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览者，谓习读之人，犹言学者尔。盖思后之读史籍者，以其烦文不能专一，将生异说，故删定之。凡此数句，文对旨明，甚为易晓。然后之学者，辄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览之者不一，虽大意不失，而颠倒本文，语更凡浅，又不属对，亦为妄矣。今有晋、宋时书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览者之不一。又云：以所闻伏生之书，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盖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传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隶古字，定讫，更别以竹简写之，非复本文也。近代浅学乃改隶古定为隶古字，非也。案直云隶古，即是隶古字，于理可知，无所阙少。定者，谓定讫耳。今先代旧本皆为隶古定，不为古字也。”校正《尚书序》的两处误文，所据的是晋宋时书和先代旧本，并疏释了校正的理由，真是言辨而确。书之文字最易致误和校者最易忽略的，一种是于大意不失，因而不复注意，如“惧览者之不一”误为“惧览之者不一”。一种是不常见的名称，因而加以擅改，如“隶古定”改为“隶古字”并失其句读。这里都明白地指出了。由此可以推得他的《五经定本》，也是用这种校订方法。

校《过秦论》误文

又如卷五逡遁条：“贾谊《过秦》云：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

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已困矣。遁者，盖取盾之声以为巡字，当音详遵反。此言九国地广兵强，相率西向，仰形胜之地，溯函谷之关，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险固，无惧敌之心，不加距闭，开关而待。然九国畏懦，自度无功，迟疑不进，坐致败散耳。后之学者，既不知遁为巡字，遂改为遁逃，因就释云：九国初见秦闭关，谓其可胜，所以率兵来攻。忽见秦人开关，各怀恐惧，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赋》云：或开关而延敌，竞遁逃以奔窜。斯为误矣。若见秦开关遁逃而走，即应大被追蹶，覆军杀将，岂得但言不敢进而已乎？且书本好者，今犹作逡遁，不作遁逃也。”校正《过秦论》的误文，所据的是“书本好者”，也即是晋、宋时书和先代旧本之类。潘岳词章之士，所据已为误本而不知改正，不能反据它作证。遁与巡为假借字，不懂音韵的无法理解，只见秦胜而九国败，败者必逃，逡与逃二字又形近，遂误改为逃遁了。经师古这样分析，岂不令人哑然失笑？《过秦论》的文字稍觉古奥，或因而容易误会本意。他又用通俗文体把这段文字译述，逡遁和遁逃一字之异，而两种译述显然不同，谁是谁非，一望可知。也可说已提示我们今天用白话译述文言的先例了。由此可以推得他的《汉书注》，也是用这种校订方法。

韩愈的校讎学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生大历三年，卒长庆四年。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从他文章所涉及的，可知道他是很注意校讎的。《读鹞冠子》：“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鹞冠子》的篇幅是不多的，他能正、乙、灭、注至七十二字之多，可说是很仔细的了。正，是校正误字；乙，是乙正颠倒；灭，一本作减，是除去衍文；注，或是旁注疑而未定之字。方法已经很完备。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书》、《礼》剔其伪。”东晋的伪《古文尚书》，唐孔颖达据以作《正义》，为功令所习。韩愈首先

知它有伪而剔除之，这也是校雠学中辨别古书真伪的发明者。由于他在古文运动上的盛名，人们往往忽视他的校雠学。

第八节 宋元明人的校雠学

宋秘阁重视校雠

自唐末发明了刊印书籍，至两宋而官家和私人的雕版盛行。雕版必须校雠，因而校雠之业也称极盛。其官家的重视校雠，则设官自有专责。《宋史·艺文志》：“真宗时，王官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复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神宗改官制，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脱误，则主于校书郎。徽宗时，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案三馆谓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摹工缮写。搜访辑补，至是为盛矣。”所以北宋时，名贤学士多人秘阁校理书籍，各撰叙录，大有上继汉天禄阁遗绪之风。其叙录今可考见的，黄伯思《东观馀论》有《校定楚辞序》、《校定焦贛易林序》、《校定师春书序》三篇。曾巩《元丰类稿》有《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陈书目录序》、《唐令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徐幹中论目录序》、《说苑目录序》、《鲍溶诗目录序》十一篇。苏颂《苏魏公文集》有《补注神农本草总序》、《本草后序》、《本草图经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又《后序》、《校风俗通义题序》、《校淮南子题序》七篇。据沈括《梦溪笔谈》：“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是当时对于校书事中途而废，很为可惜。又据《笔谈》：“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

字于其侧，以为日课。”则可知当时任校书之责的人，多有滥竽充数，志在干禄，不如黄伯思、曾巩、苏颂等忠于职事，它的成就，遂远不及私人了。

宋代校讎学的成就

昔人谓汉儒重考据，宋儒重义理，不过举其大端而已，其实谈考据的并不能脱离义理，谈义理的也不能没有考据。校讎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而宋儒义理学的代表朱熹，就非常重视校讎，如《孝经》有《刊误》、《韩文》有《考异》，可称为校讎学的大家。倘只谈义理而鄙弃校讎，是并非真能了解宋儒的。宋人的校讎，在四部书都有卓越的成绩，罗列版本异同的，以岳珂为代表；辨章学术源流的，以郑樵为代表；钩考群籍证补的，以吴缜为代表。著作如林，美不胜收，而零星材料见于各家笔记中的尚多。元、明两代，学术稍衰，虽刻书藏书之风，不亚于两宋，而校讎之学，可以举数的，有寥若晨星之感。

吴缜的校讎学

吴缜，字廷珍，成都人。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着意文章而忽略考证，所以有不少错误。廷珍乃指摘它的错误而成《新唐书纠谬》二十卷。自序：“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误，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复；五曰多采小说；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削者不知刊削之要而各徇所私；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务惟苟容。”都击中了《新唐书》的要害。纂修这样一部三百多年的历史，自然要集体协作，但首先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吴缜所举其失有八，就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所造成的。历史记载的是事实，事实是不容许有纷歧脱误的，倘然发现了纷歧脱误，便要参互考订以求其真是。吴

缜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自校正《新唐书》的，不同于一般的根据众本。他还有《五代史记纂误》三卷，也是同样的作品。是和刘敞、刘攽、刘奉世、吴仁杰的《两汉刊误》，同为校史的巨著。

其自序第八条论校勘云：“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务苟简？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雒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暗默，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苟容之故欤？”他举出了文士和胥吏对于校勘不同的责任，议论非常中肯。而裴煜等五人的循故袭常，不负责任，这是他发奋著书的原因。或谓吴缜因欧阳修拒绝他的请求参预修书，故作此书以报复，似乎浅视他了。

《新唐书纠谬》的内容

内容分二十门：一曰以无为有；二曰似实而虚；三曰书事失实；四曰自相违舛；五曰年月时世差误；六曰官爵姓名谬误；七曰世系乡里无注；八曰尊敬君亲不严；九曰纪志表传不相符合；十曰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十一曰载述脱误；十二曰事状重复；十三曰宜削而反存；十四曰当书而反阙；十五曰义例不明；十六曰先后失序；十七曰编次未当；十八曰与夺不常；十九曰事有可疑；二十曰字书非是。第十三门以下，属于史例居多。其它则都是校雠的必要方面。

黄伯思的校雠学

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生元丰二年，卒政和八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故能多见秘阁藏书。著有《东观馀论》二卷，大都是碑帖

书籍的题跋，末有《校定楚词序》、《校定焦贛易林序》、《校定师春书序》三篇，又《汉简辨》一篇，可考他校讎学的大概。

校定序三篇，是他任校书郎时所校的官书。《校定焦贛易林序》云：“承议郎行秘书省校书郎臣黄某所校讎中焦延寿《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误，以快为决，以羊为年，如此者众，校讎已定。又若喜或为嘉，鹤或为鹄，义可两存，皆并著，可缮写。”《校定师春书序》云：“承议郎行秘书省校书郎臣黄某所校讎中《师春》五篇，以相校除复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误以梦为豊，以放为依，如此类者众，颇擷，皆已定，可缮写。”篇末皆云：“谨第录上。”是全仿刘向叙录格式。《师春书》乃晋汲冢所出竹书之一种，据杜预说：是集《左氏传》卜筮事。而伯思所校的秘阁藏本，乃是记诸国世次和十二宫岁星所在，并律吕谥法等，末乃书《易》象卦变，与杜预所说，完全不同。据他儿子黄讒跋，这部书曾刻板于建安漕司，可惜已无传本了。

他多见古书各种不同的本子，汇集作校，所以有一定的价值。如《校定楚词序》云：“近世晁监美叔独好此书，乃以春明宋氏、赵郡苏氏本参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广平宋氏及唐本，与《太史公记》诸书是正。而某亦以先唐旧本，及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及洛下诸人所藏，及武林、吴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李纲《校定杜工部集序》云：“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为多，遭乱亡逸，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浸失旧文，乌三转而为烏者，不可胜数。长睿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游，哀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讎，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可见他对于《楚词》、杜诗的校勘，是搜集了许多藏书家的旧本和校本，尤其是唐代的本子。据黄讒跋，在绍兴年间都曾刻行，可惜今也没有传本了。

《汉简辨》的校史

黄伯思根据地下发现的新材料，校正《后汉书》中相承的讹文，著

有《汉简辨》一文传世，其内容是非常精确的。特附录于此，作为我们校史的参考。

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词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幕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中二千石守（此五字古本缺）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案范曄《后汉书·安纪》，永初元年夏，先零种羌畔，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二年正月，骘为羌所败于冀西。七月戊辰诏，有“羌豺畔戾，夙夜克己”之语。其年十月庚寅，任尚与羌战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骘大将军，召还。则此简所谓车骑将军者，即邓骘也。所讨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纪》所书日月及汉简参考之，简云六月丁未朔，则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则七月不应复有之。而《安纪》是年复有戊辰之诏，盖《纪》误也。又据《安纪》是年七月之后，继书闰月。闰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当复有辛丑，则是年闰当在七月。据汉简六月丁未朔，则后百二十日得两丁未，故简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据《纪》于七月闰，则丁未当在九月矣，又与简不相合，亦《纪》误也。又《纪》书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骘讨之。二年冬始召还。而骘本传云：永初元年夏，羌畔，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部兵击之，西屯汉阳。冬，召骘班师。据《纪》，讨羌在二年夏，召骘在二年冬，汉简亦有二年之文，正与《纪》合，而传云元年诏还班师者，亦误也。简书甚明，乃当时文字，又日月首尾相应，非如史之先后差谬，宜以简所书为正。於戏，千载之下，幸是简偶存，得以考正范史所书之误，是以君子贵乎博学而多识也。

洪兴祖的校讎学

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人。生元祐五年，卒绍兴二十五年。官知真州饶州。事迹载《宋史·儒林传》。著《楚辞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列《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云：“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成书，又得姚庭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案此，本有《考异》一卷，在《补注》十七卷外，今本已把它散入于各句之下，据明仿宋刻本已是这样，可知是宋人窜乱的。《楚辞》本为文学家所应熟读的书，所以像欧阳修、苏轼等都有手校本，洪兴祖在北宋末年，和他们时代不远，故能搜访到十九家的校本，汇集以成书。陈振孙称他用力甚勤，朱熹作《楚辞集注》也多采用，可知这部书的价值了。

洪兴祖的校讎《楚辞》，它的优点是能博采众家，除《书录解题》所举外，洪迈《容斋续笔》又说：“洪庆善注《楚辞·东君》篇絙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引《仪礼·乡饮酒》章：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为比。云箫钟从二乐声声相应者互奏之。既镂板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作搆，广训为击也。盖是击鼓，正与絙瑟为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还有这不知姓名的蜀客，虽所校只有一字，兴祖也谢而亟改之，这态度是可佩的。但现在传本，一本箫作搆条并未载人，想是他先在稿本上改正，已镂板的，便未及改了。由此可知镂板后仍在修改，并不是最后定本。

郑樵的校讎学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生崇宁三年，卒绍兴三十二年。官枢密院编修官。《宋史》本传：“好著书，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

留，尽读乃去。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他著作甚富，最有名的为《通志》二百卷，《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文献通考》引《中兴四朝艺文志》：“中兴初，郑樵采历代史及他书，为书曰《通志》。仿迁、固为纪传，而改表为谱，志为略。”这部书在宋时先刻二十略单行，《四库提要》谓是他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至其全书和其它著作，则《宋史》便称“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已深致不满。《四库提要》对《通志》一书，又历举书中的错误。现在虽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实则远不及他们的精密。

《校雠略》的批判

二十略中的第十六曰《校雠略》，尤为全书中的精华部分。他对校雠之学，是非常自负的，《夹漈遗稿》有《上宰相书》云：“樵校雠之学，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虞世南对校雠的成绩怎样，已不可深考。至于欲与刘向相比，不免言大而夸了。他为了求胜于刘向，所以对于《七略》、《汉志》，下及《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等，几乎无一不加以诋斥，而并不顾到自己的疏忽误谬。章学诚说他“能讥班固的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于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解也”，确能击中他的要害。我们对于《校雠略》的看法，必先批判它的夸大和误谬部分，然后吸取它的精华部分。

《校雠略》的理论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鲁鱼亥豕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是郑樵的校雠学，虽不能比刘向，然也不可否认确有体会刘向父子的要旨的方面。应该指出，他的“略其鲁鱼亥豕之细，而特以部

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讎”，是他特异于一般的校讎学者而成为校讎学理论家的基础。他这部书，也是关于校讎学第一部的专门著作。

《校讎略》的内容

《校讎略》的内容，一曰：《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二曰：《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三曰：《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四曰：《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篇；五曰：《编次失书论》五篇；六曰：《见名不见书论》二篇；七曰：《收书之多论》一篇；八曰：《阙书备于后世论》一篇；九曰：《亡书出于后世论》一篇；十曰：《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十一曰：《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十二曰：《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十三曰：《编次之讹论》十五篇；十四曰：《崇文明于两类论》一篇；十五曰：《泛释无义论》一篇；十六曰：《书有不应释论》三篇；十七曰：《书有应释论》一篇；十八曰：《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十九曰：《编书不明分类论》三篇；二十曰：《编次有叙论》二篇；二十一曰：《编次不明论》七篇。

《校讎略》的特点

章学诚《校讎通义序》：“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是指《校讎略》中的《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和《求书之道有八论》两部分。《求书之道有八论》，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他指示了求书的各种方法，确是非常详备，可作后世的指南针。他又主张求书应当有负专责的人，校书应当有长久的任期，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议论都很精辟。其《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云：

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汉除挟书之

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搜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藪泽可以无遗。司马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岂可不久其任哉。

彭叔夏和《文苑英华辨证》

彭叔夏，庐陵人。自署乡贡进士，始末不详。太平兴国七年，李昉等奉敕编《文苑英华》一千卷。又命苏易简等参修。至雍熙四年书成，为宋四大书之一，也是总集中卷帙最富的一种。周必大于嘉泰四年和士友精校刻成。所谓士友，即指叔夏。著《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其自序云：“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文苑英华》一千卷，字尽鲁鱼，篇次混淆，比他书尤甚。曩经孝宗皇帝乙览，付之御前校勘官，转失其真。公既退老丘园，命以校雠，肤见浅闻，宁免谬误。然考订商榷，用功为多。散在本文，览者难遍，因会粹其说，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小小异同，在所弗录。元注颇略，今则加详。（谓如一作某，字非者，今作声说。）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初不注者，后因或人议及，今存一二。）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云。”案治忽见《尚书·益稷》篇：“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伪《孔传》解“在治忽”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治理与忽怠对文。倘是治乱，谁所不知，何必留此方匡呢？改作治乱，不能说他不通；然而正因其可通，后人于此更容易忽视校勘。

叔夏在这一点上悟出书之不可以意轻改，真是心得之言。《四库提要》：“叔夏此书，考核精密，大抵分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例。其用意谨严，不轻点窜古书，亦于是可见矣。”评价是相当高的。清代的大校讎学家顾广圻，对于此书也很推崇，认为是校讎的楷模。

方崧卿和《韩集举正》

方崧卿，莆田人。孝宗时，尝知台州军事，其事迹无考。欧阳修曾说“韩愈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讎者妄改”。他因搜罗各本，证其异同，撰《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这书的校讎体例，非常精密，多可为后来所取法。后经朱熹复加考订，别为《韩文考异》，而此本便为所掩。方书传本很少，有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系据文渊阁本重印。

《举正》的特点，为所据的多后世失传之本。书末附《叙录》一卷，列举所据各本而加以简明的提要。一、石本，二、唐令狐氏本，三、南唐保大本，四、秘阁本，五、祥符杭本，六、嘉祐蜀本，七、赵德《文录》，八、《文苑英华》，九、《文粹》，十、谢本，十一、李本，共十一种。韩愈的文章，当时多有刻石的，必是最后定稿，当然比展转传刻的为可信。他搜到的有十七种。唐令狐氏本，为令狐绹之子澄所藏的咸通十五年写本。南唐保大本，为宋平南唐所得而藏于翰林院的，可惜是残本了。秘阁本，为当时的官家藏书，黄庭坚辈都据以校正，所以他撰《举正》，主要也以秘阁本为本。祥符杭本，为大中祥符二年杭州明教寺刻本。韩愈是坚决辟佛的，不知为什么明教寺会刻他的书，也可以备异闻。其它如谢本为谢克家校本，李本为李昉校本。这些材料，就是在崧卿当时，也是不易得到的，今天赖他的《举正》而犹能见到一部分。

又一特点，是明定了校勘的格式。自序：“此书字之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

而倒之。字须两存而或当旁见者，则姑识于其下，不复标出。阁与杭蜀皆同，则合三本而言之。同异不齐，则志其长者。”又附校例：“字（案原作朱文），误字当刊。○（案原作朱文），衍字当削。□（案原作朱文），脱逸当增。己（案原作朱文），殽次当乙。”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朱墨别异，尚不是用于校勘。这里把朱墨用于校勘，又明定了各种不同格式的用法，遂为后来校书者所采用。在没有朱墨套印之前，只可把朱文改作阴文，现在《四库全书珍本》是影印文渊阁钞本，已朱墨分别，保存了这书的原状。

《叙录》：“大抵国初书籍，板本少而传录多，蜀本之得于刘柳者，凡修正七千余字，正恐其间岂无以意增损。然是时校本与旧本并行。末学恶陈而嗜异，妄生分别。及乎旧本湮没，今皆千卷一律，真本反见于一作之下，是岂不深可叹耶！”说明校本的不可尽信，由于末学的恶陈嗜异，妄生分别，故必得旧本。又深惜校本行而旧本遂致湮没。正可见旧本的所以可贵。

《叙录》又引洪庆善云：“韩文旧本未经前人校正者，往往与石本同。故尝参唐历以稽岁月，摭史传以订姓名，由《毛诗》、《楚辞》以求用韵之源，取《庄子》、《国语》、《史记》、《汉书》以考用字之祖，则旧本之所得常多，而今本常出于意定，焕然在目，不可以诬。”此又见校勘取资的材料，不仅限于本书的各种本子，而必须广求诸其它方面，才能得作者的真意。

朱熹和《韩文考异》

朱熹，字晦庵，新安人。生建炎四年，卒庆元六年。《宋史》有传。熹为理学大家，他的著作如《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都是家弦户诵。他也兼长校雠，却被他的学问所掩，后人少有注意到的。

方崧卿的《韩集举正》，上面已提到，他的校雠方法是可以肯定的，可是偏信了秘阁本，便不免有依违牵就的地方。朱熹因此重加考

订，撰《韩文考异》十卷。《四库提要》：“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于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是在方崧卿原有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层。朱熹自序：“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这种求是的精神，确是超出了一般的校讎家的看法。因为一般的校讎家，总是迷信旧本和古本，好像晚近的板本是无足取的。他们并不注意一下，晚近板本也可能经过校勘，或所据底本是善本，而随即予以否定。朱熹却不迷信于官本、古本和石本，而就文势义理来作决定，并不轻视民间本，甚而是民间的小本。（一般说来，小本是指普通的坊本，并不是指书品的大小而言。）

熹又著《阴符经考异》一卷，《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这二书都属道家。《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晁公武《读书志》引黄庭坚跋定为唐李荃伪托。《周易参同契》据葛洪《神仙传》为魏伯阳作。其说是《周易》，其实是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这两部书本无多大价值，而朱熹为作考异，随文诠释，实是笺注之体，而不尽订正文字，和《韩文》虽同名考异而性质不同，后来谈朱熹校讎学的，往往因而误与《韩文》同列。

张淳的校讎学

张淳，字忠甫，永嘉人。乾道八年，曾逮刻《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属淳为之校定，因据所校改的字，别为《仪礼识误》三卷。其书已失传，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逸去了《乡射》、《大射》二篇。淳所引据的旧本，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的监本，有汴京的巾箱本，有杭州的细字本，有严州的重刻巾箱本。今只有严州的重刻巾箱本存在，黄丕烈据以复刻入《士礼居丛书》中，其它都不可得见了。此书甚为朱熹所赞许，《语

类》云：“近世永嘉张淳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又云：“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校他本为最胜。”可以作为此书的定评。

《仪礼识误》发明《注疏》《释文》所据本不同

《仪礼识误》自序：“郑康成收拾于《大》、《小戴》及刘向《别录》中，参以今古之文，定为之注，其书已不纯古矣。陆德明因刘、范二家之音，作为《释文》。刘之本，如以时为肯，以糟为蒟，以洗为淬，以纆为纆，以御为衙，与德明本异矣。德明之本，尚非刘本，其可谓纯郑乎？至贾公彦所据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谓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彦论《乡饮酒》‘执觶兴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盥字，然则今之本，又公彦所谓俗本也。此书之传，如是而已。岁久而文益讹，既讹而莫之订，《礼》之又失，其谁尤乎？”据此，可知张淳已经认识到《仪礼》郑玄本已不同于戴德、戴圣、刘向之本。陆德明本又不同于刘昌宗、范宣之本。贾公彦本又不全同于陆德明本，又有别一所谓俗本。《仪礼》一经，已这样的复杂，推之它经，都是一样，所以校雠者不能固执着一本，而必须研究它不同的所以然。清代段玉裁从这一点出发，在《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的论文中，主张校经之法，要以贾还贾，以陆还陆，以郑还郑，使各人都恢复了原本的面目，然后讨论他们的得失，是更进了一步的研究方法。

岳珂的校刻《九经三传》

岳珂，字肃之。仕履见前第三章两宋板本的概述节。他刊正《九经三传》，为宋刻书中最佳之本，也见前述。今根据他所著的《沿革例》来了解校雠的情况。《沿革例》一卷，分有七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前有小引：“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

当，合诸本参订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宝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复存。尝博求诸藏书之家，凡聚数帙，仅成全书。惧其久而无传也，爰仿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注文，如释音，如句读，悉循其旧。且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证之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非敢有所增损于前，偏旁必辨，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视廖氏世彩堂本加详焉。”所以能够刻成没有讹错的好书，主要原因，决定于有专家的协作而不是个人的单干。所谓明经老儒，虽不具姓名，可知是当时的专家。否则珂虽著作很多，经学却非其专长，无疑是不能独办的。《四库提要》称其“参订同异，考证精博，厘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于经学”。任大椿也称其“深于经训，能会通经文上下语义，而证之以注疏释文，然后求之于诸本异同，覃思旁讯，妙语莹彻，非仅以校本之多见赅博也”，都能指出他校勘的特点。

论字画的名言

《提要》又称“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原文云：“字学不讲久矣，今文非古，讹以传讹。魏晋以来，则又厌朴拙，耆姿媚，随意迁改，义训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讳，如操之为掺，昭之为召，此类不可胜举。唐人统承西魏，尤为谬乱。至开元所书《五经》，往往以俗字易旧文，如以颇为陂，以便为平之类更多。五季而后，镂版传印，经籍之传虽广，而点画义训，讹舛自若。今所校本之以许慎《说文》、张参《五经文字》、唐元度《九经字样》、颜鲁公《干禄字书》、郭忠恕《佩觿集》、吕忱《字林》、秦昌朝《韵略分毫补注字谱》，参以毛晃《增韵》，及其子居正所著《六经正误》。其有甚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谓如互之为宜，晋之为晋之类，皆取之石经遗文）。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凡此者，实与同志之精于字学者逐一探讨折衷，不使分毫差误，虽注字偏旁，点画必校，庶几圣经贤传，不堕于俗学之陋，当为世所善矣。”他校书的谨严精密，点画不苟，是我们值得

学习的。李慈铭《越縵堂日记》又称“其书虽仅三十余叶，而详载板本源流，经注体例，于音释一门，尤为赅备。此读书者之津筏，尤刻书者之准绳，所当家置一编者也”。

毛居正校《六经》

毛居正，字谊父，衢州人。著《六经正误》六卷，为《易》、《书》、《诗》、《礼记》、《周官》、《春秋三传》，每经为一卷。嘉定十四年，国子监刊正经籍，聘他担任校勘，他取《六经》、《三传》诸本，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研究异同，凡字义音切，毫厘必校。据魏了翁序：“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犹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给有司，而版之误字，实未尝改者什二三也。”是居正校勘的成果，刻板时并没有很好地运用。由此可见，官本号称谨严，校勘多出名手，而仍脱误累累。魏序又云：“或者谓：纵令尽正其误，而诸本不同，何所取证。岂若录其正误之籍而刊传之，俾后学得以参考。”这点也很合理。因为从各本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字来校改，只可说是一本的面目，而其它各本的异文便不可见，万一选择的并不正确，读者就无法把别本来参考了。且就是他选择的一本，人们也无从知晓他是哪一本。至录其正误之籍为单行之本，倒可把所有各本的异同一一罗列，待后人审别。后来考异、校记等书的盛行，就是有取于此。

元代官刻注重校雠

元代的官刻书，除了京师的国子监、兴文署之外，其它各路的儒学、书院，刻书经费，都在贍学田款内开支，故选用的是上等工料。在仕学官，清闲无事，也得细心校勘。陆深《金台纪闻》：“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廩饩，余则刻书，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则纠数处为之，以互易成帙，故校雠刻画，颇有精者，初非图鬻也。”这是校刻俱佳的原因。私人刻本，受它的影响，也是佳

者居多。但是研究校讎而著书立说的，却远不能和宋代相比。今举刘世常、吴师道二人，以见元代校讎学的大概。

刘世常的校讎名言

刘世常，字平父。据大德九年张楷刻《白虎通·序》：“乃大元开国之初，行省公之子，鲁斋许左辖之高弟。收书不啻万卷。”其人当可考。大德九年，无锡李显得他的所藏旧本《白虎通》重刻，末有一跋，不具姓名，当即是他的题识。云：“或谓是书中间多有鱼鲁之嫌。如首篇援《尚书》言迎子刘一事，即《尚书·顾命》考之，迎本作逆，刘本作钊，其当时传写之误耶？借曰初得旧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之，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学》以《尚书·尧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诗·烝民》秉彝作秉夷。谁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诵读岂无宗工巨儒者出？蔑有一人敢为改正。由是观之，《白虎通》亦犹是也。间有不妥，尽从其旧。盖纂之者班固，汉时人去古未远，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尽知，后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轻议班固之述作。倘能知《礼记·缁衣》以《君牙》为‘君雅’，《说命》为‘兑命’之意，则能释鲁鱼之疑矣。昔人有云：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谈议汉儒，观书者试思之。”卢文弨校刻《白虎通》，特附刻这篇跋文而附题云：“案古书不宜轻改，此论极是。至此所云迎子刘一定当改钊字。单、刘皆周之卿士，不闻刘避讳而改氏。且康王之后为昭王，后人引以为嫌名不讳之证，尤可见其不作刘也。此又不当过为拘泥矣。”卢氏首先肯定了古书不宜轻改的名论，然后再列举两条证据来说明刘字的决为钊字之误，而认为不改字是太拘泥了。案文字的通借，一定要求之音韵和训诂，这里的钊字作刘，只是形近之误。由于刘氏不通音韵和训诂，故举《大学》、《孟子》的通借字作比，这是不适当的。卢氏是活校一派，这正可见他的学识。但有人提出反对而仍主张刘氏的不改字说。《艺风藏书记·元大德刊本白虎通》某氏跋这篇题识后云：“诚哉其言，亦可见其笃信好古，谨慎不苟矣。汉时《尚书》

立学官者凡四家：曰欧阳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曰《古文尚书》。师承各守，训解多歧，至字句之异同，见于《释文》诸书者，更难枚举，安知四家中不有作迎子刘者？古书散亡，百不存一，敢据今日所见之本为定耶？明辽阳傅钥本改迎子刘为迎子钊，并删去此跋，以后吴瑄、程荣、何允中、胡文焕、钟惺诸本，俱袭其谬，沿误至今，不特无一人纠正，且有以不改刘字为过于拘泥者，于此益叹平父之卓识为不可及也。”看末了“且有以不改刘字为过于拘泥”这句话，明明是驳斥卢文弨的。这位不具名的某氏，当是属于死校一派。据他说来，是相沿下来的所有误字，即使有充分的证据，也只好仍旧，是错误永无改正的一天了，这正是过于拘泥的见解。不过他也确有相反的。明人刻书，好改古书，如吴瑄这辈人是很多的。在迎子刘改为迎子钊，他们虽然没有错，但他们没有依照宋元刻本，也没有加以说明，那末，其它地方被他们误改的一定不少，而且无痕迹可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卢文弨和某氏虽各持相反的看法，而对于刘世常的古书不宜轻改的主张和谨慎不苟的态度，是一致同意的。

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

吴师道，字正传，兰溪人。生至元二十年，卒至正四年。事迹详《元史·儒学传》。著《战国策校注》十卷。《战国策》自汉高诱作注后，有宋姚宏、鲍彪为之补阙正误，师道取姚、鲍注参校，又杂引诸书来考证。自序：“事莫大于存古，学莫甚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又其所引之书，止于《淮南》、《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顾本字之当否，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他主张传疑存旧，虽对鲍彪而发，却也可说是明通之论。他又提出了字多假借、音亦相通的问题，也可说是能上承汉儒、下开清人的校书方法。《四库提要》：“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凡增其所阙者谓之

补；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曰、正曰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授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第，为彪所改窜者，别存于首。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益棼，节目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遂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之下，附著《别录》第几。林亿等新校《素问》，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几，即其例也。”这一体例，谨严详密，既不擅改鲍注的面貌，又能兼存刘、曾古本的次第，确可为校勘古书的范例。元代校讎学自当推他为杰出的人物。

明人擅改古书的荒谬

明人对于校讎之业，非但不能继承宋、元的坠绪，相反地好擅改古书，贻误后人，尤以万历间为甚。顾炎武《日知录》：“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为其父武帝也。改曰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说，岂非小人之无忌惮者哉？”从这些例子，可见明人擅改古书的荒谬。即如颇有名声

的焦竑，其所著《国史经籍志》末附《纠缪》一卷，所纠者自《汉书·艺文志》以下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然其缪往往乃在他自己，此已多为章学诚所驳正。他如刘绩的推求意义，胡应麟的探讨古今，毛晋的保存古本，已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刘绩校《管子》和《淮南子》

刘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时官镇江知府。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称：“幼聪明不羈，贯穿群籍，尤精于考究，凡所撰述，古雅冲淡，根极理要。”著作甚多，其有关校雠而今有传本的，当推《管子补注》和《淮南子补注》二书。《管子补注》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于旧解颇有匡正，皆附于原注之后，以绩案别之。虽其循文诠释，于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愜，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今《管子》题房玄龄注，其实是尹知章之误。刘绩的注比原注所得为多，则它的价值可知，所以王念孙《读管子杂志序》也称刘氏绩颇有纠正，《读淮南子杂志》又称《淮南子》唯《道藏》本为优，明刘绩本次之，并多采其说。今酌录数条如次：

校《管子》：

《牧民》篇：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刘绩曰：经文不应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孙案，伐矜好专二句，与上文义不相属，则不当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参之天地而衍。

《乘马》篇：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刘曰：此言当旱之时，若污下地五尺见水，则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见水，则免三。三尺见水，则免二。二尺见水，则免一。十分去一当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误也。

《幼官》篇：若因夜虚，守静人物，人物则皇。尹读若因夜虚为句，守静人物为句，人物则皇为句。注云：必因夜虚之时，守其安静以听候人物，此时人物则皇暇。刘云：后《中图》作处

虚守静，人物则皇。此人物字疑衍，当以处虚守静为句，人物则皇为句。念孙案：刘说是。

又：信利周而无私。刘云：周，当依后《图》作害。念孙案，隶书害字或作害，与周相似而误。

校《淮南子》：

《原道训》：禽兽有芘，人民有室。高注曰：芘，蓐。刘本芘作芘，云，芘音仇，兽蓐也。与《诗》芘野之芘同字，旧误作芘。念孙案，刘本是也。

《天文训》：徵生官，官生商。刘绩曰：当作官生徵，徵生商。念孙案，刘说是也。

《墜形训》：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领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东至均入沔也。刘绩曰：冢领山在陕西西安府商县南，丹水出于此，东流至河南内乡县，与浙水合流入汉江，非此所谓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讹，汉上党高都县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绝水（见《地理志》）。今山西泽州高平，即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孙案，刘说是也。

《时则训》：命太仆及七驂，咸驾，戴荏。刘绩曰：戴荏《记》作载旌旄，疑荏乃旌字之误。念孙案，刘说是也。隶书旌字或作挂，与荏相似而误。载戴古字通。

胡应麟的校讎学

胡应麟，字元瑞，兰溪人。生嘉靖三十年，卒万历三十年。王世贞《二酉山房记》：“元瑞自言于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护，览之可以当夷施，忧籍以释，忿籍以平，病籍以起。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砚，取丹铅而讎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可见他对于读书校书的嗜好。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一书，分正续两集，包括十六种内容，第一种名《经籍会通》四卷，主要是讨论古来藏书的聚散存亡，也常有发挥校讎的理

论。首有小引称：“凡前代校综坟典之书，汉有略，晋有簿，唐有录，宋有目，元有考，志则诸史共之。辄不自揆，掇拾补苴，间以管窥，加之税藻，稍诠梗概，命曰会通。”他著书的宗旨，是要继承《七略》、《中经新簿》等书的传统。每卷有叙例，一：“坟籍之始，肇自羲、黄，盛于周、汉，衍于梁、晋，极于隋、唐。一烬于秦，再厄于莽，三灾于绎，四荡于巢。宋氏征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轶言湮，聚散兴废，概可睹矣。述源流第一。”二：“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还，始定于一。今稍掇拾诸家，撮其大略，以著于篇。述类例第二。”三：“古书历世，兵革洊更，间有残编裂简，仅以空名，寓于载籍。辑录之家，存而不论；博雅之流，论而不议；钓奇之士，顾有取焉。编摩之暇，辨驳诬谬，联络遗亡，与癖古者共之。述遗佚第三。”四：“古今坟籍，梗概略陈，然率综核陈编，未遑近迹。余九龄入燕，往来吴越，垂三十载。涉历宾游，脞言鄙事，时有足存，辄缀大都，附于简末。后之博雅，征求故实，万一在焉。述见闻第四。”分门讨论，有条不紊。其它如《九流绪论》三卷，是讨论子部的得失。《四部正讹》三卷，是考证古来的伪书。也与校雠学有密切的关系。

这部书引征典籍极为繁博，但好肆辩论，因而不免有错误之处。沈德符《敝帚剩语》、王士禛《香祖笔记》、张文岚《螺江日记》多有驳正，如《四库提要》指出的，“《崇文总目》但经史有所论列，子集阙如，盖据《六一集》所载。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竟阙也”。又“《汉志》兵家《儿子》一篇，书名奇怪。然儿古倪字，故倪宽史亦作儿宽。《倪子》书名，亦犹《孙子》、《吴子》，何奇怪之有”？又“刊版当始于隋。引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为证。然史文乃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非雕版也”。都切中它的要害。但在明人著述中，能这样的研索旧文，参校疑义，究是不可多得的。我们应该分别来看待。

第九节 清代的校讎学

清代校讎学的成就

清代学术上成就最大的，校讎学当居其一，它几乎超越了唐宋而直接两汉。自顾炎武批判了明代刻书擅改的荒谬(见前节引《日知录》)，而提倡实事求是之学，著《音学五书》(《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以考证古音，《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石经考》以考证经传文字，便已树立了清代校讎学的基础。后来所谓汉学一派，凡见于学海堂和南菁书院两《经解》的作者，直到刘师培、王国维等，他们的治学，都是注重校讎的。中间虽然也有为校讎而校讎，犯了繁琐的弊病，如焦循所指的本子学和章学诚所指的横通，但是究属少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阅《刘申受集》，其《论语·述而》篇误据《北堂书钞》以女为君子儒章何晏注为何休注，遂妄断邵公有《论语》注，其谬既不待言。而以此注君子儒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二语，谓汉儒中惟董江都及邵公能道之，马、郑诸儒皆所不知，真是梦语风谵，大惑不解。申受知读旧钞本《北堂书钞》而不知读注疏，自来郢书燕说，无如是之可笑者。”刘申受名逢禄，常州人。为今文《公羊》学的大师。《公羊》家喜讲微言大义，而忽略了校讎，认晋代的何晏为汉代的何休，硬把《公羊》来解释《论语》，原则已误，当然所说的一无是处，而全出于穿凿附会了。这虽然是很个别的，也可见校讎的重要。现述清代的校讎学，只能选择成就和影响较大而有代表资格的，当然远不够全面。

死校为活校的基础

清代校讎的所谓死校一派，如叶树莲、陆貽典、冯舒、冯武、何

焯、何焯、黄丕烈等，都有相当的成绩，为活校派建树了不可少的基础。但他们主要的成就，还是在于目录和版本，这里没有提到他们，并不是有所遗漏和轻视。

卢文弨的校雠学

卢文弨，号抱经，余姚人。生康熙五十六年，卒乾隆六十年。第三章清代的板本概述节已经提到他。段玉裁撰《墓志铭》：“早昧爽而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日且冥，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间。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钞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今抱经堂藏书数万卷皆是也。”他手校的古书，自刻《新书》、《春秋繁露》等若干种为《抱经堂丛书》，因无力尽刻，取《易经注疏》等三十七种的校语，别编《群书拾补》刻之。又有他人借刻而不自具名的，如谢墉的《荀子》、毕沅的《吕氏春秋》、周廷采的《韩诗外传》，都是他的著作。每种都把校语附在本文的下面，有原注的，加圈以别之，使读者方便。只《经典释文》别为《考证》附于后面。他在校雠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数清代校雠专家，当推他是第一流。

校《蔡中郎集》篇目和内容的窜乱

卢氏对于校雠学的名言法语，见于《抱经堂文集》中序跋两类和《钟山札记》、《龙城札记》的多不胜数，今录《钟山札记》中《蔡中郎集》一条以示例。

《钟山札记·蔡中郎集》：“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旧，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于一篇之中，颠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欧本第一卷首

篇乃《故太尉桥公庙碑》，以颂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汉元公。此为其孤作也，故称列考，即烈考也。颂后公讳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勤于征钺，官簿次第，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以昭光懿。此是第二段。下云：桥氏之先出自黄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仪也已。为第三段终焉。即所谓碑阴也。其四铭即附此篇之后。自明张天如刻《百三名家集》，于《蔡集》以赋为首，次以疏、表、书、论、议、对问、设论、连珠、颂、赞、箴、铭，而后及于碑。此碑则以桥氏之先云云，公讳某云云连为一段。于末妄增铭曰二字，然后以光光列考提行，至作宪万邦终焉。四铭则别人铭类，不系此碑之后，则全与篇中所云不相应。篇中所云书于碑阴者，即桥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则所云碑阴，又何所指乎？本朝康熙年间，又有莘野刘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为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与张本同，但不加铭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桥公碑》一篇，乃为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吴整作者，刘本则移之于四铭之前。不知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勤于征钺之语，自在前篇，今乃系于后篇，不亦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为能传古书，则古人之面目反隐矣。”宋欧静辑本《蔡中郎集》，今所传乃万历时徐子器刻本，分为十卷，犹存欧辑原来面目。嘉靖时俞宪、乔世宁刻本已并为六卷，无怪内容被窜乱了。张天如又据后来文集的常例，以赋居首而碑居末，而第一篇就被窜乱到这样地步，那全书的情况是不问可知了。这种人的刻书，由于全不照顾书的内容而自作聪明，功不掩过。卢氏案照文理，一一为之纠正，才得条理秩然，便于诵读。

校《蔡中郎集》杂用它书参订例

《札记》又云：“古书流传，讹谬自所难免，果有据依，自当改正。《蔡集》余有校本，今姑以桥公二碑略言之。第二段云：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考《水经注》，言行作之行为是，此碑但记行事耳。礼制作礼则。又下钺钺作征钺，亦当从《水经注》改

正。末云：俾尔昆裔，永有仰于碑阴云。语意全不似汉人。且此是三孤与其故臣门人所述，安得有俾尔昆裔之语？故我以为当从《水经注》作以昭光懿为得也。时有椒房桂戚之托。桂乃贵字之误。特进颍王梁不疑为河南尹。案不疑未封王，乃颍阳侯之讹。当事以对，当作当以事对。贞以文章得用句，鬼薪公句，离司寇句。文章旧本作文笔。又西府俱四府之讹，四府乃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也。民有父子俱行句，凶人（本又有一人字，衍。）恶言当道句，晓之不止句。其子杀之而（作人公者讹。）捕得句。公以其（三字有本缺。）见（下有其字，衍。）侮辨直句，（本无直字，乃文脱。）不举文书。此段皆以旧本考正。又云：凡所获禄，皆公府所特表选。旧本作表送，盖仕而不受禄，故公府为特表送也。又云：自九列之后，乃以丕虺。言其位至九卿，禄皆散之亲旧，故云丕虺。有本作自九列之后，咸以明公连下句者，非是。又析见是非（下疑脱二字），明作速于发机，本或无析见二字，下句作达于事机。又张本作察机，皆讹。《黄钺铭》是用镂石下，《水经注》有假象二字，当补入。盖即一篇之中，其当改订者不少。但究须审慎，疑者宁阙，以俟后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凭臆改定，而又全没旧文，则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据《水经注》、旧本、张本，逐字逐句，细细校勘，补缺改错，文字已正，句读也自然清楚了，这是他校勘古书的绝诣。

校讎所据旧本简目

卢氏校定付刻之书，于书首必胪列所据各种刻本和校本，并略疏其书的内容，不但为昭示信实，也是使后人有所考核，虽取法于方崧卿《韩集举正》而更翔实，后来阮元《十三经校勘记》采取此例。今录《新书》讎校所据旧本为例：

建本。是宋时刻本。明毛斧季、吴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即有谬误，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惟目

录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故今称为建本。

潭本。宋淳祐八年长沙刻，即从淳熙八年程潜使本重雕者，题《贾子》。

吴郡沈颀本。明弘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眷宋建本于此本上。其吴元恭所用之本，虽无沈颀名而实不异，当是沈名后来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让》篇，吴据宋本钞补，而毛本则仍缺此篇。

李空同本。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贾子》。后有钦远猷者，不知何时人？合郴阳何燕泉本、长沙本、武陵本合校是书。何本于文义不顺者，颇加窜改。又于《过秦论》后，补《审取舍》一篇，乃录《大戴礼记·礼察》篇全文，今不用。

陆良弼本。明正德九年为长沙守时刻。

程荣本。刻《汉魏丛书》内。

何允中本。二本皆同出陆本。

江阴赵曦明敬夫校。

余姚卢文弨召弓父合众本校。

每种都提示了内容和板本的要点，无异于《贾子新书》的板本源流考。犹存小小疏失处，吴元恭为吴县人，嘉靖三十四年举人，当次于毛斧季之前。钦远猷，名揖，也是明末苏州的藏书家。都载《苏州府志》。

《群书拾补》的编刻

卢氏手校的古书，除了已刻入《抱经堂丛书》和《群书拾补》以外，还有不少流传于世。他在《群书拾补》的小引中说：“余手校之书，将来必有散在人间者，则虽无益于己，宁不少有益于人乎？后有与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诸世，庶余之勤为不虚也已。”他的期望，终于达到了一部分，后来刻书的往往根据他的校本，嗜书的也往往传录他的校

本。最可惜的是手校的《古今逸史》全部，由周星诒书钞阁、蒋凤藻铁华馆展转入上海涵芬楼，在抗日战争时毁于兵火，遂使卢氏汗血精神，永付销灭。（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误记为何义门校。余昔年曾目睹数册，故知之。）

戴震的校雠学

清代皖派经学的领袖戴震，著书很多，虽不专谈校雠，而他对于校雠的主张和提倡，有很大的影响。震字东原，休宁人。生雍正元年，卒乾隆四十二年。《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得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古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他主张读书首先在识字。识一字之义，又必须贯群经、贯六书。这是校雠方法之一。又《古经解诂序》：“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摭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他主张搜集异文和旧注，就是要具备多方面的材料，以作为订经之用。这是校雠方法之二。后来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就在他所指导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校《水经注》的发明

戴震校勘的书，以有名的《水经注》为例，他的弟子段玉裁在《与梁耀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中这样说：“东原氏之书，细大宜辨。据古本，搜群籍，审地望，寻文理，一字之夺必补之，一字之羨必删之，一字之误必更之，东原氏之能事也。然而其功细。自唐、宋浅学，逢书不知其义例，误认过某径某之文无区别，任意互讹，大抵注讹经者十八，经讹注者十之一二。东原氏得其例有三：一曰独举复举之不同。经文甚简，首举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内必详其注入

之小水以间厕其间，是以主水之名屡举不厌。虽注入小水有所携带者相间，亦屡举小水之名，经文断无是也。一曰过径之不同也。经必曰过某，注则必曰径某，所以别于经。一曰某县及某县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谓某县故城者，即经之某县也。经时之县，注时多为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执此三例，沛乎莫御，厘之有如振槁，承学读至白首不解者，豁然开朗，王伯厚、顾景范、胡肫明、阎百诗称引之误，今皆可正，此则东原氏功之大者也。”他所谓细大之分，就细的方面，只要是具备一定功力的人，还是做得到的；至于大的方面，则必须把原书反复熟读，根据学科的分析，才能有创造性的发明，就不是一般的校讎家所能办到了。《水经注》一书的作者，或谓是汉代的桑钦，北魏酈道元为作注，本应该经和注分明的。可是后来经唐、宋时的移书，竟把经和注混淆了，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经过不少学者的钻研，总是摸不着头绪。他们对经和注的混淆尚没知晓，那末，引用这材料作证据，怎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呢？自从戴震有了这一发明，“承学读至白首不解者豁然开朗”（段玉裁），确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当然比文字上的校误补脱的功绩为大了。后人对于《水经注》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他创立的基础。

钱大昕的校讎学

钱大昕，号竹汀，嘉定人。生雍正六年，卒嘉庆九年。著作甚富，汇为《潜研堂全书》。他能兼通经学、史学、小学、文学，为清代杰出的学者，阮元序他所著的《养新录》指出有九难，其第四难为“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其第六难为“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这说明他对史籍校讎，尤为专精，今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集》的有关校讎部分，真是精辟绝伦，突过前人。阮元的校经，犹依协作之功，而钱氏则独力成之。至今经、史两大校勘著作，并为空前的巨制。

校雠须戒擅改和泥古

他久居吴门，与当时周锡瓚、顾之逵、袁寿阶、黄丕烈四大藏书家往来极密，多见宋元旧槧，而却并不迷信旧本。卢氏《群书拾补序》：“海内文人学士众矣，能藏书者十不得一，藏书之家能读者十不得一，读书之家能校者十不得一。金根白芨之徒，日从事于丹铅而翻为本书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为枕中秘，谓旧本必是，今本必非，专己守残，不复别白，则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他慨叹能读书者不多，而能校书者则更少。号称校书者，又一则擅改，如韩昶的改金根车为金银车，田敏的改《尔雅》日及为白芨。一则泥古，坚信宋元刻，即明明是错误也必认为正确，不知宋人对当时刻本，如前引苏轼、张洙等已经明言有擅改不足信的。要除此二弊，必须参互考订，存是去非，即是活校派的最高阶段。

校雠符合旧本的绝诣

他对旧本的看法，并不是因不足过信而便忽视，但着重在能有所别白，其正确的还是应该依据。所以参互考订，并不脱离了旧本。有时考订所得在先，待后获见旧本核对而一一符合，得到可靠的证据，这种校书的精思是难能可贵的。《十驾斋养新录·汉书景祐本》条：“余撰《汉书考异》，谓《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乐成下衍龙字。《百官公卿表》宁平侯张欧，宁当作宣。俞侯乐贲，乐当作栾。安年侯王章，年当作平。平喜侯史中，喜当作台。广汉太守孙实，实当作宝。《五行志》能者养之以福，之以当作以之。《地理志》逢山长谷诸水所出，诸当作渚。博水东北至巨定，博当作时。《张良传》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陈留，陈字衍。《枚乘传》凡可读者不二十篇，不当作百。《韩安国传》梁城安人也，城当作成。《韦贤传》画为亞人，亞当作亞。《佞幸传》龙雒思侯夫人，雒当作额。顷见北宋景祐本，此十数处皆与余说合。”如这样符合于旧本的校文，在《廿二史考异》中何止

千百条，看他虽仅校正一二字，然必须统贯上下文，又须搜罗旁证，才能确定。清代的校讎专家，往往能做到这样，如顾广圻的《文选考异》，案之近从日本发现的唐写本《文选集注》，符合的很多，都可称为校讎的绝诣。

读书当得善本

《廿二史考异》自序云：“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撻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为升分，更日及为白芨，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余所不能效也。”这说明读书应该着重文字的校讎，而不应该空发议论。必须文字无误，才能议论有据。这又当广求经史的善本了。《养新录》又云：“经史当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监及汲古阁本，《仪礼》正文多脱简。《穀梁》经传文亦有溷错。《毛诗》往往以《释文》混入《郑笺》。《周礼》、《仪礼》亦有《释文》混入注者。《礼记》则《礼器》、《坊记》、《中庸》、《大学》疏残阙不可读。《孟子》每章有赵氏章指，诸本皆阙。《宋史·孝宗纪》阙一叶。《金史·礼志》、《太宗诸子传》各阙一叶。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补。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这是宋元本的所以珍贵，可以校补后刻本的脱漏，又非参互考订所可获得的。

段玉裁的校讎学

段玉裁，号茂堂，金坛人。生雍正十三年，卒嘉庆二十年。他受戴震之教，把古形、古音、古义的研究，贯彻到校讎古书中去。最有名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是以《说文》一书作主题，而实则包括了唐以前的许多古书的校正订误。

校书须辨底本和立说的是非

有《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一文，其言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

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缪辑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瞽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又云：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案指贾公彦)，以孔还孔(案指孔颖达)，以陆还陆(案指陆德明)，以杜还杜(案指杜预)，以郑还郑(案指郑玄)。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他提出了底本的是非和立说的是非问题。底本又必须还复作者原来的面目，而不能相混，然后对于立说的是非，才能够下结论。这是校雠学的更进一步，须有科学分析的精神。

《经韵楼集》论校雠名言

其它关于校雠学的名言，见于《经韵楼集》中的甚多，今摘录一部分于此。《与黄尧圃论孟子音义书》：“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兹后来之惑也。”这是反对死校派之说。又《与胡孝廉世琦书》：“读书有本子的是非，有作书者的是非。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未易定也。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这又提出了校雠须具备淹博、识断、审定的三种条件。又《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

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这是说如力不能定其是非，则不如保存原状，而切不可擅改。以上的论点，大都是“必须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的补充意见。

章学诚的校雠学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生乾隆三年，卒嘉庆六年。他是一位大史学家，著书很多，刘氏嘉业堂汇刻为《章氏遗书》。最著名的为《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后者是讲校雠学的专著。他认为刘向父子的部次条别，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后世的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不同。故著《宗刘》一篇。又认为刘向父子之学，惟郑樵能体会他的意义，但不能平心静气地来研究，故对于刘氏父子的微旨，仍有所隔膜；又议论过于尖锐，对前人只有抨击而很少表扬，而自己的缺点却不能弥补，便容易造成矛盾。故著《补郑》一篇。刘氏之学存于《汉志》，所以他对《汉志》的研究，用力很深，并驳斥了郑樵和焦竑的错误。而郑樵的《校雠略》则吸收其精华，弥补其缺陷。章学诚以他的才识，在汉学极盛之时，独树一帜，卓然成为校雠学的理论家。

互著和别裁的理论

《校雠通义》的重要发明，尤其在《互著》、《别裁》两篇。《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继。”指出了书有难分而易混的，那末，编目将怎么办呢？《互著》篇认为：“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著，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

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就是说一书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就在两种有关的门类都要著录，才能见其全备。这一方法，本于《七略》，如《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这是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并不是重复。

互著是据一书或一家的整体言，假使一书之中而各篇有不同性质的，章氏又发明了别裁的体裁。《别裁》篇：“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仿。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容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把一书中的某一篇，根据它的内容性质，抽出其目来编次入另一适合的门类中去，其方法也出于刘歆。如《管子》本属道家，其中《弟子职》篇别列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本属《礼经》，其中《三朝记》别列入《论语》。这样分析得愈细，对于同一性质材料的功能也发挥得愈大。和互著确像鸟之有两翼，是相辅而行的。它的施用，虽似属于目录的编次，然必先能审别书的内容性质，则又当属于校讎，而非一般目录的编次者所能了解。

王念孙、引之父子的校讎学

王念孙，字石臞，高邮人。生乾隆九年，卒道光十二年。子引之，字伯申。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王氏父子深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据以校勘古书，四通八达，绝无凝滞，其成绩是空前

的。阮元《经义述闻序》：“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一譬喻，对王氏父子校讎事业来说，是非常适当的。古书的注解虽多，是否真是作者之意，很难断定。而且有的展转推衍，愈去愈远。只有根据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才能理解古人的语言、意义。王氏掌握了这个工具，来整理古书，给我们阅读时不少的方便和启发。

念孙著《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志馀》二卷。包括《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汉隶拾遗》，又《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十八种。引之著《经义述闻》三十卷。包括《易》、《书》、《毛诗》、《周官》、《仪礼》、《大戴礼记》、《礼记》、《春秋左传》、《国语》、《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尔雅》十二种，附《春秋名字解诂》一种。书名述闻，说所述的是闻之他父亲的，所以基本上也可说是念孙的著作了。

求本字和不墨守

引之《经义述闻序》详述了他父亲对于校讎的名言：“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籀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娄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云：“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

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他运用了从假借以求本字，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更发展了毛亨、郑玄的成例。这比朱熹的只案文势义理作征验，更为坚卓可据，正是汉学和宋学不同之点。

《读淮南杂志自序》的校例发明

王念孙从校勘古书所得的经验，在《读淮南杂志自序》中列举了古书因字不习见而误、因假借之字而误等共六十二条之多，这一总结，道出了许多古书致误的缘由。

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

龚自珍《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又详述了王引之对于校雠的名言：“吾之学于百家未窥，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古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云：“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误，吾则勇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槧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他提出了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论点，这是非常精当的。汉以前经由口说，后来著于竹帛，师承各异，不能是此而非彼，所以不改。用假借之法来校书，确是打通难关的良法，但尚有十分之二是无法推求的，决不能硬改，所以也留着不改。至于写官、槧工之误，和后人的妄改，也必须加以思考，搜得证据，才能勇改，否则也宁留待他人来研究而仍不改。这样的细致地处理，确为校雠学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但又说“于百家未窥，独治经”，则未免太局限了。我们接受文化遗产，应该有

广阔的眼界，凡是有益的好的东西，都该窥它一窥，当然不是说泛滥无归，而要有中心有目的！事实上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虽主题是治经，何尝不博引群书来作佐证呢？他又说“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好小学果然为了要通经，但通经就是要能够批判地接受经的大道为今天服务。难道说只要局限于文字上的讲通，而大道就可不问吗？无论是好小学好校讎，都为通大道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照他这样提法，虽用意是出于谦逊，然很容易影响人们去钻牛角尖，这是必须指出的。

阮元的校讎学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仪征人。生乾隆二十九年，卒道光二十九年。清代乾隆、嘉庆时学术称极盛，他是提倡人之一。他以经生而居高位，在浙江建诂经精舍，在广东建学海堂，培养了不少著名的学者。又用集体协作的方式，编纂了许多有用的书籍。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成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仪礼石经校勘记》的校例

关于校勘的事业，阮元在乾隆五十六年充石经校勘官，分得《仪礼》十七篇，撰《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这一石经，就是前第三章第三节所提到的清石经，据金坛蒋衡所写刻石。蒋衡是一个书法家，经学很疏浅，故所写字体多误。刻成后，命彭元瑞负责校勘，阮元是当时的分校。《自序》云：“今总汉石经残字、陆德明《释文》、唐石经、杜佑《通典》、朱熹《经传通解》、李如圭《集释》、张淳《识误》、杨复《图》、敖继公《集说》、明监本、钦定《义疏》、武英殿《注疏》诸本，以及内廷天禄琳琅所收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综而核之，经文字体，择善而从。”是其具备了众本。又焦循序：“博访通人，务从人善，如得以为昏姻之故为庶子适人者，则用戴东原编修说。宾服乡服卿大夫，则用刘端临教谕说。脊胁胷肺，则用王伯申明经

说。《丧服》传刊去四十字，则用金辅之修撰说。又钱辛楣官詹，王怀祖给谏，亦曾执手问故。”是又博采于通人。其第四卷为校勘字体，如於之与于，眡之与视等，有古今正俗之别，都归划一。较之彭元瑞的《石经考文提要》更为精审。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协作和总成

校雠成绩尤卓越的，当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附《释文校勘记》。段玉裁序：“阮元自诸生时，校误有年，病有明南北雍及常熟毛晋《十三经注疏》本纰缪百出，前巡抚浙中，遂取在馆时奉敕校石经《仪礼》之例，衡之群经，广搜江东故家所储各善本，集诸名士，授简西湖诂经精舍中，令详其异同，钞撮会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黠烛定其是非。会家居读礼，数年乃后卒業，分肌擘理，犁然悉当，其学瞻，其识精，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俾好古之士，以是鳞次栉比，详勘而丹黄之，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寻真古本汉本，其在今兹有是书，较陆德明《释文》之在唐初，为无让矣。”据此，由《仪礼石经校勘记》而推广之，遍及《十三经注疏》、《释文》，做到分肌擘理，犁然悉当。这样的巨制，倘不是集体协作，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所集诸名士的分工，元和李锐校《易》、《春秋穀梁传》、《孟子》，德清徐养原校《尚书》、《仪礼》，元和顾广圻校《诗》，武进臧庸校《周礼》、《春秋公羊传》、《尔雅》，临海洪震煊校《礼记》，钱塘严杰校《春秋左氏传》、《孝经》，仁和孙同元校《论语》。而总其成者实为段玉裁。这些人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聚集协作，是不可多得的条件，宜乎有此成就了。但诸儒的姓名，都载明序文，而总其成的段玉裁，在他序中也没有提到，因而人多不知。近人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在嘉庆八年冬至日作《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按语称：“详此文义，与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左传题词》全同，则此篇殆为代阮伯元捉刀而作。然则由此亦可见阮氏《左传校勘记》为出于先生手矣。”这是不考段氏本是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修定人而误会的论断。刘撰《年谱》于嘉庆七年引段《与刘端临第二十八书》：“今年一年，《说文》仅成三页，故虽阮公盛意，而辞不敷文。（案不疑去字之误。敷文系书院名。）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证》，自顾精力万万不能，近日亦荐顾千里、徐心田两君而辞之。”《注疏考证》即《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谓心欲看完者，是鉴定之辞而非编撰之辞，安得以严杰所作的《春秋左氏传校勘记》说是出于段氏手呢？相隔数行，竟未照顾，更无论《经韵楼集》中《跋黄尧圃蜀石经毛诗残本》明称“余为阮梁伯定《十三经校勘记》”，《与孙渊如书》又称“昔年愚为阮梁伯修《十三经校勘记》”的话了。（案梁伯亦为阮元字。）这时阮元为浙江巡抚，官事丛脞，不能如老经生的专力研究，而请人代庖，也是很平常的，反可体会他的处事慎重。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凡例

《校勘记》每种前都有引据各本目录，附注很详，因文繁不录。在今天来说，他们没有见到的古写本和宋元刻本，尚有不少，可补这书的遗漏。

吴派校讎家

苏州自明以来，为藏书家集中的地方，从而促进了校讎事业，出了不少专家。清代著名的，如何焯、何焯兄弟，惠士奇、惠栋父子等，所校的书，现在尚多流传。惠栋承袭了祖和父的家学，经术湛深，为吴派经学的领袖，又不仅以校讎著名了。顾广圻以惠栋的弟子江声为师，而接受了汉学的衣钵。又与段玉裁、钱大昕、黄丕烈等为友。一生专以校书刻书为事，遂卓然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世与卢文弨并称为卢顾。

顾广圻的校讎学

顾广圻，字千里，后以字行，元和人。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

十五年。他是一个贫士，依靠代人校刻古书为生活，为阮元刻《毛诗注疏》，为孙星衍刻《说文》、《古文苑》、《唐律疏义》、《尚书考异》、《宋元检验三录》、《天文大象赋》、《抱朴子外篇》、《广黄帝本行记》、《轩辕黄帝传》，为张敦仁刻抚州本《礼记》、《仪礼注疏》、《盐铁论》，为黄丕烈刻《国语》、《战国策》、《易林》、《汪本隶释刊误》，为胡克家刻《文选》、《通鉴》，为秦恩复刻《法言》、《奉天录》、《骆宾王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词学丛书》，为吴鼐刻《晏子春秋》、《韩非子》，为廖寅刻《华阳国志》，为洪宾华刻《宋名臣言行录》，为沈恕刻《绍熙云间志》，为其兄之逵刻《列女传》，为汪士钟刻《仪礼疏》、《鸡峰普济方》。每种多附以考证或札记，而题他人的姓名。自著有《思适斋集》。

阐发“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意义

顾广圻以思适斋名其所居之处，是取邢邵的“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意义，有《自记》一篇，说明他校书的宗旨。略云：“以思适名斋者何？顾子有取于邢子才之语也。史之称子才曰：不甚校讎。顾子役役于校讎而取之者何？谓顾子之于书，犹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诚仅曰不校乎哉？则乌由思其误？又乌由而有所适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遂以与夫天下后世乐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所以有取于子才也。”把邢邵的两句话，反复地加以阐发，不但邢邵的意义大明于世，而且找到了校书的规律。又突出了“以不校校之”的口号。在另一篇《礼记考异跋》中说得更明白：“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所以他校刻的古书，都是摹照宋元旧本，甚而明明有误，也一字不易，保存书的真相，此不校之谓也。后附考证或札记，讨论书中文字的是非得失，供读者的参考，此校之之谓也。纯乎以客观态度来对待古书，无疑地是进步的。

古书致误由于强预和易言

顾氏《韩非子识误序》：“宋槧之误，由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往往可寻也。而赵刻之误，则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于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误者，方且因此而至于误。其宋槧之所误，又仅苟且迁就，仍归于误，而徒使可寻之迹泯焉，岂不惜哉。”赵刻指明赵用贤刻本，在明版中算是有名的善本，哪知已被他大大地改动过，反使不误者致误，而宋槧的痕迹也被消灭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赵用贤这样大胆地校改呢？《礼记考异跋》云：“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涂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痕。二者殊涂，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古书的反误于校者，总括说来，是强预和易言，不出此二涂。由此可见，死校派虽不如活校派的明通，但还是有相当的价值，不应轻视。

《易林》的校例

《焦氏易林后序》：“读此书之法又有三焉：以复见求之也。以所出经、史、子等求之也。以韵求之也。”第一条是求之于本书。第二条是求之于本书以外的有关各书，范围是相当大的。这两条方法可移用于其它古书。第三条，因为《易林》是全部有韵的，比较特殊，但必须深通古韵，否则便无法下手。

与段玉裁校《礼记注》的争论

顾广圻和段玉裁曾为了一字之异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辩。《礼记·祭义》篇的郑注，有“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一句，广圻校定四字当作西，而段玉裁则坚持不改，仍当为四字。陈鱣《经籍跋文·宋本礼记注跋》：“《祭义》：天子设四学。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顾千里云：四郊之四当作西……或又据《芳传》所引，并欲改《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亦作四郊，致为巨谬云云。按所谓或据《芳

传》者，盖指孙颐谷侍御《读书脞录》。段茂堂大令作《礼记四郊疏证》，申孙黜顾，凡数千言。顾复作《学制备忘记》以辩之，亦数千言，两家遂成水火。余欲作调人而终莫能解。尝汇其书为一册，题曰：《段顾校雠编》。洪稚存编修见之，曰：正可对朱陆异同辨，相与一笑。”西之与四，本是形近易混，由于他们俱有渊博的学识，引经据典，旗鼓相当，竟难分别谁是谁非。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段学固博奥，颇喜立新义，尽翻古人，不及先生持论谨慎尔。”又云：“段氏虽引据纵横，骏辨四溢，而《王制》西郊之不当作四，郑之论周立四代之学非在四郊，《大戴礼》之言五学亦本一处，以及王肃紊古违郑之非，皆依据谨严，足为定论。”是颇能论定两家的得失。

与严可均校《说文》的争论

孙星衍覆刻宋本《说文解字》，先请严可均任校勘，严著有《说文校议》，根据群书来校定《说文》，原是极佳的著作。他主张照《校议》来改《说文》，那末，不是覆宋本而是严氏的校改本了。广圻提出反对。孙氏从他的意见，即改请他担任校勘。因而严氏颇感不平，其《说文校议序》云：“有或挟持成见，请与往复，必得当乃已。”明向广圻挑战。广圻遂摘出《校议》中最不可从的三十四条，逐条辨正，义据谨严，都能击中严氏的要害，即所著的《说文辨疑》。这又是一场激烈的论战。学术的讨论，应该是百家争鸣，才能愈辩愈明，原是件好事。可是广圻与段、严二人，不免沾着文人相轻的习气，自估过高，不惜意气用事，甚而出于谩骂，那就失去学者应有的气度了。

第十节 现代的校雠学

现代校雠学的提倡和条件

近数十年的校雠学，承继了清代的优良传统。鲁迅首先着手《嵇

康集》的整理，结合了目录、版本、校雠三位为一体，精密详审，树立了校雠学的典范。郭沫若深入地研究甲文和金文，对古书常有精辟的发明，又汇集各家对《管子》研究的成果而加以折衷，完成《管子集校》的巨著，又扩大了校雠学的领域。有了他们的提倡和指示，又以全国的私人收藏善本图书，大多集中在各地图书馆；地下珍贵的材料又不断地在发现；印刷事业空前发达，突过了从前几百年的历史。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

鲁迅对《嵇康集》卷次和版本的研究

鲁迅对于古代文化遗产，不但善于批判地吸取其精华，而就校勘整理来说，也有不少成绩。他所校定的《嵇康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校《嵇康集》序：“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槧，又经鲍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余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案此，详细地研究了《嵇康集》历来卷数的异同和刻本的优劣，使人们对于《嵇康集》的面貌，先有清晰的认识。黄本刻于嘉靖乙酉，时代最早。张燮本根据黄本，而做了些正误增逸的工作。然后突出了吴宽的丛书堂钞本。吴宽是明初的大藏书家，早于黄省曾，彼时很可能见到宋槧本。把它和黄本雠对，发现了

两本同出一源，而且各有讹夺。必须彼此补正，才能成为较胜者。这样细致地分析，是合符科学的精神的。

丛书堂钞本旧校的鉴定

序又云：“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有墨校，增删最多，且尝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使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案此，又详细地研究了丛书堂钞本的内容，并指出朱墨三校的不可凭信。匏庵即吴宽的号。这本中的校字，相传是出于匏庵之手，但以黄刻本校讎，发现了朱墨的三次校文，都是根据刻本，甚至连刻本的讹夺也不加审辨而一起校上去了。由此可得到结论：吴宽是卒于弘治十七年，不可能取相隔廿多年后的嘉靖刻本来校这本书；吴宽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人，不应该不加审辨，把讹夺也校上去。对于相传说是吴宽的手校提出了疑问。吴宽本的源出于宋槧，倒有相当理由。凡是已被校改的文字，一定是宋槧原文，一定有极有价值的地方。可惜被校者“灭尽原文，至不可辨”了。所以有必要尽可能恢复它的原状。并可见旧校不一定可信，偏信者反被校者所误，必须自己踏实地摸索一番，来做到实事求是。

各书的参校

序又云：“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后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纘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

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异同。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无所正定，亦不复道。而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亦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他把所有现存的《嵇康集》各种版本和可以取校的古注类书总集，几乎全都仔细校过。罗列的这些书名，有的并附著了某人的刻本，更可见他对校讎工作的忠实与谨严。因为各书有不同的版本，倘不注明，后人误以它本核对，不免会发生异同。而且后人还可再据他没有依据的别本，或后来发现的古本，做复校的工作。例如《太平御览》，他作序时在一九二四年，此时《四部丛刊》中的覆宋本尚未出版。《艺文类聚》直到今年才由中华书局以宋版景印。又如《北堂书钞》有南海孔广陶的重刻旧钞本，无疑是比陈禹谟删改本为佳，都可能有资拾补的材料，他所以著明某人刻本，正是这种意义，并无碍于这校本为《嵇康集》的第一善本。

序又云：“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僛为愆，寤为悟。或刻本较此为长，如遊为游，泰为太，慾为欲，樽为尊，殉为徇，饬为饰，闲为间，翫为暂，脩为修，壹为一，途为涂，返为反，捨为舍，弦为絃。或此较刻本为长，如饑为饥，陵为凌，熟为孰，玩为翫，灾为灾。或虽异文而俱得通，如迺与乃，忝与吝，强与疆，于与於，无、毋与無，其数甚众，皆不复著，以省烦累。”这比较了钞本和刻本，而指出它的各有长处，绝不迷信于钞本的时代较古，藏家名大。但这些异文，多是可以通用的，不必效死校派的一字不易，照样模写，徒然造成烦累，于本书和读者，均属无益。故只在序文中加以说明。

丛书堂钞本残缺的发明

序又云：“又审旧钞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学论》等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

黄、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盖较王楙所见之缮写十卷本卷数无异，而实佚其一卷及两卷半矣。”这对于卷次和篇目的整理，尤可见其校雠的卓越，而真有得于刘向校书之学的。丛书堂钞本出于明代大藏书家吴宽，所据的是宋本，大校雠家顾广圻、大藏书家黄丕烈，对此书只有赞叹，而都没有能够发现它的残缺。现在从全书精密的校勘下得到了原本编目的次序，从而发现卷次篇目都有移易，更无论黄、汪、程的刻本了。

末了还附有《逸文考》和《著录考》，录存了集外的零碎文句，并罗列了目录著录的全部材料，继承了清人校刊古书的优良传统。

郭沫若的《管子集校》

郭沫若于甲文和金文的研究，著作甚富，时有创见发明，可以考证先秦古书的传说，而具体地以一书为对象而统加校雠的，以《管子集校》为一大著作。

《管子》书的内容，多古字古言，兼有儒、道、名、法、农、阴阳诸家之说，实为研究古代哲学和经济学的珍贵材料。唐尹知章注不能尽满人意，后来从事校释的，也都瑕瑜互见；只就文字舛讹来说，也并没有解决。郭沫若据宋明刻和钞校的不同本子十七种，自宋以来各家的有关著作四十二种，包括多种未刻稿本及闻一多、许维遹的底本，汇集编次，而加以折衷案语，全书达一百三十万言，可称自有《管子》以来所未有的一次大整理。

利用甲文金文的新工具

《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脩。”(脩，原校改循。)这蜀字说者纷纷，有作器、独、櫛、蜀、浊各种的诂释，《集校》云：“抱蜀之义，说者均迂阔。蜀乃鐻之假字。《广雅·释器》：鐻、铎、钲、铙、钟，铃也。故鐻亦犹铎耳。《论语·八佾》篇：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言天不言而以孔子为代言也。《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

铎。郑注：古者将有新令，必奋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抱蜀即奋铎，抱而振之斯为奋。铎声既振，故不言而庙堂既循，闻者肃然也。”这条犹是用传统的方法，求之假借字，而知蜀即鐻字，鐻犹铎字。又引《论语·八佾》和《周礼·天官·小宰》的木铎作证，而其义遂豁然明了。又：“飞蓬之间，不在所宾。”自来校者，都注意在上句的间字而没有注意到下句的在字，因之总不妥贴。《集校》云：“不在所宾。在当作才。墨宝堂宋本作不，亦才之误。凡甲骨文、金文在字多以才为之。不才者，《左传》文十八年举四凶之名均斥为不才子。不才所宾，即《书·牧誓》篇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道行不顾，则与之相反，言道德行义在所不顾。”这条是用甲骨文、金文来校，知在当为才。又引《左氏》文十八年传和《书·牧誓》作证，而上下文理遂顺。运用此种新工具，非段玉裁、王念孙等所能梦见。

正确的立场观点

《乘马》篇：“百货贱，然后百利不得，百利不得，然后百事治。”孙星衍、王念孙、张佩纶均谓“百利不得”的“不”为衍文，当作“百利得，然后百事治。”只有何如璋仍主用原文，而解释不明确。

《集校》云：“当作百利不得，何说得之。尹注谓不得过常之利也，正是的解。此乃言商贾不能获得超额利润。百货言货物多，百利言利润多。货物贱则利润少，不能作超额剥削。剥削少则市场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故曰百利不得则百事治。”这是用正确的经济观点作推理的校正。人民在商贾的残酷剥削下，只有增加痛苦，哪里能说百事治呢？所以剥削少，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马叙伦的校讎学

马叙伦撰《说文六书疏证》，煌煌巨制，当与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诸家比并。他熟精许氏之学，执此工具来校理古籍，于本字

和假字，疏通证明，都能怡然理顺。所著《老子校诂》四卷，《庄子义证》三十三卷和《读吕氏春秋记》、《读汉书记》等书，都可见他校讎工夫的湛深。

《庄子义证》以众本校文字

就《庄子义证》为例。自序：“今世所行世德堂刊郭本，其夺讹视诸本为最。晚近遵义黎氏覆宋刊成玄英疏本，亦载郭注，然余疑成疏虽据郭本，本亦自行，今乃取别一郭本而附以成疏，此详检注疏而可知者。湘乡郭氏所刊《集释》本，盖据黎本，顾亦时与黎本异。余治庄书，苦无所从，乃欲为之讎勘。以近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虽面目无差，病其合两残本而一之。又涵芬楼有所谓赵谏议宅本者，未得窥其原书，读孙氏毓修所为校记，则差佳于世德堂本。不得已而取黎本为主，以涵芬楼影宋本世德堂本及明刊崇德书院本及陈景元《庄子阙误》所记各本异文，兼取《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文选》注、《后汉书》注核之。宋以前人所著书中称引者，偶有所见，亦并及之。虽于大体无益损，奇文零句，借以核正者致多。扫叶之讥，固不能免，旨在证明意谊，遂不辞于疏漏。”世德堂刊《六子全书》，在明刻书中要算是较好的本子，然经他用各本校勘《庄子》郭象注，发现在诸本中夺讹最多，由此益可见明人刻书的不尽可靠。唐孔颖达、贾公彦撰诸经义疏，本自单行，南宋时为了读者的方便，把它和经注合刻，而不顾他们所据的底本各有不同，便造成了文义上的矛盾和舛错，所以段玉裁主张校经者要做到以郑还郑，以杜还杜，以孔还孔，以贾还贾，各还他们的真面目。今又发见成玄英的《庄子疏》，本自单行，也经后人硬把别一本《庄子》郭注配合付刻，和诸经义疏一样，这是必须从细密的校勘中才能得到的结论。除了汇校宋明各本及类书古注外，又注意到宋以前人所著书中所称引的，因为这些材料就是宋以前的古本，虽属奇文零句，仍可校正今本之误，这是非常珍贵的。

又以音训校文字

自序：“《庄子》书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学者喜读之，然其用字多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后有字之本义世久不用，而犹存于《庄》书，学者多不明文字本义，又昧古今音读变迁之迹，是以注释此书者，无虑百家，率皆望文生训，奇谈妙论，虽足解颐，顾使庄生复生，当复大笑。夫所贵为古书注释者，乃欲使今人读古书，如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得一译人耳。苟人为一解，家张一说，使听者何所从。”阮元序王引之《经义述闻》云：“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谕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凡是正确的理解，必需根据正确的文字，据错误的文字立论，无非是歪曲异议，使古人复生，也必然要大笑了。何况《庄子》是部哲学理论书，文句又非常古奥难明，更容易穿凿附会，各凭自己的主观来发挥，所以诸子中注解《庄子》的特多，而很少得《庄子》的真意。他对《庄子》的文字语言作了比较正确的校定，从而理解他的意义也自然更真切了。

杨树达的校雠学

杨树达精于文字、音韵、训诂及文法之学。他用高邮王氏之法来校读古书，并推而及于治甲文与金文。其说解往往超出王氏之上；盖科学研究，后来居上，又有地下的新出材料，其不断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他在北京时，曾与吴承仕、邵瑞彭、高步瀛、陈垣、孙人和等，取北齐邢邵语组织思误社，后来改名思辨社，专以校订古书为事，这是从前所没有的创举，而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空气，是值得注意的。

他校雠的成绩，散见于所著的《甲文说》、《金文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等书。其专著则为《汉书窥管》、《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三书。

《汉书窥管》的破除迷信权威

班固《汉书》为人人必读之书，历代多有校注，而以王念孙《读书

杂志》中《汉书》十六卷，王先谦《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最为空前的杰作。然百密一疏，仍未能免。杨树达校讎之学虽以王念孙为宗，而王先谦又为同乡前辈，然发现他们有舛误之处，绝不回护，必加纠正，可见他治学态度的公正。例如：“《郊祀志》曰：‘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师古以汾阴直连读，训直为当，谓正当汾阴，是也。盖气在天空，方所无由确指，故举汾阴而云直，谓当汾阴地面之天空也。高邮驳颜说，以直有金宝气连读，训直为特，则似汾阴地面有金宝气，于事理不可通矣。《金日磾传》曰：‘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高邮于奉车下校增都尉二字，不知班氏因下有都尉二字省略也。《儒林传》云：‘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弘农河内下并当有太守字，因下文太守字省略也。《王莽传》云：‘又置《六经》祭酒各一人，琅玕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讲《春秋》、讲《诗》、讲《易》、讲《书》、讲《礼》下亦各当有祭酒字，亦因下文讲《乐》祭酒省略也。高邮必增都尉二字，不惟不能心知其意，亦暗于全书通例矣。此类误说，理宜在屏弃之列，而《补注》一一迳录，不加驳正，非也。”校书必须辨察事理，才不至有所误解，如第一条的举例。又须辨察全书的通例，才不至有所误增误删，如第二条的举例。后人采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仍必须自己考索一番，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否则便容易以误传误，伊于何底了。这是教人们不要迷信权威，而必须独立思考的很好说明。

《淮南子证闻》的反对贵远贱近

《淮南子》的研究，前于杨树达出版的，有刘文典的《淮南子集解》，他荟萃了清儒的成说，而又广取唐宋类书所引《淮南》本文，详加勘校，应该是部好书，但杨树达在《读刘叔雅君淮南鸿烈集解》一文中，举出了它的缺点。一为所据本的失择，二为本文之失校，三为高

注之失校，四为成说之失勘与失引，五为体裁之失。(又分为：甲、隔断正文，乙、引成说前后倒置，丙、交代不清三项。)六为标题之失。这都是教人们校讎和著作的重要方法。他自著的《淮南子证闻》六卷，是在王念孙已有基础上再作钻研的收获。《后序》云：“学者群奉许君为训诂学大师，然今读其《淮南鸿烈间诂》残存者八篇，以之与《说文解字》较量，其美恶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又试取《闲诂》与清代高邮王氏说经校子史之书相校，王氏立训之精，又迥非许君所可及也。然则王氏之业优于许君乎？曰：非也，此时代为之也。天地间万事万物，莫不向前发展而日进，学术何独不然？向令王氏生于东汉，亦必无由过于许君也。余尝谓训诂之学，明义诂为首要矣，而尤贵乎审辞气。大抵汉代儒生精于义诂，而疏于审辞气，赵宋学者善于审辞气，而疏于义诂。王氏生当汉宋之后，挈取两者之所长以成其术业，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而绝特秀出于前古也。今日文法修辞之学大明，志学之士又不当以王氏之兼审辞气为已足，而以之自囿也。世有独见之士，不为贱近贵远之成见所蔽者乎？或当知吾说之不诬矣。”

汉许慎有《淮南子间诂》，今只残存了八篇，和高诱注相混淆，清儒才把它清理出来。许慎之不如王念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犹之杨树达比之王念孙又有所提高一样。我们不应该迷信古人，贵远贱近就是厚古薄今，这一错误观点必须打破。他对于汉宋人的治学方法，作了公正的论断，主张必须把明义诂和审辞气相结合，来作为此后发展的途径，也是很正确的。由于清代以来有些学者，或取此而失彼，或取彼而失此，不是支离破碎，就是卤莽灭裂，这是针对着他们说的。

《整理古籍计划草案》

为了准备校讎的必要工具，他曾拟有《整理古籍计划草案》一文云：“我国古籍，经汉唐宋清各代儒先之注释考证以至今日，读之文从字顺者固多，而扞格难通之处仍复不少，此无可讳饰之事也。推求其故，一由于文字之扞格，二由于制度文物之不明。如欲求古籍之大

明，非从此二事下手不可。”欲明制度文物，是属于考古的事。解决文字之扞格，是属于校讎的事。他计划编纂三部工具书，第一是编纂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因为这对校讎有密切关系。现把这一段的原文附录于此，供后来者参考。

一、编纂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

本文所云经籍，与阮元《经籍纂诂》之经籍义同，不限于《十三经》。经籍文字之扞格有二事：一曰文字之通假，二曰误字。明通假赖乎小学，订讹误赖乎校勘。清儒于此二事成绩卓绝者为高邮王氏父子，其所著《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犁然有当之处最多。俞曲园私淑高邮，论其精诣，则远不逮。王氏《述闻·通说》内有经文假借一条，历举经典中通假之字为前儒所未及者，亦既美且富矣。然经籍至博，非一家一人所能尽也。据个人数十年来之经验及多年之思考，觉欲令古籍大明，非广用此术不可。故窃谓宜取古籍之有异文者，以及清儒说经诸家之卓然可信者，将其说通假之处逐字胪列，为经籍异文假字考一书，令学者得此可以触类旁通，或者文字之阻碍可以少减乎！（《纂诂》每字之末附载异文，然不完备，清儒说更未及。）

自宋及清，研究金文之风颇盛。清末甲骨出现，治之者亦盛极一时。以余所见，立说者虽多，尚不能全部审确可信。何者？甲金文已盛行通假，此关不破，终无是处故也。故余尝谓今日学者当以王氏治经子之法治甲骨金文，然后甲金文始尽其史料之用。如有经籍异文假字考一书，其价值与作用或当在阮氏《纂诂》之上，不惟经籍可以大明，甲文金文之学亦必放大异彩。此个人经验有得之言，非凭虚妄论也。

订三豕为己亥，子夏早已为校勘之学。汉儒解经，恒言某当为某，皆订误也。《老子》佳兵不祥之语，承讹袭谬，至高邮王氏订佳为《说文》训短尾鸟之佳，读如后世书传之惟，而文义安。

《书·酒诰》之越百姓里居，《大诰》之前宁人，至清儒治金文，乃知里居为里君之误，前宁人为前文人之误，而文始可读。故应取古籍中误字一一录之，附诸异文假字考每字之末，此通经之助也。

闻一多的校讎学

闻一多校讎古书的成绩，在他所著的《古典新义》中，除了考古和释字的部分外，如《庄子内篇校释》与《楚辞校补》两种，也是用段、王以来传统的方法，而辅益了甲文和金文的新出材料，思理非常细密。

《庄子内篇校释》四例

《庄子内篇校释》自《逍遥游》至《应帝王》共七篇，而不及外篇杂篇，似是未完之稿。近人研究《庄子》所收材料最丰富的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作者用此作底本，而标识四例来处理。一、误文改正者。二、倒文乙转者。三、脱文补足者，皆在字旁加“·”。四、衍文删去者，在空格内加“○”。这使读者便于认识校文。《逍遥游》篇：“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今以木为舟，则称卫舟大白。”《校释》云：“《释文叙录》曰：《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怪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又记崔譔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均视司马、孟氏卷帙为少。然则诸家于司马、孟氏旧本，所刊落者多矣。今诸书所引《庄子》佚文有司马彪注者，不下十数事，即诸家所删司马本旧文之确然可考者。《书钞》一三七引《庄子》曰今以木为舟，则弥卫舟大白。慧琳《一切经音义》八九引弥作称，又引司马彪注曰大白，舶名也。寻绎文义，当在本篇水浅而舟大也下，上言芥舟，大小对举，与本篇文义适合。今补。惟语似未尽，或以下尚有阙夺。慧琳引弥作称义长，今从之。”司马彪的《庄子注》，唐时犹

存，故陆德明、虞世南、慧琳都能见到，后来便亡失了。闻氏钩稽仅存的残文，校补了这两句，虽然仍不完具，但文义是适合的。且可证实陆德明注者以意去取的话。又《齐物论》篇：“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葆光者，资量万物者也。”《校释》云：“《淮南子·本经》篇曰：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谓之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案粮为量之误，资与贄通，贄亦量也（《后汉书·陈蕃传》注）。瑶从畱声，畱从缶声，葆从保声，缶保声同，故葆光一曰瑶光。本书文与《淮南》同，惟阙末句，疑当据补葆光者资量万物者也九字。”先秦古书，往往有雷同或类似的话，可以取来互校。《淮南子》是杂家，杂家中有道家在内，和《庄子》是同源，更可以取来互校。所引《淮南·本经》篇来校《齐物论》，不过文字小有不同而已，而末句恰可校补《齐物论》的脱逸，所异者一作葆光，一作瑶光，又以声类相通之故加以说明，而知二者即一。这都是非常细致的校勘。

《楚辞校补》的基础工作

《楚辞校补·引言》：“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岐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字义，三校正文字。”又云：“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连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项同时交出。但情势迫我提早交卷，只好将这最下层，也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一并提

出。……在一部书上已经花上了十年左右的光阴。”他对这部书的研究花了十年光阴，所以相当地精密，虽则主要是校正文字，确是最下层也是最基本的工作。譬之建筑，没有把下层基础做好，是不可能建起高楼大厦来的，倘为了重视第一项而因之轻视第三项，是完全不科学的。

校讎必须有实证

《凡例》的第五条云：“本书论列之内容，其范围如下：今本误，可据别本以诂正之者。今本似误而不误，当举证说明者。今本用借字，别本用正字，可据别本以发明今本之义者。各本皆误，而以文义、语法、韵律诸端推之，可暂改正以待实证者。今本之误，已经诸家揭出，而论证未详，尚可补充证例者。（诸家说已精确，而论证亦略备，本书作者无可附益者，本书概弗征引。）”这里提出的五条内容，也可说是校讎学的正确原则。尤其是第四条，虽从文义、语法、韵律推得了它是误字，究竟还没有实证，未必就十分正确，那末只能暂改而不作定论，再作广博的探讨，以期望得到实证。这种态度是谨严可法的。

陈垣的校讎学

陈垣为思辨社社员之一。他擅长史学，对于史籍的校勘，功力极深。著作已刻的，有《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三种，第二集五种。他对《元典章》一书校勘的成绩，尤为卓著。著有《沈刻元典章校补》，计《札记》六卷，《阙文》三卷，《表格》一卷。又《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后在书面加盖《校勘学释例》五字，是后定的书名，这部书虽是校《元典章》，而其方法可通之于校其它各书，故改作《校勘学释例》，是适当的。

校《元典章》的成绩

《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无卷数，《四库全书》收入史

部政书类存目。《提要》称：“所载皆案牘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瞽乱，漫无端绪，观省札中有置簿编写之语，知此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故初拟缮录而终存其目焉。”姚鼐《惜抱轩书录》称：“此书载案牘之文，未免细碎猥杂。又元时陈奏诏令，直用当时俗语，转经钞写，或有舛误，至今多有不可通晓者矣。然一朝制度之详，史所不书者，此略备之。”是此书未被前人重视的原因，一为胥吏钞记，一为多不可通晓。而《四库》遂摈入存目，惟姚鼐知它为一朝制度之详，可以补史之阙，较为公允。此书自元刻之后，也仅有钞本流传，已似若存若亡之数。到民国初元，沈家本才把它重刻，因所据的底本不好，校对又不精，所以谬误极多。陈氏据久闕在清宫内的元刻本和其它旧钞四种，详细校勘，其《释例》六卷，对校雠方法的发明，尤为精密，可与王念孙校《淮南子》所举的例子方驾比美。王例为校汉以前书，故必以文字、音韵、训诂通之。陈氏乃校元代之书，有所不同，故分为六例：一曰行款误例，二曰通常字句误例，三曰元代用字误例，四曰元代用语误例，五曰元代名物误例，六曰校例。每例下又列细目，学者由此类推，则校雠之学，思过半了。

总结校法的四例

《释例》全书，所据材料只《元典章》一书，而第四十三的“校法四例”所举的纲，却是总结了校雠学所有的基本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校法，即以前所称的死校，本校、他校、理校三法，即以前所称的活校。今节录于下：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

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缙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即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脱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见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字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僂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